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魏雪垠传——史海文心



姚雪垠传

第一部早年生涯 (1910—1937)

第一章差点溺死的孩子

1910年10月10日(农历庚戌年九月初八)，中原大地的夜晚。秋高气爽。地上的菊花散发着醉人的清香，天空月明星稀，一片湛兰……

此刻，河南省邓县西乡姚营寨的一户破落地主家里，婆婆正躺在上房东间的榻上嗞嗞地抽大烟。儿媳妇在自己的房间，疼痛难耐、满脸汗珠地生孩子。老婆婆虽已上了年纪，但却全神贯注、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她孙媳妇的身旁。她时而看看孙媳妇的动静，时而看看放在地上的张着象饿狼似大口的尿罐。她的神经紧张极了。她想：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孙媳妇把孩子溺死。孙媳妇最好是生一个女孩儿，而且最好过了子时再生。因为一过子时，便是九月九日，她可以给他的重孙女起名“重阳”。

老婆婆正想得入神，婴儿坠地的啼哭声突然把她惊醒。于是她非常利落地把刚刚出生的婴儿即刻抢到手中，剪过脐带以后，便抱着孩子跑到她住的堂屋西间，并且边跑边说：“她孙媳妇，你生的是个男孩儿，我向你道喜了。”

“老婆婆，你为什么要救他？”孙媳妇一边看看她事先精心布置好的准备溺死孩子的尿罐，和要压在孩子身上的那块大石头；一边看着老婆婆抱着孩子出门的身影，失望又痛苦地说：

“我的命多苦啊！不溺死他，我以后的日子将怎么过？”

一场紧张的生死搏斗结束了。窗外，夜色正浓，秋菊散发着阵阵清香。

孙媳妇是战败者，有气无力地躺在炕上哭泣、流泪；老婆婆是胜利者，她让事先请好的一位姓胡的佃户女人给她的重孙喂奶。三天以后的一个晚上，老婆婆将刚出生的婴儿抱到她孙媳妇的房间，让孙媳妇看。孙媳妇看见她生的孩子五官端正，特别可爱的是有一双双眼皮的大眼睛，十分明亮的黑眼珠随着老婆婆手中的灯光转动。见此情景，孙媳妇流出眼泪叫着说：

“神娃儿，神娃儿，真是神娃儿！我绝不再让孩子死了。”

但对此，老婆婆仍然不放心，仍不敢将孩子留在这位母亲的身边。她毫不客气地当场就又把孩子抱到自己住的堂屋西间。直到满月以后，当地知道这位母亲确实不再让重孙死时，才把孩子交给她的孙媳妇。

这个差点被溺死的孩子，就是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的姚雪垠，本书要写的主人翁。

他当时被起名叫“姚冠三”。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姚雪垠这位著名作家，一出生就不受欢迎，遇到一难。当时虽然大难不死，化险为夷了，但从此以后，在他漫长的一生的道路上，命运却给他安排下了许许多多的灾难，要这位“雄才”经受……

姚雪垠的母亲为什么准备把他溺死在尿罐之中呢？

这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情况来寻找原因。从社会环境来讲，当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政府腐败不堪，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贫民百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溺死，这种溺婴的风气在河南农村非常盛行；从家庭情况来看，一则那时的姚家已经开始没落，姚雪垠的祖父姚守业，祖母袁氏都抽大烟，姚雪垠的父亲姚薰南、姚雪垠的

姑姑也都抽大烟，而且这位姑母出嫁很晚，一直和姚雪垠的母亲相处不好，关系紧张，但受气的常常是姚雪垠的母亲。虽说白天洗衣做饭家中有伙计，但姚雪垠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厨房帮忙，至于到了晚上，她总是为婆婆烧烟，这样的劳累痛苦简直使她难以忍受；二则，在姚雪垠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已生过两个孩子，他们是姚雪垠的大哥姚冠杰、二哥姚冠洛。如有第三个孩子，她不愿意也根本没有精力来抚育。因此，姚雪垠的母亲在她生姚雪垠以前，已决定将他一生下来就溺死。

这情况，姚雪垠后来在一篇回忆他青少年时代的文章中曾经写道：

“远在我降生之前，我的家已开始没落。我的祖父是在童年时代就有了大烟瘾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披一条小小的发辫，穿一双‘双脸儿’花鞋，带着长指甲，说话时不住地从鼻孔发出来干的声音。他每天四分之三的时间是躺在床上抽鸦片，有时他自己烧烟，有时有一个烟把子替他烧，他只管舒服地闭着眼睛抽。他的娱乐似乎是只有玩鹌鹑和玩戏子，而后者尤使他着迷。在封建时代，青年戏子多供地主们发泄性欲，社会上谈起来不以为耻。所谓男色或男风的爱好竟然在官僚和地主阶级中公然流行，明清两代更盛。我的祖母死的时候我只有四岁，除记得有人抱我到她的棺材旁边外，她没有留给我任何印象。不过我听说她的烟瘾很大，每天得一两膏子。我母亲白天忙着帮伙计做饭，忙着服侍她，忙着照顾我的哥哥们，到夜间还得替她烧大烟。我的父亲和他的唯一的姐姐都是在幼年就抽上烟瘾，象当时一般没落的地主家庭的孩子们一样。生我的时候，我的父亲没在家，似乎在省城读书。我的姑母出嫁很晚，也需要我的母亲服侍。正如旧家庭的一般情形，我的母亲和我的姑母是天生的一对敌人，直到死不曾和好。据我的母亲说，我的姑母常常在我的祖母面前陷害她，挑唆是非，使她受虐待，甚至挑唆我的父亲打她。我虽然不完全相信母亲的话，但母亲的恨姑母却是真的。一则因为家庭里天天生气，二则因为眼看着家产没落，母亲在我诞生前下了狠心，决意不让我留在世上。多亏老奶是我的救命恩人，假如没有她，我不会在人间活一个钟头。”

姚雪垠的老祖母又为什么要救姚雪垠呢？

一方面因为，姚雪垠的母亲没有能够保守秘密，把向己要溺死孩子的消息，事先告诉了这位老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姚雪垠的老祖母从18岁就带着一个孩子守寡，她亲眼看见姚家三代单传、人丁稀少的情况，所以她特别希望能有几个重孙，家里人丁兴旺。于是她决心抢救孙媳妇生的第三个孩子。经过她的努力，她的第三个重孙终于得救了。但是被抢救出来的姚雪垠，在小时候从来没有感激过老祖母的救命之恩，反而特别顽皮，每逢姚雪垠惹老祖母生气时，老祖母总是骂姚雪垠：

“不孝顺的小东西！要不是我把你从地上抱起来就跑，世界上也不会有你。”

“是的呀，”姚雪垠学着老祖母的口吻说，“不孝顺的小东西！要不是我把你从地上抱起来就跑……”

不等姚雪垠说完，他的老祖母就笑了，他的母亲和家里的伙计们也都笑了。

但是姚雪垠长大以后，他就真诚地感激他的老祖母了。他说：“在我的家人和亲戚中，留给我的印象最美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我的老奶。每次回忆到我的老奶，不免有一种淡淡的怅惘之感。”为此，在姚雪垠成为作

家之后，曾经带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的老祖母》的散文，详细记述了他的老祖母的善良、勤劳和孤苦的一生，既作为对她的报答，也作为永远的纪念。

姚雪垠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的家世居在闭塞的乡下，离城有五十华里。这是一座有名的寨子，里面住着不少大地主和他们的佃户。当我的老奶才嫁来的时候，我的家还没有开始没落，大概有将近三、四百亩地，另外还有生意。我的老太爷有三个儿子，老爷是他的长子。老爷结婚后一年左右，便撂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婴孩去世，好象天从老奶的头上塌了下来。那时候，老奶大概只有19岁，决心带着这个多病的婴孩守寡，过完她悠悠的一生。”

姚雪垠在他文章的结尾还说：

“我记忆中的老奶也确实是一个相貌可爱的老婆婆，不象一般老婆婆的瘦小枯干。很奇怪，我记得老奶有一双蓝色的眼珠。每次想起老奶就想起这双眼珠，好象她依然用这双蓝眼珠向我凝视。我似乎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老奶有一双蓝眼珠，母亲回答说：‘眼珠发蓝，因为老奶太老了。’可是我天天看见老年人，一直没有见过象老奶那样的蓝眼珠，难道是我的记忆错误吗？唉，多少年了啊！”

是的，应该为这位善良的令人尊敬的姚雪垠的老祖母立传！感谢她为我们救了姚雪垠，为中华民族抢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这位老祖母的功劳确实是很大很大的。

姚雪垠的多灾多难的童年，不仅指他刚一出生就差点被溺死，他的家庭也从那时起每况愈下，步步没落；而且还指他来到世上以后，正值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匪荒遍地，百姓遭殃。

在19世纪初和20年代，河南几乎每县都有土匪，而以豫西和豫南最为严重。当时的邓县几乎成了土匪的世界。在很多地方，当土匪兴起以后，随即又出现了对抗的力量。姚雪垠的家乡姚营寨也是如此。姚营寨的地主绝大多数都姓姚，他们的祖籍并不是河南。因为在明朝初年朱元璋打仗，才由江西迁移到了河南邓县。姚营寨的地主本来都是一族，但在荒匪年代却分成了两派：一派地主既有钱又有势力，称为绅士派，他们的子弟同外面的土匪有联系；另一派地主虽有钱但没有势力，常常受前一派的欺负。为了对抗绅士派，后一派的地主便结成联盟，推举姚雪垠的父亲姚薰南为首领。

姚薰南被推举为后一派的领袖人物以后，就从外边请来几位“硬肚”教师，教大家唱符念咒，练“硬肚”，抗枪炮，反对绅士派。但谁知，“硬肚”没学几天，就引起了敌对派的严重注意。绅士派为了打垮所谓刀枪不入的“硬肚”派，他们中有的子弟便同外边的土匪串通勾结起来攻打姚营寨，企图打死姚薰南，搞垮“硬肚”派。

1919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北风怒号，黑云乱飞。姚营寨的人们都熟睡了。趁“硬肚”派没有防备，绅士派却引来土匪攻打寨子，实现他们的预谋。

当土匪攻破寨子以后，在寨中却到处找不到姚薰南和他的妻儿。于是他们便大肆烧杀“硬肚”派的家和人。他们首先把姚薰南的住宅和姚家佃户的住宅全部放火烧光，接着打死了姚薰南这一派中的九名地主。

正巧，这天姚薰南带着他的妻子张氏和三个儿子，到村外走亲戚去了，才使得姚氏一家未遭惨死。可当他们在七、八里外的亲戚家望见姚营寨的冲天大火，听到密密麻麻的枪声之后，姚雪垠的母亲绝望地哭着说：

“ 我的天呀！那被烧的就是咱家的房子，那就是咱家的房子…… ”

姚雪垠的父亲姚薰南也痛苦无比地自言自语地说：

“ 完了！一切都完了！恐怕祸不单行，也许他们还会追到这里来杀我。 ”

说罢，他稍作安排，当夜就带着姚雪垠的大哥和二哥，从亲戚家动身逃到邓县城里去避难。一个月之后，当他在县城租好房子后，派人把妻子和姚雪垠也从亲戚家一起接去。

从此，姚家便由破落地主，变成房无一间，地无一亩的赤贫人家。姚雪垠的母亲因受刺激几乎疯了；姚雪垠的祖父曾上吊自尽未遂，但之后，很快就与姚雪垠的老祖母先后死去。

姚雪垠这一年只刚刚 9 岁，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却永远记下了这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

第二章作文 100 分的学生

姚雪垠上小学的时间很晚，8岁以前一直不曾识字。但他聪明伶俐，记忆力极强，早在孩提时代就耳濡目染地受到了动人的历史故事和美丽的文学童话的熏陶。

还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当他父亲姚薰南在屋里教他的大哥、二哥《三字经》时，他在院里玩儿，偶尔听到一些，便觉得《三字经》中那些历史故事非常有趣，于是他边玩儿边听，竟然把《三字经》都记住了，背会了，而且深深被那些有关《三字经》中的古代历史故事所吸引。当时，他们家有一个姓袁的伙计，因家穷没机会读书，不识字，但是想学《三字经》，结果就找姚雪垠作他的小先生。这位姓袁的伙计每当下地刨红薯时，就把姚雪垠放在背篓里，背着下地。到了地里，他劳动，让姚雪垠教他背诵《三字经》。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位姓袁的伙计竟然让小小的姚雪垠教会了不少《三字经》。

童年时代的姚雪垠，在天寒地冻的冬日农闲季节，也经常悄悄地跑到他们寨里邻家的牛屋，听大人们讲历史故事，谈论“古今”。

在姚雪垠的家乡一带盛产黄牛，农民耕田以牛为主，每个农家都有牛棚（牛舍），当地人称之为“牛屋”。在冬日的白天或夜晚，这种“牛屋”里，总是挤满了听故事的人，而且别有一番情趣：窗外狂风呼啸，寒气逼人；屋内烟气弥漫，火光熊熊；老黄牛卧在地上，懒洋洋地慢吞吞地倒着它那永远倒不完的沫，人们围着火，有的坐在土坯上，有的坐在旧木凳上，在全神贯注地听“古今”。小小的姚雪垠也同大家一样，在“牛屋”里，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甚至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他最爱听的是那些世代口传的神话传说，古人古事。比如，有名古人的经历，农民起义的胜败，一个家族的盛衰，一个朝代的兴亡；他也爱听近人近事，以及老年人亲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

有时，姚雪垠也爱听艺人们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演义》等书。

听“古今”，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历史知识；听说书，使他对故事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姚雪垠从小还在外祖母的面前或怀抱中，听到过许多美丽的童话。他在成为作家以后曾经这样说过：

“我首先读童话是在初中的课本上读王尔德的《快活的王子》，20岁以后才有机会看英文本的王尔德和安徒生的童话选集。所以最早启发我的想象能力，培养起我的文学兴趣的，不是王尔德，不是安徒生，也不是五四时代的文学先驱者，而是我的外祖母，一个不认字的乡下老婆婆。”

在夏天的夜晚，外祖母常常带着姚雪垠和别的姚营寨的孩子们在姚家大门外的沟边乘凉，或坐在席子上，或坐在草墩上、小椅上，有时就坐在扫过的黄土地上。这时灰蓝灰蓝的天空缀满了星星，一弯纤纤的新月挂在村边。千里风不时徐徐吹来，头上的树枝微微摇晃；沟那边是打麦场，夜色中可以模糊地看见场中有几座麦秸垛的暗影和几堆人影。人们在场中乘凉，扯闲话，烟袋锅中的火星在夜色中忽明忽暗。往往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外祖母用手抚摸一下她的随着清风飘动的鬓发，便开始给姚雪垠和村里的孩子们讲童话、说故事。她讲起童话和故事来，活灵活现，非常适合孩子们的口味，

简直使孩子们听的入了迷。即使是把同样的童话和故事，对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讲来，孩子们也从不感到厌烦。

有时，外祖母专门对姚雪垠一个人讲故事：白天，在村边的青草地上或碾盘上；夜晚，在屋中的小油灯下或锅台前，只要姚雪垠有要求，她从不拒绝。

所有这些，总加起来，也只能算作姚雪垠在学前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内容；他在 11 岁正式上小学以前，在邓县县城中居住的家里，还由父亲教过半年的识字，之后上过两个私塾，共读书一年半。

姚雪垠的老家被土匪烧光以后，他的父亲姚薰南逃进邓县城中，因生活所迫，无奈选择了一个为别人打官司写“呈子”的职业；同时在这个时候，姚薰南也开始下功夫教姚雪垠和他的两个哥哥读书。因为姚薰南在河南省的省城读过书，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又见多识广，所以他坚决反对姚雪垠弟兄三人读五经四书，在他给姚雪垠弟兄三人教学时，所讲内容，完全是按照当时小学校的课程进行。

姚雪垠在家里让父亲教识字半年以后，从 1920 年春起，当他 10 岁时便进入了一个私塾读书。在这个私塾里，他充分显示出了自己天资的聪颖，当别的学生还没有背出书来的时候，他早已背会，而且背书背得很快，甚至在他背书的时候，老师连看都来不及，他就背完了。

在这个私塾里，姚雪垠整整上了一年，结识了他生平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李万千。这位启蒙老师在他的心目中，曾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间已经过去 60 多年以后，直到 1986 年谈论起来，姚雪垠仍感触很深地说，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对不起他。

那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有一次成了作家的姚雪垠回到故乡，看见了已经非常苍老的李万千老师。当时，他的学生和徒弟们要给他立一个纪念碑，李老师要求姚雪垠为他撰写碑文。

“我同意。”姚雪垠当时答应说。但事后当他离开河南邓县回到上海时，他并没有写。结果没等到全国解放，这位李老师已经与世长辞了。

如今，姚雪垠带着深沉的追忆说：“我的这位启蒙老师，可能因为没有给他写碑文，死不瞑目。我为什么不给他写呢？当然我也有我的苦衷。因为李老师同我谈碑文的时候说，他培养了多少多少学生，有的已成了国民党连保主任、区长……要我写碑时都予提到……这怎么成呢？所以我就没有写。现在我这样说，也算是对九泉之下的李老师的一个回答。李老师培养的学生，确实有不少人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但也有一些成了人民的敌人，这并不能怪他。”

在李万千的私塾读了一年之后，姚雪垠的父亲又把他送到另一个叫李萼楼的老师办的私塾里就读。这个私塾在邓县北城的一条街上，离姚雪垠的家很近。这位姓李的老师，原是看城门楼的先生，家里十分贫穷，经常吃不饱饭。姚雪垠在此读书期间，他父亲往往让他把家里的米带两碗给李老师，以补救他的饥饿于万一。

在此读书期间，姚雪垠和他的同学们发现：他们常常去了，李老师并不在。时间久了，学生们才知道，原来李老师是到城东寻找充饥的“油饼”——芝麻打过油后做成的饼，一般用作牲畜的饲料，在饥荒遭灾年月，人们也用来充饥。而且，当李老师不在的时候，他的这些学生还乱翻他放在床底下的饭锅，终于发现：李老师的锅里放的尽是油饼；于是他们就调皮地给李老

师起了一个外号：把“李萼楼”改为“李饿篓”！

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北方的启蒙老师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和困苦！但是，即使如此，李老师教书教得却一直非常认真负责。他在教学中按照姚雪垠父亲的意见，不教四书五经，而是讲授国文、修身、历史、地理，外加一门他自己专门为学生开设的作文课。他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每隔一天，就让学生用通俗的文言文写一篇几百字的作文。开始时，他的学生都不懂得怎么写，但由于他决心想集中教会学生如何写文言文的作文，对每个人都精心给以辅导。结果，仅在半年的时间内，他的这一尝试竟大见成效，不少学生的作文水平都有显著提高，而姚雪垠的作文写得最好。对此，姚雪垠在成名以后常常说：“对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李萼楼，我一生都很感激，是通过他的辛勤教学，才使我从小就打好了写文言文作文的基础。”

1921年秋天，11岁的姚雪垠考入了邓县银行街教会办的鸿文高等小学，开始了他为期三年的小学学习生活。在此期间，除过学习小学的课程外，学校还让学生读圣经，姚雪垠对此很不喜欢；学校上的历史课，是按照英国的历史编的，外国的教师在课堂上竟公然讲什么“自上帝创造人类以来，至今已有六千多年”，而姚雪垠明明知道，那时中国的历史只有四千余年，他从心底里不赞成老师的说法。

姚雪垠在三年学习期间，对作文课一直非常感兴趣。他不仅努力刻苦地认真练习写文言文的作文，也下功夫练习写白话文的作文。结果，他的作文成绩，在整个小学期间每次都是100分，成为全校的出类拔萃的学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样的作文成绩，既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种因素。

第三章百日历险

一个清冷清冷的上午，从驻马店到南阳的三百多里的官路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奇怪的赶路者，其中一个为商人模样，四个是学生，有两个年纪较小的还坐在小土车上被人推着。

他们一面在恐怖中拼命地向前赶路，一面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不一会儿，商人模样的中年人对四个学生说：

“我要到前边找人去办点事儿，我们只好就此分手了。后会有期。”

这位商人模样的陌生人走后，一种害怕的情绪，即在四位学生的心中油然而生。他们议论说：

“这个人莫不是土匪的探子，假装与我们同行，现在跑去要告诉土匪来抓我们？”

“很有可能，那天他要求与我们结伴同行时，我就觉得可疑。”

他们一边谈论，一边赶路，当翻过一道岗坡，将近中午的时候，突然听见从背后传来一阵凶暴的喊叫：

“站住！站住！”

接着是几声枪响，子弹似乎从他们的头上嘘——嘘——飞过。

他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回头一看，有十多个土匪端着步枪从岗坡上跑下向他们追来。

“不准动！动一步老子就毙了你们！”一个土匪大声命令说，同时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别的土匪过来，把他们带的东西全部抢去；然后，他们被押送到一个被烧毁了的小村庄，关在一座房子已被烧光的小院。

他们进去以后，院子里已经关着不少人。有几个土匪正在审问一个跪在地上的青年百姓：“你家有多少钱？都藏在什么地方？快如实招来！如不说实话，就枪毙你。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我家没有钱，我是穷人，家中只有老母一人，靠我养活……”那青年不断向土匪磕头，苦苦哀求。

“他妈的！看来你是要钱不要命了。”一个土匪说完，就开枪打死了这个青年。

在被土匪抓来的四个学生中，一个有着浓眉、大眼、隆准、广额，五官端正，并且长得十分英俊的年纪较小的学生，见此情景，便用肘弯碰了一下另一位年龄比他大的学生，同时用手掀一掀他的衣服，脸上带着镇静的微笑小声说：

“过一会儿，我们也要象这个人一样完了！”

“别说话！”这位被掀衣服的人，看了同他说话的小学生一眼，悄声说。

这位浓眉大眼、英俊镇静的小学生，就是14岁的姚雪垠；同他说话的人，便是姚雪垠的二哥姚冠洛（后改名为姚作华）。

他们兄弟二人是在由信阳回邓县，途经泌阳境内时，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抓住的。

从此，姚雪垠即开始了他一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对他以后进行小说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的百日土匪生活。

姚雪垠本来在邓县的家乡读小学，怎么会来这里被土匪绑架呢？

这要从姚雪垠小学毕业后的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的历史形势说起。

1924年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思潮：在南方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

思潮，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并且正在准备北伐；但在北方，仍是军阀混战的年代，由于过分的宣传，使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形象，在青少年中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在河南省有不少小学生甚至非常佩服他。当时身任直鲁豫巡阅使、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驻节”洛阳，他的巡阅使署设在洛阳西工，而西工简直成了那时中国北方军阀、政客们纵横捭阖的活跃中心，同时也是吴佩孚的一个练兵中心。他亲自兼师长的嫡系精锐银队陆军第三师就附属有学兵营和幼兵营，并且不断从河南各地招收学生从军。在这一年的春天，姚雪垠的大哥姚冠杰（后改名姚含章），在别人的怂恿之下，已经进了洛阳西工吴佩孚的学兵营当兵。

1924年夏天，14岁的姚雪垠在邓县鸿文高等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怀着朦胧的“军事救国”的思想，跟随一位比他年龄大的姓杨的同学来到洛阳，雄心勃勃地要进吴佩孚的幼年兵营当兵。但当他到了洛阳西工见到他的大哥以后，却遭到了坚决的反对。

“吴佩孚的军队内部非常黑暗，你绝对不能来此当兵。你还年小，一定要去读书。”姚冠杰带着无限的痛苦对弟弟姚雪垠说：“在这里，老兵把新兵当作奴隶，新兵要侍候老兵，新兵动不动就挨打受骂，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前些日子，幼年兵营住的窑洞塌了，压死许多孩子，但竟无人过问……”姚冠杰叹了一口气又对弟弟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去信阳读书。”

姚雪垠当兵未成，就于这一年的秋天来到信阳，插班进入教会办的信义中学（初中）二年级上学。

信义中学，坐落在信阳西门外的狮河北岸，它的对面是美丽的贤隐山，校长是一位美国的牧师。但学校开学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就爆发了。到10月下旬，吴佩孚在战争中被打败，退到了信阳南面的鸡公山，国民军随即大批进入河南。吴佩孚命令他的部队在信阳车站四处挖掘战壕，信阳一带顿时战云密布，局势紧张起来。信义中学宁静的校园生活被军阀们混战的枪声搅乱。传教的外国人害怕打仗，提前将学校放假，命令学生各自回家。

姚雪垠心里燃烧着的渴求知识的烈火，被军阀战争的狂风暴雨给熄灭了。他和他同在信义中学读书的二哥姚冠洛，好不容易从兵荒马乱的信阳逃了出来，在弥漫着硝烟的中原大地上，同另外的几个同学结伴回家。信阳离他们的家乡邓县大约有五百余里，而且当时还必须绕道驻马店，才能去邓县，这样路途就更加遥远。11月的天气，夜里北风呼呼，雪花飘飘，他们几个人瑟缩在敞篷铁皮火车车厢中，冻得浑身麻木，好不容易到了驻马店。在荒凉的驻马店住了一夜之后，他们又在土匪如毛的通往南阳、邓县的已经荒废的官路上，胆战心惊，马不停蹄地行进！不料，在第三天，走到离家还有两百多里的泌阳境内，突然遇上了土匪。结果，他们统统被绑架，做了“票子”。

姚雪垠和他的二哥姚冠洛等几名学生被土匪绑架以后，并没有象那位青年一样，当场予以枪毙。土匪是在“杀鸡给猴看”，有意警告他们。土匪枪毙那个青年后，押着他们沿着高低不平的土路，又继续往前走，直到一个大村庄后，才把他们作为“肉票”关进一座大院的一间空房子里。主管“肉票”票房的土匪头目瓢子九，这时即刻出现在姚雪垠他们面前，要这几个学生马上给家中写信，让父母赶快派人拿钱来将他们赎回。

“我们是亲兄弟，恳求你放我弟弟回家，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姚雪垠的二哥姚冠洛向瓢子九哀求说。

“胡说，你们根本长得不象，别骗人。”

其实，纵然土匪知道姚雪垠、姚冠洛是亲弟兄，也绝对不会放走他们其中的一个。因为绑架、拉票，如果拉去兄弟二人，他们可以逼受害者家庭先赎走一个，然后再来赎第二个。如果受害者的家庭对土匪要的款子确实不易办到，土匪就先杀死一个，用这种办法进行威逼。

姚雪垠将写好的信给瓢子九念了一遍，即交给了这个土匪头目。瓢子九吩咐那个给姚雪垠推小土车的将信送往邓县、并向姚家讨雇车钱。从此，姚雪垠和他的二哥等学生，就度日如年的被土匪关押在“票房”，等待家中来人。但姚雪垠深知自己的家中很穷，不会有钱来赎。因此，他同他二哥的命运将到底如何？真有点使人感到不寒而栗！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姚雪垠的二哥对姚雪垠说：“这股土匪中，一个叫王三少的杆子头儿想要你做干儿子。”姚冠洛带着哭声叫着姚雪垠的乳名：

“三，二哥请求你答应此事。不然咱们俩很快就会被杀掉一个！冠三，你到底答应不答应，请回答我！”

“好吧，我答应！”

姚雪垠认真想了一会儿以后，对他的二哥点头回答说。

很快，姚雪垠便被瓢子九带到了王三少的面前。

“这就是你的干爹王三少，快跪下磕个头。叫干爹呀！”瓢子九对姚雪垠说。

“不用磕头啦！不用磕头啦！”王三少嘴上虽这么说，但心里却在等姚雪垠给他磕头。因为按照习俗，只有磕了头才能正式将干父子的关系确定下来。

“干爹！孩儿这里有礼了！”姚雪垠趴在地上向王三少磕了一个响头后，声音甜甜地叫着说。

王三少看见姚雪垠如此英俊、伶俐，就十分高兴地将他带走了。

姚雪垠虽然作了王三少的干儿子，但并没有改变他的“肉票”身分。他的行动随时都受土匪的监视；他仍然没有自由；相反，作干儿子后还给他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灾难；他可能成为王三少发泄兽欲的工具，被“鸡奸”。

爱好男风，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恶劣风习。在当时的河南一带相当盛行。社会上有男风，在学校男同学中同性恋和鸡奸的事也时有发生。

刚当干儿子的第二天，姚雪垠听到王三少手下一位性格豪爽的土匪刘老义对他说：“王三少认你作干儿子居心不善，如果他要欺侮你，你就抗拒，就喊叫！”听后，他便恍然大悟，提高了警惕。因此，他每天晚上同王三少睡在一个被窝里时，总是提心吊胆，同王三少脸对脸地睡在一头，深怕王三少在夜间有所动作；他并且下定决心，一旦王三少要对他下手，他就坚决反抗。如此这般，姚雪垠夜夜警惕。直到十几天以后，王三少离开李水沫的杆子，他那颗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

姚雪垠被土匪绑架以后的生活，真可以说是一浪未平，一浪又起。他的干老子王三少头脚走，后脚就出来一个薛二少的头目，想收他当干儿子。

“你是愿意回票房？还是当薛二少的干儿子？情你想好后告诉我。”土匪刘老义向姚雪垠说。

姚雪垠这时的心里简直乱极了。他想：自己如果回票房，二哥必然先被杀死；而且，他们发信以后，家中根本没有消息，这一时期他的二哥已同别的“肉票”一样受罪，被一根绳子绑着胳膊，脸从来没有洗过，蓬乱的头发

里长满了虱子，……为了使他的二哥少受打骂，免于一死。他当即就答应了做薛二少的干儿子。

薛二少是农民出身，家住薛岗寨中。他不让姚雪垠叫他干爹，只要他叫二伯。他和他的手下对姚雪垠都很好。这些土匪们几乎没有人叫他的名字，而只叫他“娃儿”。他们也都再不把他当“票子”看待，更不防范他逃走。有一次，姚雪垠在房间里玩土匪们挂在墙上的枪，不提防有顶膛子儿，砰的一声响了，将他吓了一跳。这时有两个土匪不知出了什么事儿，赶快跑未。当他们知道是姚雪垠玩枪走了火时，并没有骂他，只是告诉他以后要小心。

显然，姚雪垠这时已由“票子”变成“贼娃”，甚至成了这股杆子中的一员。

这期间，土匪们去破寨，姚雪垠就跟着助威；他们烧房子，他也去点火；土匪向地主索款或催促人们来赎“票子”，他就伏在小桌或磨盘上代为写信。

这期间，每当他看见土匪扫死抵抗的红枪会的农民，他心中虽然不免凄然，但他又认为他的义父和那些土匪们原本都是好人，心地善良，是迫不得已才拉杆子。他从心眼里喜欢他们讲义气，作战勇敢。

这期间，他看着这支土匪由小到大，迅速发展；他也看到了大杆子内部的矛盾，看到了杆子与地主豪绅之间又对立又勾结的复杂关系，还看见了大杆子与各派地方小军阀之间的争斗。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增加和丰富了他对于土匪的感性生活知识。

有一次，当这支杆子被军阀追击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姚雪垠不仅不害怕，而且表现的十分勇敢。他几乎是随几个土匪最后才退出阵地。这支杆子的“二驾”看见他走在后面，随时都有被流弹打死危险时，便大声命令：

“娃儿，快牵着我的马尾巴！”

“不要紧！”姚雪垠又惊慌又快活地答着，牵着马尾巴渡过了河。还有一次，这支杆子被军阀包围在一座大庙中，姚雪垠竟冒着枪林弹雨，从围墙内探出头来放鞭炮取笑和恐吓军阀……

后来，这股土匪被打散了。他的土匪头目义父薛二少才派人把姚雪垠送回邓县家中。但这时已是1925年的春天。

姚雪垠在土匪窝里整整度过了一百天！

当姚雪垠百日历险后回到家时，正是一天的早晨，一进大门，他象平常从学校回家时一样，大声地呼唤娘，不过声音中却带着哽咽和颤栗。母亲一听见他的呼唤，立刻在病床上哭着说：“唉！三儿的魂灵回来了！”姚雪垠的大嫂这时急忙从姚母的房间走出来，看见姚雪垠已经跑进二门，于是她一面迎接姚雪垠，一面用带有哽咽、颤栗、吃惊和欢喜的声音告诉她的婆婆说：

“娘，三儿是活着回来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时势造英雄。这二十年代出生入死的一百天土匪生活，竟对他一生的小说创作起了重要作用。姚雪垠在抗日战争后期写的长篇小说《长夜》，就是依据这一段生活遭遇，写中国北方农村经济崩溃后，农民没有出路，土匪蜂起，但是当蹉将也不是出路。群众在漫漫长夜中挣扎。在事过50多年以后，于1979年10月13日，姚雪垠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中说：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我自己。我

是农历 9 月间生的，9 月俗称菊月，所以我将主人公起名菊生。这故事发生在 1924 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这正是我被土匪捉去的那段时间。”他还说：— “关于我被土匪捉去的经过和在杆子中的生活，小说中所写的都是真实情况。” “我在写《李自成》时，取自《长夜》中的生活经历不少。” “《李自成》中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可以在《长夜》中找到影子或原型。”姚雪垠还在 1980 年写的《学习追求五十年》一文中回忆道：

“我回到家中大概在阴历二月上旬，在杆子中间的时间大概有一百天左右。这一段少年时期的绿林生活对我后半生的文学创作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使我写出了《长夜》，也对我写《李自成》很有帮助。”

第四章失学期间

15岁的姚雪垠从土匪那里回来以后，在长达四年多的岁月里，一直失学在家。

在此期间，他虽然有两次上中学的机会，但都未能如愿。一次是他回家不久，就去考上了南阳第五中学，因为这个学校是教会办的，当地的军阀不允许学生去上学；另一次是在1925年的秋天，他到樊城进入教会办的鸿文书院（相当于初中）二年级读书。去后不久，即被父亲寄去的“母病重，见信速回”的十万火急的信件催回家中，可当姚雪垠回家以后，发现他的母亲并没有生病。原来因为他当兵的大哥已战死在外，二哥也离家跑去当兵，外面又兵荒马乱，土匪遍地，他的父母怕再将他也失去，所以才假“母病重”之名，把他叫回，不让再念书。

从此，姚雪垠便一边烦闷地生活在充满悲剧气氛的家庭中，一边刻苦进行自学。

姚雪垠的母亲张氏，本来人很聪明能干，在年轻的时候，只要她听一遍戏的唱腔，便可记住，唱给别人听；但她没有文化，是一位旧式的妇女。可自从姚家在乡下的房子被烧以后，她就抽起了大烟，加之她的大儿子因当兵死在外面，二儿子也跑去当兵，这就更使她受到刺激。她完全变成了神经质很厉害的女人，甚至可以说她真的有点儿疯了。

这种情景，姚雪垠在成了作家以后回忆他青少年时代家庭的两篇文章中曾作过详尽的描述。

在一篇题为《外祖母的命运》的文章中姚雪垠写道：

“我们逃进城里不到两年，母亲慢慢地也染上了鸦片烟瘾。起初她还在别人面前护短，后来就不再瞒人，公开地摆起烟盘子了。从母亲有了烟瘾之后，家中的活儿她一概不管，反而白天和夜晚都需要别人侍候。她动不动就吵人、骂人：动不动就呻吟、就哭泣、就怨天尤人。从我10岁起到19岁飞出家为止，在差不多10年中我只见母亲的脾气一天天地变坏，身体也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我同母亲住在上房，白天和夜晚我常被母亲的不正常的脾气所苦。当我正读书或画画的时候，我会突然听见母亲的没有理性的吵骂、号哭，弄得我头顶冒火，胸口几乎要炸裂。母亲愈是脾气坏，愈是多病。我永远不会忘掉，每当我含着愤怒和痛苦的眼泪走进母亲幽暗的房间时，我所闻到的那种由大烟、熬药和尿盆儿混合的特别气味。这时家中很可以雇一个两个伙计，但因为母亲的脾气象烈火一样，男女佣人都不能在俺家停留多久，甚至没有人愿来俺家。在这种情形之下，经常侍候母亲并照料父亲同我日常生活的，便只有我的大嫂和外祖母了。”

姚雪垠在另外一篇题为《大嫂》的文章中还写道：

“……母亲白天哭，晚上哭，一面哭一面重复地述说大哥的童年趣事，述说大哥的种种好处。倘若我稍微惹母亲生气，她就立刻想起大哥来，哭着说：‘唉唉，要是我的冠杰在家……，母亲因为日夜想念儿子，烟瘾又大，脾气又坏，一年有大半年时间被疾病缠绕，从此后，我的家不再有一丝温暖，一丝乐趣，一丝生气，完全包围在痛苦和哀伤之中，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不能不皱起眉头。’”

姚雪垠的父亲，在这一时期，从来都不外出，总是整天躺在家里抽大烟，等候人们找他写呈子，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如果没有人来找，他就在家里给

姚雪垠讲古文。但因为姚薰南经常在半夜起来写呈子，睡眠不足，所以往往给儿子讲着讲着，自己倒先睡着了，而且还把书掉在大烟灯上，有时烟灯被打灭，有时烟灯则把书烧了。对此，姚雪垠曾经哭笑不得地说：“父亲对我的教育总是在大烟榻上进行，令我担心和寒心。”

姚雪垠的大嫂是一位难得的贤慧女人。她高条个儿，温柔大方，从 18 岁就嫁到姚家，只同丈夫相处一年多，两人便离别，不久丈夫死在外面，她在内心无比痛苦和暗中忧伤思念的情况下，还得强作笑脸侍候不讲道理，不通人情的婆婆，整天受封建家庭的折磨。虽然姚雪垠的母亲在折磨她时，姚雪垠也为她打抱不平，挺身而出同他的母亲争吵。但，人小言微，那能解脱她在悲剧气氛家庭中的悲剧人物命运？对于他的大嫂，姚雪垠一直同情，他说他的大嫂既象他的姐姐，又象她的母亲！他曾叹息道：“唉，可怜的大嫂啊！命运已经残酷地折磨了你的精神和肉体，它什么时候才肯让你的心获得完全的轻松和安适？”

在失学期间，姚雪垠由于无法忍受他的充满悲剧和没落气氛的家庭，一年到头都烟灯昏黄、哭声与吵骂声不绝于耳的家庭，他曾想尽办法来逃离和躲避。为此，他曾又两次进私塾，去读古文，两次离家跑去当兵，虽然一次只有三个月，另一次仅一个星期。但少年时代的姚雪垠，万万没有想到，他由此却因祸得福：在他一次从军中所经受的军事生活和所获得的军事知识，竟对他在 30 多年后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有很大的帮助。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是幸运的，命运并没有捉弄他！那是从 1925 年冬至 1926 年春天的三个多月的一段时间里，在姚雪垠 15、16 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悄悄逃出邓县的家门，跑到南阳樊钟秀的“建国军”中当了兵。

樊钟秀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在大革命时期，当军阀围攻广东，威胁孙中山的安全和生命时，樊钟秀正好带着部队赶到，解了孙中山的围。由此，孙中山就授予他的部队一个“建国军”的光荣番号。

这次樊钟秀来河南已经占领了邓县、汤河、南阳等几个县，并在南阳招兵，姚雪垠从家跑到南阳时，正好碰上，所以就参加了“建国军”。后来，有一个四川的军阀，带着四个师的兵力，打着舍川救吴（佩孚）的旗号，从四川出发，来到河南，攻打邓县。樊钟秀闻讯，即带兵去救邓县，但当他的部队进攻到离邓县县城 30 里的白牛镇时，被军阀的部队挡住了。

于是，双方之间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姚雪垠随“建国军”参加战斗。耳闻目睹，樊钟秀在作战中有两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情是：在白牛镇决战前夕，樊钟秀抽足大烟后，带着手套，后跟两个马弁，来到敌人的阵地上观察地形。

“口令？”对方阵地上的哨兵问樊钟秀等三人。

樊钟秀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口令，但他仍勇敢沉着地向哨兵走去。

“口令！再不回答就开枪了！”哨兵将子弹顶上枪膛，端枪瞄准樊钟秀。

但樊钟秀毫不惊惶，仍在向哨兵走着，直至走到哨兵面前，他突然用手电照着哨兵的脸，接着就是两个耳光，并边打边骂说：

“混蛋！离前线这么近，你喊什么？让敌人听见了怎么办？”

哨兵以为是他的长官，便放樊钟秀等三人过去，等他们走远以后，哨兵才明白过来，知道上了当，但已经晚了。

另一件事是，战斗几天后，当白牛镇被四川来的军阀攻破时，樊钟秀仍在屋里抽大烟。士兵向他报告说：

“敌人来了！”

“别惊慌，不要急。”他边抽大烟，边回答说。

又过了一会儿，他的副官进来报告说：

“司令，敌人到大门口了！”

这时，樊钟秀才从烟榻上坐起来，身披大衣，向门口走去。敌人已经迎面向他走来。

“樊钟秀在哪儿？”敌人问。

“樊钟秀在后边呢！”他即刻回答。

于是敌人蜂拥似地冲进了大门，樊钟秀却若无其事地脱身逃跑。

之后，南阳也失在旦夕，樊钟秀的部队被打败了。姚雪垠便假借母亲病重，离开部队，回到家中，结束了他的三个月的从军打仗生活。

事隔60多年后，1986年有一次姚雪垠在他的家里向记者谈到此事时，仍怀着深情说：

“这一段当兵生活，对我写《李自成》很有帮助。写《李自成》不仅要有学问，要有知识，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樊钟秀在作战中沉着、勇敢的表现，就成为我后来创造李自成性格的原型人物之一。”

姚雪垠失学在家期间，还以坚强的毅力，进行了对他一生的小说创作非常有用的认真的刻苦自学。应该说，他在少年时期的爱好和兴趣是非常广泛的。他不仅学习古文、历史、文学，读小说、诗词，而且还兴趣很高地学习绘画。

他的父亲在烟榻上给他教授的古文，早已远远满足不了他的强烈的求知欲望，而他们家的藏书，又让土匪给烧光了。为了学习，姚雪垠四处找人借书，如饥似渴地阅读。

邓县有一个叫胡宾周的人，在清朝的时候，曾作过多年的知县，他把挣的钱买了许多书。他死之后，由于乡下乱，他的儿子就把他的书运到了邓县城里，准备开一个图书馆。但没等到图书馆开办起来，四川一个军阀的部队就占领了邓县，原来准备开办图书馆用的房子也被军队住进。这些军队住进以后，把放在房子里的图书到处乱扔、乱丢。姚雪垠看到这种情景以后，就眼馋、心疼。

“老总，你能不能把那些乱丢在地上的图书，给我捡几本，我想看书，但家里没有。”姚雪垠对一个士兵说：“我替你站岗，时间长一点都行，你行行好吧！”

站岗的士兵看见姚雪垠如此恳切和认真，便当即满足了他的请求。

“好吧，我给你捡几本书去。”士兵说完，就给他去捡书，姚雪垠背着枪代他站岗。

不一会儿，一大堆书被士兵抱了过来，送给姚雪垠。

“这都给你，再要你自己进去捡！”

“谢谢老总，你真好！”姚雪垠向士兵鞠了一躬说。

象探宝人发现了金矿一样，姚雪垠在这里拼命地采掘。他先后从这里捡走了不少有关历史的、地方志的、诗词的、文学的、古文的书籍，还有古典小说、新小说，以及俄国的翻译小说等等。在这些书中，六朝的赋和尔雅，还有鲁迅的小说，曾经深深地吸引了他。

通过刻苦自学这批书，和努力练习写作，姚雪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仅初步掌握了写“文言文”的技巧，基本上会做“古文”，而且也大体上可

以做不很严格的骈体文。是的，一点不错！姚雪垠在这方面表现了特别的才能。当他结束了在家里的四年多的自学生活，在 19 岁去考河南大学预科时，国文老师 他的文言文答卷上竟批了“此文可直追汉魏”八个大字，进行高度评价。意思是说，就姚雪垠“文言文”的写作风格而言，可以与汉魏古文相比。国文老师在课堂还对全班同学夸赞说：我发现在你们班里有国文修养很高的同学，不用我来上课，这位同学就可以教你们大家几年。他就是姚雪垠！姚雪垠在 1980 年发表的《学习追求五十年》一文中，在回忆他这一段情况时，也曾写道：

“这些少年时代的初步锻炼，随着后来读书渐多，有所增进，对我写《李自成》很有帮助。如果缺乏对古典文学写作能力的长久锻炼，临阵磨枪，《李自成》中一部分人物的对话、书信、奏疏、诏谕、祭文等等，是没有办法按照小说的艺术要求随手写出来的。”通过自学和阅读古今中外小说及古典诗词，也使少年时代的姚雪垠受到了不好的影响。比如，姚雪垠那时候读了一本“五四”新作家的感情不健康的、充满灰暗、颓丧情绪的小说，竟使他对人生非常悲观，十五、六岁少年的他，竟取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浮生”！

还如，在 19 岁以前，姚雪垠在家里自学读书的这一时期，由于受了坏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思想上非常悲观。在写文章时，竟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作“雪痕”！

“雪痕”是什么意思呢？

它出自苏轼和子由浥池怀旧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是说人生短暂、无目的。

后来，当姚薰南看见这一笔名时，对儿子说：“你这个笔名中，有一个字不吉利，要将‘痕’字换成‘垠’字才好。以后改用‘雪垠’作笔名吧！”

就这样，“雪痕”的笔名，便改为“雪垠”，姚雪垠的名字即由此而来，直到如今。当然在漫长的创作岁月中，姚雪垠还用过另外一个笔名：“冬白”，不过时间很短。

姚雪垠在家失学期间，乃至他的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巨大的变革和交替时期。1911 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爱新觉罗氏的封建王朝，割掉了人们头上的一条辫子，但由于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尤其是在他的家乡——河南邓县，致使封建社会的制度、礼教、道德、生活习俗，以及人们的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还远远没有革除。这就使从记事时起到 18 岁一直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姚雪垠，不仅亲眼看见了封建社会的社会风貌，看见了封建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阶级关系，也看见了官府的各种各样的杀人方法；而且对封建社会有了较深的感性认识。这些，对他后来写《李自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现在，让我们从姚雪垠少年时代的家乡中，来摘取一些他经历过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来看看吧：

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在邓县还把县长称为“大老爷”。“大老爷”出来还坐轿子，仪仗齐全，威风凛凛：有人拿着大锣“ ” “ ”地敲着，鸣锣开道，前面还有“顶马”，打着伞，扛着一对“回避”“肃静”的虎头牌，后面却跟着手执水火棍的一队衙役。老百姓看见“大老爷”，都给吓住了，大街上坐在茶馆喝茶的人，都得赶快站起来。

乡间的绅士们进城，坐的是两套或三套的马车。

在邓县的西门外，有一个杀人场。少年时代的姚雪垠和当地的百姓常常来这里观看杀人。当时的杀人有各种各样的杀法，其野蛮、残忍、落后、愚昧之程度，简直无以复加。姚雪垠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春天，就在这片小小的空场上看见杀过两百多人，这里的地面上浸着一片片的殷红血迹。还有一次，也是在这里，他又亲眼看见杀了包括女人和小孩在内的27个人。有的人被杀以后，还被刽子手把心挖出来拿去卖，据说人心可以医治什么心痛病，有的男人被杀以后，还被刽子手把生殖器割下来，切成片，贴在瓦上烘干，拿去卖，据说可以医治什么妇女不育症；每当刽子手用刀将人头砍掉的时候，围观的人们都一起发出叫“好”的声音……

还有一种杀人的方法：名叫“立枷”或“站笼”。它的杀法是：将判了死刑的人，装入一个木笼，头露在外面，脚踏在垫有砖头的木桩上。犯人死时并不被砍头，而是在死前让家里人给犯人送东西吃，一吃过东西，刽子手就把笼中犯人脚下踏的砖头打掉，将人立即吊死！

姚雪垠在他的家乡杀人场上，曾看过许多人被处死，临死前有的人叫骂不止，有的高喊：“老子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还有的在高呼：“冤枉……”：而死后，则有的被抬走，有的被掩埋，有的被狗啃……

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情景，都在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为他以后在小说中再现封建社会的生活，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第五章在河南大学预科

“快去看，听说学校又挂牌开除人啦！”

“是谁呀？”

“不知道。”

.....

1931年暑假的一天上午，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的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在宿舍这样议论着。

窗外，骄阳似火，暑热蒸人，知了在不停地鸣叫.....

一个瘦弱的青年闻讯后，便匆匆地跑上看告示。只见布告上最后写着：

.....查该生思想错误，言行荒谬，酌情开除学籍。

“果真不出所料，是自己。”这位青年看后自言自语地说。他就是姚雪垠。

“跟我来，”正在看布告的姚雪垠，突然被一个靠拢共产党的学生捅了一下后，拉着离开人群。

“听说是要将你先开除，然后再逮捕，你赶快跑吧！”

“往哪儿逃？”

“往北平！”

“我没有钱。”

“你先回宿舍收拾一下，我给你借钱去。”

火车徐徐驶出开封以后，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风驰电掣般地飞跑，沿路的房屋、土地、河流、树木、庄稼.....都迅速地被抛在后面.....姚雪垠在火车有节奏的前进声中，陷入了沉思，他一生中带有关键性的河南大学预科两年的学习情景，又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

1929年春天。19岁的姚雪垠不甘心在家长期失学，不甘心命运对他的捉弄，抱着青年人的向往和希冀，离开了他早已厌恶的充满了悲剧和没落气氛的家庭，来到当时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寻找出路。

一天，姚雪垠在开封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在一条繁华街道的墙上，忽然看见了河南水利学院招生的一张广告。在当时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便决定报考。当他看完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偶然遇到了邓县老家的一个老同学。

“你来干什么？”这位老同学问姚雪垠。

“考学校。”

“考什么学校？”

“河南水利学院。你看这里贴着招生广告。”

“唉，你这么聪明有天才的人，考水利学校干什么？！我劝你还是考河南大学预科吧！”

“考河大预科，要交验初中毕业文凭。可我不仅没有文凭，而且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姚雪垠为难地说。

“没有文凭没关系。我可以找人替你伪造一张。保证让你报名应考。”

“那太好了，谢谢你。”姚雪垠喜出望外地说。

从此，姚雪垠便在开封西中街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考试的功课。但这时离考试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他这位只上过三年小学、不到一学期初中的长期失学的青年，要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修包括英文、代数、几何等所有考试的科目，是多么的紧张和困难！

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姚雪垠不仅要夜以继日地拼命复习功课，而且因为当时军阀混战，交通中断，在经济上得不到家里的接济，竟使他的生活成了问题。他不得不经常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复习功课；不得不在温课之余，信步开封街头，去寻找充饥的食品。

当时的开封街道很窄，马路不平，电灯不明。沿街有许多挑担卖绿豆面丸子的，专供穷人充饥。姚雪垠每当吃饭时，总是沿街观看，哪个挑子能多给几个丸子、个子又大一点，他就在那里吃，而且每顿只敢买一碗，根本吃不饱。有时为着省钱，他便不去蹲在街边吃丸子，而是买一个甜瓜回来，连皮吃下去充饥；还有时，实在无钱买东西吃，于黄昏时分，他一人独自坐在开封街上，幻想有人丢个钱包，让他拾到维持几天生活……这样时间长了，由于营养不良，他的身体便逐渐垮了：常常蹲下了就头晕，睡下起不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姚雪垠仍没有向困难低头，向命运屈服。终于，在这年秋天，由同乡提供他一张假文凭，经过考试，他考上了学制三年的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相当于高中）。

本来，姚雪垠上河大法学院预科，是幻想将来做一个政治家。当他上学以后，才发现自己的特长和才华是在写小说方面。1929年9月份，他在《河南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雪痕”的短篇小说《两个孤坟》。

这是姚雪垠的处女作！

这篇作品描述的是姚营寨的寨主对他的两个佣人进行无理残酷的打骂，以致使两人身亡的故事。现在研究姚雪垠早期作品的一位大学教授指出，这篇小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走的现实主义道路；二是相当重视艺术，结构具有艺术匠心；三是很有感情。当时，姚雪垠还不满19岁，可见他一开始写小说就出手不凡，显示了才华。

除此之外，姚雪垠在河大法学院预科上学期间，还写过一篇描写青年人单恋心理的小说。因为这篇小说写的男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女主人公则是他喜欢的一位姓梁的同班女同学。经老师看过后，虽然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在心理刻画方面很细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因为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作品一直未发表，只保存作了资料。

在河大法学院预科的短短两年中，姚雪垠还如饥似渴地读了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使他初步了解了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对他以后的学习起了启蒙和引路的作用；同时，他对新文学也发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在史学方面，他以清代朴学家、《古史辩》派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运动三个不同方面受到综合影响。

当时有两本书，给姚雪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为中国新史学奠定了基础的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姚雪垠读后，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心爱的书”四个大字，一本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姚雪垠读后，不仅初步知道了从顾炎武以来清代学者们值得后人认真继承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而且他在以后治学的道路上，也学习和运用了前人的经验。姚雪垠曾说：“前代学者们的那种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和勤于收集资料，以众多经过推敲辨析的资料为基础，以老老实实的态度论证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的治学方法，使我非常佩服。”

在河大法学院预科的两年期间，姚雪垠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他总是一边努力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籍，一边积极参加共产党开封地上市

委领导的学生运动，他经常在“飞行集会”上，向工人和市民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传单，结果在上学一年后的那个暑假里，他就遭到了当局的逮捕和监禁，差点使他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那是1930年暑假的一天晚上。姚雪垠正生病熟睡在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的学生宿舍。

“起来！起来！”几个身穿军服的军人，在一间学生宿舍，一边大声喊叫，一边用电光照着睡在床上的一名学生，同时还用手枪和大刀比划着。

睡在床上的学生被喊醒起来后，下地点着了灯。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军人问。

“姚冠三！”姚雪垠用他的乳名回答说。

“就是他。”站在他面前的连长说。

接着，这些来抓人的兵，就在姚雪垠的房间开始了搜查，结果除过课本和作文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连长用绳子将姚雪垠的一条胳膊绑上，拉到了在河大隔壁的国民党省党部大院前的广场上，当被抓的7名学生都到齐后，连长让他的士兵带着他们离开大院。

“我有病，走不动了，前边就是空地，要干你们就在这里干吧！”姚雪垠从童年少年时起，在他的家乡邓县，不知看到过多少次杀人，他以为这一次要轮到自己被杀了，便沉着地对押送他们的连长这样说。“不是枪毙你们，是奉命要带你们到警备司令部去！”

这时，姚雪垠才知道他自己不会马上被杀掉。于是，他只好拖着沉重的身子，跟着连氏走。因为他在前几年曾经有过出生入死的一百天的土匪生活，所以他对死并不害怕。他边走边想：如果一两天内要枪毙我，临死前我要喊什么口号；如果不枪毙，以后我要写一篇题为《被捕前后》的小说。小说就从“一群犯人被士兵押着从东往西走，走着走着，天已大亮，一片晨曦出现在东方……”开头。

这充分显示了青年时代的姚雪垠，对小说艺术的敏感，和英雄浪漫主义的气质！

当他们被带到警备司令部时，被抓来的许多人正在过堂，鞭打声、训斥声、哭叫声混杂成了一片。姚雪垠由于实在太累了，根本顾不得看这一切，靠在一个地方睡着了。但没过一会儿，他就被带到大堂上接受审讯。只见大堂上蜡烛高照，台阶下有个杠子，放着皮鞭，还点着一对香火。姚雪垠向前跨了一步，被指定站到杠子内。一个刚刚受过刑的学生，被折磨的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从他面前拖了出去。姚雪垠明白，这是审讯者在向他示威：如不从实招来，将与此人同样下场！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

“姚冠三！”

“犯了什么罪？”

姚雪垠想，不能说没有罪，如果没有罪，当场就会被打得死去活来。但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审讯人见他不吭声，气势汹汹地进一步大声追问：

“你怎么不回答？有人告了你！”

“我想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在班上学习好，老师说我有才华，有些女同学又对我好，这很可能会招来嫉妒，被人告发。但别人告什么，我却不明白。”

说到这里，姚雪垠向审讯者的桌子上瞟了一眼，看见他们的本子上在报告人一栏中，记得很空。于是接着说：

“请你们把报告人报告的情况告诉我，如果是事实，我一定承认。”

“好，你不说，那就让我们来告诉你。”坐在堂上的审讯者一边说，一边哗啦哗啦地翻着本子看。但这位审讯者在翻完本子后，并没有说出什么事实，只是大声喝斥道：

“将姚冠三押下去！”

这样，姚雪垠根本没有受刑，就过堂完毕。等到天大亮，所有被抓的50多名学生都过了堂以后，大家就被押到路东的一个作临时监狱的旅社关了起来。

开封的国民党当局，本来是以“共党嫌疑”逮捕的这些学生，但经过搜查、审讯，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很快，他们就让学生找保回去。一下子便走了许多。

“你呢？”看监的人问姚雪垠。

“我没有熟人，只有一个同乡。”

“有同乡也行！只要你写个条子，我们拿去让你的同乡盖个章，就可以放你回学校。”看监的对姚雪垠解释说。

于是，姚雪垠就照看监者说的办法，写了一张条子，让他们拿着去找他的同乡王庚先盖章。当看监的拿回盖了章的条子，在逮捕他的第四天后，便把姚雪垠释放回校。

被释放以后，姚雪垠一如既往，仍然继续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所以在一年以后，又发生了被学校当局以“思想情误，言行荒谬”为理由，挂牌开除的事件。

对此，姚雪垠并不后悔，他曾回忆说：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奔腾前进的时代潮流，宏伟的历史运动，鼓动着、教育着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前进，无数人为着崇高的理想而战斗，而献出生命。我是这一时代潮流中比较蹩脚的学生，我永远感激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历史运动对我的启蒙、教育和熏陶。”

姚雪垠孑然一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沉沉黑夜里，在风雨交加的茫茫世界中，走进了北平城，结束了他一生中短暂的学生时期的学习生活。

他这位开封被追捕的青年，在古都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

第六章婚姻与家庭

姚雪垠在婚姻问题上，既反对过封建家庭对他的包办逼婚，又经过自由恋爱的苦痛，最后在半包办、半自由的情况下，才结婚组成了家庭。

姚雪垠的婚姻，深深地打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烙印。

早在姚雪垠 10 多岁时，家庭父母包办，就有了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妻。

这个婚事，完全是按照姚母的极其现实的功利主义包办的：在媒人给姚雪垠说亲时，她对姚雪垠的父亲说：“马马虎虎说成了，心净一条事，以后一天穷一天，谁肯把女儿许给咱们！”可以说，她为儿子找媳妇，根本不是为了儿子的幸福，完全是为了找一个侍奉她的供他使唤的奴隶。但姚雪垠有姚雪垠的看法和想法，他对这门亲事一直不予承认。

后来，当姚雪垠于 1929 年秋天，在 19 岁考上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后，曾跟同班的一个姓梁的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很要好。姚雪垠当时的文章、小说写得好，这位家在商丘的女同学的国文比他并不逊色。大家总把他俩看成天生的一对。同学们非常调皮地经常在黑板上写“姚”字时，故意把右边的那个勾拖得很长很长，然后再写那个女同学的姓，把“梁”字包在“姚”字里边。姚雪垠对这位女同学很有感情，很喜欢她。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里开花》的短篇小说，用意识流的手法，专门写他怎样想这位女同学。国文老师看了他的大作后，非常同情他。曾问姚雪垠要不要帮忙，姚雪垠说不要。那时才华出众，很有风度的姚雪垠，虽然爱那位漂亮的女同学，想跟她好，可又不敢同她当面讲，而且一见到他就心里发慌，面红耳赤。他想自由恋爱，却没有胆量和勇气进行表白，采取行动，只是把自己的感情悄悄地倾吐在不能发表的小说中，还落得一个“单相思”的名声。他为自由恋爱受尽了折磨和苦痛。几十年以后，成了大作家的姚雪垠，有一次去河南郑州大学讲学，还有熟人同他开玩笑，说他青年时期，进行过“单相思”的恋爱。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真实情况是：姚雪垠喜欢的那位女同学，在当时也一样喜欢姚雪垠，只是她更没有勇气向姚雪垠表白。后来，当这位女同学听到姚雪垠同别的女子结婚以后，她痛苦无比，后悔不已，大哭一场……

这是二十年代，受了封建思想毒害和影响的中国青年自由恋爱的一场悲剧！

1930 年暑假，姚雪垠在被同乡王庚先保释回到学校后的一天。学校会客室突然通知他有人来找。姚雪垠到会客室一看，才知道是为王庚先办事的刘先生。

“你好！请转告王老先生，谢谢他救我出狱。”

“不必客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刘先生开门见山地对姚雪垠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奉王老先生之命，来找你只为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姚雪垠说。

“王老先生有个姑娘，你见过没有？”刘先生问姚雪垠。

“没有见过，听说长得很漂亮。”

“我对你照实说吧，王老先生两口子认为你相貌端正，英俊潇洒，聪明好学，才华出众。他二老看中你了，愿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你，选你做他们家的乘龙快婿。要我亲自来问问你，愿意不愿意？”

“我倒愿意，但自己不敢作主，要问过父母以后，才能正式回话。”姚雪垠思考一阵之后回答说，同时向刘先生提出要求：“你能把王老先生女儿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吗？”“可以！完全可以！”刘先生说，“她名叫王梅彩，年方17岁，眼下在北京翊教中学读书。梅彩姑娘不仅身体健康，人长得漂亮，性情温柔；而且，心地善良，知文识理，很有教养。在她的身上特别具有一种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动人风采。郎才女貌，同你非常般配。”刘先生一口气说完，但好象还忘记了点什么，想了一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一边给姚雪垠，一边补充道：“这是王梅彩姑娘的地址，王老先生说，你可以给她写信。”

送走刘先生之后，姚雪垠回到宿舍沉思起来，王庚先老先生的情况他是了解的：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在当时是河南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为了向王老先生请教学问，在此之前姚雪垠去过他家两次。如今，他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姚雪垠当然非常高兴！

很快，姚雪垠便写好并寄走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他父母写的，说明他愿意娶王老先生的女儿为妻，要父母将原来给他订的亲事退掉。父母收到信后，虽然很为难，但还是给姚雪垠退了亲。另一封信，便是给王梅彩写的，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书来信往了。

到这年寒假的时候，王梅彩放假从北京回到开封家中。王庚先通知姚雪垠到王家同他女儿见面。当时姚雪垠听说还有别人想追求和“进攻”王梅彩。因此，他得到通知后，就立即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王家，生怕迟到一步，王梅彩被别人“抢去”。由于心急火燎，跑的太快，黄包车在路上还翻了一次。赶到王家以后，姚雪垠显得非常紧张。结果，头次见面，他连王梅彩看也没敢看上一眼，至于漂亮不漂亮，他更说不上来。还是王梅彩大方，这次见面之后，她竟主动到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去找姚雪垠。

在寂静的河大校园里，雪花一朵接一朵的飘落着，刹那间，小路白了，房屋树木白了，整个学校都变成了一片银白世界。姚雪垠和王梅彩不顾这些，俩人仍边走边谈，漫步在校园里。外面的气候虽然寒冷，但他们的心里却是火热的。

“你不是上次没有看清楚吗？现在好好看看吧，我让你看个够！”王梅彩深情地看了姚雪垠一眼，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把脸朝着姚雪垠莞尔一笑说。

姚雪垠用手抚摸着王梅彩的肩膀，目不转睛地从上到下仔细地注视着王梅彩。

“你有着美丽温柔的眼睛，苹果似的脸庞，丰满匀称的身段，浑身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确实非常漂亮、动人。这一下我看清楚了。”姚雪垠仔细地看完王梅彩后，非常高兴地说。

“喜欢不？”

“喜欢！”……

就这样，这一对青年恋人便彼此深深地相爱了。到1931年5月，他们由袁介亭做媒，在开封结了婚。时年，姚雪垠21岁，王梅彩18岁。从此，姚雪垠和王梅彩就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婚后，王梅彩先后生育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1932年，他们的女儿姚海燕在开封出生，她现已55岁，在河南洛阳涧西医院任政工干部；眼下，她

自己已有三女一男，并且有了一个4岁的小外孙。1936年，他们的长子姚海云在河南邓县出生，现已51岁，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一家现在也有三男一女，共四个孩子。1938年，他们的次子姚海星在邓县出生，现年49岁，在开封石油管道局中原输气站工作，这一家现在也有二男二女。1940年，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姚海天出生，现已47岁，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自然科学编辑室工作，这一家有两个女孩。总计起来，姚雪垠的第三代，有4男、10女，14个孩子。

应该说，姚雪垠在青年时代，确实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妻子，有了一个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几十年来，王梅彩不仅为他生儿育女，操劳家务，从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照顾他，成为他的贤内助，而且在事业上也成了姚雪垠忠诚得力的助手。

姚雪垠写稿子，王梅彩就给他抄清；姚雪垠写字，王梅彩就给他磨墨、铺纸；为了能够让姚雪垠更专心地从事小说创作，在六十年代，王梅彩还专门辞掉教师工作，回到家中协助姚雪垠做事；为了能够解决要有多份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稿子的问题，王梅彩还努力学会了中文打字，长期为姚雪垠打小说手稿；更令人感动的是，王梅彩在精神上也给姚雪垠极大的支持，即使是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发配农场劳动改造期间，王梅彩也从未动摇过对姚雪垠的爱情和忠贞！

对此，姚雪垠非常感激。他经常对人说：“梅彩是默默无闻的英雄，在我的事业里，甚至可以说，有她一半的功劳！”

如今，他们两人已过了银婚纪念日和金婚纪念日，岁月的流逝，把他们满头乌黑的秀发变得银白；但这对夫妇仍然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俩人之间的感情似乎并不减当年。

1934年，姚雪垠出访法国期间，曾到马赛作短暂的停留。有一次，该市市长对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曾与几位漂亮的姑娘同居过。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在生活方面也有不少风流韵事。姚先生如此聪明有才气，在年轻的时候，有无这类事情？”

“我结婚结得早，妻子又长得很漂亮。所以结婚以后就一锤定音，再无同别的姑娘有什么爱情。”姚雪垠笑着回答说。

“这太可惜了！”市长耸耸肩膀，有点遗憾地说。

“那么，在结婚以前，是否有漂亮的姑娘追求过你呢？”笔者在同他谈青年时代婚姻问题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过姚雪垠。他听了以后，总是笑而不答。但有一次，好象是有意要泄漏天机，他悄悄地神秘地对笔者说：“因为你要写我的传，所以我得如实告诉你。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很风流，也有漂亮的姑娘追求过我。但现在我不能说，你也不能写。将来等我死后，你修改我的传记时，再补充进去。我还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诗，但现在你也不能引用。”

这就是辩证法。有时候，一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并不愿意公诸于世。作家也不例外，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小说中，把别人在这方面的事情，总是写得淋漓尽致，维妙维肖。

对于姚雪垠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只有等待。

第七章艰难奋进

在狂风暴雨之夜逃到北平的姚雪垠，并没有交上什么好运；完全相反，等待他的却是贫穷、疾病和艰难困苦。

从此开始，直到1937年8月8日他最后一天离开北平，在先后长达6年多的漫长岁月里，姚雪垠一直在同命运搏斗、抗争……

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他一方面以极其惊人的毅力，努力战胜贫穷与疾病的折磨，同时又以无比坚强的意志，顽强地进行着自学和追求。他在艰难中奋进，终于为他希望从事的学术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同时自学成才，闯开了文学创作殿堂的大门，为一生的文学创作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姚雪垠在艰难中奋进的情景吧：

举目无亲的姚雪垠，在北平城内经过再三打听，才在沙滩找到一个专门招揽穷学生的蓬来公寓住了下来。他住的是一间坐西朝东的小房间，每月连伙食、茶水、电灯费在内只要十块钱。但由于找不到职业，生活完全要靠朋友接济，日子过得很清苦。于是，他便断绝了再进学校读书的念头，成了既失学又失业的流浪青年。可对此，姚雪垠并不气馁，他决心通过刻苦自学，将来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或文学史家。

文化古都有永远开采不尽的知识宝藏，姚雪垠在这里日夜辛劳，拼命掘取。很快，他就成了北平图书馆的常客。在那些岁月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穿旧蓝布大褂的瘦弱的青年，每天从早晨开馆到晚上9点闭馆以前，都在那里贪婪地阅读着关于马列主义理论、哲学、历史、文学史、文学作品，以及古文等各种书籍，边读还边作笔记；中午饿了，就吃一个事先带来的饅饼充饥；渴了，就喝一杯开水。

因为没有钱坐车，姚雪垠从沙滩住处到北平图书馆，来回总是步行。常常在深秋的夜晚，他从图书馆出来，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每当这时，他总是走到自己寓所门前的那个卖小米粥的大布棚里，买一碗稠稠的热乎乎的小米粥，同拉黄包车和其他的劳动者挤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喝完，暖暖身子。然后，半饥不饱地回公寓睡觉。

从1931年暑假至1937年北平沦陷，姚雪垠先后四次来到北平，都住在沙滩一带，两次住蓬来公寓，另外两次是住沙滩的东老胡同和中老胡同。他除坐在公寓的斗室中写稿子外，更多的时候是到北平图书馆去看书。北平图书馆是他青年时期打知识基础，自学成才的地方，也是他终身难忘的地方，后来他一直常常怀念这里。

他曾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这样写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深秋之夜，冷月悬空，行人稀少，枯荷败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声。我每晚走在金鳌玉蛛桥上，总要对月下的北海停留一阵。风吹空筒蓝布长褂（当时我没有穿毛背心或毛线衣），颇有寒意。在北平图书馆中用心看书的时候，别的事不去多想。但在回沙滩的路上，站在月下冷清洁的中南海桥上，常不免想到下月住公寓的钱如何解决，冬衣如何解决，今后长此下去，如何养家糊口（当时我在开封结婚不久）等等迫切的生活问题，心中暗暗发愁。”1982年6月10日，姚雪垠得知北京图书馆要庆祝建馆70周年时，特地将他在1972年1月下旬写的一首旧诗录出，交送北图，以为纪念。这首诗是：

逝水（东、冬通押）

——忆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沙滩的贫病交迫与奋斗日子

逝水滔滔逐浪远，
沙滩雪尽有鸿踪。
金鳌玉蛛残秋月，
浅海枯荷败叶风。
五里愁心凋树路，
二更暖腹破糜篷。
蓬莱客馆青袍薄，
抱病犹攀百丈松。

靠朋友接济生活的姚雪垠，经过半年的苦撑，终于再难以维持下去，1931年冬天，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北平，返回河南老家谋求职业。经再三托人寻找，好容易才于第二年的春天和秋天，先后在豫北淇县楚旺中学和信阳义光女子中学，分别担任了一个学期的语文教师。教书是可以维持生活了，但影响他进行自学。具有强烈事业心的姚雪垠，并不甘心这种状况。他决心再一次前去北平，到图书馆读书。但当他在寒假回到开封家里以后，妻子生了孩子，家庭开支增加，他再没有钱去北平了。为了生活，他便和朋友在开封的北书店街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大陆书店，同时出版一个刊物。当他们办的小刊物《今日》，第二期刚刚出版，国民党的一个机构就把书店和刊物都封闭了，而且还抓走了书店的一名店员。姚雪垠闻讯，赶快外出避难。

这件事情平息以后，姚雪垠返回开封，继续失业在家，在极其贫穷的生活中，仍坚持自学读书。设在开封龙亭湖畔二曾祠内的河南省图书馆阅览室，就是他当时读书的历史见证。这个阅览室很大，但看书的人不多，有时少得只有两三个人，甚至只有姚雪垠一个人。檐际小雀啁啾，更增加了阅览室的寂静。就在这里，他先后用半年多的时间，又阅读了许多文学和史学方面的著作；就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有关李自成三次进攻开封的记载：李光壁的《守汴日记》和周浚的《大梁守城记》，最早接触到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史料。

1933年冬天，姚雪垠的岳父王虔先老先生被宛西军阀杀害。这件不幸的事情，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对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生活所迫，姚雪垠不得不在1934年春天，把全家由开封迁回邓县居住。他只身第二次前往北平，但不得不改变初衷，放弃做学者的理想，靠卖稿为生，艰难地走上自学文学写作的道路。

正当姚雪垠在穷困中奋发自学，继他的处女作《两个孤坟》以后，又开始在北平、天津和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杂感之类的作品时，偏偏疾病无情地向他袭来。这无异于屋漏偏逢连阴雨，大雪又加狂风吹。生活啊！你为什么如此不公平？！命运啊！你为什么总是捉弄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灾难和不幸降临给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姚雪垠！请想一想吧，我们的主人公姚雪垠，灾难是多么的深重：他刚一出生就差点被溺死，由于老祖母及时抢救，才得生存，8岁多，他家被土匪放火烧光，变成一片废墟，他只好随父母逃往县城居住；14岁时，他又被土匪绑架，变成了“肉票”和匪首的“义子”，出生入死地过了100天的土匪生活；接着是在家长期失学，苦闷难耐：到20岁那年，他又以“共党嫌疑”分子被国民党逮捕监禁，

差点杀头；21岁，即被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挂牌开除，为避免第二次被捕，他只身逃往北平；之后，他一直在失学失业中，忍受着贫穷，奋发读书，可偏偏疾病又向他袭来。

天是那么广，地是那么阔，宇宙是那么大，可为什么你们却容不下可怜的姚雪垠，不让他健康成长，有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生活呀！你到底要干什么？是想考验他，磨炼他：还是想吞噬他，扼杀他？

由于长期用功过度，生活穷困，营养不良，姚雪垠在1934年冬天，不幸得了肺结核。这种病，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可怕，但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还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对它进行治疗，所以当时患此病者，死亡率相当高，人们对肺结核几乎是“谈虎色变”，它无异于今天的“癌症”。

24岁的姚雪垠患病后，既无钱治疗，又无条件躺下休息，贫病交加几乎使他走上绝境，他十分清楚：死神已在向他招手。

姚雪垠患病后，很快变得又瘦又黄，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大口大口吐血，而且往往在吐血后的几天中头晕目眩，浑身无力，根本起不了床。但只要能起床时，他就即刻继续坚持读书和写作。

在生病的二、三年里，他有时住在北平，一边同疾病作斗争，一边坚持读书写作，有时实在难以支持，就回河南养病。

请历史老人打开记忆的闸门，挂起雪白的银幕，为读者再现姚雪垠回家“养病”时候的几件感人事情吧：

从地理条件划分，邓县属南阳盆地，夏天十分炎热，冬天冷的滴水成冰。有一年，姚雪垠从北平回家养病。他的岳母和孩子们住两间坐南朝北的屋子，他和妻子王梅彩住一小间坐西朝东的房子。夏天，全家都在小院中乘凉，晚上也睡在院中，但无论妻子和岳母如何叫姚雪垠、逼姚雪垠出去乘凉、休息，他都坚决守在小屋中，一边咳嗽，一边汗流浹背地在煤油灯下用功；同时，不断地用破蒲扇拍打叮在身上的蚊子，冬天，姚雪垠没有大衣，更没有皮袄，他只能在屋里披着破被子，一边咳嗽，一边坐在桌边用功。窗外北风怒号，屋里寒气袭人，而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他脚下的瓦火罐，他常常因两手冻得发直，不得不停下正在撰写的文章……

在河南老家养病期间，姚雪垠每次总要到杞县大同中学居住。这所中学是他的老师、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先生创办的。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学校竟然有中共地下组织，抗日救亡和民主空气相当浓厚，许多进步青年都云集于此。在这里不但经常可以听到救亡歌声，还可以听到教员中有人唱《囚徒之歌》，甚至于悄悄地唱《国际歌》；这里和外边的进步运动息息相通。这个学校还曾经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培养了大批进步学生。比如，现在既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著名记者，又是著名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家的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就是当年大同中学的学生，姚雪垠就是在那时认识了穆青，与穆青结下了师生情谊。至今，穆青仍称姚雪垠为老师。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姚雪垠。

姚雪垠在这块充满革命和自由空气的天地里，一边养病，一边竟跟着他的朋友们学会了世界语，并翻译了一篇短篇小说，在上海《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姚雪垠在这里还结识了一些地下党员的教师，同他们建立了友情，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进步的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一次，这个学校的教师、诗人、中共地下党员赵伊坪，奉调离校，前往别处工作，姚雪垠和几

位地下党员的好友为他悄悄饯行。在一盏煤油灯下，大家围着小方桌，一边饮酒，一边低声谈话。赵伊坪在离别时讲的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竟成了姚雪垠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在抗战初期，他把赵伊坪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又加以丰富、改造，多次讲给救亡青年们听，听众鸦雀无声，感动万分，之后，他又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短篇小说《红灯笼的故事》发表，作品发表后，还被翻译成俄文，收入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再之后，姚雪垠又把它溶进他写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作为单独的一章。

大同中学，确实在姚雪垠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印象。50多年以后的1982年5月，他赋诗感旧，兼励后来，作七律三首：

(一)

风雨当年路漫漫，
中原到处暗如盘。
烽烟北望山河碎，
兵气南来手足残。
妥协难消民意盛，
救亡偏有众心坚。
乾坤一角弦歌地，
私点明灯照夜寒。

(二)

高风每忆王夫子，
磊落光明是我师。
遍地阴霖惜火种，
漫天飞雪护花枝。
聘来教习藏亡命，
送走生徒举义旗。
坎坷忠魂应自慰，
大同事业令人思。

(三)

转眼行将五十年，
联翩往事上心田。
繁星沉院传真理，
斜月幽窗写短篇。
共唱新歌悲下泪，
私谈时势愤挥拳。
良朋早洒沙场血，
留得光辉照后贤。

——姚雪垠在回河南养病期间，有时既不能坚持写作，又不能用心读书。在这力不从心之际，他便另辟溪径，开始钻研文学的第一要素、作品美学影响的媒介——语言。这期间，他专门研究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自论文，唐宋以来的古文，还利用在河南老家养病的七、八个月时间，专门收集中原人民口语中的精彩语汇。他不仅把故乡的口语一一记录下来，并对某些

语汇追究了语源，与元曲中的道白互相印证；而且还按照编词典的方法，把收集的词汇分门别类整理抄写在专门的本子上，起名《中原语汇》。他的这一工作，对他今后在文学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起了重大的作用。

对此，他在 1941 年秋天发表的一篇《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的论文中，曾作过专门的叙述。他在论文中写道：

“大概是 1934 年的夏天，我因为沉重的吐血病离开北平，路上辗转耽误，直到秋末才回到故乡。在故乡的七、八个月中我既不能坚持写作，也不能用心读书，天天只有睡眠和吃药。无聊的时候我随便读一些世界语，或把故乡的口语记录下来。日子久了，搜集的语汇多起来了，我按着编辞典的方法把所搜集的语汇编写在笔记本上，题名为《南阳语汇》。这工作虽没有做到完成，但却得到了很大益处。我从此真正的认识了口语的文学美，那美是在它所具有的现实的深刻性，趣味性，以及它的恰当，真切，素朴与生动。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外国农民的语言往往很富于幽默性，而我也从故乡的农民语言中发现了浓厚的幽默趣味。我读过莱翁·托尔斯泰的传记，这位伟大作家对于故乡农民语言的种种赞美，我全可以借用来赞美我的父母之邦。”

姚雪垠在这篇论文中，还举出许多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他故乡口语的形象、生动和美妙。他在文中说：“且不谈我所知道的许多‘嵌子’（即歇后语），如今我只随便的举几个例子瞧瞧。在口语中，形容一个走路慢的人便说我是（肉猪），说他‘一步挪四撒’或‘一脚踩死一个蚂蚁’；形容一个性情麻木的人便说他是‘没血没汗’，或说他‘扎一百锥子不流血’，形容一个小心怕事的人便说他‘走树下怕树叶几打头’；形容一个刻薄的人便说他是‘刀子’；倘若这个人咀上刻薄而心地善良，便说他是‘刀子咀豆腐心’；相反的人被形容为‘咀甜心苦’；乡下女人逢年过节又黑又粗糙的脸上搽了很厚的一层粉，便有一个绝妙的形容语：‘驴尿蛋儿上下了霜’。诸如此类的美妙口语，只要稍留意去搜集，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八章逃离北平

历史进入 1937 年。从这一年起，姚雪垠的命运已经有了转机，他正在从贫病交迫的艰难困境中，逐步挣脱出来。从事业上讲，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已在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等作品，而且拿到的稿费还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从身体情况看，他的病情也大有好转，虽然仍有咳嗽，偶尔痰中还带一点血丝，但早已不再大口吐血，死神已被他赶跑，他自我感觉精神很好，能够正常地进行读书和写作。为此，姚雪垠在这年的春天，最后一次同中学的好友们、同学们告别，把妻子王梅彩从老家接到北平，在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租了两间房子住下。他自己开始了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的创作，有时仍去北平图书馆看书。就这样，他计划在北平长期居住下去，但谁知好景不长，这样虽然清贫，但是十分安定的生活，只过了一个多月，就有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的卢沟桥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揭开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枪声，不仅打破了姚雪垠的原订计划和宁静生活；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和巨大的灾难！

卢沟桥事变后，起初姚雪垠还希望在全国的支援下，能够将日寇尽快击退，他和妻子继续在北平生活一段时间；但很快，日本侵略军就攻占了南苑，并进一步向城内逼进，严重地威胁着北平。北平已非常危险！此时，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保卫马德里”的口号，又出现在姚雪垠的脑际，爱国主义的精神激动着他的心。他断然决定：让妻子王梅彩回河南老家邓县，自己留下参加北平保卫战！于是，姚雪垠趁长辛店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往南的火车还未中断，便在一天上午，坐火车送王梅彩先到门头沟，然后骑毛驴到长辛店，最后搭乘火车回河南邓县。在由门头沟到长辛店的途中，姚雪垠看见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老人呻吟，小孩啼哭，一片凄凉，令人心碎！当快到长辛店的时候，突然从天空飞来许多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向手无寸铁的大批逃难的中国人射击。随着机枪声响和炸弹的爆炸，不少无辜的人们惨死在血泊中……日本侵略军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

姚雪垠送走妻子后的第二天，原来守卫古都的宋哲元部队撤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维持治安。国民党军队这种不战而退的情况，使北平和天津很快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

姚雪垠对北平的沦陷十分悲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

姚雪垠被日本人在北平办的日文报纸点了名，说他是北平文艺界的抗日青年！说他曾写文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主张抗日等等。

姚雪垠此时的处境已危险万分！他必须立即逃离北平！但无奈铁路不通，任他有腿难逃。他只好与南阳府的同乡刘尧庭住在北平辅仁大学北边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等候逃离北平的机会。为了逃避日本人对他的逮捕，姚雪垠就开始不刮脸，留下胡子，进行伪装。

逃离北平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37 年 8 月 8 日，日本侵略军正式开进北平城，平津铁路开始通车。这天一早，姚雪垠和他的同乡刘尧庭即去前门车站，乘火车去天津。

两天以后，他又从天津的大沽口搭乘私营直东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驶入茫茫的渤海！

第二部崭露头角

(1938—1945)

第九章投身抗战洪流

在烟波浩渺的渤海上，一艘客轮正在行进。身穿蓝洋布大褂的姚雪垠手扶栏杆站在甲板上，时而向远方眺望，时而陷入沉思，任习习海风吹拂和飞溅的浪花抚摸……

渤海，伟丽壮观，广阔无垠，碧兰碧兰的海水，在秋阳的照耀下，闪着鳞鳞波光，平滑的象绸缎一样，宁静的没一点声响。

此刻，姚雪垠的思想并不平静，正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九·一八事变后，姚雪垠曾想过从北平返回河南，组织一批人马同日寇打游击，小青年的幻想未能实现。现在，日本人已打到眼前，该如何办？姚雪垠想了很久，决定从山东半岛的龙口下船，经济南再去上海，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

来到济南，一看报，才知道在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已经进攻上海，同中国军队交战，并扬言在三个月内要灭亡中国。于是，姚雪垠只好改变计划，立即从济南乘火车到开封，准备去延安参加抗日战斗。

回到开封，他去看望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老师时，碰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王阑西，他们两位都劝他不必去延安，留在开封办鼓吹抗日救亡的刊物。姚雪垠想：这也符合他的“不管在哪里，都必须用笔作刀枪，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想法。所以他当即表示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从此，姚雪垠在生活道路上，就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离开了原来的生活圈，接触到家乡和北平以外的更广阔的天地，积极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流，置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河南、湖北、山东、安徽、重庆、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在火与血的洗礼中，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报道抗日英雄事迹；同时他也努力办好刊物，宣传抗日和爱国主义精神，并经常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在颠沛流离，炮火连天的环境中，创作反映抗日救亡生活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大地，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工作，使他在青年时期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期间，姚雪垠于1937年9月，在开封与王阑西、嵇文甫、范文澜等创办了一个鼓吹抗日救亡的杂志《风雨》周刊。他既是主编之一，住在编辑部，分管内部编辑室工作，又要外出采访，为刊物撰写文章，简直忙得要命。1938年，当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即刻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名义由开封赶赴山东徐州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去奔赴安徽宿县，到抗日将领于学忠将军军部，同抗日游击队员们进行座谈……之后，他风尘仆仆前往武汉，在亢奋情绪影响下，写出了当时被茅盾赞扬为“有的是典型的事，以及典型的人物”的作品《战地书简》。这本书信体的报告文学，反映了游击队向群众作政治工作，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军民共同抗击侵略者等情形。在1938年6月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与此同时，他还写出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反映一位空军英雄抗日行为的小说《白龙港》，发表在1938年5月汉口出版的《自由中国》上。

在这期间，于1938年7月底，姚雪垠还与袁宝华出席了河南青年救亡协会成立大会。这个协会的总会设在洛阳，在南阳成立执行部，叫豫南执行部，

姚雪垠被指定为这个执行部的负责人。会后，他就来到南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那时武汉的国民党已经取缔了青年救亡协会、青年救国协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三个抗日救亡团体，而且社会上有谣言传说，只要鼓吹抗日救亡的姚雪垠一回到邓县作乱，邓县的民团就要暗杀他。尽管如此，姚雪垠还是冒着危险回到了邓县，在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空乌云乱飞，北风怒号，寒气袭人。姚雪垠家斜对门的一个宅院，大门虽然紧闭着，但屋里却充满淫荡的气氛。一个外号叫“冠团长”的暗娼，扫扮得花枝招展，正在陪嫖客抽大烟、睡觉。嫖客一边喝酒，一边说：“前天，我们民团活埋了九个人，现在他们又让我去杀死你对门住的姚雪垠，可是姚雪垠不经常在家，叫我到哪里去找他？”说着说着，他就把女人搂在怀里，紧紧抱着……

“今天晚上，我不去杀人，只同你行乐……小宝贝。”

这位因生活所迫堕入风尘的女人，心地并不坏。第二天一早，那位民团嫖客走了之后，她就赶忙跑到姚家，把民团要暗杀姚雪垠的消息，告诉了姚雪垠的岳母。姚雪垠闻讯后，当即逃离邓县，躲避灾难。

在这期间，武汉沦陷，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搬到湖北襄樊，将后方留守处设在均县。这时，中共地下党与李宗仁合作，成立了以钱俊瑞、曹获秋、胡绳等同志为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边设有报社、文化站、文化队等不少机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姚雪垠在1938年冬天，应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的来信邀请，参加了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被派到均县留守处。当时经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决定由留守处在均县城内办一所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姚雪垠在这个班担任了讲授《唯物辩证法》课程的老师。万没想到，28岁的他，竟把这门哲学课讲得那么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不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吸引了很多人，在均县引起了很大震动。每当他讲课的时候，除了讲习班学员外，总还有许多人前去旁听；他不仅在班上讲，而且还到当地的国立一中、国立六中，以及由何丰基将军担任教育长的七七军训团，作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报告。后来，当国民党发动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下令撤销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讲习班被迫结束。姚雪垠在一个天色很黑的晚上从均县乘船撤离时，讲习班的学员，××军训团的学员，国立一、六中的部分学生，均县城内的进步团体……有许多人都来到均县东门外的襄江岸上，打着火把，来为他们送行。不少学员还一再大声向姚雪垠嘱咐，要他务必把《唯物辩证法》的讲义继续写完，寄给他们。姚雪垠热泪盈眶，向大家挥手告别，点头答应。在蒋介石下令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姚雪垠在长官司令部挂了一个秘书的名义，仍住五战区。他一面深入到随县、枣阳、钟祥等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体验生活，撰写战地通讯，如发表在1939年10月28日出刊的《全民抗战》第九十四期上的通讯《界首集》，以及刊于《群众周刊》三卷期的通讯《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等，同时，在湖北老河口进行反映抗日救亡生活的创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姚雪垠被第五战区驱逐回家。之后，在5月由邓县老家，经过千辛万苦，到安徽立煌，利用桂系军阀的内部矛盾，通过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安徽省民政厅长韦永成的私人关系，终于获得了一个安徽省政府参议员的名义。从此，他又开始了在大别山一年多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

在这里，他拒绝了韦永成要他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要求。他以文化人的身

份，以韦永成的名义编辑出版了一个名叫《中原文化》的半月一期的杂志，继续鼓吹抗日爱国主义精神。这刊物当时在武汉，重庆等地发行。

在这里，姚雪垠不但写小说，也写政治论文，通过各种手段和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如他撰写的国际述评《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王牌》，用化名在《中原文化》发表以后，受到读者的好评。他还被《皖报》等一些新闻报刊聘为评论员，为抗日撰写评论，大声疾呼。

在这里，他还结识了我国著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韩作黎当时是小学教师，给姚办的《中原文化》投稿，姚即采用了。二人从此建立了友谊，直到几十年以后的现在。

在这里，姚雪垠一直住到 1942 年 10 月。在韦永成从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大力帮助下，顺利离开大别山，往河南老家邓县，后于 1943 年到达重庆。

全国解放以后，韦永成出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他曾对别人说是他过去帮了姚雪垠的大忙，不然姚在那时就要吃大亏了。

“是的，确实如此。这话一点不假！”姚雪垠几十年后，在 1986 年同笔者谈起这件事情时，仍带着感激的口气这样说。

第十章成名作

当人们登上大山的高峰，看到悬崖峭壁上傲然挺立的小小青松时，都会感到惊奇，为之赞叹！可这小小的青松到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它要在山石间发芽、生根、长叶、风吹、日晒、雨打、雪盖，以及各种难以估计的自然灾害的考验，才能得以生存，它要顽强地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坚硬的百尺、千尺岩缝之中，去吸取养料和水分；根深之后，才能叶茂；根深叶茂才能茁壮成长……姚雪垠，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艰难奋进，积累和准备，锻炼同实践，终于撞开了文学创作这个玄妙高深的殿堂大门；在新文化思潮影响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洪流推动下，登上了文坛；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写出了引人注意的、令人赞扬的成名作品……

1929年姚雪垠发表了描写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的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从1935年到1937年，他又先后在当时的进步文艺刊物上，如《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展现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斗争画面的《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了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

这是姚雪垠的早期创作，也是他在一生创作道路上跨出的可喜的第一步。他的这些作品，虽仍属习作，但一开始就具有时代的和作家个人的鲜明特点。

姚雪垠在青少年时期，受到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努力学习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所以他一开始写作，就表现了鲜明的倾向性，就站在了革命文学阵营一边。他不仅在杂文中公开表示自己反对把文艺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且在作品中努力反映社会矛盾，揭露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残酷现实，并鼓吹反抗，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反抗者的身上。

如1935年，他在《芒种》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鸟文人》的杂文，就批评、讽刺那些不关心国家，以“隐士”自居的作家是“玩鸟品茗之徒”，又把他们比作鸟中的“鸚鵡”、八哥、百灵、画眉之类，是妆点客厅及闺阁的鸟，是供人怡情娱心之鸟。

他在小说中总是描写农民极其贫穷的生活和他们被驱使、被愚弄、被残杀的悲惨遭遇。1936年11月，他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小说《碉堡风波》，就写了“国准时期”“僻远的、闭塞的、土霸王统治的山村里”发生的一些荒谬的事：某国占了北京东边20多个县之后，故乡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乡村的土霸王借端派捐，“碉堡委员”派安康村人出碉堡费，并限在一个月内修碉堡两座。村民不得已，挖了一座被误认为古迹的埋在地下的旧房屋，取砖修碉堡。不料立刻风传他们挖出了珍宝。土霸王、区长、驻军的团副等等，相继去敲诈，气死了保长，最后八百土匪为掠宝进村，安康村终于成了一片废墟。

姚雪垠在最初三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大多数主人公都是反抗者。象1935年7月发表在《新小说》上的《野祭》，就是写一个参加“打富济平”的人，被枪毙已经七年了，但家里的人还认为他不会死，天天在盼他回来。他们整整等了七年没有消息，他的母亲不顾一家人劝阻带小孩子到郊外烧纸

祭他，但回家的路上奶奶如要孙子走快些：“说不定你爸爸会突然回来了。”

姚雪垠的小说带有明显的进步思想倾向，但他在作品中并不直接向读者发议论，而总是通过情节和场面来表现。

姚雪垠的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他从素材中提炼人物和情节时，总要把他们带上生活本来所有的活泼的生气和特殊的地方色彩；他在作品中还十分注意描写风土画，风俗画：农村“野祭”的风格、古老的黄河渡船、凋蔽荒芜的中原土地，铤而走险的绿林好汉……

他的这些作品虽仍属习作，但一开始就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鼓励和肯定。周立波在《光明》杂志2卷2号特辑上，评1936年小说创作时曾指出：

“因为塞外的抗战，以及内地农村的破坏和骚动，在今年的文艺领土上，特别产生了许多新的收获，象端木蕻良、荒煤、舒群、朱之的、罗烽、姚雪垠、王西产、吴奚如、刘白羽等，都有很高的成就。……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1936年造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尽管姚雪垠的这些早期创作，具有时代特点和个人特色，也受到了评论界的鼓励和肯定，但严格说来，这些作品还很幼稚，还很不成熟，只不过为他今后创作，打下了基础，并未引起文坛的很大注意。姚雪垠上的新台阶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在他投身于全民抗战的伟大洪流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时。他不仅扩大了原来的生活领域，而且还于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一边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一边深入战地采访、调查、研究、体验人民的生活和情绪，搜集和积累素材，努力进行创作。终于写出了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是1938年春天姚雪垠应一个朋友的约稿，在武汉写成的。那位朋友看过以后，觉得不满意，认为写得“啰嗦”，不能利用，便将稿子退还给他了。姚雪垠不服气，又把稿子寄到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杂志，结果两个月之后，稿子在该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

《差半车麦秸》，全文八千多字，主要写了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的农民游击队员。他非常憨厚、纯朴、善良，却又带着农民的某些落后意识和习气。他抱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认识参加了游击队，但又时时惦念着家庭和土地。开始到游击队时，他称呼人不叫“同志”，叫“二哥”，他相信“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因为爱惜灯油，晚上悄悄熄掉营房的灯，以致造成宿营队伍的混乱；还在一次战斗中偷了老百姓一根牛绳。但他终于被共同的艰巨战斗吸引到集体中来了，逐渐习惯于集体生活，开始懂得了革命的意义，成为同志们“最有趣的好伙伴”。他勇敢作战，在一次激战中身负重伤，却仍然挣扎着要“留下来换他们几个”，关键时刻表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而他在最后昏迷中说的胡话是：“嗒嗒！咧咧！黄牛呀！……嗒嗒……”

姚雪垠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整个文坛的注意和重视。不仅在国内“轰动起来”，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也“轰动了苏联的文艺界”，引起国外的注意。

当时，正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充斥文坛之际，《差半车麦秸》的出现，使读者耳目一新，评论界公认它是第一批抗战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最早而又最有影响的评价是茅盾提出的。他在1938年8月16日出版的《文艺阵地》

第1卷第9期撰文指出，“差半车麦秸”这一形象，是抗战文艺发展不到一年中出现的“新的典型”，他“正是肩负着这个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的。不仅当时如此，这位文学巨匠，在事过46年之后，当他在1984年撰写《在香港 文艺阵地 ——回忆录（二十二）》（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一文的时候，继续对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进行全面深刻的评价。可见这部作品对他的印象之深。

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文艺阵地》的另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发表在三期上的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当时它引起的轰动不下于《华威先生》。所以，后来人们讲到《文艺阵地》都要举这两篇作品为代表。”茅盾在回忆录中还强调：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个在抗战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地的主人。这是一篇写光明面的小说，但作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没有去写那些天兵天将式的英雄，他只写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觉醒，然而却有着撼人心弦的魅力，使人们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源泉所在。”

“在这篇作品里，没有标语口号，没有讲理论，纯粹是故事的描写，可是我们从故事里自然可以看出深刻的道理和好多问题来。”“象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艺，才能尽了它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

在茅盾发表文章的前后，还有不少人撰文评论赞扬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如郭沫若、魏东明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过这类文章，黄绳在《文艺阵地》也指出，《差半车麦秸》描写人物的新生，是一个优秀的短篇。

《差半车麦秸》发表不久，叶君健还把它译成英文，《文艺阵地》编辑部并请著名画家就小说的内容刻了三桢木刻，作为英文版的插图，与作品一起送到美国一家进步杂志发表：后来，《差半车麦秸》又被苏联人罗果夫译为俄文，收入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

如今，《差半车麦秸》已经作为姚雪垠的成名作，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册，由著名文学评论家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评论这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指出：“姚雪垠在抗战初期以成功地运用北方农村口语，写出农民在战争中的觉醒变化而受人注意。”“这篇小说1938年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以后，以反映现实的迅速和刻画人物的真实生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为什么能获得如此的成功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品较为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写了农民觉醒参加抗战，而且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人们从公式化作品带来的腻烦中解脱出来，获得新鲜的艺术感受。著名文学评论家罗苏在《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一文中，在谈到《差半车麦秸》时曾经指出：

“作者写下了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形象，作者并没有公式化地把他写成一个站出来就十分之十的英雄，主人公，他是带着许多先天的农民性格——落后的意识，走到抗日队伍里来的。作者只索描地表现了这带着落后的农民性格的人，怎样地在这新的环境中，新的战斗力量中被教育着、被影响着的一个农民战士。”

姚雪垠自己则认为，《差半车麦秸》是他在学习道路上，着重在语言方

面进行的一种探索。他说：“在三十年代，作家中象老舍那样在《骆驼祥子》中运用极其纯熟的北京群众语言写作的情况是很稀少的，所以我在大众语讨论下，于1938年春天用中原乡土语言写出《差半车麦秸》是较有意义的成功的尝试，也曾给人们新鲜感觉。所以得到了一定的赞扬。”

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是姚雪垠在湖北老河口，从1940年2月开始进行创作，到次年1月底，断断续续，先后经过整整一年时间，在十分艰险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完成的一部难产的作品。小说完成以后，他于1941年春天寄到重庆的《抗战文艺》，但由于当时印刷厂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稿子和房子差点同归于尽，当解除空袭警报之后，编辑部的人们从废墟中找到稿子时，发现中间缺了若干页，因邮路困难，一时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无奈编辑部只好加上按语，以残稿发表在1941年11月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第七卷四、五两期上。后来该小说出版革行本时，作者才将残缺的部分补上。

姚雪垠的这部中篇小说，是在一次出差旅行的时候，构思出来的。在创作过程中，他曾遇到了三大危难。一是在日寇飞机对老河口进行狂轰乱炸的情况下，他一边在郊外躲空袭，一边进行写作。飞机一来，他赶快卷起稿纸，躲进麦地或胡豆地里，飞机一去，他拍一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在矮小的桌子上写；二是有一次他带着写好的大半部稿子逃难，走在汉水边，因人多拥挤，他的手提包被挤得掉在汉水边，幸亏他奋力抢救，才免于落水，三是在创作期间，又遇着他出天花，吃药不见效，加上每天往野外跑，躲飞机，发热吹风。身上前后心，喉咙都出满了天花。后来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认为十分危险，就把他收住在一个停尸间进行隔离。这次重病，虽然死神没有将他夺去，但却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所有这些都使他无法细琢细磨地进行写作，以致使作品出了不少疏漏！

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主要塑造了一个旧军队出身的抗日战士牛全德的形象。某支新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中一个班长牛全德，以前在旧军阀军队里当了十几年兵，他加入游击队一小部分原因是出于“直觉的爱国观念”，大部分原因是为了“想找一个出头之地，混水中摸一摸鱼”。这支游击队中又有一个外号叫“红萝卜”的战士，他原来是一个有十几亩地的庄稼人，只因日军侵入不能耕种，也加入了游击队。游击队开展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以后，红萝卜的思想起了变化，牛全德却妒忌他的进步，感到在抗日队伍中没有旧军阀队伍“自由”，但是作为抗日游击队的一员，他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又很感动，种种新事物引起了他的思想斗争。正当他准备逃离这支队伍时，发现他以前一个江湖上的“换帖兄弟”当了日本特务，他已开始认识到民族利益高于个人恩怨，既没有受“七弟”的拉拢，但又没有完全摆脱“江湖义气”，不把“七弟”的特务活动向游击队报告。战斗开始后，在对敌军面对面搏斗时，牛全德终于打死了汉奸“七弟”，救了被“七弟”追赶的战友红萝卜和赵班长，但他也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部中篇小说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

《牛全德与红萝卜》发表之后，以其朴素的语言、新颖的风格和突出的人物形象，获得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被公认为这是作者继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之后，又一成功之作。但也有人认为作家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还有人在《希望》杂志第3期上，以题为《市侩主义底路线》，对《牛全德

与红萝卜》进行了很不公正的谩骂。对此，姚雪垠在时就写了《《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一文，进行有力的抗辩。

应该说，这部作品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连姚雪垠自己也承认：“关于人物方面的漏洞也不少，如写红萝卜的心理忽略了矛盾发展……”为此，1944年春天，茅盾、冯乃超、叶以群、臧克家等人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对《牛全德与红萝卜》的讨论会，对作品进行公正的评价，并请作者本人参加。在会上，大家既肯定了小说的成功之处，又详细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姚雪垠认为这是对他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和难忘的批评。事后，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修改了一次作品。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检验以后，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评论这一作品时指出：

“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写了农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的变化。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结构和谐，经修改后，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转变过程显得更为细致合理。它与《差半车麦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觉地实践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可喜收获。”

1983年重庆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撰文评论这部作品时也指出：

“作为现实主义者，姚雪垠没有把自己封闭在‘主观’之中，也没有按照‘主观’框子把自己的创作定型化。相反，他敏感于生活与文学发展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和不断展现的新内容，努力地思考着探索着。继《差半车麦秸》后写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就显示了新的进展。作品主人公的新生过程，较之《差半车麦秸》不仅更丰富，也更艰苦。作家在较为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刻画了牛全德的优点和缺点、美德与恶行相胶着的复杂性格，突出地描写了他克服自身的流氓无产者习性所经历的从强制到自觉的痛苦斗争，较为生动地表现了他那‘旧时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移转’。从而有力地反映了‘抗战毕竟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动力’，‘抗战将激起整个中国人的社会变化，完成整个中国人的改造’。那种认为作家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还有一点应该特别告诉读者的，就是关于姚雪垠写《牛全德与红萝卜》的主要目的：他是在有意继《差半车麦秸》之后，进一步着重探索口头语言的运用与这种语言相谐的带有朴素美的作品风格。

比如，在作品中有一处写红萝卜的心理时，他用了重叠的句法：

红萝卜忧郁地想着，想着生活。麦子该到锄地的时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烟苗该到栽下的时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油菜该到开花的时候了，可是自己的地却在荒着。……

再如，作品中还采用了一种新艺术的手法：追求文学“摇曳生姿”：

他面前不远的地方是一条小河。河岸上长着一排浓密的垂杨柳。河那边，几株桃花还没有开树。阳光里闪耀着新绿和艳红。春风呢，春风里荡漾着花和草的清幽芳香。但牛全德的心上没有春：女人对他也变成讨厌的东西了。

蝴蝶成对地忽上忽下地飞舞着。蜜蜂在他耳边嗡嗡着。而且风，象一个活泼的大姑娘，用温暖的嘴唇凑近他的耳朵快活地絮语着。但牛全德默默地向河边走去，脚落在地上比平常加倍地流重了。

第十一章“太阳、月亮、星星”

1985年1月3日，姚雪垠应邀以著名作家的个人身份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营”和“新加坡华文文艺金狮文学奖颁奖大会”。当他刚下飞机，踏上这个绿意盎然的狮岛之国时，一位衣着入时，风度洒脱的报社女记者，热情地迎了上来。

“姚雪垠先生，太阳、月亮、星星，你更喜欢哪一个？”女记者直看着姚雪垠问。

“很抱歉，对你提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姚雪垠边走边说。“因为你是新闻记者，我一讲你们就要发表，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让人议论这些事，多不好意思！”

“既然如此，就不让姚先生为难了！”女记者笑容可掬地看了姚雪垠一眼，继续提问道：

“姚先生，你看我象哪一个？”

“基本象月亮！”

“可我有时也象太阳。”

“是啊，这并不矛盾！”

一个星期之后，当姚雪垠从新加坡到香港时，《亚洲周刊（英、文）》杂志的女记者又来对他进行采访。当她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行将结束时，这位女记者又问姚雪垠：

“你看我是太阳？还是月亮？还是星星？”

“你本是月亮！”

“很对，我也这样想！”

“我的这位助手呢？”

女记者一边高兴他说，一边指着同她一起来的另一位小姐又问道：

“这不好判断，因为她没有说话。”姚雪垠回答说。

他们是在干什么？是在相面，还是猜谜语？似乎使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要知道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先看看下面的这一段小说：

……陶春冰说：

“我近来正在研究三种少女型。我们日常遇见的少女，不管是在学校读书的，或已参加救亡工作的，大体上都可以分别的归入一型，你们愿意不愿意听讲这三种少女型？”

“愿意！”他们一起说。

“这是三种类型，”陶春冰开始说：“代表着三种基本性格，但一个姑娘……”

“一个姑娘可能具有两种性格，或三种都有一点，问题只看哪一种占主要成份。比如，她的性格中有一部分是第一型的，有一部分是第二型的，如果第二型的成份最多，她就是第二种女性。”

“陶先生，我是属于哪一型的？”黄梅急着问。

“我呢？”陈维珍跟着问，停止了捕鱼工作。

“看你们急的！”林梦云拦住说，“陶先生还没把三种性格的特点解释清楚呢。”

“陶先生……”韩秋桐本来想问，她自己是哪一型，但听了小林的话立刻把舌尖一伸，把羞红的脸孔藏到小林的怀里：爱羞的小声问道：

“你自己属于哪一型？”

“不要理他们，”杨琦向陶春冰催促说：“你快点解释吧。所了以后我还赶紧去画画哩。”

陶春冰停止了笑。首先，他声明说，这三种性格如果要详细而具体的报告出来，两个钟头也报告不完；现在只能笼统的谈一谈，给每一种画个轮廓，跟着他说，如果拿天上的东西来作比：第一种是太阳，第二种是月亮，第三种是天际闪烁的一颗寒星。拿地上的东西来作比：第一种是瀑布或山洪暴发；第二种是山脚下，稻田边、或肥沃而静谧的平原上，一道清浅的溪水照耀着明媚的阳光，永远歌唱着欢快的调子，第三种是清秋时节的塘水中，它是那么清，那么静，充满寒意，使你觉得它很快会凝结成冰，但只要一丝微风吹过或一片落叶飘下，都会激起来一阵波纹……陶春冰又继续打了几种比，却举不出来生活上的实际例子。他的说话的天才是那么的好，一个字一个字都恰到好处，使大家都全神贯注地静听他，觉得他是在朗诵着一首诗或一段美丽散文。当他的话结束时，全体女子不约而同地向他要求说：

“说下去！说下去！”但他连连的摇着头坚决不肯多说了。

“我替你补充一条，”杨琦接着说，笑着看陶的面孔。“假若拿文学作品来比；第一种是散文，第二种是韵文，第三种是一首情诗。”

“不，是一种永远不肯写出来的情诗。”陶春冰替他修正说，于是两个人大笑起来。

黄梅立刻觉得他自己有了新的发现，非常得意地抢着叫道：

“我知道小林是月亮，罗兰是星星！”

“别扯我，我什么也不是！”罗兰推了黄梅一下说，不过在他心中早就自认为是第三种女性了。

“黄梅，你为什么不提你自己？”杨琦问。

“你觉得自己是哪种女性？”

“她是太阳！”林梦云和陈维珍同时叫道，随后小林又转向陶春冰：

“陶先生，黄梅是第一种女性不是？”

不等陶春冰答话，陈维珍焦急的连声嚷叫着问她自己应该属于第几种，惹得大家哄笑一阵。杨请望着她用鼻子哼了一下说：

“小孩子，什么也不是。”

“她有点近于太阳，”陶春冰说，“不过将来还会变的。”韩秋桐伸一下舌头问，“第二种的成份我也有，第三种的成份我也有，陶先生，我到底算哪一种？”

林梦云急着问：“张茵算哪一种？”

陈维珍跟着叫：“王淑芬算哪一种？”

“见鬼！”黄梅突然截断大家说：“我以后非把男的也归成三种类型不可！陶先生，你说男的也可以归纳成三种么？”

这是姚雪垠在45年前，当他还是三十岁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一段有关“女性三型”的描述。从那时至今，时间虽然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因这部小说曾先后在香港有三种翻印本，在香港和南洋各地华人读者中深入人心；所以，当姚雪垠一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的读者便争相向他提问，要他判断是属于哪一种女性，这种现实中的场面，比小说中描写的场面，并不逊色。这真是无巧不成书，书外还有书啊！

这种情景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它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奖赏和光荣，对读者来说，是一种幸运。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抗日战争时期，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来看看姚雪垠和他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有关情况吧：

《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姚雪垠青年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抗战开始后，我国出现的第一部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也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从此以后，他的兴趣就由创作短篇转向长篇。

这部作品写的是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前后，大别山下一个讲习班中一些救亡青年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不仅深入描写了这群救亡青年的性格和心理，反映了他们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成功地塑造了被称为“女性三型”的——太阳、月亮、星星三个主要人物；而且把救亡活动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深刻地反映了抗战爆发后发生在上社会和家中的思想冲突，如处处存在的进步与反进步、积极拥护抗战与消极拥护抗战的矛盾等；此外，从国共之间的十年内战，经过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双十二事变，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争取，实现了国共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的第二次合作，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原有的阶级关系在历史的巨变中受到猛烈震荡，产生了新的深刻分化和联合。这一切新的历史现实，也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七·七事变以后，姚雪垠亲身参加了抗斗争，置身于“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直接感受，所见所闻，为他创作长篇小说开辟了广阔大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9年春天的那些充满诗意的夜晚，在湖北襄樊，胡绳和郑楚云等同志，常常在晚饭后来姚雪垠的住处，围着摆着咸牛肉和花生米的一张小桌，一边喝酒，一边漫谈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无所不及。他们也谈到抗日救亡工作中的姑娘，而且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谈着谈着，一个个少女便在他们的心里活了起来。而且通过对这些姑娘们性格的分析，渐渐地他们议论的真实生活中的少女，便被大家归纳塑造成了完整的三个女性文学典型。为着议论方便，姚雪垠把这三个少女的典型称为太阳、月亮、星星。因为在议论过程中，姚雪垠对少女性格的研究，有精辟的独到的见解，大家都称他为“少女心灵的探险者”。姚雪垠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时酝酿形成的。

1939年夏天，胡绳到重庆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写信向移居老河口的姚雪垠约稿，要他把酝酿的长篇小说尽快写出来，《读书月报》将从第一期开始连载。这一敦促，竟成了姚雪垠这部长篇小说能够写出的关键。

姚雪垠在动笔之前，给他的小说名为《春暖花开的时候》。因为他认为，自从1929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便是第二次革命的高潮。一二·九运动是一声春雷，抗战开始后就进入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会有急风暴雨，但春天的来到毕竟是不可阻挡。国民党右派势力对抗日青年的压迫打击，会使抗日青年发生分化，但是主流继续前进，很多青年会锻炼得更成熟、更坚强，勇敢地投入民族革命的洪流。这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

为了能够赶上《读书月报》在创刊号开始连载，姚雪垠只好在“八月秋高怒风号”的时刻，在日本侵略军对老河口的狂轰滥炸中，艰难地开始了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创作。

由于日寇的进攻，买不到稿纸，他只好用质松、色黄的当地土法造的粗纸写作；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经常到老河口狂轰乱炸，他往往不得不一吃过早饭就带着妻子王梅彩和稿子跑到郊外，向老百姓借一把小椅子，在村外的树下或菜地里，将稿纸摊在不平的小椅子上，坐在地上，两肘悬空，进行写作。等市里鸣了紧急防空警报，敌机临近时，他和妻子便赶快伏倒在地上躲避。请想一想吧，那飞机的轰鸣声、炮弹的爆炸声、机关枪的扫射声，交织在一起，是多么的可怕。每当这时，王梅彩总是伏在他的身旁惊恐地叫道：“雪垠！雪垠！”他则替妻子壮胆说：“别怕。目标不是我们这里。”当敌机在疯狂地扫射、轰炸之后，刚刚飞走，硝烟还未散尽，姚雪垠即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摊好稿子，又继续写作……

就这样，一张张带有硝烟和泥土气味的稿纸，便不断地从姚雪垠的手上飞往重庆，读者在《读书月报》上便接连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就这样，从1939年秋天开始，到1941年1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直在《读书月报》连载；后来由于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读书月报》停刊，他的写作也即中断；之后，直到1943年姚雪垠到了重庆，才将已经停顿了两年多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接着写完。1944年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分三册出版。

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连载时，就获得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出版后，又成为大后方人们到处谈论的话题，成为少有的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头版一万，一抢而光，接着又印了两三次，仍不能满足读者的渴求。

但同时，《春暖花开的时候》出版后，也引起了一系列“最严厉的批判”，其中有类似于《差半车麦秸》所受到的指责，比如说作品没有“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内部爆发的”“狂风暴雨般的热情”，没有反映“青年们是怎样的豪壮、热情和悲凉”，也没有“雄大的，悲惨又欢乐，痛苦又骄傲的，灿烂的图画”等等，但更主要的是作品被胡风主编的，在大后方较有影响的《希望》杂志，大骂并判定为是“色情文学”、“市侩文学”、“娼妓文学”，并连带作者的《戎马恋》、《重逢》等中长篇小说一起，把姚雪垠创作的基本倾向，竟然毫无根据地说成是“色情”。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春暖花开的时候》呢？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时间的实践和检验，历史已经作了公允的裁判：这部作品既有优点，也存在着缺点，但优点大于缺点，应予充分肯定；那种对它进行恶意谩骂，把它诬蔑并宣判为“色情文学”和“娼妓文学”的做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春暖花开的时候》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谈论的话题、畅销书，这是由作品本身的优点和独具特色决定的。首先，作品写出了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抗日青年的生活，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很浓厚。它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宣传抗日，而始终着眼于写生活。

1969年香港高原出版社将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入《鲁壁文艺丛书》出版时，编者徐连在这年12月1日写的一篇《〈春暖花开的时候〉出版小记》中曾指出：

“这本书的确写得很好，文笔流畅，情节动人，人物的性格刻画最为成功。虽然巴金曾批评过这本书作者对人物的介绍过于繁滞，不过，这一点正

适合今日海外读者的需要，因为大家借此机会可以多了解一些时代背景，抗战时期的生活，小城市青年男女恋爱心理，以及为今日社会所缺少的爱国情操。”

1979年12月6日，新加坡作家严晖在《星洲日报》上发表题为《姚雪垠及其〈春暖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

“《春暖花开的时候》写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别山的一群男女的抗战工作和生活动态。当时相当轰动，大后方的青年读者很羡慕那种生活，觉得新奇又很有意义。曾经过过那种生活的读者，好象重温旧梦，又思念起那一段活泼生动的日子，即使抗战结束多年，仍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第二，作者在作品中从生活写人物，塑造了一群有鲜明性格，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第三，写得美，作品中有许多地方充满了诗情画意。在这部作品里，姚雪垠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使用，使人感觉到仿佛两股水流：一股平稳清澈，另一股在欢乐地嬉戏，时而分开，时而相遇，互相衬托，更显出各自的特色，大大有助于塑造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这使他初步形成了他自己作品的语言风格。朴素、生动、流畅，基本上摆脱了三十年代流行的欧化气息，基本上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看起来顺眼，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的美学效果。这就大大地吸引了读者。

《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有严重的缺点。它出版后，于1945年5月4日，茅盾曾在《文哨》第一卷第一期撰文进行评论。茅盾说：“本书第一分册出版后，评价不一。问题是在第一分册太多了小儿女（都是救亡青年）的私情蜜意。”“如果本书的第二、三分册竟照第一分册那个调子发展下去，则本书之完全失败将不可避免。幸而第二、三分册中，儿女私情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些问题被提出来了。”“作者终于把这部书挽救过来，不使成为抗战红楼梦。”

“但是，本书虽然有不少地方写得相当细腻而深入（例如写罗兰的矛盾心情，林梦云的恋情等等），有不少写景抒情的片断看得出作者颇费了匠心，然而从整个看来，不能不说这部书还是写得潦草的。”

茅盾这篇文章中，还对小说的结构、人物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指出了存在缺点。

确实如此，《春暖花开的时候》是有许多严重缺点。因为这是姚雪垠的“少作”，是他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他那时只有30岁，思想水平不高，写作功力还浅，再加之“且排且写”，问题当然不可避免。

当时间过去40年后，姚雪垠在80年代初，谈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时，他自己也承认小说的结构不严密，布局不完整；在强调写生活的要求下，开始部分浪费了篇幅，不能迅速展开重大的社会斗争；将三个少女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故事迅速向重大斗争展开；小说没有把小城市的救亡运动同大势紧密结合起来写等等。为此，他从那时起就将这部小说加以修订，重新出版。经过几年的修改，在1988年终于修订完毕，不久将以定稿本的形式同读者见面。

姚雪垠的这部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本来计划写三部，已经出版的为第一部，后面两部以分别写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青年的深刻分化。即第一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后来都分化了，他们中有的到了游击区，有的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特别是当地方沦陷以后，这些青年的家庭有的跟维持

会汉奸发生了关系，有些则保持了民族气节……总之，不同的人各奔前程，但主流仍是抗日、进步、革命。

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刚刚问世，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文艺刊物上，就遭到一股极左思潮加宗派情绪的文艺势力的猛烈“批判”和大肆辱骂。从那之后，不少甚至连作品都没看过的人，也随声附和，跟着起哄，往往听风是雨，人云亦云，竟形成了社会舆论；看过作品、知道内情的人，见此情景，也不敢主持正义、明证是非。

这样，在抗战胜利后，当姚雪垠跟一些朋友谈到要继续写完《春暖花开的时候》，竟得不到任何支持。于是他就只好怀着强烈的愤慨和深深的遗憾，停笔了，使这部《春暖花开的时候》永远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非难《春暖花开的时候》的舆论，一直影响到解放以后，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者似乎都没有直接研究原著，就照抄了胡风等对《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不适之词。

毕竟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月亮和星星。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抗战文学研究工作者和现代文学史家，终于澄清了近四十年来少数人强加给《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各种诬蔑之词。他们认真研读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各种版本，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色情描写，甚至连挑逗性的字眼也没有。他们公开宣布：这部作品与所谓色情毫不相干。

但是，多么遗憾啊！姚雪垠和他的作品被误解了三十多年！

第十二章周恩来的赞扬

1942年当杜鹃花开的时候，姚雪垠从湖北孤独而苦闷地来到了大别山，1942年当枫叶正要变红的时候，他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大别山，在烟雨中开始了秋天的遥远的旅程，他一边走，一边望着苍茫的天边，同时想着未来的前程；1943年的1月，一路上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走完旅程，来到了大后方的山城重庆。

早在1938年3月2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之际，姚雪垠就参加了这个协会，就在日寇炮火和轰炸的包围中，站在了飘扬于拂拂春风中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这面大旗之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在周恩来积极推动下成立的。他并且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热烈的演说。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佑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被推为名誉理事；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被推举为文协理事。

这次姚雪垠来到山城重庆，就住在了重庆嘉陵江边枣子岚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座小楼里。开始他与臧克家住在一起，后来与冯雪峰同住，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之后，当协会在重庆召开代表大会时，在会上，姚雪垠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胡风是这个部的部长。

这时，党在大后方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有徐冰和叶以群等同志。

就在这年春节期问，一件对姚雪垠一生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又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被称为雾都重庆的一个难得的好天。歌乐山上的青松翠竹优美如画，嘉陵江水在春阳的照耀下波光闪闪。虽然是抗战时期，但重庆仍有节日气氛，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利用春节的时间，互相访问串门、聚会，彼此交换创作中的甘苦，畅谈繁荣文艺创作的设想，议论抗战形势的发展……

这天，33岁的姚雪垠，穿一件干净的蓝布长衫，两眼炯炯有神，同几位作家一起来到郭沫若同志居住的地方聚会。当大家正热烈地谈论着全国文艺界和山东文化界的事情时，会客室的电话铃响了。东道主郭沫若去接电话。

“是！我是！郭沫若！”

“周公！你一定来呀！我们大家等着你！”郭沫若说完，放下电话，随即满面春风地告诉大家：

“有好消息，周恩来同志一会儿要来我这里看望大家，而且还同诸位共进午餐。”

顿时，大家的情绪更加热烈起来。

周恩来同志当时在重庆虽然肩负着党和全国人民委托的重任，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对文化界和新闻界的事情一向十分关怀。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并庆祝他五十生辰，他曾于1941年专门撰写了题为《我要说话》的文章，在11月16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他在文章中指出：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

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郭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些什么呢？”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

“这些，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对《新华日报》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更是关怀备至。他不仅从方针政策上进行领导，而且给报纸撰写文章、修改稿件……，更令人感动的是，他还从报纸上的作者中发现人才，给予赞扬和鼓励。大约中午 11 点多，身穿军服的周恩来同志，来到了郭沫若的住处。

“春节好！”周恩来亲切地向大家问候过以后，便同各位作家开始交谈。午饭时，当大家谈到如何才能写出好的文章问题时，周恩来问：

“哪一位是姚雪垠同志？”

“周副主席，我在这里！”姚雪垠有点拘束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操着河南口音回答说。

“姚雪垠同志，”周恩来一边请他坐下，一边说：

“你最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已经告诉《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把你的文章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希望你以后多写些文章。”

“谢谢周副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我一定按照你的希望去做！”由于激动，姚雪垠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

是的！姚雪垠确实非常激动！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重任在身，公务繁忙的周恩来副主席还会去看，而且看后还让别人学习，而且又当面对自己进行赞扬和鼓励！

这是党对他这个同抗战文艺一起成长起来的“文艺新芽”的信任和培养！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老前辈对他寄予的殷切期望。

姚雪垠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心潮难平。他决心把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鼓励和鞭策，永远铭记在心，作为指导创作实践，不断前进的动力；他决心努力多写作品，为党的文学事业作出贡献，报答党和革命前辈的恩情！

姚雪垠写的这篇题为《需要批评》的文章，全文只有两千字。原载于 1943 年 2 月 12 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副刊头条显著位置。这是他到重庆后写的第一篇文章。

姚雪垠这篇文章的头三段这样写道：

“一个人正当恋爱的时候，往往热情超过理智，对对方失去了批评的能力，于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几点碎麻子也可以令人销魂。然而，‘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与丑毕竟有一个客观标准。善与恶，美与丑，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自有它们的绝对性，并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漫无标准。这标准就是真理。真理逐渐向深处发现，标准也自然逐步提高。恋爱者把对方的麻子看作是美点，是由于主观过强，由于偏爱，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往往如是。

“孩子纵然是秃子，是麻子，做母亲的并不因此而感到憎恶。有人谈到孩子的缺点，母亲不是公然护短，便是暗中生气，因为孩子是他的血肉变成

的，从她的眼皮下长大起来，她对他有着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偏爱。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也往往如是。

“医生纵然有高明的修养，丰富的经验，为别人治病时妙手回春，他对于自己的病痛却往往束手无策。医生总是惯于诊断别人，不惯于诊断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脉搏便失去了自信。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也往往如是。”

接着他指出：

“既如此，就需要批评，让旁观者说几句客观话。作家对批评家应该虚心，而批评家对作家和读者都负有很大责任。公正的批评不仅可以教育作家，也同样可以教育读者，提高一般的鉴赏水平和创作水准。”

姚雪垠在文章中还强调：

“我认为，一部作品，当没有发表的时候，它属于作者所有，和社会不发生关系；但发表之后，它便不是属于作者，而属于社会，起码是和社会发生密切关系。因此，作品出版之后，作者应虚心地听一听社会上舆论如何，正确的批评如何，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倘若批评家指出来真正毛病，作家应该毫无吝惜地将原作加以修改，好让这作品对社会发生更好的影响。要知道孩子长大是社会的，做母亲的应该贤明，不要溺爱，不要固执。”

第十三章 优点与缺点

姚雪垠虽然总是操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但他端正的五官，长方形脸上的两道浓黑浓黑的眉毛，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直爽，明朗的性格；还有在他中等个子的身上，时而一袭长衫，时而一套中山装，不仅没有一点土气，反而显得风度翩翩，潇洒大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在河南、在鄂北、在安徽，还是在重庆，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朴实、自信、坚强、有毅力；又是那样锋芒毕露，好为人中之龙。

他在 28 岁时，因《差半车麦秸》一鸣惊人，少年得志。从此，姚雪垠在文学事业上，更加努力向新的目标追求；在思想上，则比以前更加狂妄自大；在政治上，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姚雪垠自成名作发表以后，在创作上犹如雨后春笋一样，总是一篇接着一篇。1942 年他写了十多万字的反映恋爱题材的中篇小说《戎马恋》；1943 年他写了象征着中华民族将在抗战斗中自觉和新生的《新苗》，还有以爱情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重逢》；1944 年，他发表的小说有《三年间》《伴侣》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青年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关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他不仅努力创作，而且下苦功在多方面学习，向新的目标进行攀登……

为了使他的作品能够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风格，使他的语言走向中国气派和朴素自然，姚雪垠从中原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口语中，从元明以来直到“五四”时期白话文学中，以及文言系统的古典文学中汲取这三种语言营养；而且以大众的口语为主，将这三个来源融汇贯通。他一方面在作品中进行实践锻炼，一方面撰写有关学习文学、语言的论文；终于使他更进一步在作品中摆脱了欧化的语法，形成了“行云流水”的文风。

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姚雪垠还向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学习创作经验，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借鉴写作技巧。

姚雪垠在创作时努力学习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他说：“普罗文学政治上进步，我拥护，但我厌烦蒋光慈的小说，我很喜欢鲁迅的《风波》《故乡》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等我自己写时，追求的不是蒋光慈而是鲁迅的传统。”

他学习现实主义巨匠高尔基关于创作中“真实”的论述：“有些人物一定要雕刻得比真实的人物更为丑恶，又有一些人物一定要雕刻得比真实的人物更加优美。优美的，我将表现得更为优美；我不喜欢的，我也不怕故意歪曲，不管将他刻划得如何丑恶。”

他学习托尔斯泰的创作经验：

“写长篇、中篇（大的作品）——这就是同你作品的人物一起过生活的。你虚构出他们来，但他们应当要复活的。他们复活着，他们常常所想的并不是你所想的。你开始监视着他们的行动：把他们排挤到主要路线的旁边去，同他们共同苦恼，生长，而常常同所构成的幻想坠无底的深沟里……这样的作品是有生命的，这是艺术。”

他反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中的结构问题和写作技巧：他认真吸取《战争与和平》《静静

的顿河》《悲惨世界》和《父与子》等不朽名篇的表现方法。

他不仅学习别人的创作经验和写作技巧，还随时总结自己作品的成败经验，并经过提炼概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撰写成文学论文发表。在抗日战争时期，姚雪垠先后写了许多文学论文，如《抗战文学的语言问题》《创作漫谈》《小说结构原理》《论目前小说底创作》《小说是怎样写成的》《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等。他把其中的一部分论文集成《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专集，在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姚雪垠在成名以前就有自视甚高，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的缺点，在他成名以后，这些思想意识上的毛病，犹如“火上浇油”，更加得到了发展；无论写作、讲演、为人做事，还是与同行相处，无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自己也承认，“我在二十岁至三十岁有一个毛病，就是骄傲自满，狂妄自大。”

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本身所存在的这些缺点，与他那时曾相交往了八年，后来到了台湾的一位名叫陈纪滢的作家，1982年撰写的《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十二）《记姚雪垠》（发表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二至四期上）一文中，曾作了很值得一阅的具体描述。

陈纪滢在他的传记文学中曾这样先后断断续续的写道：

姚雪垠是风头人物，他永远不让人，要占上峰。

无论什么事，他的主意多，他说出来，非照他的办不可。起初大家都让着他，后来见他毫无民主精神，自然免不了跟他争吵。

于是，他们一致赠送雪垠一个绰号：“天才”。后来“天才”一衔，就成了姚雪垠的代名词。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

总之，雪垠不愧为“天才”，然而“天才”外露，这是中国人的大忌，可是他又憋不住，所以在任何场合，都会发觉有他在，有姚雪垠在场！他永远控制会场、桌面以及三个人以上的群体。

姚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然后讲到写作的技巧等等。

他这样讲法，至少有五、六次之多。你说这不是发疯吗？这不是神经病吗？

有一次，他在重庆的张家花园文协讲话，我偷偷地对他说：“雪垠你的开场白，我都背过了。”于是我说：“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他莞尔一笑才改了嘴。

雪垠不但在创作上，争强赌胜；在为人处世中，也往往不让人毫分。他这种尖锐的性格也构成他孤独的生活。

那时，他在写《春暖花开的时候》，自鸣得意。

比如，他在八十年代初一篇回忆青年时代的文章中就这样写道：

“我在许多年中被有些朋友目为‘狂妄’，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并没有抓到我的性格的主要特点或本质。我确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有‘好高骛远’的特点，对自己树立些狂妄的目标。有的青年有很高的目标，含而不露，谦虚谨慎，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好风格。我偏偏心中藏不住话，喜欢谈出自己‘好高骛远’的目标，这当然是‘狂妄’了。其次，我心中很少迷信名人，在属于艺术方面的问题，好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公然批评名人。有许多比

较有涵养的人，必然对别人有意见不说出口，其次者是表面上随声附和。然而我的性格有致命缺点，我有不同意见就忍不住要说出来，既不衡量自己的地位，也不肯为贤者讳。这当然也是‘狂妄’的突出表现。这后一个毛病至今未改，大概要带着去见马克思了。

“这后一种‘狂妄’表现且不必谈，如今只谈前一种‘狂妄’。前一种‘狂妄’具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浮夸，好的一面是有大志，有追求……”

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他是姚雪垠！这就是他的本来面貌：既有突出优点，伟大成就；也有明显缺点，但自己并不觉得。

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因此，对他的嫉妒和议论是可以理解的；况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日月有蚀，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因此，对姚雪垠也不应该有过的苛求！

姚雪垠是作家，作家也是人；而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本来就是这样：有血有肉，有好恶，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天经地义！

自《差半车麦秸》“誉满文坛”，《春暖花开的时候》“轰动一时”以来，姚雪垠的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来重庆后，又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扬，他的名字在报纸和刊物上，总是频繁出现，他的作品总是被突出地宣传……

他是多么的惬意和高兴啊！

他简直心花怒放了！

但突然之间，不知何故，一下子就把他从欢乐的浪峰，掀到了痛苦的浪谷深渊……

首先，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在刊登杂志要目广告时，虽然户主向报社交了广告费，但报社还是去掉了姚雪垠的名字；紧接着党领导的新知、生活、读书生活等出版单位，也完全停止了对他的作品的宣传。他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青年作家，难道就要从此销声匿迹了吗？

姚雪垠不解其意，为此苦恼。

“这是为什么？”一天，他找到了当时重庆中共地下党具体负责文艺工作的叶以群同志，心急火燎地问。

“这件事情，徐冰同志要找你谈的。”叶以群回答说：“请你不要着急。何时同你谈话，等确定后就通知你。”

那是在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的一天上午，姚雪垠被通知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楼上，去见徐冰。

“这是为什么？情告诉我！”姚雪垠坐定以后，开门见山地问徐冰。

“姚雪垠同志，事情是这样的：近来，我们收到了从延安来的一份电报，不是专门为你发的，还谈了其他事情。但其中也谈到了你的事情。有人说，你姚雪垠与国民党特务有关，怀疑你是国民党特务。”徐冰看了一下姚雪垠脸上的表情，继续说：“党组织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为此，我们有责任把你的问题搞清楚。所以，现在暂时停止了对你和你的作品的宣传。”

“这完全是有意陷害，我与国民党特务毫无关系！”姚雪垠听后，火冒三丈，非常气愤地说：“天下竟有这等无中生有的事情！”

确实，对姚雪垠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晴天霹雳，意想不到的打击！

说着说着，他便气得哭了起来。

“请不要着急，”徐冰见此，进一步对姚雪垠说：“目前，周恩来同志去延安了，他了解很多情况，他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

尽管党组织对此事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但向来听风就是雨的文艺界少数人，即乘机对姚雪垠加油添醋，大造谣言，甚至撰写文章对他进行诬蔑批判，落井下石，使他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但事实总是事实。经过重庆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调查了解，终于证明了姚雪垠根本不是国民党特务，与国民党特务也毫无关系。而且，徐冰还将此情况电告延安，延安回电说，要以当地情况为准，不能以延安提供的情况为依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延安正在搞抢救运动，搞极左，搞扩大化，有人被整得胡说八道，乱揭发，乱咬人，说××是国民党特务，××是反革命等等。姚雪垠的事情就是从这里来的。

现在，既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徐冰和《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便请姚雪垠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吃饭。

“姚雪垠同志，今天，我代表重庆地下党正式通知你，你的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我们党仍象过去一样地对待你、信任你。”徐冰一边说着，一边同姚雪垠干杯！

“这样平白无故，对我进行政治陷害，真是岂有此理，我一定要到延安去追查，看是何人所为？不搞出个结果来，决不罢休！”姚雪垠将一杯酒一饮而尽，十分生气地说。

“姚雪垠同志，请不要生气，更不要介意！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还是不要去延安为好。”徐冰劝姚雪垠说。

“真对不起！”潘梓年社长对姚雪垠说：“是我们《新华日报》首先在广告中删掉了你的名字，这种做法不对，我向你道歉！来，为我们今后的共同合作干杯！”

这件事在政治上给予姚雪垠意外打击的事情结束后，他因经济拮据，难于维持生活，在1945年春天便离开重庆，来到四川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去任副教授，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学生涯，主讲《小说原理》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两门课程。月薪十分可观。

第三部关键抉择

(1946—1957 上半年)

第十四章《长夜》

1945 年夏天，姚雪垠由三台来成都度暑假，住在东方书社。这时他 35 岁，开始了由青年向中年时代的跨进！

七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东方书社的经理王畹芎请客，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以及姚雪垠等七、八人应邀赴宴。尽管成都的夜晚没有一丝风，空气也好像凝结了似的，闷热难耐，但散席后，却没有一个人离去。大家仍围坐在桌子周围，一边摇着扇子喝茶，一边在静静地听姚雪垠讲话：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在我的肚里已经藏了 20 多年，我早就想把它写成小说，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但每当我想起这个故事，我的眼前就展现了无边忧郁的、萧条的、冬天的北国原野，而同时我的心就带着无限凄惘，无限同情，怀念着那些前一个时代的不幸的农民英雄。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也了解他们的心。我和他们在一起有过一百天的接触。

“那是在 1924 年的冬天，当我 14 岁的时候，在由学校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抓去……

姚雪垠一口气谈了足足有两个小时，才把故事的主要情节讲完。大家则完全被他的故事吸引了，简直像在听《瓦岗寨》和《水浒》！

“真是太动人了！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不然会后悔一辈子。”叶圣陶听后力劝姚雪垠。

“就住在我们这里写。我提供方便！”东方书社的王经理对此兴趣更大。果然，从这天晚上起，姚雪垠就下定决心把他的故事写成小说，而且就住在东方书社写。

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本书在第一部第三章中，已经详尽写到的姚雪垠的百日土匪生活，故在此恕不重复。

从那天晚上下定决心以后，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姚雪垠差不多每天不是朗诵，就是用毛笔抄写两句诗：

结束铅华归少作，
屏除丝竹入中年。

这两句诗，出自我国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的《绮怀》，它的全文是：

露榭星房各悄然，
江湖秋枕当游仙。
有情皓月怜孤影，
无赖闲花照独眠。
结束铅华归少年，
屏除丝竹入中年。
茫茫来日愁如海，
寄语羲和快著鞭！

姚雪垠为什么要抄写和朗诵这其中的两句呢？

他是在借用这两句诗，为自己已经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作总结。他认为，在此之前，他写的短篇《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一批小说，都属于他写作探索的第一阶段，即青年时代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突出的优点，但由于年龄和修养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够朴实的弱点，还没有达到深沉的境界。现在，他写作探索的第一阶段就要过去，马上即进入第二阶段。他决心在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一定要摆脱和克服青年时代的弱点。因此，他总是反复念着这两句诗。

完全可以说，这既是总结，又是转折，也是开端。这在姚雪垠一生的创作道路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姚雪垠经过总结，告别了青年时代，从八月上旬起，便在暑热中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创作。他把他写的小说起名《长夜》。

如何开头呢？他在苦苦的思索着，努力进行着较高的艺术追求。忽然之间，一首古诗涌上他的脑际：

兔从狗窦入，
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
井上生旅葵。

“好！把这首诗的意境，溶化进小说里去，就从这里写起。”姚雪垠想好以后，坐在桌上，提起笔来，很快便写出了这部小说的开头两段：

1924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那些幸而没有荒芜的田地里，麦苗像秃子的头发一样，活得非常的勉强和无聊。树叶早已在霜风中落净，一眼望去，到处是单调而荒凉的赭色土地。

从平汉线的驻马店通往南阳的三百里官路已经荒废，常常有枯草埋没着深深的车辙，官路旁的村落大半都成了废墟，剩下些烧红的墙壁映着蓝天。并沿上围着荒草。碾石上长着苔藓。有的村庄还没有全毁，但大部分的房屋用土坯堵塞着门窗，主人不知道哪儿去了。这是多么惊人的开端之笔！

姚雪垠用音节铿锵的散文手法，形象、生动、诗情画意地把读者一开始就带到了那无比忧郁的，萧条的、冬天的北国原野，带到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破败悲惨的现场。从此，他就展开描绘出了一系列奇特的生活画面和人物故事……

就这样，他便开始了长篇小说《长夜》的写作。这部作品，尽管开始写的较顺利，但前后拖的时间却很长。直到这年的十月中旬，他在成都才写了四万多字，之后回到三台又写。到1946年，因他父母病故于河南老家，他只好赶回故乡进行最后的告别，往返途中，他在南京、开封、邓县边走边写，最后于1947年2月才在上海脱稿，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长夜》在没有完稿以前，从1946年的夏天开始，就在陈翰伯主编的上海《联合晚报》连载了几个月，后因报纸停刊中断。1947年5月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但当时因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心惶惶，社会动乱，只印了两千本，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竟被埋没了三十多个春秋，几乎不为人知。直到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夜》，发行十一万册，这部作品才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而且在这次出版时，姚雪垠为他的重印本还写了“代序”——《为重印 长夜 致读者的一封信》，对作品的

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及其与《李自成》的内在联系等问题，都作了说明。

长篇小说《长夜》全书十八万多字，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贯穿全书的人物——青年学生陶菊生，就是作者姚雪垠本人。

这部作品所以叫《长夜》，是因为姚雪垠在抗日战争末期，曾有过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他曾设想用三个姐妹篇去反映河南农村的历史变化，表现中国近代农村的三个阶段。他把这个创作计划，叫作“三部曲”：第一部定名为《黄昏》，要写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农村迅速崩溃的过程：即原来交通闭塞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农村，如何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洋货”代替了自给自足的日用商品，主要土特产的销路受到帝国主义买办的控制，而大买办派来的客官又与本地地主豪绅们所办的代理采购土特产的商行狼狈为奸，对农民层层剥削，原来保持表面平静的农村生活崩溃了，小盗渐起，随后土匪如毛，随后又受到军阀混战的波及。旧的封建社会在动乱中日趋死亡。

第二部定名《长夜》，写农村经济崩溃后，农民没有生计，土匪蜂起，但是当蹉将也不是出路。农民在漫漫长夜中挣扎。

第三部，定名《黎明》，写北伐军进入河南，新旧军阀在河南南阳地区的角逐，农村各种力量的大动荡，大分化，而一部分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如何开始到农村中传播革命火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庞大的创作计划，并没有完成，只写出了这部《长夜》。

应该说，《长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国唯一的一部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具体地、真实地反映土匪生活的小说。它通过主人公陶菊生被土匪绑架一百天的生活经历，以豫西李水沫的一小股土匪活动为中心，不仅写出了农民、土匪、封建地主、地方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刻画了土匪中不同层次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以及他们的“被扭曲的人生”：土匪既有残暴的一面，又有讲义气的一面；既奸掳烧杀，无所不为，又有善良本质和悲苦命运，从而深刻地反映了二十年代中原和北方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侧影，更深刻地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封建剥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促使农村经济加速崩溃，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农民失业之后，城市不能吸收，无出路，年老的沦为饿殍，青年的只能当兵或当土匪，而兵匪又往往不分；军队打败仗就变成土匪，土匪收抚后则变成军队。

《长夜》的创作，对姚雪垠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从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来讲，这部作品是他写作探索的第二阶段，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他写作探索的第三阶段。但《李自成》中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可以在《长夜》中找到影子或原型。《长夜》的写作，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为《李自成》的创作做了准备，打下了基础。因此，作者曾说：读《长夜》是打开《李自成》的创作问题的钥匙之一。

早在四十年前，《长夜》刚一发表，郑振铎就说写的好，感到很满意，有的评论家也指出作品取得了“若干成功”；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此书后，一些文学评论家和现代文学史家更相继对它进行研究，先后发表评论。有的说，这部小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文笔生动朴素，人物栩栩如生，性格鲜明，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量；有的说，《长夜》不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作品。因为“它开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几乎从未描写过的生活领域，扩大了新

文学的创作题材。”并“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方法，再现了二十年代前期旧中国的黑暗和混乱，中原地区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广大农民急剧破产，走头无路的悲惨境况。提出了农民的出路问题。”一位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在评论这部作品时还强调：

“《长夜》以 20 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象《长夜》这样以现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姚雪垠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 年发表的《强儿》刻画一种坚强的性格，30 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长夜》在语言的运用上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少评论家都这样指出：“一是语言的朴素自然美，二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比如，《长夜》中有这样两段描写：

“天空清爽得象一片海水，只有远远的天边有零星的白色的云块，象一群绵羊卧在海滩。山坡上，田野上，村落中的屋脊上，这儿、那儿，有背阴处的残雪未化。所有那些化过雪的湿润地方，都在太阳下袅袅地冒着轻烟。”

“石子带着无法形容的美韵在冰上滚着，愈远声音愈清楚，最后仿佛是一根极细的铜弦在微微震动。”

用“一群绵羊卧在海滩”和一根铜弦在“微微震动”来形容色彩和声音，是多么的朴素和形象！

再如《长夜》中对蹉将陈老五的描写，更可以使人领会到作者在语言运用上的深长韵味：

……他大约 35 岁年纪，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胡子占去脸部的二分之一。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设法找剃头匠给他刮脸；如果有两天遇不到剃头匠，他就会变做猩猩。每逢刮脸，象割草一样地喳喳响。他的手十分奇怪，违背面指关节也有硬皮，扣子极密，料子是一种发亮的黑洋布，只有那时候的乡下土财主才觉得这布料和式样好看。每次洗完脸后，他总是要在他的比栗树皮光不多少的脸上抹一些雪花膏，免得脸皮被寒风吹裂。如今他正用心用意地用他的笨拙的手指给枪栓上的零件擦油。没有说话。……

这里没有层叠的形容和华丽的词藻，而是抓住人物的特征去刻划，缓缓写来，活灵活现，而且能让读者从这奇特的外表想象到陈老五的粗犷憨直的灵魂。

还如小说的第四十节，关于马文德的代表和李水沫之间围绕收抚问题所开展的一场争吵，也写得绘影绘声，余味无穷。

一个说：

“李水沫，你这个杂种，马旅长从前对你的好处你都忘了。老子瞎眼跟你朋友一场，没想到你这个人过了带子就拆空子！”

另一个跟紧着道：

“老子怎么拆空子？你个王八蛋不要瞪着眼血口喷人！”

就这样，他们在烟榻上唇枪舌剑地反复交锋，但又出之和平的声调，伴随着笑声和吸鸦片时的喷云吐雾，把对抗和友情交织在一起。

这是多么活生生的个性化的语言。

姚雪垠的《长夜》自重印以后,不仅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好评,1987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已决定将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搬上银幕;而且还被翻译成法文,在1984年1月,由法国弗拉马利翁出版社出版,轰动了巴黎和法国!

第十五章《雪垠创作集》

1947年年初的上海。北风呼啸，混浊的黄浦江汹涌澎湃，浪滔滚滚……

一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有三个人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都准时来到了上海国际饭店三楼一个单间宴会厅。

楼下的马路上，不时传来警车尖利的鸣叫，国民党的许多军队，全副武装，正在向外滩方向走去……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阴云，笼罩着上海。

“这位是作家姚雪垠，他刚从河南老家来。”剧作家徐冒霖向上海怀正文化社的经理刘以鬯介绍说。

“久仰姚先生大名，今日得见，非常荣幸！”刘以鬯一边同姚雪垠握手，一边继续说：“今天我请客，咱们好好谈谈。”

“谢谢刘先生！”姚雪垠从上到下将刘以鬯打量了一遍后说。

“我一向爱读你的小说。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重逢》等，我都读过，写得真好！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很有成就，令人钦佩。”刘以鬯坐定以后，同姚雪垠交谈起来。

“刘先生过奖了，情对拙作多加指教！”

“姚先生，现在我想首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出版社，然后再向你谈约稿的事情。你看可以吗？”刘以鬯看着姚雪垠，征求意见说。

“可以，客随主便。”姚雪垠回答说：“冒霖，你说呢？”

“好，我看你们就随便谈吧。你们两位见面了，接上了，我这个‘红娘’——介绍人，也就完成任务了。”他呷了一口茶以后，以剧作家特有的幽默说：“不过有一句话，我得首先向你们两位声明：如果你们两位的‘恋爱’谈成了，雪垠写了好作品，以鬯出版了好书，可不能忘了我这‘月下老人’。到那时，你们两人要一起请我的客！”

“一定！一定要请你的客！”刘以鬯和姚雪垠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我这个出版社，在上海来说，是一个新成立的出版社。出版的范围很窄，不出杂书，专门出版高水准的新文学作品。”刘以鬯向姚雪垠介绍说：“先严名浩，字养和，家中堂名为怀正堂，均以‘浩然正气’取义。我为着纪念先严，所以将我的出版社定名为‘怀正文化社’。姚先生你知道，上海是全国出版中心，书店林立，象‘怀正’这样的新出版社，想出好书，并不容易。所以，特请姚先生这样有才能，有影响的作家给以支持！不知现在姚先生手上有什么作品？”

“说支持不敢当，不过现在我倒有一部快要写完的长篇小说。”姚雪垠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道：“这是一部以河南西部土匪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题目叫《长夜》。”

刚说到这里，饭店的服务员，已把午餐送来，于是他们便边吃边谈。

姚雪垠绘声绘色地将《长夜》的故事情节和他的创作计划讲给刘以鬯和徐冒霖听。刘以鬯听完以后，对《长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高兴地向姚雪垠提出要求：“请把《长夜》交给‘怀正’出版吧！”

“好，我答应了。”姚雪垠考虑一阵之后又说，“但是小说还需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在2月底才能脱稿。”

“我提议，”徐冒霖从座位上站起来，拿着酒杯说：“为你们的‘恋爱’成功干杯！”

“干杯！”

“干杯！”

他们三人干过杯重新坐定以后，刘以鬯又得寸进尺地说：

“姚先生誉满全国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我特别喜爱，曾读了多次，你能不能从抗战以前与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众多的作品中，再给我选编一个短篇小说集出版，以飨读者。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战时的重庆，我出过一个短篇创作集。”姚雪垠喝过几杯白酒之后，脸色已微微发红，话也似乎多了起来；集子以《红灯笼故事》为名，收有四个短篇：《红灯笼故事》、《选举志》、《差半车麦秸》、《碉堡风云》。书很薄，只有88页，列《大地文艺丛刊》之一，出大地图书公司出版。但抗日战争结束后，这本书已绝版。因此，我愿意再选编一个短篇集子，给你出版。”

姚雪垠接受了这个建议以后，刘以鬯的胃口则越来越大了。紧接着，他雄心勃勃地又向姚雪垠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从这部长篇和短篇集开始，希望你继续创作或选编下去，‘怀正’为你出版一套《雪垠创作集》，希望这一套专集能够列入你所有的作品，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

“我同意这样做，谢谢你的安排。”姚雪垠当即便肯定地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约稿出版计划，我祝贺你们合作成功！为此，我们又应该来干一杯！”

“好！干杯！”

“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

就这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国际饭店，在宴会之中，有关出版《雪垠创作集》的事情便顺利地由双方商定下来。

但当时姚雪垠心里有一件事情，仍不踏实：

“我住在什么地方写作呢？租房子需要金条，这我根本就无能为力。住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极大问题。”姚雪垠面有难色地想。

还是刘以鬯想得周到细致，正当姚雪垠为此大伤脑筋时，刘以鬯问姚雪垠：

“在实现我们共同计划的过程中，你还有什么困难吗？我愿尽力帮助，提供一切方便。”

“我还没有住的地方！”姚雪垠直截了当地说。

“那就请你住在我的出版社，我免费招待！”

“谢谢你借给我地方住！”姚雪垠感激炮说：“你帮助我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

“怀正文化社”座落在沪西定盘路（现在叫江苏路），是一座西洋式的三层小楼。这房子还是刘以鬯的父亲，生前在宁波当海关官员时买的。抗日战争期间，因刘以鬯在重庆，这个住处，曾被汪精卫的一个特务组织霸占，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到上海，将房子收回，用来创办他的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的二楼有三个房间，两大一小。面积较大的两间，一间用作书库，另一间是供存放纸型用的。但纸型全部放在玻璃柜里，柜子不大，房间仍有不少空间。姚雪垠搬来出版社后，就住在这个清静的房间里，进行辛勤的写作。

姚雪垠住下来不久后，便将他这里的情况，写成一份书面材料，经叶以群同志转向中共上海地下党作了报告。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很快便有一个同

胡风关系很密切的姓陈的人，以“阿垅”为笔名，在当时苏联人办的《时代日报》上发表文章，造谣说姚雪垠从河南来上海后，住在一个特务机关中，给他出书的“怀正文化社”的名称意思是怀念蒋中正等等，等等。

对此，由于读者并不了解事情的真象，这篇捕风捉影，拨弄是非，造谣污蔑的文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姚雪垠非常气愤。直到事过三十三年之后，在1980年他写自传谈到这一问题时，还愤愤不已地说：

“真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看来‘四人帮’惯用的那种无耻造谣手法并不是新发明，而是昔已有之，于后为烈。”

姚雪垠来到怀正文化社住下以后，非常高兴。这里环境清静，生活方便，不受干扰，正合他的心意。在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在紧张辛勤地进行修改旧作或创作新作。

首先，他把编好的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交给出版社付印，作为《雪垠创作集》的第一种。

当时，“怀正文化社”在出版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的时候，在它的《新书及重版书目录》中，曾作了专门的介绍：

这个集子虽只包括六个短篇，却都是姚氏的代表作品。读了这个集子，可以看见十年来现实是怎样发展，也可以看出来作者的风格是怎样进一步的达到炉火纯青之境。这六篇作品，有的会使你拍案愤慨，有的会使你感动流泪，有的又使你惘然微笑。其中《差半车麦秸》及《红灯笼故事》两篇，不仅在国内被认为伟大时代的代表作品，且均早译成数种文字，传诵国际，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

接着，在这年的三月中旬，姚雪垠又写完了新的长篇小说《长夜》，交给出版社付印，作为《雪垠创作集》的第二种。怀正文化社于5月便将这部新作奉献给了读者。

姚雪垠还为他的《长夜》写了一篇后记，附在书后，同时印出。“《长夜》后记”中有两段话，很值得一阅。

一段是关于对胡风等人对他作品批评的反批评：

一年前，胡风派的朋友们曾经对我的作品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不管他们的批评态度使我多么地不能同意，我一直把他们当作我的畏友，感激他们对我的鞭策。他们说我的《差半车麦秸》是革命的公式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自然也是，而且他们从后一部作品中断定我创作人物的本领已经完了。他们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差半车麦秸》这小说发表于抗战开始后的次年春天，也可以说是最早地写出了从落后到新生的农民典型。这之前没有公式，这之后渐渐地成了公式。胡风派的朋友们一面在批判着这种公式，却一面在这一公式里打跟头，创造着公式的工农英雄。至于他们说我不能够再创造新的人物，那不是一向目空一切地小看圈外朋友，便象人们在愤恨时发的咒语一样。咒语照例只代表主观愿望，要是咒语都灵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客观的真理可讲？我当然不相信“一咒十年旺”这句俗话，但我相信至少在十年内我的人物不会有枯竭的时候。在这部小说中，我又写出了几个人物，在下一部小说中可能会写出更大更多的典型性格。

我不是故意要唱一出《三气周瑜》，只是因为我既然从事于小说写作，写性格是我的份内之事。

另一段是作者对当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的强烈的不满：

《长夜》所写的时代背景是北伐的前夜，但是谁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

内战竟然比从前更加惨烈，人民的痛苦比从前更大更深？唉，中国的夜真是长啊！

在把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和新作《长夜》交给出版社后，姚雪垠便着手认真地修改他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作为《雪垠创作集》的第三种。

这部中篇小说，最早发表于《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四二年十月，重庆书店出版三集本的《小说五年》时，徐霞柯、葛斯水等责任编辑，便将《牛全德与红萝卜》节录收入该书的第二集中。

这次，作为《雪垠创作集》第三种的《牛全德与红萝卜》，是经过修改后的全文，姚雪垠在修改作品的同时，还于1947年4月初写了一篇“《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的长文，交出版社同作品一起付印。

《雪垠创作集》的第四种，是他在1947年5月初完成的新作长篇传记文学《记卢熔轩》。

这是姚雪垠经过深入采访和调查研究，用文学手法写的一个真实人物的传记，全书十万多字。卢熔轩是一个发明家，农村改良运动者，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从事独轨火车和农业水利方面的发明创造和实验工作中，从来都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但他却处处碰壁，偶然技术上获得一些成功，结果也事与愿违。姚雪垠在这部作品里，不是用卢熔轩这位爱国科学家来表现某种抽象性格，而是表现单纯的科工富国的思想与努力在旧社会的政治环境下，必然地到处碰壁而致成悲剧牺牲者。

姚雪垠在记这位科学家时，着墨虽然不多，但却写得十分动人，使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产生被重物压迫的感觉。这部作品出版之后，曾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由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断扩大，在蒋管区出现了币值大跌，通货恶性膨胀。《雪垠创作集》作为一套专集只出了以上四本书以后，怀正文化社便陷于半停顿状态，无法继续出书，原订的《雪垠创作集》只好就此作罢。但不管怎样，1947年和《雪垠创作集》，都将永远留在姚雪垠记忆的金沙里……

第十六章在事业的十字路口……

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谁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但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比如政治上的十字路口，事业上的十字路口，个人生活上的十字路口，等等。在这些十字路口，假如走错一步，就可以影响你一个时期，甚至影响一生；如果走对了，就会给你的终生带来胜利、成功和幸福……

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能够进行正确的抉择！

但生活告诉人们，要作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有时候并不容易，它需要经过瞻前顾后，分析对比，苦恼徬徨，以及当机立断的气魄和决心，等等。

姚雪垠正走在他事业的十字路口，正在受着煎熬，正在进行着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次抉择……

“我后半生在事业上将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自从上海解放以后，他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院长以来，大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姚雪垠总是想这个问题。他在学校想，下工厂体验生活时想，白天想，晚上想，甚至连做梦都在想。

1951年春天一个温暖的夜晚。整个上海都安睡了。夜风轻轻地抚摸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只有黄浦江在低吟和喘气，只有在江上远航的轮船还偶尔发出几声沉闷的鸣叫。姚雪垠随“上海大学教师土改队”去浙东工作了一个时期，最近两天才刚刚返校。

他一向认为，每一个走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作家，都必须依靠写他比较熟悉的生活、人物、社会环境等等物质条件，才能发挥作家主观所具备的艺术的创造才能。正是这个原故，中外的很多作家才都把各自的故乡（或长久同人民在一起生活的所谓“第二故乡”）看做是创作取材的矿山。所以，他还把这种情况视为产生现实主义文学成功作品的一个重要规律。他过去十几年的创作实践，曾从正面证明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现在，这一次他去浙江东部一带体验生活，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作为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姚雪垠，他在浙江的宁波、余姚、慈溪等县帮助当地进行土改，但却听不懂那里群众讲的话，事事处处都要有人来替他翻译、解释。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困难和不方便！这种情形，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他对那里风土人物、历史背景、语言特色的充分了解，而且直接影响着他深入生活，挖掘素材，进行创作。这种实际情况，曾引起了 he 激烈的思想斗争，更加促进了他离开上海返回河南老家重当专业作家的想法。再加上，他从浙东一回学校，就收到了河南省文联负责同志劝他回老家当专业作家的来信。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他对事业上到底要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

第二天，姚雪垠吃过早饭以后，觉得思绪仍然很乱理不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于是，他决定去上海的外滩，到黄浦江边去玩玩，散散心。

此时的黄浦江边，春意融融，阳光灿烂；江岸上的柳树枝条已经返青发软，变得婀娜多姿，有的甚至在枝条的梢头抽出了鹅黄色的新芽，微风一吹，它们便轻轻地摇曳起来，鸟儿也在那里飞来飞去，好象专门为它们的舞蹈唱歌助兴；一对对青年情侣，几乎占满了岸上的木倚，他们大模大样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谈情说爱，窃窃私语，拥抱着接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姚雪垠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空椅子坐下，太阳照耀在他的身上、脸上，他觉得暖暖的，懒懒的，他面对一望无际的黄浦江，面对海与天相接的迷迷濛濛的远方，想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但是他办不到。他的思想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就好

象这奔流不息、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一样，他又一次地陷入了对这几年来往事的回顾，对他自己现状进行分析、对前途进行抉择的思考……

自抗战结束至今，姚雪垠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 1945 年下半年到 1949 年初，这三年多的时间为第一阶段，从 1949 年初到 1951 年上半年，这两年多的时间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内，基本上可以说，姚雪垠是一边教书、作学术研究，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他的重点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但也有一些有关历史学术方面的论著问世。

在此其间，他 35 岁时曾被聘为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给学生讲授《小说原理》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两门课程；36 岁时，曾在成都的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学院担任有关文学方面的特约讲座；37 岁时，如前一章所述，他住在上海怀正文化社在创作新作、修改选编旧作；38 岁时，为了在上海能够找到供他写作和研究学问的住房，曾到浦东一个乡间小镇的高行农业学校，担任过为期一年的国文教师。

这期间，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新作有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长篇小说《长夜》，传记文学《记卢熔轩》，电影剧本《万里哀鸿》并出版四本一套的《雪垠创作集》；还于 1946 年写有以故乡与童年为题材的一组散文：《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在这一组散文中，姚雪垠不仅饱含着感情，写出了三个妇女的不同命运，而且也写出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以及他故乡的风土人情和民间习俗。

这期间，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于 1948 年，在大型左翼学术刊物《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历史论文。一篇为《论石敬瑭式的政权》，这是用借古讽今的办法，将投靠美国以求生存的蒋介石比做石敬瑭；另一篇为《明代的锦衣卫》，这是借论述的锦衣卫影射蒋介石的特务政权。此外，他还写了两部没有完成的有关学术研究的长稿。第一部的题目是《明代的特务政治》，通过这半部稿子的写作，使姚雪垠进一步了解了明朝历代皇帝统治臣民的一种为唐、宋所没有的特殊手段；第二部的题目是《崇祯皇帝传》，姚雪垠当时一边写一边在 194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3 月上海的《幸福》月刊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号上发表（未完）。姚雪垠写作这部论文的目的是想弄明白，明朝中叶以后各代皇帝的政治生活，深入研究崇祯所承继的历史包袱，探索他悲剧性格形成的因素。

姚雪垠的《崇祯皇帝传》，在第一卷（《悲剧的根源》）第一章（《血腥的传统》）的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万历三十八年 12 月 24 日，天色黎明的时候，有一个不幸的婴儿在东宫诞生了。这正是凛烈惨淡的严冬，北京城滴水成冰，一切的生物都在严寒的威力下瑟缩而颤栗，不知有多少生命正在冰雪中冻饿而死。好象这季节象征着这婴儿所处的悲剧时代，也象征着他一生的不幸命运。而且他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是不能分开的，当他的悲剧演完之后，整个的民族又继续扮演了三个世纪。然而当他诞生的时候，皇宫中并没有引起来多大重视，更没有人会想到他竟有那么重要；将由他来偿还祖宗的累世血债，做中国历史大悲剧的主角。他不是长子，他的父亲还没有承继皇位，所以人们只能预料他将有一个王的爵位，无声无息地活着罢了。

这婴儿的名字叫朱由检，就是十六年以后的崇祯皇帝。

姚雪垠在《崇祯皇帝传》中还指出：

“朱由检的家族历史，只能追溯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止。

“从民族解放的意义上说，我们不抹杀朱元璋的伟大功绩。但从另一方面看，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却罪不可恕。他们统治中国有二百七十多年，使君权扩张到疯狂地步。从开国的朱元璋到亡国的朱由检，除掉享国很短的惠帝外，我们所看到的皇帝不是荒淫，便是爱钱；而独裁、蛮横、残酷，则是他们的传统作风。我们所看到的皇帝都是那样的刚愎、骄傲，差不多失去了理性，也失去了人性；历史上所谓‘从谏如流’的开明皇帝，在明朝没有一个。明朝的皇帝不仅把人民当作奴隶，还把大臣当作了奴隶，随随便便的加以羞辱，给以刑罚。虽然朱元璋靠农民的力量夺得政权，但他的政权却建立在大地主的利益上面，使皇庄、宫庄、豪门占田，徭役和赋税制度剥夺了农民的生存权利。

“朱由检也承继了祖宗的刚愎作风，不允许有人在他的面前说一句坦白有用稍微逆耳的话，甚至没有人敢说实话。因此，在明朝，皇帝愈变得神圣和尊严，便愈成了孤独的统治者，愈成了聋子和瞎子。在遗传学家的眼光中，看朱元璋及其子孙们的这一作风，当然会认为是血统问题，但我认为血统的遗传在其次，主要的是制度问题。就是说，刚愎和残暴的性格是由生活、环境、传统的政治制度形成的，左右权无限扩大的条件下，君主的刚愎和残暴是当然的现象，不然就不象独裁皇帝。

“确实，明朝的历代皇帝尽都是血腥的统治者。他们不是靠清明的政治来维持政权，而是靠锦衣卫镇抚司，东厂和西厂，这些特务机关和特刑庭来维持政权，是靠残无人道的酷刑和杀戮来维持政权，血债自然要用血偿还，而一切违反理性的统治办法都只能增加人民的普遍仇恨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所以，在明朝，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压迫的战争，将近三个世纪中此起彼落，接连不断，终而形成崇祯年间的狂风暴雨，同时朝廷解体，连皇帝所信任的太监也一个个背叛了他。

“过去一般人觉得朱由检的下场太惨，其实二百七十多年的血债永远也不能偿清！”

这些有关明代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和未完成的研究文章，一方面在实际上起到了为他在九年以后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做准备工作的作用，同时，另一方面，对姚雪垠用毕生精力创作的《李自成》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第二阶段内，姚雪垠主要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他既是教授，又是学校的领导：有时虽然也去工厂体验生活，进行文学创作，比如他在这一期间，先后发表和出版过小说《因为我也是工人》、《母爱》，剧本《一封信》等。但毕尽数量很少。

他热爱大学的教学生涯，他在教学时，可以把文学史讲得令人回肠荡气，小说原理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使学生受到极大的教益，他教授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但他又觉得自己在这一岗位上，不会有大的作为。他心情痛苦、思想矛盾，他的日子很不好过……

快到中午时分，姚雪垠关掉了他思想海洋中回忆的闸门，开始转入对自己的认真剖析，他从长椅上站起来，沿着黄浦江的江边慢慢走着，任海风吹拂、抚摸，江水一起一落有节奏地拍打着江岸，不时击起一堆堆白色的浪花；他的思想也似乎在合着江水的节拍，不停地运转、思索：

——如果我继续留在学校，象前几年这样教书，那么后半生在事业上：

就只能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学问的工作。教书是很有意义的，我也许可以教得很好；但我已经 41 岁，在学术研究方面，由于先天不足，在青年时期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积累，又有不少缺门，所以一定不会有什么大的造就，发表一般性的学术论文、出版书籍、都不困难，但要做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学者，已不可能；而且由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因此，在业余也不可能写出什么重大的文学作品。

这样下去，也可以生活，但后半生一定事业平平，无所作为。这，我决不甘心！

——如果我离开学校，离开教书岗位，回河南老家重当专业作家，重理写小说的旧业，很可能发挥我的长处和优势：比如我已经写过不少小说，又非常熟悉河南的生活，对文学创作有浓厚的兴趣，对学习文学语言曾下过很大的功夫，已初步形成了自己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我还有自己的创作计划，等等；这些长处和优势如能发挥的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也许会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路，能够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做出有创造性的贡献。至少也得到了在创作上做出成绩的机会，有做出成绩的希望。有机会、有希望，为什么不去争取呢？

就这样，经过上百次反复分析和比较之后，渐渐地，姚雪垠就把砝码，加在了他心中那台天平的“当专业作家”一边。况且，当时华东高教部正在积极筹备上海儿所私立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而他又是大夏大学的教授、兼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院长。“要离开学校，就必须在合并之前，不然等成立新校、人事制度确定之后，就再没有机会了。”姚雪垠这样想：“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不能再因循不决，优柔寡断了。”

终于，他下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离开教书岗位，重当专业作家。在事业的十字路口，做出了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正确的抉择！就在这时，他一下觉得轻松了许多，一股愉快的情绪，胜利的喜悦涌上他的心头。他快步离开了黄浦江边，来到一家河南饭馆，要了一盘猪耳朵下酒，自斟自酌，为自己的决定庆贺！

8 月 1 日这一天，大夏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饯别仪式，文学院的师生们燃放鞭炮、敲锣打鼓地为他送行。

就这样，姚雪垠抱着留恋的心情，正式告别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大学教学生活，又一次走上了新的征程。

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一条充满困难和布满荆棘的道路，他更没有想到，他踏上这条道路，迎接他的竟是无法忍受的苦恼和烦闷！

第十七章 “这一辈子算完了！”

41岁的姚雪垠，怀着创作的宿愿和希冀，带着理想和追求，驾着他的生命之船，在1951年金色的秋天，终于由上海回到了故乡河南。

秋天本来是收获的季节。在中原大地上，那金黄的谷穗、殷红的高粱，银色的棉桃，还有那象挂满树枝彩灯的橙黄色的柿子；在千家万户的房顶上、屋檐前、院子中堆放的玉米、白薯……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到处都充满了欢愉的气氛。

姚雪垠抱着一团燃烧着的理想之火回来，想为实现自己的追求，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大干一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生活的大海却不向他敞开胸怀，而是用那黑色的浪头，一个接一个、不停顿地向他袭来，使他陷进了无边的苦海……

他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时，是教授、每月工资为520块银元，但回来后，尽管那里将他职务与工资待遇情况的档案一起转来，但河南省文联的负责人，仍毫无道理地将他的职级定为文艺八级（相当于讲师），工资定为每月500斤小米。

这种职务上的降级和工资的大减，使姚雪垠非常痛苦。后来，到1953年，他转到武汉中南作家协会，虽然新单位的领导，觉得他的级别定得太低，很不象话，使劲提，才给他提成文艺六级，仍无济于事，离他原来的待遇仍相差很远。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同他差不多的人，行政级都定了十级、十一级，而他原来是教授，却平白无故被降为讲师。但他又不敢提，一提就变成了争级别，闹待遇；不提心里又闷得慌，他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

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他的经济收入大为减少，全家的生活难以维持。本来，他从上海回来时，还带了一点钱，但在开封，河南文联又没给他分配宿舍，他还得用钱租房屋居住，这样，开支就更大，他全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难。

渐渐地，他的这种情况为朋友们所了解，因此，有人曾先后多次劝他到郑州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中国文学系去任教，享受教授的职级和物质待遇。如果这样做，全家的生活一定可以得到大大的改善。但是姚雪垠却说：

“级别的下降，经济上的减少和生活上的困难，虽然使我很痛苦。但不能动摇我为祖国的文学事业进行努力的决心，我既然破釜沉舟地回到家乡，就一定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绝不退缩。谢谢你们关心和好意，但我不能离开文学创作，再去教书。”

就这样，姚雪垠便忍受着生活上的困难，又驾驶着他的生命航船，继续在文学创作的海洋中行进！

他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情况，结合自己以前走过的创作道路，清醒地认识到：要做一个较有成就的作家，一定要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

- 一、必须有进步的思想（就他所处的时代说）；
- 二、必须关心现实，充满正义感，而又能在困难条件下不追随俗流，人云亦云；
- 三、必须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对生活的知识愈深广愈好，不应局限于一点；
- 四、必须在写作上不断提高，精益求精，到死方休；

五、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读书，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

对此，他不仅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认识，而且还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单就以学问修养来说，他深知自己的弱点：9岁开始认字，从童年到青年时期多在失学，家中又没有藏书；19岁时到开封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可很快又被学校开除，后来流亡北平，虽读了一些书，但因要谋生，毕竟读书时间有限，加之他青年时期，骄傲自满，所以始终未能切实地打好学问基础。正因此，他才放弃了青年时代既当作家又兼从事学问研究的理想，才从上海的大学回到家乡当专业作家。但当专业作家也非常需要学习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因此，当他从上海返回文化古城开封的时候，就决定一边写作，一边努力读书，提高学问修养。趁他尚在中年，通过读书，尽量丰富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知识，丰富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知识，帮助他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生活。

因此，当他看到在开封几条马路的两边，摆着的许多很有价值的旧书时，当他看到他以前想读，又不曾遇到的明版和清代的精刻本时，他竟欣喜若狂，流连忘返，一头栽进了线装书中。他不仅经常逛地摊找旧书看，还在生活本来很困难的情况下，又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一点便宜的好书回家去读。

这本来是好事，但当时河南省文联的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却大为不满，并向他发出了严肃的忠告：

“雪垠同志，你的肚子里装的封建东西太多了，成了你沉重的包袱。因此，我劝你不要再去逛旧书摊，要同线装书决裂。”这位领导强调指出：“你应该明白，现在是新中国，我们只要能够将《干部必读》读完就够了。”

姚雪垠听后，只觉得莫名其妙，啼笑皆非，无言以对，但从此，他却深深地感到：邀请他回来的河南文联的领导同志对他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比如他的长处、短处，在创作上的追求等等，并不了解，他对于故乡的新环境、新情况也并不清楚。这种形如“凿枘”的情况，使他在思想上和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痛苦。当然，姚雪垠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还是“我行我素”、“依然故我”。但“故步自封”、“‘资产阶级文艺观’牢固不变”、“政治思想落后”等等的议论却满城风雨，对他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更使他伤心和痛苦的事情，还在后边。

本来，他是怀着强烈的创作宿愿和宏大的创作计划返回故乡的。

在回河南之前，他就暗下决心，要写出他自己的《静静的顿河》。因为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已开始写了十多万字的名为《小独裁者》的长篇小说，但因自己不满意，未进行下去。这次回来，他原打算利用他对河南风土人情和群众语言比较熟悉，和对中国现代史知识较多的条件，在《小独裁者》的基础上，再将原来的题材扩大，以河南农村作为背景，以一家四代人的生活命运为线索，写一部反映河南农村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初期，几十年间变化的大部头的长篇小说。

他还打算完成抗日战争期间计划写的“农村三部曲”，即

《黄昏》、《长夜》、《黎明》。把在1947年收入《雪垠创作集》出版的《长夜》，进行修改，扩大内容；然后再用两、三年时间将《黄昏》和《黎明》写出。

这是一个多么具有雄心壮志的非常好的创作计划：原来既有基础，作者又有决心，谁都不会怀疑只要经过努力，定可完成。

但是非常遗憾，姚雪垠回来后，当时河南省文联的个别领导同志，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片面理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加之作风又简单、粗暴、武断，竟使姚雪垠感到左右为难。

这位领导经常要姚雪垠写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看的短小作品，并宣称“写短小的通俗作品也可以产生托尔斯泰”，他还批评姚雪垠不积极为工农兵写短小作品，是“不肯为群众雪中送炭”，指责他的“文笔太细，不符合时代要求”。正告他如“不改变这种风格”就“很难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物的精神面貌”，甚至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对姚雪垠进行嘲弄：

“老姚同志从前写过好作品（按：指《差半车麦秸》等），好坏一抵消，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他现在总想写脱离现实的大部头长篇历史小说，这是为了打翻身仗，哈哈！”

亲爱的读者，请想一想，在这种历史气氛和生活环境中，姚雪垠，一个正直的有成就的作家，他何以为人？何以进行写作？他痛苦，他伤心，他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写作宿愿付之东流。

1953年夏天，中南作家协会分会成立，姚雪垠即由河南调到武汉的中南作协。这时，他虽早已被迫停止原有的写作计划，但他的雄心并未泯灭，理想之火仍在暗暗燃烧。由于他在河南省新乡通丰面粉厂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对这个工厂的历史和三代工人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and 了解，加之他总希望以他比较熟悉的河南现代社会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纵深地反映生活；因此，他在新乡通丰面粉厂深入生活期间，便萌生了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他决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创办的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为原型，再加上一定的历史概括，写出内地轻工业的出现，它的几十年变化历史，农民通过不同渠道变成工人，三代工人的生活经历与思想等等，他把这部作品起名叫《白杨树》。

姚雪垠是住在新乡通丰面粉厂进行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由于他非常熟悉这个工厂和这里几代工人的生活，所以他写起来觉得十分顺手，而且常常一边与一边流泪。到1955年已经写了20多万字。这时，姚雪垠又被叫回武汉参加运动。

他哪里想到，这次回武汉后，一场恶运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武汉的天空被厚厚的乌云完全遮盖，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也没有一点亮光，夜黑得简直有点令人可怕！

“你请坐，”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的一位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对姚雪垠说，“听说你在写长篇小说《白杨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写作情况。”

“好吧，”姚雪垠说，“现在，我就把《白杨树》的结构、内容、人物、主题、写作进展情况向你汇报！”

当姚雪垠向他汇报完后，这位负责人下命令说：

“姚雪垠同志，我坚决反对你把这部长篇小说继续写下去！”

“为什么？”姚雪垠非常吃惊地很不理解地提出疑问。

“不必激动！”这位负责人打着官腔说：“理由是充分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他从嘴里喷出一个烟圈以后，慢腾腾地说：

“第一，你写这个工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厂到抗战初期二十多年里，没有写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行的。写工人的小说不能不写党的领导；

“第二，在沦陷期间及以后，你在作品中虽然要写党对工人的领导，但

是你姚雪垠没有这种生活，也不熟悉这种生活，因此你就根本无法把作品写好！……”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姚雪垠听后激动地提高声音说：“你没有看我的稿子，怎么就主观武断对作品下结论！请你看完我的稿子，再发表意见好不好？”

“稿子没有看的必要！”这位负责人说：“这个意见是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说的，请你停笔！”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不看作品就对它宣判死刑！”姚雪垠激动而气愤地说：“我永远不会同意你的意见！”

“你太狂妄自大了，竟敢目无组织……”

这样，他们两人在当场便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但姚雪垠终于无法改变这位领导人作出的错误决定。为此，他痛苦极了。他回到宿舍，怎么也想不通，这位领导怎么会如此蛮横无理？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愤怒。为了表示他的气愤和抗议，姚雪垠一怒之下，在一天竟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手稿，放在火上，化成了灰烬！他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心都碎了！这是他用无数心血，准备向祖国和人民奉献的礼品，烧掉它，简直比挖他的心还要疼！

这是姚雪垠在文学道路上的悲剧！也是我们祖国那个时代在文学创作事业中的悲剧！

这是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统治文学创作必然带来的恶果！多么令人痛心！多么发人深省！

但愿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创作事业中，今后永远再不要发生这样可悲可笑的、不利于繁荣中华民族文学事业的事情！

但愿所有的后人都能记取这个惨痛的教训！

《白杨树》被人为地错误地扼杀以后，可怜的姚雪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无力抗拒当时的极左潮流。结果，他无奈只好“顺从”领导的意图，按照当时流行的主题和题材，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携手》，发表后又改为长篇小说《捕虎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有好技术而思想保守的老工人，他的徒弟是一位技术较差而思想积极的青年工人，师徒间发生矛盾，一个埋藏的阶级敌人从中挑拨，使师徒关系变得更糟。后来揭露了阶级敌人，师徒关系顿然改善，团结起来，将生产搞得很好。

毫无疑问，这部小说得到了同他谈话的那位负责人的热心关怀和支持；但姚雪垠本人却很不喜欢，而且他一边写，一边总是觉得自己思想上和心里都是空荡荡的，满不是滋味；干违心的事，在他看来还是头一回，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没有出息！多么有愧于祖国和人民，有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和时代中生活，作家也一样。不管谁都要受社会的影响，在思想上还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姚雪垠自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回到河南以至湖北武汉以来，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他深深地陷入了创作的苦闷之中；同时由于疲劳过度，他的身体也垮了，他患了长久的头晕病，走起路来总是感到象腾云驾雾一样，还经常晕倒在地上……

这五年多的时间，姚雪垠在创作上完全处于苦闷时期，除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和杂感外，他没有写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些创作苦闷的年代里，姚雪垠简直象疯了一样，他常常在走路或坐

在家里时，总是自言自语地发出哀叹：

“完了：完了！我这一辈子算完了！”

第十八章 心声

言为心声！

“物不得其平则鸣！”

即便姚雪垠在处于创作的苦闷时期，也并没有忘记党和人民、祖国和时代所赋予他这位作家的神圣职责。小说不好写，他就采用散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对当时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以及文艺界的某些领导同志有意见，他就从对党的信任和爱护出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通过写文章或在座谈会上发言，大胆提出。

姚雪垠写了哪些散文？通过文章和发言又提了些什么意见呢？

1957年春天，中南海柳绿花红，阳光灿烂。一天上午，毛泽东主席正在他宽大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人士对全国文艺界情况的汇报。当他听完周扬和茅盾的发言之后，突然问道：

“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

“主席，我们没有注意到。”周扬和茅盾异口同声回答。

“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把脸转向周扬和茅盾又问：“作者姚雪垠，何许人也？”

“三十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茅盾补充道。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毛泽东肯定地说，“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过了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办公室，听取新闻界人士汇报情况的时候，同《大公报》《文汇报》等单位的负责人储安平、徐铸成等同志，又一次谈到关于姚雪垠写的《惠泉吃茶记》的散文。

很快，这一消息就传开了，原来没有注意到这篇小文章的文化界、新闻界知名人士，听说毛泽东同志议论过这篇散文，都纷纷找来《新观察》查阅。

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散文《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1956年秋天在太湖养病期间写的，全文两千八百多字，最初发表在《新观察》1956年第17期，后于八十年代初，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特写选》第一册。

《惠泉吃茶记》有着十分鲜明的主题思想：即反对迷信、盲从、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提倡实事求是地独立思考。

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几个月的时间内，一些干部中曾盛传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在举行秘密谈判，台湾可以不经战争而回归祖国的消息。一天，姚雪垠在看《参考消息》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则外国记者有关此事询问周恩来总理的报道：

“倘若蒋介石回到大陆，要给他个部长吗？”记者向周总理提问道。

“他能回来，给他个部长位置太低了。”周总理笑着回答。

看完这条消息，姚雪垠觉得既新鲜，又兴奋。作为一个作家，他很快意识到，应该义不容辞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他一直在寻找适合的时机来做这篇文章。

1957年春天他来北京出差，《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约他为刊物写稿。

“时机到了！”他听完彭子冈对他提出的约稿要求后，回到住处，在日记上写道：“我要写一篇题为《卢沟桥礼赞》的散文，把我想说的思想，可以很自然地写进去。”

就这样，姚雪垠便很快写成了全文一万多字，共分四节的游记散文《卢沟桥礼赞》，发表在1957年七月的《旅行家》杂志上。

这是一篇抒发爱国主义感情的散文，许多段落都流露着作者的激情，寄托着作者的思想。

在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年时间内，姚雪垠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为着推动我国文艺创作能够更加繁荣，为了帮助党整风，他曾以赤子之心，逆耳忠言，对文艺战线上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领导思想和领导方式，对文艺战线上存在的极左思潮、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等弊端，提出了尖锐的但是善意的批评。

姚雪垠的这些批评主要体现在他写的《谈打破清规戒律》、《创作问题杂谈》和《打开天窗说亮话》等三篇文章和在两次座谈会的发言中。

除此之外，姚雪垠还于1957年上半年在北京参加了《文艺报》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一次，他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由编辑部加了一个《要广开言路》的标题发表，文中谈到了文学创作上的所谓“本质论”的问题。在另一次座谈会上，他在发言中批评了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

本来，姚雪垠是抱着对祖国母亲和亲爱的党的无比赤诚，创作散文，针砭时弊，寄托思想，以期尽到他一个作家应尽的责任；针对实际情况，结合自己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响应组织号召，帮助党进行整风，才认真大胆地撰写文章，发表言论，提出意见。

这些作品、言论和意见都是从心底向党发出的声音。它象水晶一样地纯洁，溪流一样清彻，空气一般透明，象日出月落一样正常，并无什么错处，更无可非议！

但姚雪垠哪里会想到，他的这些作品、文章和意见，竟变成了所谓的“右派言论”，他的心声给他带来的将是塌天大祸，将是一场可怕的毁灭性的打击！

第四部 疾风劲草

(1957 下半年—1976)

第十九章 错划“极右派”

从1957年6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著名爱国人士，大批驰名中外的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都遭到了批斗，被错划成为“右派分子”。

本来，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是必要的。但是，根本用不着人为地制造和发动这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来北京住在西山八大处修改长篇小说《捕虎记》的姚雪垠，就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他惊恐万分，坐卧不宁，根本不能集中思想修改作品。他天天看报，密切地注视着反右派运动的进展情况，时时为他的命运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呢？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8月下旬的一天，武汉作家协会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回去参加运动。几天之后，又有专人来京请他速回。

“这一定是不祥的预兆！”姚雪垠想，“为什么一道金牌、”又一道金牌地催着回去呢？”

离北京口武汉的那天晚上，首都的天气闷热难耐，即使是一向被称为比较凉快的西山八大处，也同样暑热蒸人。室外根本没有一丝风，知了一直在不停地鸣叫。夜已经很深了，但姚雪垠躺在床上仍毫无睡意，他觉得烦躁，思绪很乱。

一会儿他想：也许上级有规定，让每一个人都参加运动，所以才要我回去，不是要回去批斗我，把我也打成右派。因为我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的重要措施，从来都是完全拥护的，虽然在文艺问题上我提了意见，但目的也是为了繁荣和发展党的文艺事业，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或阴谋夺权，我更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一会儿他又想：也许已经把我确定为批斗的对象了。因为在我提意见的时候，曾带有个人情绪，有的地方比较偏激，有的言词过于尖锐，伤害了作协的领导，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但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做法都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也许猛烈批判之后并不把我划成右派……

总之，他一会想这儿，一会想那儿；一会想东，一会想西，一直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折磨自己，痛苦万分。

姚雪垠所抱有的种种幻想和侥幸心理，很快就被残酷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就象肥皂泡一样，一个一个地遭到破灭。他这棵文艺阵地上的小草，也同别的无数的嫩芽、青草和鲜花一样，统统在劫难逃，一起遭到了急风骤雨的无情的吹打和袭击。

事实上，姚雪垠早已被武汉作家协会确定为反右派运动中的重点批斗对象，而且批倒批臭之后，还要给他戴上“极右派”的帽子，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他由北京一回到武汉，很快就被押上了审判台，就被通知出席由武汉作家协会主持召开的对他的批斗会。

对姚雪垠的批斗会，在9月份就先后接连开过三、四次：与此同时，在作协机关还贴出了许多批判他“右派罪行”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在对姚雪垠进行口诛笔伐之后，便勒令他检查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但他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怎么也检讨不深刻，认识上不去。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并不影响对他作结论，给他划“极右派”，让他签字，呈报上级审批。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的，先后仅仅用了一个月。

到1957年10月初，虽然上报的材料还没有批复，但姚雪垠实际上已戴上了“极右派”的帽子，被彻底地孤立起来：不仅没有人敢同他来往、说话；甚至看见他就象见了瘟疫一样，都要赶快躲避，怕的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实际上，这是对右派进行的一种严厉的惩罚，叫做将“右派彻底孤立起来”。

为了把他彻底“批倒批臭”，武汉作协还在省、市及全国报刊上对姚雪垠进行了公开揭露，点名批判。使姚雪垠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当时《河南日报》有一篇文章竟指名道姓说他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真是岂有此理。

本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时，就有人无中生有，诬陷他是国民党特务，当时重庆的地下组织，随即对他采取不应该的做法，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后来查明事实真相：姚雪垠根本无有此事。为此，地下党组织专门向姚雪垠作了赔礼道歉。但不知，昔日的错误，如今为何又再一次重演？姚雪垠对这样的造谣，诬陷，在心中愤怒无比，但他也只能权此而已。他是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信上帝，但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却总是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托尔斯泰一篇小说的题目：

《上帝知道，但须要等待》！

不到年底，他就被宣布是“极右派”，工资也被取消，改为每月只发90元生活费，并开始进行监督劳动。

到1958年秋天，中共湖北省委最后正式批准，将姚雪垠划为“极右派”，并且给他戴上了这顶压死人的“帽子”。

其实，姚雪垠何罪之有，他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忠诚，以满腔的激情写下了不愧为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惠泉吃茶记》和《卢沟桥礼赞》，这些作品是真正的香花，根本不是什么毒草。他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以赤诚之心，逆耳忠言，对文艺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意见。这种可贵的精神，本来应该受到赞扬，怎么能说是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但他为此确实受到了惩罚，而且为时长达22年。

第二十章 在灭顶之灾面前……

姚雪垠这一次真的完了吗？

也许是！

因为他遇到的打击和灾难，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已经有消息传来：在武汉被错划的“右派”中，上吊自杀的有之，投江自尽的有之……

姚雪垠怎么样？

姚雪垠自从在反右派斗争中，错遭批斗、错划成为“极右派”以后，在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确实感到非常痛苦，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在那些日子里，他总是在痛苦：白天以泪洗面，夜晚几乎都在失眠，实在太困了，偶然睡着一会儿，但醒来后又哭了起来。他悔恨自己不该说话，尤其不该说尖锐的活。但他对党从无二心，又认定自己说的话并没有错。他是平白无故，惨遭横祸和冤屈的。

这是为什么？

他想不通，更找不到答案，只好用眼泪来冲刷郁结在内心的无法倾吐的痛苦。

可这种办法不仅解脱不了他原有的痛苦，反而又给他带来了新的痛苦，使他完全陷入了痛苦的海洋，甚至他浑身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都无不浸透在痛苦之中。由于哭的次数太多，严重失眠，使姚雪垠患了眼病：他的左眼又红又肿，怕光流泪，疼痛难忍；右眼总是带着一个深深的黑圈，陷入眼眶，而且体重大大减轻，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一下就消瘦和衰老了许多。无奈，他只好到医院就诊。但医院当时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反右派运动，正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围歼，到处都贴满和挂满了“揭露”和“批判”右派的大字报。医生一看病历上姚雪垠的名字，知道他是被报纸点名，已经批倒批臭、定案戴帽的“极右派”，便态度冷淡，爱理不理，敷衍塞责，致使眼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长期不能痊愈。

“天哪，我怎么这样命苦？！”姚雪垠从医院回来的那天晚上，一边看着洒在地上如木的月光，听着长江的涛声；一边躺在自己的床上孤独得近乎绝望地想：

“我怎么办？是象有些人那样，站在长江大桥上，两眼一闭，心一横，向下一跳，解脱痛苦，了却此生。还是战胜痛苦，振作精神，坚强地活下去，同命运搏斗，同生活抗争，在逆境中走出一条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继续做工作，作贡献的新路？”

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想啊，想啊，直到天亮，他才理清了自：己的思想，想出了一个结果：

姚雪垠认为自己对党对人民是肩用之才。他决定：决不向命运屈服，决不自杀！

尽管姚雪垠已经度过了思想上的生死难关，决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但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并不知道他的想法。他们知道的是：姚雪垠有着倔强的脾气，看见的是他常常都在痛哭难过，还有那一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因此，他们总担心姚雪垠一时想不开，会自杀。因此，他们便把他的妻子王梅彩从开封叫来武汉，让她照顾姚雪垠一个时期。还因此，在初秋的一天黄昏，武汉作协的副秘书长、机关党支部书记、这次反右派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韩

柏村，突然到姚雪垠的住处，来看望他，并情姚雪垠到长江边上去走走。

这时，白天太阳留下的炎热早已减退，美丽的晚霞正升起在天边，江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江岸，不时激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阵阵凉风还轻拂人面。要是在从前，姚雪垠见此情景定会激情满怀，诗兴大发。可现在，他根本没心思去观看这美丽的景色。他们两人在新筑的长江防洪堤上边走边谈。

“这次你虽然栽了大跟头，但你千万不要灰心绝望。”韩柏村首先对姚雪垠说：“只要你认罪服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党还是会给出路的。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对前途有什么想法，可以完全对我敞开心扉，千万别放在心里，想不开。”

“老韩，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姚雪垠回答说：“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说真话！”

“好，那我就向你谈谈我的真实思想。”姚雪垠着了老韩一眼后，声音不高，但是非常坚定地说：

“我现在虽然犯了错误，但决不会自杀，也不是那种只会吃闲饭的人。在下半辈子我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做出我自己的成绩。让我继续搞创作，我可以写出作品；让我搞研究工作，我可以做出研究成果；让我到大学教书，我的教学工作也不会做得很差。大概你也会相信，我是能够在专业方面做出成绩的人。”

这一回答，完全出于韩柏村的意料，完全不合潮流和时宜，但却完全符合姚雪垠的性格。

姚雪垠之所以要这样回答，是因为他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已经在思想上理清了问题，在巨大的挫折和灭顶之灾面前，坚强地站了起来。

首先，姚雪垠认为，在1956至1957年上半年，他虽然对文艺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念头，从未想过要在政治方面为自己捞什么好处。人们在批斗他时，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他无权反驳，但他坚信自己根本没有这一问题：更相信，将来总有一天，党会实事求是弄清他的问题，实事求是处理他的问题，因此，他不能自杀，要坚强地活下去，要用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而且还要用事实证明，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还可以做出成绩，贡献力量。

第二，姚雪垠坚信他自己的“历史运动过程论”是正确的，并且用以指导他的行动。他认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应是历史一的参加者或缔造者，而不应做旁观者。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历史的过程，千百年来的历史都是由一个一个运动过程组成的，只不过每个过程的长短不等，而且每个运动的过程，并不是永远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原来在这一社会运动中的是非观念，到下阶段很可能完全改变。这种历史运动过程的转变，就是自我否定。不论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自我否定，或是突然全部自我否定，反正它不能永远不变。比如，在反右派运动中，认为所有的“右派”都是敌人。将来总有一天也许会有人力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平反；在反右派运动中有人一时栽了跟头，这只是这个人生活中的一时现象，绝不是永远不变的、更不是生活的终结。只要他的工作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尽管道路有曲折，但迟早会回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他终究是有前途的。关键是要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能倒下去。

姚雪垠被错划成“右派”以后，他不仅自己按照他的理论武装思想，指

导行动；而且还悄悄地用他的“历史运动过程论”去鼓励别的错划“右派”的同伴，使他们也增强信心，渡过难关。

姚雪垠在灭顶之灾面前，不但不自杀，而且也不消沉。他一方面从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古代的先辈身上，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寻找精神支柱，寻找榜样的力量；同时，令人意想不到地在，偷偷酝酿创作新的长篇。

在身处逆境中的那些日千里，姚雪垠总时常在心中背诵《孟子》中的一段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劝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是讲只有历尽艰辛，才能造就人才的道理，姚雪垠每背诵一遍，都受到很大的鼓励。

在身处逆境的那些日子里，司马迁以刑分之身发愤著述《史记》之类的事迹，也常常萦绕在他的脑际：不知道有多少次，姚雪垠总是怀着沉重的感情在心中背诵司马迁的这一段话：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作《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每当姚雪垠背诵完这一段话以后，他就问自己：古人能做到的，我们今人为什么不能做到？别人能够做到的，我姚雪垠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经过再三反复的分析思考之后，姚雪垠终于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1957年10月下旬起，他要开始偷偷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二

第二十一章 秘密创作《李自成》

亲爱的读者，在看本章以前，请先读一个故事：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脏，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朋者多矣，子奚哭予悲也？”和曰：“吾非悲别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辈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这是我国古代战国末期杰出思想家韩非在他所著的《和氏》篇中，为人们留下的关于卞和献玉的故事。它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几千年来，一直久传不衰。

姚雪垠在作出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决定以后，动手之前，总是想着卞和献玉的故事，以鼓舞他的决心。

“我到底具备不具备创作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条件呢？”姚雪垠在抱定上面所说的决心之后，又反复这样向自己提出问题。应该说，姚雪垠已经具备了写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条件。

首先，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读历史书籍，几十年来，他在叫，国历史学方面积累了不少知识，这就为他写历史小说打下了知识修养的基础：

第二，从1956年以前，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白杨树》，被武汉作协的负责人扼杀之后，他就悄悄地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积极进行了准备工作；

第三，他从19岁到开封上学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中受到了启蒙，就开始喜欢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以后又逐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为他提供了正确研究、处理明清之际各种复杂历史问题的有力武器。；第四，他本来就是写小说的，有多年的写作经验，又有较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运用各种古文写作的能力。

当姚雪垠确认自己已经初步具备了写《李自成》的条件时，忧抱着百折不挠的决心，在1957年10月下旬，当对他猛烈的批斗刚刚告一段落后，便秘密开始了《李自成》的第一卷创作。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呢？

因为他已被划为“极右派”，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只能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而根本无权再进行创作。如胆敢违反禁条，就是大逆不道，妄图东山再起，死灰复燃，猖狂反扑，同党较量，这样就必定要罪上加罪。姚雪垠坚信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正确的，他也坚信，将来总有一天问题定会公平合理解决的。因此，他决不让时光白白流逝，更不灰心丧气虚度残生；因此，他就在委屈、痛苦和孤独中秘密开始了新的艰巨的长征！

请想一想，在那时那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经受不了冤枉倒下了，又有多少人经受不了折磨和痛苦消沉了，而姚雪垠在厄运面前，却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心，对祖国文学事业强烈的责任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迈出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开始了他在创作道路上的新的攀登。真正将坏事变成好事。

为使他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姚雪垠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用8元

人民币到街上买了一个 32 开式的牛皮面活页夹，一大堆活页芯纸，将纸放进活页夹，用长杆蘸水笔把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写在上面。这种活页纸的横格虽然较窄，而且要两面书写，很不便进行修改；但是用这种工具稿纸写作，也有特别的好处，完全可以起到保密作用。

姚雪垠被批斗以后，住的是一楼的房间，紧靠院子的大门，房门上又没有插销，门无法关严，只要从院子里路过的人推门进来，就可以完全看到他“闭门思过”的情形。他在这里创作《李自成》显然相当危险，随时都有被发现的可能。因此，他在写作时非常警惕，往往要一边写，一边听人们走路的声音。每当听到有脚步声走进大门，他便赶快合上牛皮活页夹，将两手搁在桌上，坐着“思过”，等进来的人走了，脚步声上楼了，他便重新打开活页夹，继续往下写。有时有人推门进来，看见他的面前摆着合上的活页夹，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便问：

“姚雪垠你在干什么？”

“我在写思想检查。”

“要深挖你的错误根源。”

“是！我正在深挖……”他是多么害怕有人说：“请把你的活页夹拿来，我看看，你到底在写什么？”如果那样，就糟了，但谢天谢地，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还不象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那样，任何人都随时可能被监禁查抄和搜身。但是，他还是捏着一把冷汗，冒着风险、进行写作。他一直把活页夹当作“保护神”，把自己想出的这个办法称为“英明决策”！

就这样，姚雪垠总是提心吊胆，但分秒必争地在孤独寂寞中进行写作。他白天写，晚上也写，风天写，雨天也写：在炎夏，汗流浹背地写；在寒冬，手冻僵了，脚冻疼了，他都全燎不顾，仍一直在写。他完全进入了角色，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将一腔激情全部倾注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农民英雄身上。

从 1957 年 10 月下旬开始到 1958 年的 8 月间下放他到农场监督劳动以前，在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里，他终于克服了手头没有资料，不能到图书馆借书，又不能同任何人交谈和研究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极其惊人的毅力和无比坚强的意志，神奇地写出了《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第二卷的一部分，共约四十多万字。这是多么艰难的成果！

稿子虽然还很粗糙，但却为以后创作《李自成》全书，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在 25 年后，当姚雪垠回忆这一段写作《李自成》的情况时说：“假若没有 1957 年的反右斗争，我很可能永远不去动笔。我这一生，有不少很引诱我的写作计划而终于因各种原因不能实现。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再考虑在若干年中甚至在‘有生之年’，会再有机会发表文章和出版书，只好打算在死后为祖国的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才下狠心动手写《李自成》。这一决定和以后的艰难长征，也可算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1958 年 8 月下旬，姚雪垠和许多“右派分子”都被下放到汉口郊区的东西湖农场“监督劳动”，开始了他一生中为期两年的劳改生涯。他在少年时代，曾有过一百天的土匪生活，如今命运又使他变成了一名受人监督的“极右派”、“劳改犯”。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人一生，真是命运难测啊。

东西湖农场，原是一片纵横百里的荒湖滩，只有极少的村落，清末张之

洞任两湖总督时，主持修建了一道名叫张公堤的长堤，才分成了内外湖。堤内的水势逐渐减少，堤外是纵横百里的沼泽地，一到雨季便成了一片汪洋。全国解放以后，从1955年开始，湖北省人民政府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计划整治张公堤外面的荒湖滩。当姚雪垠来到这里时，虽然大规模的整治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建立了许多大农场，并且在一边进行农业生产，一边建设居住点。

姚雪垠来到东西湖农场以后，第一年被分配在一个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场；第二年转到了以种植蔬菜力主的吴家山农场。尽管他饭量很小，身体瘦弱，力气单薄，很难适应这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却很愿意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写作《李自成》。

每当从事轻微或简单的重复劳动时，如锄地等，他就一边干活，一边进行小说构思，或思考有关《李自成》的历史问题；每日出工或收工的路上，他也从不放过，总是利用这些时间来思考有关《李自成》的写作问题；到了中午或晚上，当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便忍着一天的疲劳，将在田间和路上精彩的艺术构思和考虑所得，赶快记在日记本上，以免遗忘。

他怎么会知道，这样用功写“日记”，早已引起了监管人员的怀疑。

一天晚上，当姚雪垠正在帐子里，用手电照亮写作时，两位监管的干部、突然来到他的床铺前大声问：

“姚雪垠，你在干什么？”“写改造思想的日记。”

“请把日记本给我们看看。”

“写改造思想的日记，是你们布置的。”姚雪垠知道事情不妙，又要大祸临头，想尽可能应付过去，“这本上写得比较乱，不容易看清楚，等我抄清后再送给你们看。”

“少废话！”一个人把他的帐子一掀，怒气汹汹他说：“再不主动交出来，别怪我不客气！”

“日记”被拿走了，象摘了他的心似地难受。这天晚上，姚雪垠害怕得整夜都未能入睡，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次一定完了，不仅秘密被发现，今后再也无法继续写下去，而且还不知招来什么样的灾难？

窗外，月光忧愁地照着他们这些“右派”集体居住的大席棚，蛙声鼓噪，蚊声“雷轰”。姚雪垠觉得思想上空荡荡的，心里也空荡荡的，好象自己变成了一片虚无飘渺的云……

第二大下午，因为下雨，大家都不能出工劳动。姚雪垠因为“日记”的问题，被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批斗。那位监管他的头头在批斗大会开始时说：

“在我们这里，有的‘右派分子’，非常猖狂，象姚雪垠就是如此。他来农场后一直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打着写日记的招牌，欺骗党和人民，在日记上进行反党活动，又写起他的小说来了。”批斗会整整开了一个下午，姚雪垠照例又被批的“体无完肤”，并被取消了记“日记”的权利，同时不再让他留在大田劳动，而把他调到挑砖头、挑塘泥等劳动强度大的地方大改造。而且那些监管他的人们还说：“这一下，看他姚雪垠还写不写‘日记’。”

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剥夺他劳动时想问题的机会，但他在工余、路上、中午、晚上照样在思想上构思着《李自成》，而且充分利用每个月回武汉市四天休假的时间，把他在平时想好的一切，拼命写出来。

长时间繁重的超负荷的挑砖、挑塘泥的体力劳动，终于使姚雪垠这架难

以承受的机体出了毛病。在 1959 年秋天，他患了严重的急性关节炎，疼痛无比，不仅恨本不能再挑重物，就连走路也十分困难。监管人员见此情形，只好不让他再挑塘泥，要他在工地上二做些修理营生。

姚雪垠在受着疾病的煎熬，但他又不敢请假提出回武汉治病的要求。连队的监管人员看他象装病，怕万一出了问题承担责任，便同意给他半个月的时间回武汉医治。

在“‘右派’”同伴的帮助下，他好容易拄着双拐回到武汉，住在汉口花桥武汉作协机关的一间只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张三展桌的空房内。

但是回城以后，他并没有去看病，只希望自己的两条腿队儿以后人们永远瘸了。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去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忧可以留在机关看管炉或打扫厕所，就可以用剩余的时间再去创作他的《李自成》。他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置之度外了，他只想当现代的下和，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他的玉璞——《李自成》。

主意和决心下定以后，他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于是，他便忍着疼痛，不分昼夜地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上纸印制的稿纸，开始把他已经写出的《李自成》的草稿，整理成比较完整的初稿，变成小说艺术。

他拼命地写呀，写呀，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就写出了数万字的作品：他的双脚竟神奇地未经医治有了好转。结果，看病的假期还未满，他怕人家说他借病有意逃避劳动，就拄着双拐又回到了东西湖吴家山农场。

亲爱的读者啊，当你读到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为之拍手称赞时，可曾想到作家姚雪垠，在当年创作时的这种艰辛？

第二十二章 绝处逢生

生活的大海同自然界的大海一样，真象一个诡谲多变的怪物，总是那样神秘难测，令人不可捉摸：有时性子一发，便狂风骤雨，黑浪掀天，海涛怒立，咆哮喧哗，摇撼礁岸；有时却月明风静，波光点点，好象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的草原，而且还为人们展现出了童话般的美丽世界，发出了微笑，带未了希望、信心和温暖……生活的大海把姚雪垠的生命之船，卷进狂涛巨浪之中，以无比的威力反复冲击之后，不知为何却突然平静下来，使他绝处逢生……经过两年零两个月的监督劳动改造，在 1960 年国庆前夕，戴在姚雪垠头上的“极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从此，他便由“戴帽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派到农场的干部李德邻同志，在一个明月高照的晚上，还找他到吴家山后边的木桥上谈了话。他们俩靠着栏杆，桥下流水潺潺，田野秋虫唧唧，不时吹来的清风中，还带着浓郁的已经成熟的果实和稻谷的香味。这样美好的夜晚，姚雪垠已经好久没有注意了。

“雪垠同志，你在农场的劳动中表现很好，现在你在这里的劳动已经结束，国庆节后就可以回武汉。”李德邻亲切地对他说，“组织上已为你分配了工作，不是回武汉作协，而是到武汉市文联，不过到文联后仍然是搞创作。不知你还有什么意见？”

“感谢组织的挽救和关怀！我没有什么意见。”姚雪垠回答说。

几年来，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同志”，这样同他谈话。姚雪垠的确非常感动。他心中暗想：这不是做梦吧？

“雪垠同志，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李自成》，能否将稿子给我看看。”李德邻突然提出希望说。

“稿子是有，但现在寄存在武汉，如今还很乱，还不到拿出来给领导看的时候。”姚雪垠听后赶快回答说。他不知道这话给他带来的是优还是喜。因为他在农场因写《李自成》，作为反党的罪证被批斗过，所以人们都知道他在写小说，他不得不承认；但老李这样问他，他又摸不着头脑，不知是又要拿去批判，还是党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对他的写作给予支持？因此，他才作了那样的回答。

“不忙，”李德邻态度和蔼可亲地道：“等你回武汉慢慢整理好后，再说。”

应该说，从 1960 年国庆前夕起，姚雪垠的处境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他不仅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结束劳改，分配工作，即将重新投入写作；而且组织上也想了解他所写作品的内容，看是否可以给他帮助，但姚雪垠却不敢妄想，仍心有余悸地边走边看。

姚雪垠回武汉市文联报到以后，领导开始给他的任务是去武汉市豫剧团，跟着剧团下乡，编写剧本；这一任务还未实施，很快就改派他参加作为向党四十周年献礼的京剧剧本《武昌战火》联党组成员、诗人李冰突然大驾光临。

姚雪垠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平时喜欢历史题材作品的诗人。给他带来的是希望、福音和后半生创作道路上的重大转机！

“你在写什么？”诗人坐定以后问姚雪垠。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

“给我看看怎么样？我愿当你的第一读者。你知道，我对这类题材的作

品，简直入迷。”

“请多提意见。”姚雪垠一边将用土纸整理成的初稿给他一本，一边说。

“谢谢，明天还你。”李冰拿到稿子后高兴他说。

果真，第二天上午，李冰来还姚雪垠的手稿。

“你害得我好苦，使我昨夜很晚才睡觉！”他一进门就又是高兴又是埋怨他说，“我一读你的作品，就爱不释手，无法放下，结果只好在夜里一口气读完。”

“怎么样？我真想听到你的意见，得到你的指教和支持。”姚雪垠恳切他说。

“我认为写得很好，非常动人。”接着他似乎又诗兴大发起来：

“这样好的作品，为什么不支持呢？”

我支持！

我支持！

我一千个支持！”

李冰谈完意见，高兴地笑了起来。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姚雪垠：

“在来你这里以前，我已将此事向程云同志作了汇报。希望你将稿子也给他送去看看。”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姚雪垠听后感激地说：“程云同志那里，我将尽快将稿子送去。”

程云，当时是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市文联主席；同时还担任武汉歌剧院的院长。他很熟悉自己分管的业务，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自己份内的工作从不推脱，一向敢于负责，敢挑担子，很受文化人的拥护和欢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姚雪垠的这位顶头上司，在武汉文化艺术界，既是大红人，也是大忙人。他的态度如何，对姚雪垠和《李自成》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姚雪垠十分重视李冰的意见，并按照他的嘱咐，将两本已经整理好的《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很快送到了程云同志的家里。然后他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领导的裁判：

红灯，还是绿灯？

支持，还是反对？

这对他的关系确实重大！

从李冰的态度和意见中，他曾猜想，他的作品可能会得到领导的支持；但当他把稿子送程云之后，却不敢这样想了。因为这是正式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他当然希望领导支持，但结果到底如何？他不愿意也不敢乱想。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是“摘帽右派”，他的这种身分，很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他作品的判断。

“不论如何，我都将要坚决写下去！”姚雪垠鼓励自己说。

事实证明，担心和顾虑都是多余的。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姚雪垠等来了非常令人高兴的消息。

一天上午，姚雪垠正在市文联院里散步。程云推着自行车从外边回来。他一看到姚雪垠，老远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叫道：

“老姚，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好消息告诉你。”

他们来到办公室坐下以后，程云兴奋地说：“雪垠同志，真抱歉，我把你的稿子拖久了，实在对不起！因为天天忙得要命，老实说，你给我的稿子

到现在还没有全部看完，只看了《潼关南原大战》这个单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以后，显然有点激动，提高声音继续说：

“但我认为，你的作品写得很好，十分感人。仅从我看过的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出你的水平。应该马上向市委汇报，而不必等到将稿子全部看完。所以，我今天上午就去市委向文教书记宋一平、宣传部长余英、常务副部长辛甫，将你的情况和你的作品作了汇报。所以，我刚从市委回来就马上找你。

“‘你有什么意见呢？’市委领导听完我关于你的汇报后问道。我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写得很好，我们坚决支持他写下去。因为我们培养一位青年作家，等他掌握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艺术上又这么成熟，也得白了头，为什么不支持姚雪垠写下去呢？”

“听完我的意见后，市委书记宋一平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当然应该支持姚雪垠写下去。不仅市文联要支持，宣传部要支持，市委也要支持！我们不仅要从政策上给他支持，还要帮助他解决一些写作中存在的具体困难。’”

姚雪垠听完程云给他带来的欣喜若狂的消息，觉得一股巨大的暖流流遍了全身，当场就激动得热泪长流，哭了起来。他抽抽噎噎地说：“谢谢程云同志的帮助和关心，谢谢党组织的支持与关怀。我将竭尽全力，把自己的作品写好！”

是的，姚雪垠他怎么能不激动呢？多少年来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牺牲。为了他的这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谁知曾受了多少苦难？他甚至都不敢有奢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他还用卞和献玉的事迹，来鼓舞自己不断前进。如今，这许多年求之不得的最大幸福，已经向他降临，请想一想，他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姚雪垠啊，要哭你就痛痛快快地哭吧！让悲的泪，喜的泪，一起涌流，把你心中郁结的痛苦统统冲走，为你继续攀登引发出最强大的前进动力！党在反右派斗争中曾经错怪了你，冤枉了你。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毕竟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所以你同卞和的命运完全不同。当你一拿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一部分时，我们党马上就识出了它是一块玉石，价值连城。而且对你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让你继续开掘、加工！为此，你曾感慨地发出：

“乍闻温语感恩深。”

“是党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确实如此！

1960年冬天，我们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人们吃不饱饭，许多人浑身浮肿，染上肝炎。姚雪垠的家不在武汉，一个人整天吃食堂，生活更加困难。市文联、文化局和市委的领导，怕他因此把身体搞垮，都千方百计为他排忧解难，为他创造写作条件。经过再三努力，武汉市委的领导，终于决定让他住进当时条件最好的高级宾馆，位于汉口市中心江汉路的璇宫饭店。让他吃饱吃好，保证营养，安心写作。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支持和关怀啊！一种多么特殊的照顾！姚雪垠激动无比，终生难忘。现在，他创作《李自成》，再不用偷偷摸摸，他已经获得了武汉市委的正式承认和支持，已由“地下”转为地上，而且组织上给他提供了极其好的写作条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努力。

于是，他用自己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时间。在他无比辛勤的努力下，从1960年冬天到1961年夏天，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把原来写的《李自成》第一卷，整理成40多万字的初稿。用姚雪垠自己的活来说，至此，《李自成》这部小

说在创作过程中已经经过了两次飞跃和质变。

《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完成之后，住在璇宫饭店的姚雪垠，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这年9月的一天中午，他喝了一点白酒，感情更加激动，往日创作中的种种甘苦和情景都纷纷争相涌上心头，当时他再也忍耐不住，就提笔抒发情怀，写出了一组七言绝句。起名为《题 李自成 第一卷原稿》。

这组七绝共十三首。现抄录几首如下：

此书愿作千番改，
不怕鱼珠买汗颜。
自古文章攀蜀道，
何曾容易跻高山。
年华似水去骎骎，
一事无成百愧身。
梦里子期醒后少，
乍闻温语感恩深。
眷顾多方来雨露，
惘然无语表微忱。
五更枕上涔涔泪，
谁会三春寸草心。
问我雄图更若何？
请君莫笑满头皤。
百年世事风云急，
笔底胸中慷慨多。

这组记录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第一卷时思想感情的绝句，理解《李自成》第一卷创作心情的钥匙，一直由作者珍藏着。直到十八年之后，他才拿出来在1979年《花城》文艺丛刊第一辑发表，并在发表时专门写了《跋》，介绍这组绝句的写作背景和解释这组绝句的有关诗文。

姚雪垠在《跋》中写道：

“我在生活道路上曾经受到严重挫折，曾经精神极度痛苦，处境十分艰难，但没有使我的写作志愿灰心。我只有一个志愿，即为我的伟大祖国的文学事业做出我的贡献。大概从1957年10月下旬起，我开始写《李自成》第一卷。我在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环境中，以别人想象不到的努力，到次年8月下放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劳动之前，已经写成了第一卷的草稿。虽然我当时被有些人谴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说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但丝毫没有动摇我对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的责任心，也不影响我坚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处理历史问题，并在塑造大小农民英雄人物时倾注饱满的革命激情。往往，我为自己哭，也为书中人物的故事情节哭。当时我想着不管我生前有没有机会出版，我一定想尽办法将此书写成，由后人交给党和人民，大概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事业会有所贡献，不负我的宿愿。今天不管从我的生活处境的变化看，或从《李自成》一书的命运看，都只能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党是伟大的。”

他还在《跋》中解释道：

“……我当时对于支持我这工作的同志充满感激心情，所以有‘乍闻温

语感恩深’之句。当时正是灾害严重年头，我受到武汉市委有关领导的特别照顾，住在璇宫饭店写作，所以有‘眷顾多方来雨露’那一首和着眼泪写成的四句诗。……”

第二十三章天时、地利、人和

姚雪垠在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之后，尽管感到非常高兴；但在思想上和时间上，他对自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因为《李自成》是一部长篇巨著，第一卷初稿完成，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所以他在初稿完成之后，便不顾武汉炎夏的闷热和酷暑，立刻又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地投入了第二卷的写作；同时，他在思想上更多的则是考虑第一卷能否出版的问题。姚雪垠十分清楚，他的身份与他的作品出版的关系。

在政治上，他虽然摘了铁帽子，却仍旧头戴紧箍咒；虽然他在写这部小说时，曾受到党组织的支持和关怀；但这部小说能否出版，能否顺利出版，绝不会象没有“右派”问题的作家那样，单单依靠作品本身的质量就可以决定。当然，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对他来说，除此之外，还要另加三个条件，才可决定作品是否能够出版。

这三个条件是：

首先，要看总的政治形势如何？允不允许出？

第二，要看出版社的态度怎样：愿不愿意出？敢不敢出？

第三，还要看责任编辑的水平、胆识，以及对工作是否主动、积极、热情？

用古人的话来说，这三个条件也可叫做：要看是否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不管说法如何，这三者却缺一不可。如果任何一条出了问题，均可导致作品不能顺利出版。

那么，《李自成》第一卷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姚雪垠完成初稿之后，全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提出并正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且当时不仅在工农、商业等部门和国民经济领域里进行调整；还对知识分子问题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策也进行调整。这就暂时缓和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绷得过紧的阶级斗争的弓弦。

当时不仅制订了《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而且还制订了《科研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的调整有关政策的工作条例；并且，周恩来总理先后还就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两次重要讲话。

一次是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在这个重要讲话中全面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的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着重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左”的思想。

另一次是1962年3月2日，国家科委、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共同组织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在1956年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时，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

因此，重视知识分子问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各省都先后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中宣部也在文艺界召开多次会议，于1961年8月1日制订了《文艺十条》，之后在十条基础上，又修改为《文艺八条》。1962年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八条的主要内容有：贯彻执

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正是在这种有利于他作品出版的政治形势和气氛中拿出来的，碰上了历史的好时机，用古人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得天时”。

因为姚雪垠有幸得到了“天时”，在这种总的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地利”也随之为他降临。很快，北京就有两个单位来信向他索稿。

这年的10月中旬，姚雪垠意外地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给他的一封信：听说你正在写长篇，如有什么困难，作协可以帮助解决。随即姚雪垠就写了复信：我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已经脱稿，希望作协请一两位研究明史的专家看看稿子。之后，作协办公室就来信将稿子要去，并于11月17日给姚雪垠写信说：稿子已经收到，正在接洽找人阅读。

当姚雪垠刚刚把《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给中国作协寄走，在10月底又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给他寄来的索稿信：

姚雪垠同志：

你好。听说你的长篇历史小说已全部脱稿，并已交作协审阅。我们仍然希望你能将这部作品交我社出版，不知尊意如何？盼赐复。

1961年10月28日

之后，经过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和姚雪垠的多次通信联系，交换意见，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动、积极、热情的工作作风，由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还一直未找到人看稿，姚雪垠便决定将稿子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但原来稿子寄到作协办公室了，几经周折，中国青年出版社仍未拿到《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他们担心夜长梦多，于是抢先给姚雪垠寄去了约稿合同，姚雪垠于1961年11月24日在武汉收到的当天，就在合同上面签了字。

几天之后，姚雪垠又收到了中国作协办公室11月25日给他写的信，其中有段这样说：

“……《李自成》原稿仍未找妥人看。作家出版社听说这部稿子现在在这里，很想要去看一下，不知您意如何？盼告。”

作家出版社虽是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出版社，但他们却晚了一步，再也无法得到《李自成》的版权。

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1962年1月24日给姚雪垠的来信说：

“昨天，中国青年出版社转来了您12月29日给他们的来信，其中提及，作协尚未找好看稿的人，可由该社先将《李自成》原稿取走。

“本来经过几次联系约请，我们最后想把原稿送给楼适夷、韦君宜同志看的，因为他们一是作协的理事，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今天，又接到你同日给我们写来的信，我们决定尊重您的意见，已在今日将原稿（共五分册）送给该社，请他们先看了。特此奉告。”

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在收到稿子后，1月8日给姚雪垠来信说：

“尊作《李自成》稿，上星期六才由作协取来，我们正在拜读。特此奉告。”

从此，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就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手中；从此，姚雪垠同中国青年出版社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中国青年出版社便逐渐同姚雪垠建立了感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此，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便一卷接一卷地送到了广大读者的手中……

事实证明，姚雪垠在完成《李自成》第一卷初稿之后，对于出版社的选择是正确的：他首先将稿子寄到了北京，之后又迅速、果断地转到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出版社愿意出，也敢于出，又积极出，这才保证了他的作品能够很快地出版。这样姚雪垠又得到了“地利”。

为此，姚雪垠对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直非常感激。到 80 年代初期当他回忆到这一事情时，还曾多次说过：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作风上有一股朝气。‘官办’出版社的习气比较少一些。如果不冷不热地向我要稿，稿子拿到后不紧不慢地处理，拖延一久，气候变化，《李自成》的出版前途就难说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作风比较积极，对作家热情，这些优点曾给《李自成》第一卷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好的条件。使我终生难忘！”

任何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都是由具体的个人分管的。那么，多次给姚雪垠写信，向他索要稿子，而每次信的后面总是盖一颗“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圆戳，这个不露姓名的做具体工作的人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江晓天，曾经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他非常忠诚于党的出版事业，在处理稿件时既很有见识和魄力，又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此时，他却是一位普通编辑，而且处境很不好，思想上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

这是因为 1960 年春天，他的皖北家乡在灾荒中死了很多人。他听了以后，一时感情冲动，在给他二弟写信时说了几句气话。不料这封信的内容被地方干部知道后便告发了，说他攻击大跃进等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为此，他在北京被批判半年，受到了降级、撤职，以及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对他的这种错误处理，直到 18 年后才予以纠正和平反。

当江晓天接受处理《李自成》第一卷的稿子时，刚从河北省唐县农村下放劳动回来不久，仍在“留党察看”期间。

一个因政治问题受处分的同志，处理一个摘帽“右派”作家的作品，在当时来说，该有多大的困难！弄得不好，很容易给人以口舌，甚至在政治上又要犯错误。

江晓天以极大热情一口气读完了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原稿，他认为，《李自成》第一卷稿，真可谓“别开生面”。作品中那宏伟磅礴的气势，绚丽多彩的画面，浓郁的历史时代气氛，全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生动情节，深深地感染了他。他情不自禁地说：

“当了十几年文学书稿的编辑，我第一次尝到了艺术欣赏的愉悦，感到满足，不忍释手。”

经过反复比较研究和周密慎重考虑，他认为《李自成》第一卷稿，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质量来说，都是难得的上乘之作，是建国以来非常少见的优秀作品。于是，他就向室负责人阙道隆和社长边春光正式提出出版《李自成》的建议，并且详细阐述了出版理由和审稿意见。

经过研究，阙道隆和边春光一致认为江晓天的建议和理由都很好，完全同意。而且还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要争取尽快把《李自成》这部稿子作为重点作品出版；二是要江晓天到武汉去找一趟姚雪垠，对有关出版和原稿修改问题进行面谈。

江晓天的建议得到领导的重视和同意以后，心中非常高兴。他一向认为，

书稿编辑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帮助和支持作家把艺术精品献给人民，为祖国积累社会主义文化财富。1962年春节刚过，他就不辞辛劳从北京坐着硬席火车赶到武汉；一下火车就风尘仆仆地找到正在汉口饭店开会的湖北省文联党组织负责人骆文。

“我为出版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书而来，想听听省文联组织上的意见。”江晓天开门见山地对骆文说。

“我们支持姚雪垠写这部作品。”骆文一边说一边将他在省文联大会上作报告的打印稿拿给江晓天看：“这个报告中有一段提到：‘有的同志熟悉历史，写历史题材，于人民有益，我们也是支持的。’这就是指的姚雪垠同志。湖北省委已审查批准了这个报告。”

“那么，我想找姚雪垠同志谈谈有关稿子的问题。”

“完全可以，请按你的计划行事。”

于是，《李自成》的责任编辑江晓天和作者姚雪垠，就在汉口饭店见面了，并且开始了非常有意义的两个上午的长谈。

“昨天就知道你来了，估计你要先同领导上谈，所以没去看你。”姚雪垠在他住的汉口饭店一楼的房间，一边热情地同江晓天握手，一边快人快语地说：“晓天同志辛苦了！见到你我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读了你的作品，就想见到你，就想同你面谈。”江晓天高兴地对姚雪垠说：“现在总算如愿了。”两人见面之后，开始转入正题。这时，江晓天才仔细看清了坐在旁边的《李自成》的作者：50多岁的姚雪垠头发全白了，但满面红光，精神状态极好。

“这次我来，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同时也带来了新任务。”江晓天对姚雪垠说：“我们认为你的稿子写得很好。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将《李自成》作为重点作品出版，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同读者见面。”接着，江晓天就把他在北京时，向出版社领导谈的关于对《李自成》第一卷的看法，又向姚雪垠说了一遍；同时，还向姚雪垠具体提出了修改稿子的看法。在交谈中，他们还就如何修改《李自成》第一卷初稿的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要尽快把第一卷修改出来，接下去你再把全书写完。其余的事情你不必操心，有什么困难，我们出版社尽可能帮助你解决。”江晓天说。

“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帮助解决。”姚雪垠说：“一是最近我打算把家从开封搬来武汉，能否预支500元稿酬；二是稿子改好后，你们能否找几个象吴晗这样的史学专家看看。”

“可以。”江晓天满口答应，“钱，我给北京打个电报，马上就可以办；请人看稿的问题，回北京后即刻联系。”他们这次见面结束后，江晓天离开武汉回北京了；姚雪垠则住进武昌洪山路十三号湖北省委招待所，集中精力修改他的《李自成》第一卷。经过几个月的辛劳，于六月上旬终于把修改好的稿子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出版社在8月上旬就将征求意见本排出来了。

事实证明，江晓天对《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江晓天担任《李自成》第一卷的责任编辑，使姚雪垠幸运地得了“人和”。

对江晓天为发展党的文学事业而怀抱的满腔热情和真诚，姚雪垠十分感动；对江晓天不怕担风险，敢于支持帮助《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姚雪垠更

是铭记在心。二十年以后，姚雪垠成就辉煌，闻名中外，但他回忆到这件事情时，仍带着很深很深的感情说：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李自成》的伯乐，我只能回答说是江晓天。他是我在困难时期遇到的第一个知音。我将永远感激他！”

第二十四章 幸遇吴晗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1962年9月中旬的一天，姚雪垠爬山来到庐山的秀中之秀香炉峰观景，不由得吟诵起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这首诗来。

“香炉峰啊，我今天终于见到了你，果真名不虚传！”他吟罢李白的名诗，一边贪婪地望着香炉峰，一边自言自语道。

此时，姚雪垠好象被雄奇瑰丽的庐山完全陶醉了，他置身在这风光无比绮丽的大自然之中，感到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愉悦。

他是在修改完《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后，同武汉市文联主席程云夫妇于7月下旬从“火城”武汉来到庐山写作和避暑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应程云之约，他们将《李自成》第一卷中的有关故事，改编成歌剧《闯王旗》。姚雪垠按照程云的要求写歌词，由程云谱曲；同时，在余暇时间，姚雪垠继续创作他的《李自成》第二卷，或者看一看《三国演义》、《三国志》，爬爬山。本来在前些日子，姚雪垠已多次去过庐山的铁船峰，并且写了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散文《铁船峰游记》，从观赏铁船峰的风景入手，阐发了他的美学思想。这天，他把游记给上海《文汇报》寄出以后，即来到香炉峰观景。自从1957年他被错划为“极右派”以来，一直在争分夺秒，伏案写作。艰苦的劳动，辛勤的耕耘，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从未出来过。如今，他把第一卷改完了，又有机会到庐山，领受大自然的神奇和优美，休息一下过度疲劳的大脑和身体，当然感到格外的心旷神怡！

“如果回到宾馆再能看到我盼望中的来信，那今天过得就简直太美好了。”姚雪垠在返回的途中这样想着。

果不出所料，一回到住处，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寄给他的来信，已放在桌上。他赶快将信拆开，一口气读完，情不自禁地说：“这太好了！太令人高兴了！”他完全被这喜出望外的消息振奋了！

文学编辑室给他的来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非常热情，他于9月3日至5日三天的时间就将全稿（作者按：指《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本）看完，而且看得很认真仔细，有些错了、漏排的字都改补上了。6日上午约我们到他处面谈了一次，他给大作很充分的评价，也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详情待面告）。当时，我们进一步向他提出要求：作者还要写四卷，有些问题很想向你请教。他满口答应。不过，他10月间要出国，你因剧本（作者按：指歌剧《闯王旗》）脱不开身，9月来不了，但是希望你来京日期至迟不超过10月10日，晚了，吴晗一走，几个月后才回国。”

姚雪垠读完信后，就同他的合作者程云商定：暂时撂下未完成歌词创作的《闯王旗》，前往北京，赶在吴晗出国前同吴见面。

姚雪垠根本不认识吴晗，但要吴晗看他的作品，是他的心愿。如今，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帮助他实现了此愿，而且公务繁忙的吴晗，还答应同他面谈，这真使他大喜过望。

为了表示对吴晗的感激，姚雪垠在下庐山之前，给吴晗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方面表示谢意，同时向吴晗请教：《杨嗣昌文集》在何处可以找到？

吴晗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公认的为数不多的明史专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散文作家。他1909年8月11日诞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吴店苦竹塘村，比姚雪垠年长一岁，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首都的文教工作。

国庆节刚过，姚雪垠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极其热情的态度接待了他们的作者。到京后姚雪垠才知道，吴晗原来是要率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去伊朗参加建国二千五百年纪念活动；而且国庆之后他的外事接待任务很重，每天日程都几乎排得满满的。这更增加了他对吴晗的感激之情。

姚雪垠在到京后的第二天下午，江晓天就接到吴晗秘书的通知，要他和姚在第二天上午10点到吴晗家中见面。

当姚雪垠和江晓天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吴晗家里以后，早已在客厅等待他们的吴晗一边热情同姚雪垠握手，一边高兴地说：

“为了欢迎姚雪垠同志的到来，今天我们到北京饭店共进午餐，在那里边吃边谈。”

“谢谢吴晗教授，”姚雪垠说，“我从庐山给您寄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不过你太客气了，大可不必！”吴晗回答说。

“《杨嗣昌文集》在哪里可以找到？”姚雪垠乘机向吴晗提出了他在信中问题。“这本文集，一直未出版，只有手抄本，我在北京大学看过。你去那里可以找到。”谈了一阵之后，他们就一起乘车来到座落在首都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北京饭店，在一个优雅、安静的单间餐厅开始了长谈。

“首先，让我们为姚雪垠同志成功地写出了《李自成》第一卷，干杯！”在午宴开始时，具有热情豪放性格的吴晗提议说。姚雪垠同吴晗干杯以后说：“不敢当，我今天有幸能同吴教授见面，主要是来请教的，请吴教授对拙作进行指教。”

“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文如其人，我拜读了你的大作，就对你有了不少了解。”吴晗对姚雪垠说：“现在就恕我对你的大作直言了！”

“我认为，《李自成》第一卷是一部写得很好的书。写法，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比如崇祯皇帝怕与清兵打，又不敢说；高级将领中，卢象升不支持对清言和等。”吴晗首先这样评价说。然后他拿起公筷，又是给姚雪垠盘里夹菜，又是劝酒，当他和姚雪垠、江晓天又干过几杯以后，吴晗的“肝胆照人，才华焕发，豪放不羁，忠厚诚笃”的性格便充分显示出来。接着他继续说：

“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些虚构，如高夫人、喻上猷，但是处理得好，既合理，又真实。统治阶级方面，崇祯、卢象升、杨嗣昌等写得好。农民军方面，张献忠写得好。李自成的水平比张献忠高，更写得好。高一功、刘宗敏、田见秀等大将，都各有性格，栩栩如生。

“此外，这部作品语言也很好。写景、抒情都很生动，读来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使人放手不下。我就是在三天之内，一口气把它读完的。”

谈到这里，脸色已经微微发红的吴晗拿起酒杯对姚雪垠说：“我衷心祝贺你的成功！”

“总之，”吴晗喝完一杯酒后强调说：“我认为《李自成》第一卷的质

量绝不在《水浒》之下，甚至比《水浒》还高；如果拿它同《三国演义》比较，我看它也超过了《三国演义》。因为罗贯中的作品既没有写生活，结构也不完整。”

姚雪垠听到这里，感谢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但他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在1961年夏天写完《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后，就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吴晗方才所谈的问题，并且为此还曾专门作诗一首：

百代风流各创新，
前贤未必绝绝伦，
今人自辟康庄路，
不拜施罗马后尘。

如今，他对自己作品的估价终于得到了证实，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即拿起酒杯对吴晗说：

“现在让我来敬你一杯，你公务繁忙，自己又要写作，还花费了许多时间，如此认真仔细审阅评价我的作品，真使我感激不尽！”

“雪垠同志，你这样说就见外了。应该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研究明史，你写明代的历史小说，目的都是一个……我能看到你将在明史中的有关重大事件，写成这样好的长篇历史小说，形象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和生活，真感到高兴。”吴晗同姚雪垠干杯后，接着又认真地说：

“当然你的作品也有一些问题，或者叫作不足之处，仍需作一些修改。

“首先，对内部民族关系处理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明清关系，汉满关系，绝不能写成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比如作品中写满入侵，明抗清，都不对。只能作为国内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原来作品中有的提法要改，如中国如何，满鞑子等，不改就是原则性错误。人物对话可以，但叙述语言中一定不能这样用。

“第二，你作品中的明朝人物对话一般很好。但仍有一些现代语汇，这也要改。在关于宫廷生活描写中，有点象《红楼梦》，这倒可以。

“第三，按察使与巡按使是两码事，但稿子的注释中却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了，这我已给你改过。

“第四，稿子中还有一些错别字和漏字。除我改过的之外，还需你再认真改正。

“以上就是我看了《李自成》第一卷的意见，供你参考。”吴晗对姚雪垠说。

“你的意见很好，对我鼓励很大，帮助很大。在此，我再一次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姚雪垠诚挚地说：“对于你肯定和鼓励的地方，我在修改时将继续提高；对于你指出的问题，稿子中确实存在，我在修改时一定认真改正。”

“除此之外，我还有两个问题向吴教授求教。”姚雪垠继续说：

“第一是关于《李自成》全书的篇幅问题，我计划要写五卷，你认为如何？”

“我建议你只写三卷，象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长就行了。不必写五卷。”吴晗回答说。

“一般来说，写长篇小说好象有一种规律，往往越写越松劲，到后来变

成了强弩之末；所以你建议我写三卷是有道理的。”姚雪垠说：“不过，今天我想向吴教授谈谈我写五卷的理由，不知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请你谈吧。”吴晗说。

“我计划将《李自成》写成五卷，主要有两条理由。”姚雪垠有条不紊地说：

“第一，我认为一部小说写多长，主要决定于它的内容。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我准备反映在17世纪中叶，我国历史的各个主要方面的矛盾斗争和生活面貌、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历史动态、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等等。现在，我对《李自成》全书五卷的内容和结构已有了通盘的考虑，而且越往后越波澜壮阔，直到尾声还会激动人心。

“第二，我认为象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又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应该产生各种优秀的文学作品外，还应该产生一部或多部在内容上和艺术上，都能够和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宏伟气派相称的大部头小说。我愿意为此作出毕生的努力！”

谈完这两条理由，姚雪垠紧接着又把《李自成》后四卷直到“尾声”的主要内容，包括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每卷相对独立的主题思想，主要人物活动和主要故事情节，都简要地讲给吴晗和责任编辑江晓天听。

在姚雪垠讲述的过程中，有许多地方，特别在谈到第五卷和尾声部分时，他完全进入了角色，完全被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感动。他饱含热泪，泣不成声，往往要停顿良久，才能继续讲述。为此，吴晗也深深受到了感染。他听后激动地对姚雪垠说：

“好！我赞成你写五卷的计划，就写五卷吧！”

“谢谢吴晗教授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姚雪垠说：“现在，我向你求教第二个问题：我担心我的小说出版以后，可能有的历史学家不同意我在书中对有关历史问题的看法，他们从历史问题上写文章批评我的观点，使我陷入对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中，不能集中精力写小说。”

“你只管写下去，不必为此事担心。”吴晗听了姚雪垠这番话后，慷慨豪爽地用手将桌子一拍，说：

“如果真有人从历史方面批评你，你不必管，我吴晗站出来替你打笔墨官司！”

就这样，吴晗在约见姚雪垠和江晓天的时候，他们十分投机，畅所欲言地边吃边谈着，从有关《李自成》的重要问题，到历史、历史小说……

就这样，这位中国的明史权威，刚强、正直的学者吴晗，在明知姚雪垠是摘帽“右派”的情况下，他不以人废言，不怕担风险，为了繁荣和发展祖国的文学事业，大胆、真诚、坦率地实事求是地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支持了姚雪垠正确的历史论点和全书创作计划，使处在困境中的姚雪垠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坚定了出版《李自成》的信心，为出版《李自成》开了绿灯。

就这样，吴晗和姚雪垠从上午11点一直谈到下午2点多，还话犹未尽……

这次在北京饭店的长长的午宴和长长的交谈结束后，吴晗用车把姚雪垠送到东城十二条老君堂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分手的时候，吴晗对姚雪垠一再叮嘱：

“等我出访伊朗回国以后，希望你随时来家交谈。”

但姚雪垠万万没有想到，他同吴晗的这第一次晤谈，竟然成为永别！

姚雪垠同吴晗见面后，刚刚过了两年多，在十年动乱前夕，这位真诚坦率、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学者，竟被林彪、江青作为第一个批判对象，揪出来示众，从而揭开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接着，他受尽了各种难以忍受的摧残和折磨，于 1969 年 10 月 11 日被迫害死在狱中。直到 1979 年 7 月 9 日，吴晗同志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对吴晗的不幸遭遇，姚雪垠一直深感痛惜。每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说：

“吴晗是我在创作《李自成》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知音。假若他不被残酷迫害而死，打倒‘四人帮’以后仍然健在，必将继续在党的文化事业上，在史学上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将永远感激他！怀念他！”

第二十五章《李自成》第一卷问世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所写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一年冬天到次年夏天。当时农民战争处于低潮，农民军中的“十三家”有的已经瓦解了，有的向朝廷投降了，还有的在徬徨观望。李自成坚决不投降，孤军苦战，在潼关附近全军覆没，妻女俱失，突围出来时只剩下十八个人。但他并不灰心，在商洛山中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重振旗鼓，与逃到豫西山中的高夫人胜利会师，同时推动了张献忠等重新起义，把农民革命战争推向新的高潮。同时，在这一卷中也写了清兵大举入塞，包围北京，深入畿辅和山东，以及朝廷中主战派与妥协派之间的尖锐斗争。

1962年10月上旬，中国青年出版社送给有关领导部门和专家审阅的《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本，已经全部返回，无论是从湖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委、市委宣传部、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来的意见，还是从北京被邀请审稿的专家吴晗、李文治、阿英等来的意见，都一致充分肯定了《李自成》第一卷：认为小说在真实性上无问题，艺术上是成功的，虽然在审稿过程中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不影响基本上可以定稿付印出版。

如在专家中，除吴晗和阿英对《李自成》第一卷给予充分肯定外，曾经写过第一本专门阐述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史《晚明民变》专著的李文治，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关于对《李自成》第一卷的书面意见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这部小说的结构取材，详略取舍，我感到都很恰当。关于农民军和农民的关系，几位农民将领如刘、李、田、高诸人的个性特点，都能刻画入微。尤其对张献忠的描述，非常生动，给读者以极深的印象。在这些方面，基本反映了历史实际，所以特别使人感到亲切。就是虚构部分，也能给人以真实之感，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成功。

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打算：《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后如果修改不大，争取在1962年年底以前出书。现在，各方面来的意见，更使他们充满了信心。

几天以后，当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和责任编辑江晓天，同姚雪垠一起谈修改意见，制订修改方案时，姚雪垠一开始就说：“很抱歉，经我再三考虑，无论如何到年底也修改不完。因此，你们原定的年底以前出书计划，也将不能实现。”

“我的观点是，要改，就一定改好；否则，便不拿出来！”姚雪垠继续说：“这次听取意见后，我受到了很大启发，觉得要改的地方不少：如关于民族风格的加强，关于中西长篇小说艺术技巧的融合吸收和力求统一、和谐等，都要重点进行修改；再如，对某些细节还要加深、丰富，要把历史人物对话中的现代词汇去掉，在叙述或描写语言中，更要绝对避免对满族有歧视和侮辱词句的出现……”

“我们同意你一定要改好的意见。”阙道隆明确表示：“为了进一步提高质量，出书时间也可以推后。”

接着，阙道隆和江晓天就从编辑的角度，又对姚雪垠的稿子提了不少他们认为需要修改的意见。姚雪垠听后，觉得他们过分严格，过分挑剔，对其中的意见根本不能接受，于是便沉不住气地反驳说：

“不要说象我这样的普通作家，即使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找来，我也可

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挑出许多毛病。”

阙道隆和江晓天对姚雪垠的反驳，并不让步分毫，阙道隆针锋相对地说：

“假若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是当代作家，将稿子交给我们，我们也要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因为这是我们文学编辑的责任！”

“有道理！有道理！”姚雪垠听后，一边说一边开怀畅笑起来。

阙道隆和江晓天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场辩论、争吵结束以后，姚雪垠就投入了为期一百天的紧张修改稿子的工作。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几乎把自己完全关闭起来，一直都在全力以赴，埋头苦干。为了争取时间，他每天总是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工作，中午只休息一会儿，把一天当成一天半用，而且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总是一笔一画，字迹写得十分工整，绝不轻易涂改；有时为了丰富一个细节，或改好几句适合历史人物的对话，常常要花去他半天甚至全天的工夫；为了加强作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把中西长篇小说的写作技术融为一体，他在修改过程中一直本着“继承传统勤提炼，借鉴他山贵摄神”的原则，总是对《三国演义》、《红楼梦》、《斯巴达克斯》、《战争与和平》等中外名著的写作技巧反复研究，进行借鉴……

就这样，写呀、改呀，改呀，写呀，不分白天黑夜，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从1962年10月上旬，到次年1月中旬，经过百日苦战，姚雪垠终于将《李自成》第一卷又从头到尾改了一遍。当他把改好的稿子留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63年的春节前夕返回武汉时，确实感到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甚至一看见钢笔就紧张、害怕。他真想睡几天几夜，把消耗的精力全部补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一过春节便又紧张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创作。

姚雪垠以为这是他对《李自成》第一卷的最后修改；但当这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清样寄到武汉时，江晓天同时给他写来一封信说：

“老姚：

这虽然是清样，但是你如果觉得需要再修改，请你随便修改。”

于是，姚雪垠在看清样时，又上面大改了一次，才算最后定稿。

对于中国青年出版社这种全心全意为党的文学和出版事业着想的精神，以及在改稿过程中对他提供的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姚雪垠一直非常感激，经常提起，终生不忘。

俗话说夜长梦多，好事多磨。

当《李自成》第一卷最后定稿，就要付印出版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本来稍有放松的阶级斗争的弓弦又重新紧张起来。毛泽东同志在二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分别发出指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报刊上对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也开始了过火的批判。

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不能不引起责任编辑江晓天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慎重考虑：《李自成》的稿子没有问题，但作者是“摘帽右派”，此时出版《李自成》会不会出问题？对此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

为此，江晓天着急万分！

但姚雪垠还蒙在鼓里！

当中国青年出版社得知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曾淳在四月份要来北京开会的

信息后，江晓天便急如星火地赶到前门饭店找曾淳面谈。

“我为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第一卷出版问题而来。”江晓天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对曾淳说。

“你们出版社的意见怎么样？”曾淳问。

“外审和社里都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现在已最后定稿，版已排好。所以，出版社专门让我来找你，向湖北省委宣传部请示，如你们同意，我们就付印出版。”江晓天说。

“我们省里也开过《李自成》的座谈会，大家的看法同你们一样。认为书的内容和观点都没有问题。”曾淳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向江晓天说：“不过，你知道吗？姚雪垠是毛主席点过名的。”

“你是不是指 1957 年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毛主席谈论姚雪垠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一事？”

“是！”曾淳笑着点头说。

“不过据我们知道，毛主席是赞成的。”

“是呀，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第一卷，我们也认为是可以出版的，但要慎重。现在形势不比前两年。”

江晓天接着赶快说：

“为此，我们出版社已取消了在出书后要宣传介绍，优质优酬的打算，专门研究了三条‘限制’办法：一、不宣传，包括不在报上登新书介绍；二、控制印数；三、稿费标准从严、偏低。”

“好吧，就这么定了。”曾淳说：“我们湖北省委同意你们出版。”

得到湖北省委的明确表态，江晓天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963 年 8 月，长达 42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了，首次印数 10 万。

为写此书，姚雪垠以超人的意志，克服了许多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他先后花费了六年时间，曾五易其稿，付出了很多心血。

当姚雪垠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样书后，为了表示他对党的心意，对毛主席的敬爱，在 1963 年金色的秋天，同妻子王梅彩到武汉邮局给毛泽东主席寄去一部。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呈送毛主席的这一部书不仅没有石沉大海，而且还对他今后创作《李自成》竟起到了神奇的巨大的作用。

尽管报刊不予评介，但《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还是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生动的各种人物形象，纯熟的小说艺术技巧，独创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顿时在不同层次的读者中激起了强烈反映，大家奔走相告，纷纷谈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看了姚雪垠送给他的《李自成》第一卷之后，不仅认为作品写得非常成功，非常好；而且还亲自推荐给别人阅读。一次，他在广州会见夏衍的时候说：

“我发现最近有一本好书，你看过没有？”

“你说的是哪一本？”夏衍问。

“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第一卷。”

“没有看过。”

“这本书写得很好，十分吸引人，我简直是一口气读完的，建议你也看一看。”《李自成》第一卷确实非常吸引人，充满了艺术的光彩和魅力。一

点不错，它用自己艺术的腿，在广大读者中自由奔走，自由驰骋……

第二十六章再遭厄运

1964年以后，阶级斗争之风，又开始刮了起来，而且越刮越猛，一阵紧似一阵……向来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晴雨表的文学艺术，当然首当其冲。这块园地犹如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或一群礁石，很快就受到了强大的阶级斗争风暴的席卷和无情敲打……

随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就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对许多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一向多灾多难的姚雪垠，在这次强大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又一次遭到了厄运。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姚雪垠就计划要写一部长篇传记文学《杜甫传》，将唐代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都融化进这一部作品中。关于杜甫的生活，姚雪垠准备对他的作品深入研究之后，化为散文。姚雪垠坚信，他的这部作品如能写成出版，不仅对学习和研究杜甫诗的人有一定的帮助，而且也会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增添一个新的品种。

为此，他满怀信心，不仅对杜甫的诗和生平、唐代的社会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把研究成果，变成了形象，将《杜甫传》写出了许多章。只是后来因为没有时间，才停了笔。但他仍把这些资料和作品一直保留起来。

1962年，在首都和各地举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杜甫，是纪念对象。这年正是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长江文艺》编辑部不知从何处获得了姚雪垠曾写过部分《杜甫传》的信息，专程登门拜访，向他索稿。姚雪垠认为自己的作品正好派上了用场，就从已经写出的几章中，拿出一章来，经过修改，起名为《草堂春秋》。

《草堂春秋》全文一万四千多字，发表在1962年《长江文艺》第10期上，整个作品共分七节。作者以形象的文学笔法，真实生动地记述和反映了杜甫在成都草堂的一段生活。重点是写杜甫如何创作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品发表以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本来，《草堂春秋》这样的作品是无可非议的，它属于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种，并且给人以新颖的感觉。

但在文艺界开展整风斗争中，把姚雪垠写的《草堂春秋》打成“大毒草”，于1964年冬和1965年初，首先在湖北省、市报刊上点名严厉批判。

这些批判文章任意歪曲事实，无限上纲，说什么《草堂春秋》是一部内容反动、有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它通过唐代诗人杜甫流寓成都的一段生活描写，向读者宣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毒素，并且借古讽今，攻击了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

在批判文章中，对姚雪垠这个1957年的“摘帽右派”，老帐新帐一起算。把他1957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又重新拿了出来。说姚雪垠对文艺界的青年人一向就十分厌恶和敌视，所不同的是，这次是通过被他所歪曲了的历史人物——杜甫的口说出来的。可见姚雪垠的用心是十分恶毒的。他企图告诉读者，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老作家不但不受重视，还经常遭到迫害。这是绝大的污蔑，等等。对于这样一株危害社会主义的毒草，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给以严厉的分析 and 批判。

姚雪垠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啼笑皆非。他既无权写文章进行解释，更不

允许进行反击，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只好忍痛不再写这部已经酝酿多年的传记文学。

当过了14年以后，姚雪垠在谈到这件事情时，还不无感慨地说：

“杜甫生前决没有想到，他在封建的唐帝国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平安无事；而我在社会主义时代，为他写这一章传记，竟惹出在报刊上的严厉批判。当然，这件事和社会主义本身无关，但不能不说是暴露了某些思想和作风的弱点。”

人常说，祸不单行。姚雪垠的事情到此远远没有结束。有人说他新近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必须对它进行口诛，进行批判。

到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又有人写出很长很长的大字报，批判《李自成》第一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姚雪垠为“老右派”和“牛鬼蛇神”；随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红卫兵，便把《李自成》理所当然地列入了他们编印出版的《毒草一百种》中，并排列在第五十三位；而且还逼着姚雪垠签名，要他承认《李自成》是大毒草。

“这个名我不能签！”姚雪垠理直气壮地回答造反派：“《李自成》不是毒草！”

“以后的四卷还写不写？”造反派进一步追问。

“党和人民叫我写，我就写；党和人民不叫我写，我就不写。”姚雪垠又明确地回答说。

“了倒‘老右派’姚雪垠！”

“打倒大毒草《李自成》！”被惹恼和触怒了了的造反派，用排炮一样的口号声，向姚雪垠一个接着一个打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简直令人难以招架。

“一个社会上知名的‘老右派’，解放以后的主要作品又是‘大毒草’，我这次岂能过关？！”姚雪垠反复想过以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果然，姚雪垠从此就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摘帽右派”等等罪名，进入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行列，苦度那充满灾难和不幸的悠长岁月。

过了不久，姚雪垠就被送到湖北省蒲圻县赵家桥的武汉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进行惩罚性的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这里等待他的仍然是厄运。

1971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姚雪垠所在的“五·七”干校正在学习党中央下发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当时大家普遍感到意外，几乎不能想象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林彪，竟会如此之坏。有人在发言中说：林彪在“九大”时伪装成毛主席最忠诚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如今真相暴露了。

接着，姚雪垠在发言中谈到林彪用伪装骗取了毛主席的信任，并引用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句，作为对林彪的批判。他高声吟诵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四句诗，出自白居易写的《放言五首》一组政治抒情诗中第三首。这首诗的全文是：

放言五首（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拈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是一首富有哲理性的好诗。它以极其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个道理，即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人和事物，就往往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

事实是：周公在辅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是假。王莽在汉末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本传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装，取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

林彪事件发生后，谙熟中国古典文学和唐诗的姚雪垠，想到白居易的这首政治抒情诗是很自然的，借用这首诗来批判林彪，不仅非常适合，而且十分深刻，还可以给人以许多启迪。

林彪事件后，精通诗词的叶剑英元帅，也谈到白居易的这首诗，借以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但是有谁能想到，姚雪垠却因此招来了大祸。他刚吟诵完白居易的诗，发言还未结束，会议的主持者就把脸一沉，厉声喝道：

“姚雪垠！你没有权力再发言了。你刚才引用的诗大有问题。”主持者用手将桌子一拍，满脸通红，无比愤怒地继续说：

“你把林彪比作王莽，那汉平帝是谁呢？我认为你是在有意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件，必须进行严肃处理。”

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着吓坏了，惊呆了，整个房间顿时变得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他们只听见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

散会以后，大家都离开了房间。呆若木鸡的姚雪垠最后一个人走出来。他只觉得思想上一片渺茫。他长久地站在寒流滚滚、北风呼啸的院里，任其吹打，全然不顾。

当夜，此事由会议的主持者汇报到连部，再由连部层层上报，直到“五·七”干校校本部，经过一层一层的任意引申曲解，最后一致认为这是姚雪垠在恶毒攻击毛主席。

接着，由校本部批准，对姚雪垠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批斗会，清算他的罪行。批斗会之后，连部将姚雪垠隔离审查，令他交待罪行。面对这种遭遇，姚雪垠只好任其自然。但使他最担心的是，这样一来，写作《李自成》的宿

愿恐怕将要变成泡影。为此，他心情沉重，在隔离期间，曾作诗一首：

施罗往矣余音绝，
尊酒无缘共论文。
砚墨逐年凝寂寞，
笔花入梦落缤纷。
一床青简悲司马，
半部红楼哭雪芹。
长夜犹恋精卫神，
泡波渺渺待朝睡。

原来，姚雪垠在“五·七”干校是连队的仓库管理员，工作认真负责，做得很有成绩。但经过这次事件，解除隔离后，却罚他上山去放牛。

第二十七章毛泽东的支持

世界上有些事情往往很难预料。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奇迹！

自从《李自成》第一卷被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以后，姚雪垠就一直处于非常担心害怕的精神状态之中。他坐卧不宁，茶饭无心，晚上经常被恶梦惊醒……

姚雪垠从小生性大胆，以后又多经磨难，但这次，他在武汉地区那些天兵天将式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面前，却害怕得胆战心惊。传入他耳中的几乎都是不幸的消息：××作家被抄，所有的书籍资料，全被大卡车拉走，送到造纸厂化了纸浆；×××朋友被抄，全部图书和手稿当场被放火烧毁；更可怕的是他的另外一位作家朋友，在这些天兵天将抄家时，因请求给他把未写完的手稿留下，马上就遭到无情的毒打，以致造成了终身残疾……

“唉，不知哪一天，我的这些书籍和资料，也要变成纸浆和灰烬。”大约9月上旬的一天，姚雪垠在武汉解放公园路附近住处的地上，来回走动；他一边看着摆在书架上的书，一边无限忧愁地自言自语道：“这是什么年月？我该怎么办呢？”

他心思重重，愁云满面，无可奈何，只好放声长叹。创作《李自成》是他一生的心愿，他爱《李自成》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假如生命终止了，他当然不能再写《李自成》，但是假如他的有关《李自成》材料和手稿被毁了，他活着而不能再写《李自成》，那将是多大的痛苦和不幸啊……他想到这里，浑身感到一阵抽搐，觉得自己的心简直要碎了。

确实，他的心在哭泣，在流血……

忽然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可怕的沉思中惊醒。他赶忙去开门，十几名天兵天将一下便涌进了他的房中。

“你就是‘摘帽右派’姚雪垠！”一个红卫兵凶神恶煞地对他说。

“是的，我就是姚雪垠！”

“你又在写什么毒草？”

“没有！”

说话之间，有几个红卫兵已经闯进了他的书房，而且眼睛直勾勾的一直看着他在书橱里珍藏的那些有关《李自成》的参考书籍、资料、读书笔记和卡片，还有他那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李自成》第二卷的手稿……

姚雪垠这时紧张极了。他脸色惨白，浑身颤抖，觉得可怕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他一生的心血，也许转眼之间就要化为乌有……

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红卫兵看过以后，连一本书、一页资料都没有动，更没有打他，就都撤走了。

“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红卫兵走后姚雪垠无力地坐在藤椅上想：“这一定是一次偶然的侥幸，他们也许是先来看看，下一次才来抄家。”

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街上一阵阵的高音喇叭声，造反派押着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的敲锣打鼓声，不时传入他的耳中。他心惊肉跳，真怕红卫兵夜间突然来抄家……不知什么时候，他好象迷迷糊糊睡着了。但突然之间，他似乎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不等他前来开门，一群红卫兵已破门而入，他们一进来就大声宣布：老右派、牛鬼蛇神姚雪垠听着，你写了大毒草《李自成》，又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我们奉总部的命令，前

来帮助你破除“四旧”，清除毒菌……接着这些红卫兵便迅速散开，熟练地抄起他的家来。当红卫兵最后打开他存放《李自成》第二卷手稿的柜子时，他实在忍不住了，便恳求说：“红卫兵小将，这是我半生的心血，请不要把它拿走吧！”

“你这个老右派，还要留着它再放毒！”

接着，这个红卫兵就把姚雪垠的手稿拿出来，放在地上用火柴点着高叫：“我叫你再放毒！”“我叫你再放毒！”

刹那间，熊熊的火苗便吞噬了姚雪垠的手稿；随着火焰的升腾，他的心血很快就化成了飞灰！

“我的手稿！我的手稿！”姚雪垠见此情景，高声哭喊起来：“你们还我手稿！还我手稿……”

“老头子，你怎么啦？”睡在他身边的妻子王梅彩被他的哭喊声惊醒后，一边推他，一边叫他：“雪垠，雪垠，快醒醒。”

姚雪垠被推醒之后，浑身大汗淋漓，心扑迪扑通直跳，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做了一个恶梦。

从这天以后，姚雪垠就更加提心吊胆，动不动脑海里就闪现出梦中那种可怕的情景，一听到院里有响动或敲门声，就以为是红卫兵来了，浑身便神经质地颤抖不停。

但奇怪的是，自从那次红卫兵来家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甚至直到1970年他下放“五·七”干校时，都一直再没有任何人“光临”他的寒舍或前来问津；不仅他的有关《李自成》的所有材料都完整无损，连他本人也没有被拉去游街示众，或遭受造反派的毒打……这是怎么回事？一向多灾多难的姚雪垠，这次为什么竟有此福分？只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奇迹。但姚雪垠本人当时并不知道。亲爱的读者，你们还曾记得，当1963年秋天，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他同妻子王梅彩不是从武汉邮局给毛主席寄去一部吗？奇迹就从这里发生……姚雪垠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给毛主席寄去的那部《李自成》，毛主席不仅真的收到了，而且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确实认真阅读了；而且在读完之后，对书和作者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中南海碧波荡漾，丹桂飘香。此时，毛主席正在一个掩映于绿树和鲜花丛中的古香古色的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他举起宽大的右手来，向前来列席会议的坐在右边后排座位上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轻轻一招。王任重很快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毛泽东一边大口地吸着雪茄烟，一边高兴地笑着说：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你告诉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继续写下去。”

“主席，我立即就去办！”王任重听完毛主席的指示说。

“不，先参加会，明天再去办。”

这天晚上，正好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办公会议。王任重在会上把毛主席对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指示，向与会者作了传达。

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从北京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如实传达了毛主席对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指示；并情宋立即贯彻执

行，要绝对保证不出问题。

宋侃夫当天便召来武汉市文革工作组、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布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的意见，并让有关部门当即采取了确实有力的保护姚雪垠的措施。

这样，姚雪垠的家才免于被抄，他本人也得到了保护。

但姚雪垠本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此事。直到1970年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后，他才大体听说到这件事情，可详情仍不清楚。打倒“四人帮”以后，王任重于1978年4月21日给姚雪垠写的一封信中，才把毛主席指示的内容和当时的情况详细具体地告诉了他。

这封信，姚雪垠至今仍珍藏着，并且曾让笔者看过。王任重在给姚雪垠的信中，有一段这样说：“你写《李自成》的那些资料所以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你自己也未遭到更严重的打击，的确应当感激毛主席的关怀和保护。”

应该说，这是姚雪垠一生最大的荣幸。他对此既非常感激，又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的再次支持

1972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姚雪垠怀着不安的心情，快步走进了中共武汉市委的办公大院。按照事先的约定，他轻轻敲开了市委办公楼年的一间房门。

“你好！我正在等你。”市委一位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一边同姚雪垠热情地握手，一边说：“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谈吧！”

“今天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作《李自成》后几卷。”

姚雪垠喝了一口茶以后，按照他原来想好的内容继续说：

“在1965年以前，我已写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成》第二卷，大约有60万字，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七年间，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创作。

“前不久，我才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六年，我却一直没有继续写《李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要求。”

“你提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求。”这位市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说：“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委的来信后，市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已交换过意见，并研究决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让你立即先从‘五·七’干校回来创作《李自成》，手续暂不必办，何时正式回未，另外再通知你。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还一再嘱咐，要我向你转达，你回来后，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就向市委提山，市委一定帮助解决。”

从此，姚雪垠就回到武汉家中，不分昼夜地又继续创作《李自成》第二卷。

人是回来了，书也在写，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在变化莫测地进行，他在思想上感到很很踏实，一种担心害怕、朝不保夕的情绪总是笼罩着他。这年夏天，姚雪垠在创作之余，特地写了一首题为《夏日》的诗，描写了他的这种心情。

日日案头挥汗雨，
笔端虎啸带雷鸣。
经多实践思方壮，
勘破浮名意自平。
晓色半窗迎鸟语，
午荫满院落蝉声。
楼前尚有低云过，
注目遥虹赏晚晴。

这次创作《李自成》第二卷最后四分之一部分期间，同以前创作该卷前面的章节一样，姚雪垠又一次得到了湖北省图书馆的热情接待、热情服务和很大的帮助。

湖北省图书馆座落在武昌城内蛇山南麓，抱水堂下。馆内不仅极其雅静，而且藏有大量图书。1961年秋冬之间，当姚雪垠开始创作《李自成》第二卷的时候，这里的副馆长张遵俭、参考阅览室的负责人昌少千等许多同志，并

不因为他是“摘帽右派”就慢待他，恰恰相反，他们都非常热情地给他提供方便。姚雪垠不仅可以随时来湖北省图书馆看书、借书，而且所需有关写作《李自成》的图书资料，该馆如果没有，他们便转向湖北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或向外地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替姚雪垠租借，给了姚雪垠很大的帮助。这次他从干校回来继续创作《李自成》，“文化大革命”还继续进行，该馆的同志也没有把他看作“牛鬼蛇神”，不予惜书，而是仍象过去一样热情为他服务，及时保证了写《李自成》所需的各种书籍和文献资料。

对于这种雪中送炭，姚雪垠不仅十分感激、而且一直铭记在心。1977年当他的《李自成》第一卷修订后再版时，他在前言中专门写了一段，特别表示对湖北省图书馆的感谢；1981年5月1日，当他回忆到这两段往事时，又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了两首诗，以作为对湖北省图书馆的永久纪念。

(一)

武昌城内蛇山麓，
佳木葱笼明我眸。
秋月常窥写字案，
春阳也照借书楼。
三年泽畔风吹帽，
五夜灯前雪压头。
每忆孤征艰苦日，
抱水堂下翠烟浮。

(二)

归来莫道雄心减，
风雨幽窗苦著书。
白发催人征路远，
青山迎面步行徐。
芸编对我犹怀旧，
彩笔凌云再奋初。
倘若石渠排牛鬼，
史诗入梦竟何如？

可是在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武汉市委、湖北省图书馆这样热诚对待姚雪垠，热情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当1973年春天，姚雪垠被武汉市委从“五·七”干校正式调回市文化局创评室，市委宣传部明确指示，要姚雪垠不搞杂事，专门创作《李自成》。但是，市文化局还是不断让他做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占用了他好多时间。

对此，姚雪垠实在忍无可忍，不得已向武汉市委领导作了反映。市委负责人向市文化局有关领导又重申：要让姚雪垠集中精力写《李自成》。但现官不如现管。下边只是表面上应付，实际并不听从。

就这样，寒来暑往，春风秋雨，物换星移，日出日落，姚雪垠只好苦度岁月。

到1975年的国庆前夕，姚雪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初稿，并且一边修改，一边还开始写第三卷。

但在这个几乎无法使他工作下去的单位和环境中，要完成第二卷的修改任务，交付出版，再继续把第三卷写下去，谈何容易。

“唉，”姚雪垠在他的家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喃喃自语说：“时间不饶人啊，我已经65岁了，这样下去出书的前途一定不堪设想！我将如何是好？”

但天无绝人之路。

正当姚雪垠苦恼万分，无计可施的时候，《季自成》第一卷的责任编辑江晓天在10月初给他来了一封信，建议他直接给毛主席写信。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姚雪垠看罢江晓天的来信想：“写信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能够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才行：假如信要落到江青等人手里，就很可能出问题，轻则被压起来，重则会惹出大祸。”

于是，姚雪垠便给曾经支持他写《季自成》第一卷的原武汉市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宋一平写信，汇报他不能继续写《季自成》的困难情况，同时问宋一平有无办法将他的信转到毛主席手里。

宋一平收到信后，立即同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等同志进行了研究，然后由胡乔木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作了汇报。邓小平表示，他可以将姚雪垠的信亲自转送给毛主席。

这样，姚雪垠很快就收到了宋一平的回信：将信转给毛主席有办法，但信要用毛笔写，字要大一点，因为毛主席的眼力不好。

姚雪垠喜出望外，1975年10月19日，把写给毛主席的信寄给了宋一平。

姚雪垠写给毛主席这封信的全文是：敬爱的毛主席：我是长篇历史小说《季自成》的作者。解放后，我在您的思想教育下立志以季自成为主人公，写一部反映我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做《季自成》。《季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呈赠一部，表示对主席的无限敬爱，也表示是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开始做出一点成果。

1966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还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多次感动得热泪奔涌，下决心更加勤奋学习，改造思想，力求将这部书完成得较好，以实际成果报答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季自成》被列为第一批开放书目，至今仍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读者中发生着影响，甚至远在新疆西陲（叶城）的边防战士，也来信说他们为书中所塑造的季自成等英雄人物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所感动鼓舞。由于我的思想水平低，加上第一卷出版匆忙，书中问题不少，总想修改重印。

这部书共有五卷，估计写成后字数在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间，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而故事也愈波澜壮阔。我一直认为，我是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拥有八亿人口和数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纵然外国人和古人不曾有过部头庞大和内容繁富的长篇小说，我应该有写成这样一部小说的雄心壮志，以巨大的热情付诸实践。

第二卷稿子已经写成将近两年，约七十万字左右。由于十年来继续学习和探索，尤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教育，第二卷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有所提高。虽然我寸阴必争，不论盛夏严冬，每日凌晨三时起床工作，但我已经是进入六十六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许多读者都担心

我会完不成《李自成》的写作计划。虽然我打的是较有准备的仗，但我仍需要对有关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生活继续作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且将历史的研究成果化为小说艺术，要花费很多的辛苦劳动。往往为几句符合人物性格和历史特点的对话，便要苦心经营。我从来只靠下苦功，不曾靠什么灵感，不曾有过“文思如泉”、挥笔千言的时候。倘若在一切方便的条件，我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加上已经有了八万字的写作提纲和第一、二卷的基础，大概用三年时间可以写成一卷。由于部头庞大，书中出场的人物众多，头绪穿插复杂，反映的历史问题和生活方面较广，五卷陆续出齐后，必须再将全书统改一遍，才算完成。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我多么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或机构具体抓一抓我的工作。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同志虽然表示愿意将《李自成》继续出完，但该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全国读者都需要读文学作品，也渴望《李自成》第一卷早日重印，以下各卷能快点出版。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来写这封信请求您将《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

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六十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比较能够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七十五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不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为了让主席了解我的心愿，附呈旧作七律一首。

敬祝健康长寿！

姚雪垠

1975年10月19日

抒怀（赠老友）
堪笑文通留恨赋，
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
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
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
弃杖成林亦壮哉！

谨抄旧作七律一首，呈敬爱的毛主席

朱一平接到姚雪垠这封向毛主席汇报写作计划和请求给予支持的信后，立即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又转交给了邓小平，然后由邓小平直接送毛主席。

很快，毛主席就看了姚雪垠给他的这封一千六百多字的长信，并于1975

年 11 月初在姚雪垠给他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同意他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这是毛泽东继 1966 年 8 月，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及其作者姚雪垠，进行保护和支持之后的再一次巨大支持。其间，时间虽已过去了九年，然而年事已高的毛主席仍然没有忘记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仍在惦记和关怀着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

很快，1963 年曾经出版过《李自成》第一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派江晓天乘飞机去武汉向姚雪垠传达这一喜讯，同姚雪垠商定修改出版《李自成》第二卷，重印第一卷的计划。

从此，姚雪垠在人生的道路上，便得到了极大的转机。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具体帮助下，他鼓足了自己生命的风帆，向既定的目标前进。向艺术高峰奋勇攀登！

这年的 12 月中旬，他永远摆脱了那随意干扰他创作《李自成》的环境，告别武汉，来到了北京。

第二十九章面对第二卷中的难题

1975年12月22日凌晨两点多钟，北风呼啸，天空闪烁着寒星，浓重的夜色笼罩着古老的故宫和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千家万户正在熟睡，整个首都一片宁静。唯独座落在东郊北京工人体育场北边的一栋宿舍楼里，突然有一间房子亮了灯。不一会儿，一位长者，坐在写字台前，提起毛笔，很快写下了一首题为《到京》的抒发情怀的诗：

快车高卧入京华，
笔砚安排即是家。
舞剑仍来残阳外，
挥戈惯趁夕阳斜。
心游见阙骊龙近，
眼望珠峰雪路遐。
任重只愁精力减，
杨鞭少看上林花。

这位长者，就是昨天刚从武汉来到北京的姚雪垠。这里，便是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一楼三单元三号——姚雪垠临时借住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职工宿舍。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下，他心里燃烧着烈火，浑身，充满了力量，以致使他来到这里竟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布置，就在第二天凌晨起床，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修改工作。

《李自成》第二卷所写的主要内容是：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和十之六七的义军将士染病。明军趁机数路进攻，同时勾引起义军内部叛变，情况极其险恶。李自成、刘宗敏和高夫人等表现了巨大的斗争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内平叛乱，外歼明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次年夏初，李自成率领千余精兵从武关突围而出，潜伏于郧阳山中。冬天，李自成看准时机，疾驰入豫，饥民从之如流；随即破洛阳，杀福王，将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围绕着这些故事主线，书中还写了杨嗣昌如何出京督师，并写崇祯在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下，同皇亲、大臣之间，以及宫廷内部，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在这一卷中也写了张献忠的军事活动，牛金星和宋献策到闯王军中，以及红娘子破杞县，救李信，推动李信起义，投奔闯王等动人心弦的故事。

从《李自成》第二卷初稿的篇幅来看，要比第一卷的42万字多一倍。

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涉及问题众多，篇幅很长的历史小说，在“四人帮”对文学艺术界实行法西斯专政，大搞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影射史学”、“儒法斗争”的动乱年代，要修改好出版，该有多么困难。简直有如一座难以征服的大山，横亘在姚雪垠的面前。

姚雪垠十分清楚，《李自成》第二卷要修改好出版，困难很多，但最大的不外只有两个：一是要不要照“四人帮”的意图将李自成改写成反孔英雄？要不要在这部小说中写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是要不要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三陪衬”的荒谬理论，把英雄人物李自成等改写成绝对的纯洁、先进、正确、光辉，以及如何如何革

命，而把他的缺点，如有帝王思想、天命观和其他迷信思想，有孔孟思想等等，全部删去。把反面人物如崇祯和杨嗣昌等，统统依照程式化、漫画化、脸谱化的办法，进行表面丑化，使他们堕入公式化、概念化和粗浅庸俗的地步，而不是象现在他写的这样，通过典型的生活细节把反面人物写到性格深处，反映阶级斗争的复杂面和深刻面。

1974年初“四人帮”发动所谓“批孔”运动，接着又搞“评法批儒”斗争。当时有不少人替姚雪垠担心，劝他把“儒法斗争”的思想贯穿在《李自成》第二卷中，甚至建议，把崇祯皇帝作为儒家来写，把李自成当作法家来写，而且写成反孔英雄。

说这些话的人，有的是姚雪垠在文艺界的老朋友；有的是关心他的朋友，也有的是党的领导干部或理论工作者。

当然，也有人在背后悄悄对姚雪垠说：

“‘儒法斗争’纯属胡闹，你可千万不能写。”

“你可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的事情，更不要学那些风派学者，要有骨气！”

怎么办？

在“四人帮”大搞所谓“评法批儒”的疯狂年代，写不写这个问题确实关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

或者，屈服于权力，出卖灵魂，投机钻营，篡改历史，投入“四人帮”的怀抱，一时飞黄腾达，招来历史和人民的唾骂；

或者，坚持真理，同历史和人民站在一起，实事求是，讲出历史的真相，维护历史的尊。

在真理和权力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姚雪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坚持真理的艰难道路。

对于在《李自成》中要不要将李自成改写成反孔英雄，他明确表示：“我不能！我既没有看见一条经得起推敲的史料证明李自成偶然反过孔（更不说一贯地），也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找到理论根据。”

对于在《李自成》中要不要写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也明确表示：“我不要！李自成所领导的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我不能在小说中心造一条儒法两家的路线斗争。”

1974年9月14日，姚雪垠为避免灾祸，用比较隐晦的语言，给知识渊博、能够理解他心情的历史小说作家端木蕻良写信，专门谈写历史个说必须认真研究历史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对于明末有关农民战争的重要问题，我都尽力找到有关同一问题的历史文献资料（坚决不依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研究其各种互相矛盾之点，找到其各种来源，再决定何者接近事实。同一个问题不仅研究直接关于这一历史问题的具体资料，也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的动态，军事斗争形势，以及古代地理、明末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等等方面，来考察这些材料所包含的问题。纵然如此，也还有未碰到的资料。未真正理解的问题，不敢偷巧省力，人云亦云。更不望文主义，以主观代替客观。有时还用通史的眼光来看专题史的具体问题。因为任何历史专题，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历史的共性。这些话在信中谈起来很抽象，但在运用时就一点也不抽象。”

1975年3月7日，姚雪垠在给茅盾的信中明确写道：

“关于《李自成》与‘批孔’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一、在《李自成》全书中要努力写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二、李自成受了儒家思想很深的毒；三、根据现存的、经得起推敲和复查的文献资料，李自成没有过反孔政策和措施，倒是相反的资料不少。这正是他的弱点，他的局限性。四、……”

茅盾收到这封信后，在同年6月17日给姚雪垠的复信中说：

“至于大函中论到有人建议结合儒法斗争而您不同意这一点，我基本上赞同。您说：‘历史运动的现象（包括一个时代的具体人物）是很复杂的，不出于总的阶级斗争轨道，但不一定都在儒法斗争的范畴之内。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对明末北方封建统治阶级的致命打击，其历史意义和作用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能够努力写好这一点，《李自成》这部小说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务。’这很对。将来再函详谈。”

在“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那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他对充斥于史学界的“影射史学”非常厌恶和坚决反对。当一位记者到他家找他谈论到罗思鼎们一些反动而又荒唐的论点时，姚雪垠禁不住扬起长眉，愤慨针砭道：“简直是不顾及起码的史实！”

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时候，武汉市委办的儒法斗争骨干学习班上，有两位青年来找姚雪垠，谈到他们要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写有关秦朝灭亡的文章，并征求他的意见。

“这类文章，为要出风头可以写，要为捍卫真理，就先不要写。因为，现在写了，以后会后悔的。”姚雪垠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

“为什么？”

“因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决不是因为李斯被杀。李的被杀只是引起了混乱。你们说李是法家，也可以这样说。但说赵高是儒家有什么根据？秦始皇如不死，可能形势会变，最后能否亡国不一定。秦二世是糊涂蛋，主宰不了这个国家。”

这两位青年听完姚雪垠同他们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后，觉得很有道理，决定不再写这篇歪曲历史，赶时髦的文章。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姚雪垠顶住“四人帮”的强大压力，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已将第二卷一半以上的稿子修改好了，正准备将前面的部分交稿发排时，在1976年4月5日，偏偏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使姚雪垠又遇到了一个事先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极大的难题。

本来，《李自成》第二卷有个单元，写崇祯十三年，湖广、四川、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半个中国，无处不是灾荒惨重，无处不有“叛乱”。关外的满洲方面正在养精，准备再次入侵。杨嗣昌出京督师后，虽然将李自成围困在商洛山中，但征剿诸军欠饷情况严重，军心不稳；洪承畴出关以后，也不断传来急奏、密奏：军饷短缺，战守皆难，但求皇上饬令户部火速筹措军饷运送关外。一连几天，崇祯天天接到各省的紧急文书，不是请饷便是请兵；而国事如焚，国库如洗，他向皇亲借助军饷又告失败。他内外交困，被层层围困在紫禁城中，畿辅和山东一千多士民来京伏阙上书，在承天门前发生了惨案。

明代的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历史怎么会出现如此的巧合？小说是1964年写的，又是三百六十六年以前的事，偏偏在这部小说即将发排时，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承天门惨案”和“天安门事件”就难免没有“影射”之嫌。

姚雪垠写《李自成》时，抱定一个宗旨，就是绝不搞“影射”。“古为今用”并不等于“影射”。他对“古为今用”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看法。《李自成》这部小说的特点就是不用历史“影射”今天，而是将历史生活“再现”出来给今天的读者看，使之能正确的认识历史规律，并从中受到教育。

但是，现在若说承天门惨案不是影射天安门事件，可就有口难辩，很难讲清楚了。

为了避免“影射”之嫌，能够顺利出版，不遭横祸，出版社建议姚雪垠把这个情节删掉。但姚雪垠却坚持不删，他的理由是自己写的是历史！没有写天安门事件，而且是早在1964年就这样写了，有人看过稿子，可以作证。后来关心他的同志也劝，何必自投“四人帮”的“文网”呢？如果那样，说不定书也不能出版了。

最后，姚雪垠只好稍作让步，将锦衣旗校打人、捕人的文字删去，改为将上书的百姓驱散了事。但他在同时提出，以后再版时一定要恢复原貌。即使这样，知道内情的人，当时仍然担心他会受到“四人帮”的迫害。

到1976年的了月中旬，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二卷基本改好，只剩从头到尾再统一遍，就可作为自己的最后定稿交出版社，这一工作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做完。但偏偏在7月28日，又发生了几乎使唐山全城毁灭的大地震，而且波及北京。北京的居民绝大多数都被从房子里震了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住在临时在街上搭的地震棚里，一直不断受到地震的威胁；凡外地有亲戚朋友的，都纷纷离京去暂作躲避……

在此情况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出于对姚雪垠安全的考虑，劝他暂回武汉避震，但姚雪垠却回答说：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绝不离开北京，一定要尽快在这里将二卷改定，交给你们。”

这样，姚雪垠就在震情吃紧，大地经常颤抖的情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面人行便道上的一个小小的防震棚里，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不顾危险和闷热，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直到把第二卷全部改定。

这年国庆前夕的一个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负责人、《李自成》第二卷的责任编辑王维玲，来到姚雪垠的临时住处。

王维玲已人到中年，身材敦实，为人诚恳热情，办事机敏有方，既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又有相当的文学水平，在工作中的那种认真、负责和仔细的态度和作风，更加使人感动。他自担任《李自成》第二卷的责任编辑以来，给姚雪垠的创作和修改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方便。而且，从此之后，他便与姚雪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直当《李自成》的责任编辑，同姚雪垠联系工作……

“雪垠同志，”王维玲将送给姚雪垠过节的礼物放下之后说：“我们寄到武汉市委的《李自成》第二卷清样已审回来，他们还写了一封关于审稿意见的信，请你过目。”

姚雪垠看完盖有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大印的审稿信后，沉思了好一阵才对王维玲说：“这审稿意见是有问题，今晚我想找你们出版社的领导人谈谈。”

“他们过一会儿也要来看你，”王维玲回答说：“等他们来后，你有什么意见就尽管谈吧！”

话音刚落，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两位领导就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姚雪垠开

门见山，非常严肃地说：

“ 武汉市委的审稿信我已看过。对信中所谈 ‘ 关于崇祯皇帝的宫廷生活和朝廷斗争，以及杨嗣昌等大臣的章节可以尽量压缩，对崇祯皇帝和杨嗣昌等人只可少写几笔，并要加以贬词 ’ 的意见，我不能同意。 ”

他非常激动但又十分坚定地进一步解释说：

“ 因为这是创作方法问题，是艺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我可以考虑。

“ 现在，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今晚我要给武汉市委宣传部写信，表明我的观点：他们所提意见，我不能同意，他们所要我删改的地方，正是我所下功夫努力追求的，我宁可不出书也不改。如果他们最后还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回武汉去！书，不出了。

1976年10月6日，我们的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审稿部门最后终于同意了姚雪垠的正确意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将稿于定稿发排付印。

第五部 闻名中外

(1977 - 1988)

第三十章 巨大成功

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 1977 年的时候，他的长达 83 万字的《李自成》第二卷，分上、中、下三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出版，接着他的《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全书共 52 万多字，也分上、下两册同读者见面。这年 3 月 3 日，姚雪垠曾写了一首题为《李自成 第二卷开始问世》的诗，表达他的心情：

默默送汝初问世，
任从读者自平章。
无言桃李成溪径，
叱咤风云岂霸王？
工细何曾流纤弱，
雌奇未必属粗狂。
十年寂寞蓬窗女，

羞学江家时样妆。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共有五册，长途 123 万多字。这两卷写了崇祯十一年十月到十四年二月间的斗争历史，包括农民革命的低潮阶段及转变阶段。它一出世，就以其波澜壮阔的英雄故事和独具的艺术魅力，极大地吸引了读者，深深打动人心，在神州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请看看吧，每当各地新华书店出售这部小说的时候，总是排满了争相购阅的长长的人群，第二卷初版 30 万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为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接着天津、上海、广西、青海、吉林、四川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社，向中国青年出版社索取纸型，进行翻印，除汉语外，《李自成》还被翻译成蒙文、朝鲜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结果，这两卷的印数很快又超过了二百万大关，但仍不能满足要求，有人甚至不避繁难，手抄阅读，继之又多次印刷发行，到 1981 年第三卷出版前，《李自成》前两卷的总发行量已达到四百一十多万套，成为当时中国最畅销的书。

许多著名作家、学者、教授、以及党、政部门的高级干部，在阅读了《李自成》后，纷纷给姚雪垠写信，祝贺他的成功，赞扬和评论他的作品。

文学大师茅盾对《李自成》高度评价说：“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他还指出：“中国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

“我首先要向你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对你数十年的辛勤劳动表示钦佩。”夏衍读过《李自成》后，在 1977 年 6 月 17 日给姚雪垠的信中这样说：“《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更在以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千万读者的欢迎，粉碎了‘四人帮’的荒谬‘理论’和他们的‘一花独放’政策……更是砸烂‘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颗重

型炮弹。”

谢谢你送给我这部未完成的巨著第二卷，使我得到了极大的阅读的快乐。长久以来，我没有读到这样吸引人的作品了。”林默涵读过《李自成》，在1977年11月6日给作者写信说：“我是把第一、二卷一气读完的。读完两卷，我深深感到，这部小说虽然还没写完，却已经充分展现了明朝末年广大农民在沉重压榨下活不下去，因而揭竿四起，而明王朝的统治已经百孔千疮，濒临崩溃的一幅画图。它塑造了众多不同性格的正反面人物，反映了广阔的生活面，显示了种种社会相，描绘了雄壮酷烈的战争场面。如果作者不是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孤是写不出来的。”

秦牧在1977年10月12日给姚雪垠的信中说：“读《李自成》，是一顿精神上的盛宴，有一种艺术享受上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鞭辟入里，荡气回肠。”他在信中还说：“在一个封建制历时两千余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您准备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三百万字的篇幅，来写一部关于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小说，而且就已经出版的部分看来，写得这样笔力万钧，气魄雄伟，这样有血有肉，活龙活现，是很可钦佩和庆贺的。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仅为当代读者所热烈欢迎，并且必将成为世代流传之作。在若干年代之后，它也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推断，而不是溢美之词。”

秦牧以一首七律作为信的结语，向姚雪垠这位文艺领域的长跑健将喝采：

怒马哀兵闯字旗，
弯弓奋剑下京畿。
沧桑几度斩皇历，
穷僻千秋说义师！
欣际锤镰开广阔，
笑驱雾障辩迷离，
膏腴大地生花笔，
三百万言写史诗！

著名历史学家胡绳读罢《李自成》第二卷，在1977年3月28日连夜给姚雪垠写信：

“虽然应该承认，读得不很仔细，但我要向你报告：我对这第二卷读后的满意程度大大超过第一卷。老实说，我原来颇有点怀疑：你计划写五卷是否有点太大，这样大的篇幅是否必要。但读过第二卷后，这种怀疑完全消释了。你并不是单纯地反映明末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而是以这支农民起义军为中心，写出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当然需要这样大的篇幅。在我们祖国的历史长河，有过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它离开我们是很远，但其实又很近，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实在非常需要。我希望你放开手来写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场景，深入地写出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来。”

1977年的4月12日，朱光潜在读完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后，写下了近四千字的笔记，进行评论。他在笔记中写道：“作者对明末历史背景有充分的掌握，博学多闻，胆大而心细，文笔朴素而生动，《红楼梦》以来，

还少见这样好的长篇历史小说。”还写道：“在布局上显出虚实张弛的有节奏有烘托的进展运动，所以篇幅虽长，毫不呆板，产生了波澜壮阔的印象。”“就人物性格而论，起义军的主要将领都描绘得各有特性。”1977年的10月15日，朱光潜又给姚雪垠写信说：

“承寄赐大著《李自成》第一卷上、下两册，已收到，谢谢！”

旧版第一卷久已售完，图书馆里存的都已借出，曾托友人辗转借得一部，说明要限期交还，只能匆匆走读一过，前承经寄的第二卷三册，也由北大同事们辗转借阅，大约已经过三、四十人的手了。‘洛阳纸贵’，并非夸词。象这类雅俗共赏的杰作，印数似宜加几倍才行，不知能和青年出版社商量一下否？”

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住在北京西苑饭店的姚雪垠房间的电话响了。

“喂，您是孟实（朱光潜的笔名）先生……”

姚雪垠放下电话不久，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即来到他的住处。

“我来看看你，顺便再谈谈对《李自成》的意见。”朱光潜开门见山地说：“尽管有些意见，我在读书笔记中和给你的信中也谈过，但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还想当面交谈，因为你写的是一部宏巨的著作。”

“谢谢你！孟实先生。”姚雪垠高兴地说：“你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正如给你写信时所谈，我不敢止你费心太多，只想止你对我的长篇小说在美学问题方面，略有赐教。”

“从美学角度来讲，”朱光潜说：“首先，我认为你的《李自成》非常富有音乐节奏感。这就是指在书中有的地方写的很紧张，有的地方写的很抒情，而且十分注意笔墨变化。”

“第二，在写作手法上，你把西洋小说的手法和中国小说的手法，很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李自成》写作的独特手法。我把它概括为：‘你既吸收了许多外国的技巧，但始终植根于民族土壤。’不知妥否？！”

“这太好了，你说出了我早已想说，但又找不到恰当词汇要表达的话。”姚雪垠极其兴奋地说：“先生说话入木三分，画龙点睛，开我茅塞。非常感激！非常感激！”

以后朱光潜在他所著的《谈美书简》一书中还写道：“我读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特别欣赏他在戎马仓皇的紧张局面之中穿插些明末宫廷生活之类安逸闲散的配搭，既见出反衬，也见出起伏的节奏。”

方毅在读过《李自成》之后，也亲笔于1980年5月4日给姚雪垠写信。”他在信中说： ……

“《李自成》第一、二卷，我已拜读多次，深为书中人物所感动。我最关心的是以后几卷何时可以完成。这一历史巨著将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天京悲剧》亦望你早日脱稿。为此搞些现代化方法如录音也是可取的。”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不仅被广大读者争相购阅，而且还被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改编成各种形式，广为流传。

《李自成》第一、二卷在出版后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对全书进行了连续广播。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组经过再三研究决定，将《李自成》第二卷中册第二十八章，在1978年编入了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起名为《虎吼雷鸣马

萧萧》。这样，《李自成》和他的作者姚雪垠，又以教材的形式，出现在我国的教育界。

美术工作者，还把《李自成》改编成连环图画出版，在广大少年儿童中流传……

文艺工作者对该书的兴趣更大，他们把《李自成》各卷中的故事情节改编成了戏剧、电影、电视剧、评书、汉剧、越剧、秦腔、说唱、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供广大观众欣赏……

比如，武汉根据小说《李自成》，改编成了汉剧《闯王旗》，不仅成功地进行了演出，而且还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舞台艺术片。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还把《李自成》改编成京剧《闯王旗》、《闯王夫人》，由著名京剧演员袁世海、李和曾和赵燕侠在首都演出。电影工作者，根据小说《李自成》的部分情节，改编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故事片《双雄会》上映；电视工作者，还根据这部小说的一些片断，改编并由陕西电视台摄制成了电视连续剧《李信与红娘子》等等。

《李自成》第一、二卷出版后，日本作家陈舜臣、陈谦臣还将第一卷翻译成日文，以《叛旗》为书名，由日本东京讲谈社在1982年10月出版。

读过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以后，善于捕捉信息的新闻记者、报刊编辑，川流不息地登门拜访姚雪垠，报道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约请作家撰写文章。

最早采访报道姚雪垠的是中国新闻社特约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这位记者对姚雪垠详细采访以后，写了一篇近五千字题为《姚雪垠谈（李自成）的创作》的报道，于1977年5月14日由中国新闻社，向国内外发出。这篇访问记第一次全面地披露了姚雪垠是如何写作《李自成》的情况，以及作家的近况和以后的打算。

作为独家新闻，它一发出，就受到了香港和澳门报纸的欢迎。因而，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澳门日报》都在5月14日、15日、16日三天的报纸上，分别以显著地位，刊出访问记全文，还配以姚雪垠的照片和醒目的标题。如《文汇报》的标题为：

历史小说已走出新路

姚雪垠谈《（李自成）的创作》

《澳门日报》的标题是：

全书五卷要写三百多万字

姚雪垠赶写《李自成》

并将创作《天京悲剧》

小说《李自成》准备改成剧本搬上银幕

从此，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便在港澳和海外驰名……

1977年11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对作家姚雪垠的访问记，次日，《人民日报》等首都报纸和全国各地地方报纸，大都全文刊登。从此之后，中央、各省、市以及许多高等院校的报刊，都纷纷派记者采访姚雪垠，一篇接一篇地报道有关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情况；《人民画报》和《河南画报》以照片形式用不少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北京电视台还摄制了新闻记录片《访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不仅在国内放映，还向东南亚和日本发行。

随着国内新闻界方面的报道，国外和港澳的记者、作家，也纷至沓来，

专程登门拜访姚雪垠。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1978年6月9日在北京访问了姚雪垠，并在返回美国后写了关于姚雪垠和《李自成》的长篇报道《七十年代的故事》，香港《开卷》杂志记者杜渐也专门来北京对姚雪垠作了长时间的访问，并写了长篇访问记《姚雪垠先生谈历史小说 李自成的创作》，发表在《开卷》第三期（1979年1月号）上。

在记者们报道姚雪垠和《李自成》的同时，许多报刊的编辑、图书管理部门和高等院校的有关人员，也都纷纷来向姚雪垠约稿、请作报告、或前往讲学。姚雪垠为了回答广大读者给他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便答应了其中的一部分要求。比如他应约分别给《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红旗》等一批杂志撰写了文章，在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文献》丛刊编辑部举办的大型报告会上，向首都广大读者主讲了关于崇祯形象的塑造问题。姚雪垠在1978年《红旗》第一期发表的《李自成 创作余墨》一文，以数万字的篇幅，就他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李自成》题材的形成，内容和结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占的创作方法等问题，向读者作了很好的回答和解释。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问世以来，国内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愈来愈多，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对《李自成》的评论文章，北京、上海、江苏、四川、湖北、宁夏等许多省市的出版部门先后都出版了一批有关评论《李自成》的书籍，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研究《李自成》的机构。

1978年4月，在武汉举行了全国第一次《李自成》学术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湖北省社联（筹）委托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举办的。出席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哈尔滨、长春、西安和湖北省、武汉市的大专院校、文艺、新闻、出版等部门四十多个单位的代表八十多名。会上，大家就《李自成》第一、二卷出版的意义，它的成就和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运用，以及小说的民族风格和民族艺术传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热烈的争鸣。

在1982年春天，《李自成》还被全国六千五百万中学生评为“我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十二月，《李自成》第二卷又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在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面前，姚雪垠在想些什么呢？

他想得很多很多……

他想到，由于毛主席的支持，《李自成》第二卷才得以修订付印，但现在书出版了，毛主席却与世长辞，这多么令人痛心！他为毛主席看不到他所关心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心里难过。他默默对主席说：“请您老人家放心吧！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一定努力将全书写完！”

前两卷虽已先后同读者见面，但姚雪垠并不感到有丝毫的轻快。因为他深深知道写长篇小说是一种韧性的战斗，是马拉松运动，现在离到达终点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所以，他在结束一、二卷的工作以后，便于1977年夏天，风尘仆仆地赶赴沈阳、锦州、秦皇岛等地，参观、考查清故宫和松山战役、山海关大战的遗址，为《李自成》后三卷的创作搜集资料。实地考察结束后，一回到北京，就投入了《李自成》第三卷的创作……

他想：在第三卷中如何在小说的风格上进一步实现自己的追求：植根于民族土壤，具有中国气派，使每卷、每单元、每一章都做到“笔墨变化，丰

富多彩”。

为写好《李自成》，在创作第三卷的同时，他还在想：怎样才能解决好历史科学与历史小说的关系问题，历史题材的古为今用问题，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历史小说如何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的问题，历史小说家应有的修养问题，等等。总之，姚雪垠没有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是向着新的更高的艺术目标攀登，为实现他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奋斗。他在写作之余，还经常吟哦他写的两首诗，以鞭策和激励自己不断奋进。

(一)

我爱史诗彩色多，
缤纷世相入网罗。
英雄痛洒山河泪，
儿女悲吟离乱歌。
方看惊涛奔急峡，
忽随流水绕芳坡。
丹青欲写风光细，
不绘清明上汴河。

(二)

征路崎岖载宿愿，
艰难摸索苦经营。
全书未就双眉白，
一卷虚招万目青。
织锦私师屈子意，
乌生暗祭雪芹灵。
天京旧事情犹系，
应趁斜阳奋晚程。

第三十一章邓小平的鼓励

1977年11月2日下午5点钟，首都沉浸在一片美丽的晚霞之中。北京体育场、北京体育馆北边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下班的人流，象潮水般的涌进……

一辆从东大桥向北奔驰的红旗牌小轿车，开到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一楼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职工宿舍门前，突然停了下来。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和他的秘书下车后，一直奔向这栋宿舍楼的三单元三层三号，用手轻轻地敲开了住在这里的姚雪垠的家门。

“平化同志，稀客！稀客！”正在伏案读书的姚雪垠，听见妻子王梅彩在过道里同客人说话，便放下手中的书，前来迎客。

宾主坐定之后，王梅彩将上好的龙井茶送在了客人面前。

“雪垠同志，我今天给你带来喜讯。”张平化严肃而兴奋地说，“邓小平副主席说你的书（指《李自成》——作者注）写得很好！昨天下午，他亲自嘱咐我务必前来看你，问你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张平化喝了一口茶以后，又提高声音对姚雪垠说，“邓小平副主席还说你对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什么困难中央替你解决。”

姚雪垠听后，被这从天而降的喜讯，一下给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可是，他看看坐在身旁的张平化和曹秘书，马上又证实了这确实是真的，而不是梦。他想，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就任于危难之际，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的事业百废待兴，他为拨乱反正，为党的大事，为国家的大事整日操劳，公务是那样的繁忙，竟然还抽出时间来看了我写的书，又专门派人来看我、关怀我，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想到这里他觉得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里打转的热泪也差点夺眶而出。他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张平化说，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他喝了一口茶，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以后说：

“平化同志，谢谢你来看我。我目前的工作条件与从前大不相同，都很顺利，没有困难。邓小平副主席的关怀给我很大鼓舞，我十分感激！”

张平化转达了邓小平副主席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评价和对作者的关怀后，又同姚雪垠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对他在创作和身体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细致的询问。

张平化走后，姚雪垠的心怕久久不能平静。一连几天，他都被这巨大的鼓励所激动。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讲了此事，向湖北省委宣传部写信汇报了此事，让大家同他共同分享喜悦。但是他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拿起毛笔来，工工整整地给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主席：

本月2日下午，张平化同志奉您的指示前来看我，使我十分感激和鼓舞。同时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和鼓励，也是对整个文艺界和全同众多愿意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的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鼓励。

假若不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李自成》全书五卷大概已经全部完成了。目前，我正在努力赶写第三卷，决心争取明年定稿，后年出版，为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献礼。为报答毛主席生前的关怀和支持、您的鼓励和全国读者的热情期望，我一定本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加速完成以下三卷，并为接着写《天京悲剧》作好准备，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多做一点工作。

《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之后，又作了一些修订，即将重印。俟重印本出版，当奉上一部，请你指教。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1977年11月5日

之后，当新华社记者采访姚雪垠的时候，他又一次表示，一定要以写好《李自成》后三卷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对他的关怀和鼓励。

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同文艺界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他对《李自成》的评价。

姚雪垠是多么幸运！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人物中，毛泽东看过他的《李自成》的第一卷上册，给予了肯定，邓小平又认真看了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除给予肯定外，并作了中肯具体的评价。

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事实上，姚雪垠从武汉来北京以后，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还是有许多困难的。但他对自己严格要求，认为只要能让他安心写书就好，所以，他的许多困难并没有向来看他的张平化谈出。

后来还是一位经常采访姚雪垠的新华社记者，在1978年上半年，将他所了解到的姚雪垠在创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些具体困难，专门写成材料，向中央作了反映。

这份向中央反映的材料中说：目前，姚雪垠正在紧张地赶写《李自成》第三卷，但在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无论怎样自己主观努力，也不能解决和克服的困难。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能够为他解决：

一、户口问题。姚雪垠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1975年12月从武汉来北京写作《李自成》至今已达两年半时间，随他同来的还有为他打字和做饭的爱人王梅彩，以及一直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六岁多的孙女。在这期间，由于他们在北京没有户口，所以生活问题如兑换粮票、购买副食等，全靠亲戚朋友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集体食堂资助。这样不仅耗费了很多时间，而且长此以往麻烦别人，分吃别人的份内定量供应，姚雪垠内心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但根据湖北省委指示，又让他长期居住北京写《李自成》，因此，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能够批准将他全家三口人的户口从武汉正式迁来北京，但他的工作并不调动，组织关系仍在湖北省文联。

二、住房问题。姚雪垠现在北京是临时借住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职工宿舍，地址在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此处面临交通干线，昼夜车辆来往不断，马路对面则是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馆，经常举行各种体育比赛，八万多人观看演出，笑语喧哗，掌声雷动，入场退场时更是人声鼎沸，环境极不安静。这使姚雪垠使用录音进行创作时，经常受到干扰；而且，他进行写作需要较多的图书资料，目前的两间房子，根本摆不开从武汉运来的大量图书。基于以上情况，姚雪垠将户口迁来北京后，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分配给他一套大一点、环境又较安静的房子。

三、助手问题。为了加快写作《李自成》，组织上已给姚雪垠配了两名助手，其中一名在北京的助手，原户口在外地。因此，在批准姚雪垠进京的户口时，还需要同时解决助手户口进京问题。

以后在许多同志的劝说之下，姚雪垠本人才简单向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了一信，要求解决他全家及助手户口迁京以及在北京分配他一套住房的问题。

结果，邓小平同志很快就在姚雪垠给他的信上批示：同意姚雪垠的要求，请文化部、中宣部办理此事。

户口问题很快解决了。1979年10月，姚雪垠迎来了乔迁之喜，他由临时住处幸福一村，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路南新建公寓，六间一套的舒适、安静的住房。

对此，姚雪垠曾激动地对采访他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说：

“邓副主席对我的关怀和鼓励，真使我终生难忘。过去，他在关键时刻，把我的信面呈毛主席，使我及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后来在刚恢复工作不久，他就派张平化专程看我。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工作那样繁忙，还仔细看了《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作了中肯的评价，这次又为我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亲笔批示，很快解决。邓副主席曾自告奋勇当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后勤部长’，我说，他也是作家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最好的‘后勤部长’！”

第三十二章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经过再三思考，姚雪垠还是决定把他的《《李自成 第一卷修订本前言》的初稿，寄给郭沫若去征求意见。

这个《前言》，共有三万多字，主要讲述他的创作理论、经验和对书中人物的分析说明。

这天，姚雪垠把《前言》初稿和他给郭沫若写的一封信，一起装入信封寄了出去。

他给郭沫若的信这样写道：郭老：

多年不曾趋谒求教，至祈原谅。拙作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约八十万字，分为三册，已经印成一部分，春节前可以出版，第一卷分为两册，修订本正在排版中，将跟在第二卷之后出版。各册出版之后，即便寄上，敬请指正。

今寄上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一稿，请您看看。其中谈到一些历史问题，我没有十分把握。“四人帮”的御用笔杆子们大谈李自成反孔，实际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李自成正象朱无璋一样，不但不反孔，反而尊孔，使孔、孟为其政治斗争服务。《前言》中关于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和您从前的意见相违，正如西哲之言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也算学生同老师争鸣吧。不妥之处，也请赐教，以便改正。《前言》将在月底前发排，希望在发排前能得到您的主贵意见。

敬颂

大安，并候
立群同志健康！

姚雪垠

1977年1月19日

信寄走以后，姚雪垠在家中踱步沉思：“会有什么结果呢？无非三种情况：一是郭老同意我的意见，给回信，二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给回信；三是不表态，当然也不回信。”

“无论出现那种情况，我都可以知道郭老现在对刘宗敏和李信是如何评价的。”姚雪垠在心中默默地说。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寄出信的三天之后，竟获郭沫若给他的复信：姚雪垠同志：

好几年不见面，也没有通消息，昨天突然接到你的1月19日的来信和《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的前言，真是喜出望外。《前言》，我一口气读完了。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祝贺您的成功，感谢你改正了我的错误。我渴望着能拜读您的大作，并希望能看到您的《天京悲刷》——这恐怕是过分的奢望了，您要“七十五岁以后再写出”，到那时我已经一百岁，毫无疑问已经化为肥田粉了。

《前言》退还您，在文字上似乎还有三两处错误，我看了用红笔顺便改了。希望校对时注意。敬礼

郭沫若

1977年1月22日

姚雪垠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前言》中关于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

和您从前的意见相违。”而郭沫若给姚雪垠的复信却说：“《前言》，我一口气读完了。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祝贺您的成功，感谢你改正了我的错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姚雪垠要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就不能不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生关系。但当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的时候，在深入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他自己对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同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完全相反。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刘宗敏的英雄品质和历史作用持否定态度，并把刘宗敏作为鞭笞的对象；而姚雪垠根据他对史料的分析研究，认为郭沫若的评价是错误的，刘宗敏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中居于重要而崇高的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应该充分肯定，进行歌颂。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把李信作为英雄人物，推崇备至，进行全面歌颂。姚雪垠则认为，郭沫若在李信的问题上不仅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是错误的，而且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同时贬低了李自成，姚雪垠认为，对李信参加农民起义大军应作具体的分析：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

这样，当姚雪垠在1957年秋天被错划为“右派”，开始创作《李自成》的时候，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要不要跟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见解走，跟着走，是一条最轻松、最保险的道路；不跟着走可能会有曲折、甚至要担风险。

“怎么办？”姚雪垠反复地思考着。

最后，他决定不跟着《甲申三百年祭》走！

1977年底，当《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将付印前的最后清样，送到一个工人评论组征求意见。姚雪垠也到会参加座谈。他看见许多工人手中都拿着《甲申三百年祭》，并且有一个工人当场问他：

“你在小说中的许多看法，怎么和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不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引起姚雪垠的深思，他必须利用第一卷修订本出版的机会，写一前言，向读者公开谈出自己的观点。

姚雪垠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好了第一卷修订本的《前言》。但到底公开发表不发表呢？发表前要不要给郭沫若看呢？

他进一步更加慎重地思考着：

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著述极多；而且长期担负着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对发展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文化界众望所归的领袖，是学术界举世公认的权威。

郭沫若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公认为是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当时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还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整风学习的文件。之后，《甲申三百年祭》又一直成为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一本书，它不仅影响了历史学界，而且在广大读者中也深入人心，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历史学方面的权威著作。

而且，郭沫若又是姚雪垠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尊敬的学者和导师。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要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理论问

题，展开了对中国现代化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展开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史问题论争时，姚雪垠就认真阅读了郭沫若写的《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认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点写出的开创性著作，并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下了“心爱的书”四个大字，到1938年，当姚雪垠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在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后，郭沫若就在《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赞扬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并对当时的文坛新秀姚雪垠，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殷切的期望；1943年，当姚雪垠到达重庆以后，他又经常去郭沫若家中求教，并在郭沫若家中，应邀参加了周恩来的宴请……

“唉！”姚雪垠想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难哪！我到底该怎么办？是征求郭老的意见，公开发表《前言》？还是放一个时期再说？”

姚雪垠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大胆地鼓足勇气，便将他的《前言》和他给郭老的信一并寄出。

郭沫若真不愧为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的伟大的学者：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在学术上仍不固执己见，只要别人批评得对，他就愿意虚心接受。他既能“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这是多么需要后人学习的崇高品质。

姚雪垠对郭沫若的这种态度，这种精神，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

作为学生对老师的争鸣，到此并没有结束。姚雪垠感到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中，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评论，言犹未尽。为了弄清对明末的历史问题兼批评《甲申二百年祭》，在此之后，他便把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看法，写成了一组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连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如他写的《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一文，1979年11月至12月曾在香港《文汇报》连载；他写的《论 圆圆曲 》一文，1980年在《文学遗产》杂志第一期发表；他写的《评 甲申三百年祭 》的长篇文章，1981年在《文汇报月刊》第一至第三期刊出。

结果，姚雪垠的这些文章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因此在1981年前后，在全国史学界就《评 甲申三百年祭 》和《论 圆圆曲 》，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许多人都写文章反对姚雪垠对郭沫若的批评，但姚雪垠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有什么错误，不过为了创作《李自成》的后几卷，他没有时间再写文章公开发表，继续参加争论，只是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向党中央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

这场讨论，当然没有人作出谁是谁非的明确结论，但它的本身却给后人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许多问题。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问题研究的深入，终有一天，史学界的学者专家们，会对此作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十三章 乌柏经霜叶更丹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魄：对于自己以往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仅能够采用强有力的措施，在实际上进行彻底改正，而且敢于向国内外公开承认。

对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所犯的 error，在事过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党正是采取了这样的做法：——首先在内部、在实际上给予彻底改正，然后公开向全党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中共中央在 1978 年 4 月 5 日首先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请示报告。紧接着在 9 月 17 日，党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强调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做好改正工作。到这年的 11 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到 1980 年，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也基本结束。

不仅如此，而且在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更明确指出：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我们的主人公姚雪垠在二十多年前被“扩大化”、错划为“右派分子”，二十多年后，在有错必纠的原则指引下，又被彻底改正。

二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短短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它几乎占去了人生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宝贵时间。

当 47 岁被错划成“极右派”的姚雪垠，在 68 岁听到中央有力错划右派改正的精神时，便立即在 1978 年 11 月 12 日，向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写了长篇书面报告，提出申诉，要求对他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重新审查，予以纠正。

经过复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改正对姚雪垠 1957 年错划右派的问题，省委还决定，在写信通知姚雪垠同志本人的同时，并将此事公开见报。

1979 年 2 月 25 日在《湖北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一消息：

省直宣传战线抓紧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工作

作家姚雪垠等八十六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予改正，恢复名誉当消息中谈到姚雪垠问题的时候，还正式公布了湖北省委对他的复查结论：

“1958 年划作家姚雪垠为极右分子的主要依据，是 1957 年前后发表的五篇文章、两次讲话和一封信。参加复查的同志这次全部查阅了以上材料，发现当时的结论与原文有很大的出入，有的是斩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是歪曲原意，强加于人。根据复查，属于错划。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省委最近已经批准改正，恢复名誉。”

啊！此时此刻的作家姚雪垠，真是百感交集，激动不已。于是提笔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的情感：

风雨

——因 1957 年事获彻底纠正而作

风雨崎岖二十年，

未将羸马卸征鞍。
别工梦献连城壁，
逐客私裁九畹兰。
牛鬼蛇神迷黑榜，
香花毒草乱朱栏。
卷施纵死心忧活，
乌柏经霜叶更丹。

“乌柏经霜叶更丹”。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党曾经错怪过他，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给他带来过灭顶的灾难……但是姚雪垠始终把党作为他的精神母亲，他对于我们的党从来没有一点怨恨的心情。他总觉得，作为一个儿子，他只能靠自己工作得太少而惭愧，却没有权力去抱怨哺育自己的母亲，即使母亲在某些时候犯了错误。姚雪垠还常常拿河南家乡的一句土话来形容他自己：“家鸡打得堂前转，野鸡不打展翅飞。”他说：“自己不论怎么受委屈，也决不能背离党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1957年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以别人不能想象的勇气和决心，仍然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历史，指导创作，为党和人民写出了《李自成》第一卷。

1978年2月中旬姚雪垠出席湖北省第四次文代会时，被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就在这个月他由武汉返回北京后，又被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9年冬天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0年夏天，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一次年会，被与会代表又一致推举为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

这一个接着一个的职务和荣誉，既是党和群众对他的信任与期望，同时也加重了他的责任！

“乌柏经霜叶更丹”。当1979年2月，湖北省委为姚雪垠改正错划右派问题，恢复名誉之后，姚雪垠很快向湖北省文联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他说：“我是一个在党的思想哺育和政治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人。我一直把党看作我的精神母亲，一直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如今，我更迫切希望能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晚年，为社会主义祖国，为十亿人民多作一些贡献，报答党对我哺育的恩情！”

湖北省文联党支部经过考察，认为姚雪垠基本上具备了入党条件。于是在1981年12月7日，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姚雪垠的入党问题。当入党介绍人骆文、沈毅同志分别向支部大会介绍了姚雪垠的情况之后，姚雪垠在会上发言。他说：

“同志们：

我现在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谈几句出白肺腑的话。我今年72岁，已经是垂暮之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同志们如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将是我的新开始。对我来说，这后一方面的意义更关重要。虽然我明白我自己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实现，我的儿子、孙子们也不能看见，然而我坚信人类的崇高理想必将实现。这是我的追求，我的信仰。我愿意为这一信仰而进行战斗，所以请求党组织接纳我为一个普通党员。”

经过讨论，支部大会一致同意接受姚雪垠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还专门为姚雪垠入党发了消息：

新华社武汉1981年12月9日电 七十二岁的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

主席姚雪垠于 12 月 7 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他说：“人应该有理想 ,有信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的理想。我决心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终身。”

第三十四章痛悼茅盾

1981年3月27日凌晨5时55分，茅盾走完了他八十五年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我国文学界又一颗巨星陨落了！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解放以后，曾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第一任文化部长，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茅盾是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伟大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之一，他的大量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他同鲁迅和郭沫若一起，曾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他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茅盾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团结壮大革命文艺队伍，培养文学新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噩耗传来，使姚雪垠震惊，使姚雪垠难过，甚至一连几天，姚雪垠的心情都不能平静，难以工作。他为我国文学界失去一代大师痛心，他为自己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前辈、师长、朋友和知音而痛苦。他心里默默地想：在学问上，创作经验上，茅盾是我的前辈和师长，而在我的创作方面，尤其对《李自成》的艺术追求，茅盾是我的真正知音。然而现在我却永远失去了他。知音难遇啊！

在茅盾去世后的第三天，还不列凌晨两点，姚雪垠就起来，坐在他写作间的灯下，摊好稿纸。他想写悼念茅盾的文章，但心情沉重，思绪纷乱，竟不知从何下笔。这时书斋极其寂静，楼外的大街上也没有任何杂乱的声音。他一面翻看着茅盾生前用彩色水印写意画宣纸信笺，用劲秀的书法给他写的许多书信，见物思人；同时，眼前不断地浮现着茅盾的面影，耳边时隐时现地响着茅盾同他谈话的声音。他同茅盾四十多年来的交往，就象一部五彩缤纷的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从他的脑际闪过……

——姚雪垠永远忘不了：是由于茅盾对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最先给予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才使他一举成名。

1939年春天，姚雪垠把他写的在武汉一个刊物不用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寄到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结果，茅盾不仅在《文艺阵地》很快发表，而且还亲自撰文，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因而，这篇小说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还是在这一年，姚雪垠还写了一本报告文学《战地书简》，茅盾在香港看到后，又热情撰文在《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二期上予以介绍和评价。茅盾在介绍完《战地书简》的内容后说：“从各方面看来，这本小书里，有的是典型的事，以及典型的人物。”“作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我们对于作者抱着无穷的希望。”

——1943年春天，姚雪垠来到山城重庆，有车同比他大14岁的文学界前辈茅盾经常相见，并且当面得到茅盾的帮助和指导。那时姚雪垠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正好在重庆出版，为了评论这部小说，茅盾在1944年春天，专门为姚雪垠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参加讨论的还有冯乃超、以群、减克家等。虽然茅盾当时正患眼疾，视力很差，小说初版印得又很不好，但为了评论这部书，他竟耐心地将《牛全德与红萝卜》细读两遍，而且在讨论会上讲了很好的意见，既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成绩，又指出了它的缺点。

之后，茅盾于1945年又在《文哨》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两篇文章，评论姚雪垠写的中篇小说《戎马恋》和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由于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右派”，姚雪垠怕影响别人，因此很长时期以来他与过去的许多朋友都主动断绝了交往。同茅盾亦如此。所以，到1974年，姚雪垠已经同茅盾有二十多年既没见面，也没有通信了。这时，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已经出版了十一年，第二卷也已写完，开始进行修改。这两卷书是他花费了许多心血写出来的，而且凝聚着他在长篇小说的艺术方法、历史小说新道路方面的探索，他总想遇到知音，听一听知音之言。这不能不使他想到茅盾。于是姚雪垠便写信向茅盾请教，茅盾热情认真地复了信。从此，两人便频繁地通起信来。这样，茅盾便仔细读了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稿子，并看了姚雪垠寄给他的有七、八万字的包括十个题目的《李自成 全书内容概要》。这十个题目是：

- 一、总的主题思想；
- 二、第一卷内容梗概；
- 三、第二卷内容梗概；
- 四、第三卷内容梗概；
- 五、第四卷内容梗概，
- 六、第五卷（包括尾声）内容梗概，
- 七、对待历史长篇小说的艺术追求；
- 八、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态度，
- 九、我对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小说的关系的粗浅认识；
- 十、其他。

所以，茅盾不但了解《李自成》第一、二卷，也了解姚雪垠对《李自成》全书的设计、蓝图。所以，茅盾当时就盼望姚雪垠能够将三、四、五卷粗略地写出来，以防姚雪垠万一写不完，后人不会知道他的全部构思，他想得多么周到、细致。

这样，在1975年冬天姚雪垠由武汉来北京之前，就把茅盾给他的有关《李自成》的几十封信，粘贴成了厚厚的一大本珍藏起来，而且在本子的前面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茅公已八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患老年性黄斑盘病，一目一尺外不见五指，一目视力为0.3~0.4。承其将《李自成》第一卷看了一遍，并将第二卷抄稿七十万字（按：实际初稿近八十万字）读了两遍，写出比较详细的意见。这种关怀和热忱，使我十分感激。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涉猎中外文学作品极博，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经常分析别人的作品，故善于从小说的艺术特点评论小说作品，非同于一般评论家从干枯死板的条条框框出发。他的这些信件，有许多意见精辟入微，探出作者匠心……

现在，请读者从他们的大量来信中，阅读一、二，以见一斑吧：

比如，茅盾读了《李自成》第一卷，在1974年12月23日给姚雪垠写信说：

“第一卷中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以潼关南原大战为例，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而两面有时亦复衔接。如此布局，极见匠心。……”姚雪垠在接

到此信后，于12月29日给茅盾回信说：“接到您12月23日的挂号长信，欣感交并。您已进入七十九岁高龄，目疾又相当严重，写这样长信，谈意见如此细致，很使我感动。《李自成》第一卷从有打印稿子起到出版十年后的今天，尽管说好话的人很多，但还不曾有人象您这样对它作艺术分析，看透作者的艺术苦心……”茅盾对《李自成》第二卷是按单元次序向姚雪垠谈的。对于第二卷，他不是仅仅读一遍，而常常是先读一遍，记下要点或初步意见，再读一遍，考虑成熟，然后才给姚雪垠写信，而且信写得很长，往往长到一千甚至二千字。如当他读完《商洛壮歌》这个单元后，在1975年6月7日给姚雪垠写信说：

“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击，时而风管箫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

——姚雪垠除了把稿子寄给茅盾讨教外，还通过写信向茅盾请教他在创作中拿不准的关键问题，或久思不决的难题；而往往这时，茅盾总是给姚雪垠以支持或以主意，使姚雪垠最后下定决心。

比如，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二卷中，在《李岩起义》这一单元里，虽然用重笔与了李的原配夫人汤夫人的整个性格，但对于这个人物，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写，他自己心中没有完全的把握，特写信向茅盾请教。茅盾在看了他的稿子和信之后复信说，你写汤夫人是一分为二的。她是名门闺秀，大家夫人，封建思想自极浓重，这就决定了她宁愿自杀，不肯随李岩造反；但她又是比较明于事理、对明王朝也有不满情绪的女人，事实的教训使她终于认识到李岩只有造反是条出路。这样，汤夫人的形象写香恰到好处，她完全符合封建大家闺秀的身分。请你不必犹豫，这样写就很好。这样就完全解除了姚雪垠心中的疑惑。

还如，姚雪垠写的《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虽然征得郭沫若的同意。但是是放在书的前边作序，还是放在书的后边作附录，他当时把握不住，于是又向茅盾请教。茅盾看了姚雪垠的《前言》后，明确对姚雪垠表示：你的《前言》不仅详尽地占有了有关史料，而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作了精辟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因此该文不仅写得很好，而且非常重要，一定要放在书的前边作序，请不必顾虑。这样，义使姚雪垠最后下了决心，把《前言》放在了书的前边。

——1977年春节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姚雪垠自1957年动手写《李自成》以来的第二十个年头。这时他的第二卷第一分册刚刚印成，还未发行问世，以下还有三卷稿子未就，任务繁重。他深感老马长途，力与心违。姚雪垠2月18日清晨起来，正值春节早晨，他百感交集，怅然寡欢。随即赋诗一首，聊抒情怀。

春节感怀

曾经霜冻百花摧，
春色含烟次第回。
楼外五更多爆竹，
胸中甘载足风雷。

雄心勃勃山河壮，
笔力迟迟岁月催。
新作印成初到手，
怅然无意觅茅台。

随后，姚雪垠就把此诗抄寄茅盾。结果，很快就得到茅盾的和诗：

雪垠兄以春节感怀见示步韵奉和并请指正

壮志豪情未易摧，
文坛飞将又来回。
频年考史拨迷雾，
长日挥毫起迅雷。
锦绣罗胸仍待织，
无情岁月莫相催。
高龄百廿君犹半，
贺酒料应过两台。

茅盾

1977年3月14日于北京

而且，这首诗，茅盾还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的。它饱含着茅盾对姚雪垠的评价和期望。姚雪垠得到后十分高兴，买了一个玻璃镜框，把这件书法艺术珍品放在里面，端端正正地挂在他家的会客厅里，用以勉励自己。

——1977年6月17日，是茅盾的八十一岁生日。为了表示从青年到老年，他从茅盾那里得到的许多教导、鼓励和支持的感谢，以及他对茅盾的敬佩和爱戴之情，姚雪垠特意写了一首七律，奇呈茅盾，表示祝贺。

祝茅公八十一寿辰
笔阵弛驱六十载，
功垂青史仰高岭。
平生情谊兼师友，
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
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
点缀春光满上林。

1977年6月17日

后来，当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和第一卷修订本，先后在1977年同读者见面之后，在1978年的一至三月，茅盾不顾自己已是82岁的高龄，身体又不好，视力也极差的情况，还几经修改，写出了一篇近万字的《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评论文章，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上发表。茅盾在这篇评论中不仅从总的方面高度评价了姚雪垠的《李自成》；而且还几乎对全书许多单元都进行了仔细认真的分析。

茅盾在写完这篇评论以后，身体就越来越差，过了一个时期就住进了北

京医院。在茅盾住院期间，姚雪垠曾经去看过他两次。

姚雪垠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茅盾，是1980年5月的一天下午。

这是首都春末夏初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蓝天白云，花红柳绿，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奔忙，一队队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在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前，用清脆的声音在向革命先烈宣誓……姚雪垠在病房中，同住院的茅盾交谈了很久。他们交谈的内容，从天上地下，到古今中外，简直无所不包。姚雪垠看看自己手上的表，怕累着茅盾，想早点走，让茅盾休息，但茅盾一谈起学问就兴致很浓，不愿意他离开。姚雪垠也不舍得离开他。于是，他们继续交谈着。茅盾谈累了，坐着难以支持，便躺在病床上同姚雪垠谈。

“雪垠兄，你刚才谈话中，有一个字的读音似乎错了。”茅盾说：“这个字我不这样读。”

“这个冷僻的字，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读错了，一直到老。谢谢您纠正我的读音。”姚雪垠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问你，你的《李自成》第三卷进展如何？”茅盾兴奋地问姚雪垠。

“现在正在作最后一次修改，即将发排。”姚雪垠回答说。

“好啊！好啊！”茅盾连着说：“我真希望早点出来，我再读到它！”“等你病好后！我找人读给你听！”

但姚雪垠万万没有想到，当第三卷快出版时，茅盾竟闭目长逝。他们那一次在病房中的晤面竟成了永别！

从1981年3月30日到4月11日，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姚雪垠一连写了《一代大师安息吧！》、《读旧信追怀哲人》、《老将殊勋青史在》等三篇文章，痛悼茅盾。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和《新港》杂志上。

茅盾是一位长篇小说大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在临终曾嘱托，采用他的稿费对全国的优秀长篇小说进行奖励。后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设立“茅盾文学奖”。

姚雪垠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在1982年12月15日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领取了紫铜的奖章和三千元人民币的奖金。随后将三千元奖金全数捐赠给中同少年儿童基金会。

在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姚雪垠决定：从1983年起，向他的家乡河南邓县每年捐助稿费五百元，设立《春风学生作文奖》，每年在全县的中小学生中举办一次优秀作文比赛，以引导中小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写作能力，培养热爱文学的新芽。他还希望等到条件成熟，把这个活动，扩大到河南、湖北两省。

第三十五章《李自成》第三卷出版

读过姚雪垠著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的人，都关心着第三卷何时出版？都关怀着李闯王统帅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明王朝中原重镇洛阳之后，将向何方发展？

从1976年开始，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创作，姚雪垠终于在1981年初完成了《李自成》第三卷。

为了回答广大读者所关心的问题，新华社在1981年2月12日播发了《李自成》第三卷即将出版的消息，同年9月20日又发了《李自成》第三卷出版的消息。

《李自成》第三卷分上、中、下三册，共有十四个单元、六十章，九十余万字。连同以前出版的第一、二卷，现在《李自成》总计已有八册、共二百二十多万字，完成了全书的大半。

《李自成》竣工后将有五大卷，近四百万字。第三卷是全书承上启下的最重要的一部。在第一卷里，作者写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敌强我弱，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惨淡经营，艰苦奋斗，保住闯军大旗，站稳脚跟的故事。在第二卷里，作者写了李自成率领起义军继续在艰难中经受考验，破洛阳、杀福王之后，人马发展到八十万，威镇中原，起义事业逐渐走向壮大和成功，同时，在这一卷里，也写了李闯王和农民起义军在不断胜利中，开始暴露出的缺点、弱点。

在第三卷，作者继续展开农民战争的汹涌洪流，描写人民的智慧和斗争的艺术。李自成破洛阳以后，声势大振，曾三次围攻开封，与明军主力在中原转战，双方都投入了最大的主力，战役频繁，又各具特色。结果是，明军惨败，明王朝走向崩溃，李自成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这一卷中，还开始描写清朝入关前的重要人物皇太极（清太宗）、多尔衮等，以及满族的习俗制度，明清之间的战争等。第一、二卷中出现过的一些主要人物，在第三卷中形象更加丰满，性格更加鲜明。杰出的农民代表、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由于地位的变化暴露出本身的弱点，农民革命事业正在向高峰发展，同时也孕育下失败的因素。

整个《李自成》是一部大悲剧。如果说，第一卷侧重在定下了整个悲剧的基调；第二卷则着重从另一个侧面去加深悲剧的气氛，而且为整部作品更为广阔的社会大悲剧作了较多的艺术准备，那么，在第三卷中悲剧的气氛已相当浓厚。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飒爽聪慧的青年女兵慧梅，被强迫嫁给了袁时中，而这个袁时中却背叛了起义军。后来，慧梅协助闯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袁时中，然后自尽。历史名城、数十万人口的开封，百姓在围城中大批饿死，最后被滔滔黄水淹没……

实际上，《李自成》第三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81年9月出版之前，从1977年起到1981年的先后四年多时间里，姚雪垠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强烈需求，已将它的绝大部分单元和章节，分别在《上海文艺》、《辽宁文艺》、《人民文学》、《长江》、《芳草》、《收获》、《鸭绿江》、《长江文艺》、《解放军报》和《中国通俗文艺》等刊物和报纸发表，同读者见面。尽管这样，但在出版时，首次印刷大、小三十二开本共六十三万套，以后又多次重印，仍不能满足需要。

因为在第三卷出版时，第一、二卷的总的发行量已达四百一十多万套，

许多人有了前两卷必买第三卷，以便配套阅读和保存；有的买了第三卷而没有前两卷，又要求出版前两卷，以便买齐来看。这样《李自成》的发行量，当然要一增再增……

在中国的十亿人口中，能买到或借到一部《李自成》，读《李自成》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听《李自成》的人却多到无法计算。象第一卷、第二卷一样，《李自成》第三卷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照例在每天中午 12 点 30 分和晚上 7 点 30 分的小说连播节目时间，由曹灿将全书作了广播，守在收音机旁的听众到底有多少，无法统计。

《李自成》前三卷不仅闻名全国，而且在外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4 年春天，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给姚雪垠的来信，就是一个例证。

“我虽为一介洋人，中文程度有限。对先生巨著《李自成》，在我懂得汉语以前，即如雷贯耳，至今一读再读难以释卷；先生其他早期作品《差半车麦秸》、《春暖花开的时候》和《长夜》，则为我情有独衷，心爱不已。每思如此，优秀之文学，实应翻译成英文。

“先生写作收集资料之多，考据之精，描写之细，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以为此系中国历史研究优良传统之表现。先生求真求实的精神，实为治史者之鉴。”

更令人注目的是：随着《李自成》第三卷的出版，研究《李自成》的人也越来越多，对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从众多的意见和评论中，不难看出，《李自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在前三卷中有五大鲜明的特色。

首先，它通过广阔、精细、绚丽的生活化描绘，为作品平添一种寥廓宏博、丰腴充实而又新鲜异趣的客观生活实感，显示了巨大的艺术力量。

第二，《李自成》在前三卷中，已为我们写出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各自不同的人物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可以永远站立于中外文学名著之林的真正艺术典型。

第三，整个《李自成》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悲剧，作者在小说中对悲剧艺术进行了成功的运用与出色的创造，从而使作品不仅闪烁着悲剧美，给人以崇高和悲壮的美感；而且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震撼人心的感人力量。

《李自成》的第四个特色是采取了平行而交错的艺术结构。

《李自成》的第五个特色：是它鲜明的民族风格。这一特色在作品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西洋近代长篇小说的手法植根于民族土壤，生长出中国的小说艺术，具有鲜明的东方风格；二是作者在写作时处处运用“笔墨变化，丰富多彩”美学原则，即动静结合，虚实结合，刚柔结合，壮美与优美结合。

《李自成》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最明显的有两点：

一是倾向性地存在着生活描写不精粹的问题，第三卷更为突出；

二是在塑造农民起义军领袖和将领身上，存在着现代化的毛病。

第三十六章无止境斋

《李自成》第三卷出版以后，姚雪垠从1981年秋天撇开四卷，即刻投入了最难写也最为关键的第五卷的构思和创作。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位记者在他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寓所采访时，这样提出问题。

“我在完成第五卷以后，回过头来再写第四卷，是为了‘先难后易，稳操胜券’。”姚雪垠简单明了地回答说。

姚雪垠的寓所是有六间一套的比較高级的住宅。除卧室、书房、客厅、餐厅、厨房外，还有每天供应热水的洗澡设备，地板一律由平整光洁的新型塑料建筑材料铺成，墙上贴着带有暗格花纹的浅色壁纸，显得非常雅致宁静。朝南的房间还带有宽大的阳台。自从1979年10月底搬进这里以来，姚雪垠就给他的书房起名叫“无止境斋”。

他说：“因为我的学习无止境，工作无止境，追求无止境……所以，才给书房起名‘无止境斋’！”

“无止境斋”是一间朝南的屋子，既是书房也是写作室。大约有20多平方米的面积。临窗摆着一张宽大的米黄色的书桌，是姚雪垠的写字台；书桌的左前方，放着一个专门为他设计制作的精致而实用的小型组合柜，里边有供他写作时常用的各种资料和工具书；书桌对面的窗台上陈设着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盆花：有青翠欲滴的君子兰，散发着幽香的米兰，有开着红花的虎刺梅，绿的可爱的纹竹，还有洛阳的牡丹，鲜艳的月季……这些美丽的花卉，给整个房间带来了勃勃生机；窗户的东边是通往阳台的玻璃窗门，在阳台上也摆着许多花草，每天上午当姚雪垠工作劳累时，他便来到这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腰肢，闻闻花香，望望蓝天白云，晒晒太阳；屋内，靠东西两边的墙壁都安放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精装、平装的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从屋内往北走，经过通道可以进入他的卧室，打开屋内的东门即是他的客厅，同他的“无止境斋”一样，靠东西两边的墙壁，也都安放书柜，上面也都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在客厅靠西墙的一个玻璃书橱里，专门陈列着他几十年所写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翻译成俄、英、日、法、世界语等外文的书。

在“无止境斋”和客厅的地上，一律铺着猩红色的丝绒地毯；在客厅靠放沙发一边的墙上挂着一些名人送给他的字画。比如有一幅是1977年茅盾赠姚雪垠的一首和诗。其中有两句是：

“频年考史拨迷雾，
长日挥毫起迅雷。”

另一幅是叶圣陶书赠他的条幅。其中有几句这样写道：

“平日孜孜矻矻长篇。”
“赓继周稽博访，悉力事精研。”

还有一幅字画是周谷城先生1979年书赠他的一首诗，其中最后两句是：

“老来应鼓余生勇，
学府文坛作战场。”

“无止境斋”的这种陈设布置，完全属学者气派和作家风格，充分反映了主人的志趣和豪情。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主人在这里是怎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就让我们

来窥视一下这位大作家，写作《李自成》的秘密吧……

北京电报大楼的时钟刚报过凌晨两点。

此时，靠近木樨地路南的一栋公寓的五层楼上，便有一间房子的灯亮了起来，一位身高一点七米，精神饱满的长者起了床。

这间亮着灯的房子就是“无止境斋”。

这位长者就是姚雪垠。

姚雪垠起床以后，首先把煤气打开烧一壶开水；然后用冷水洗脸、擦身，然后把自己临窗的写字台擦得干干净净；当水烧开以后，他便泡上一杯浓浓的他最喜欢喝的上等龙井绿茶，接着在写字台前坐下，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他有时端坐在写字台前，打开录音机，用富有感情的浓重的河南低音，讲述着激动人心的故事。现在，他正在创作《李自成》的第五卷。从这部书的第三卷开始，他便采取了口述录音的办法，由他的助手将录音变成文字，最后他修改定稿。在创作第三卷时，他的录音提纲很简单，有时甚至没有提纲，对着录音机就说，说出来便成小说；抒情、写景、不同人物的对话，大致不差。从第五卷起，他开始变换办法，先在本子上写出详细提纲，然后口述录音。这样，写提纲就变成他的主要工作。往往夜深人静，一盏台灯之下，他戴上那幅深红色镜框的眼镜，用一根黄灿灿的铜尺压在厚厚的笔记本上，把另一根光亮沉重的浅绿色的大理石镇纸尺，放在三百字的稿纸上，伏案草拟提纲。窗外，冷月在天，万籁俱寂。但姚雪垠并不平静。他的感情正在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时而慷慨悲歌，时而老泪纵横，时而破涕为笑，时而兴奋异常……他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此刻正在神游于“金戈铁马”、“惊涛急奔”、“流水芳波”、“凤管鸪弦”……那种悲壮激烈的和令人心旷神怡的场面之中。他好象完全脱离了现实，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到创造的艺术世界。时间过去了多久，他根本不知道。到了清晨五点半钟，当桌上的闹钟响了，他才从艺术的王国中被惊醒过来。这时他伸展一下疲累的肢体，随即换上运动衣服，穿上布鞋，不惊动家人，悄悄地下楼去进行他的五十分钟的早晨长跑锻炼。六点半以前，他准时回到家。从六点半开始，他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一边开始吃早饭。

吃罢早饭，他往往要到卧室稍睡一会儿，然后才开始工作。整个上午，埋头进行创作。有时如果感到太累，就喝杯咖啡提提神，或是听听中国的传统音乐，来调节神经、恢复疲劳。

每天中午，姚雪垠必喝一杯白酒，而且常常用猪耳朵、凉拌白菜心、油炸花生米下酒。在生活方面，他没有过高的追求，饭菜都比较简单。他离开故乡至今，虽早已超过了半个世纪，但几十年来，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始终保持着河南人典型的饮食习惯，喜欢面食，尤其爱吃馒头，甚至几乎顿顿离不开。在一天之中，只有到了下午，姚雪垠的时间才有所松动，他自己也才有了一点小小的自由，高度紧张的大脑，才可以得到调节和短暂的休息。一般情况下，午休起来，他即转向读书学习，研究资料。

他喜欢书法，对古人的各种碑帖兴趣很大，他认为书法、绘画同写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下午他常常欣赏中国历代的名家书法和影印的古人碑帖。

1982年元旦姚雪垠在为一位书法家作的序言中，有一段曾这样写道：

“我不善写字，只是喜欢欣赏书法。不善写字是由于我苦无时间练习；

喜欢欣赏，是因为书法是一种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和文学虽然是不同领域的艺术，但是在美学道理上颇有共同之处。稍有暇时，或写文章疲倦时，我常常欣赏碑帖，一则休息一则欣赏艺术，提高审美修养。”

许多人都说姚雪垠是书法家，但他自己并不承认。尽管如此，慕名向他求字的确实大有人在。

重要的社会活动，姚雪垠是参加的，但他一般很少出门看朋友，甚至几乎不去看朋友。不过，对于必要的来访和来客，在下午三点以后，按照事先的约定，他总是在家里给予热情接待。

晚饭以后，劳累了一天的姚雪垠便不再工作，甚至连电视也不看。但在每天晚上八点以后上床休息时，他总要阅读和欣赏一阵诗词，然后才带着诗情画意，微笑入睡。

姚雪垠在他的“无止境斋”，就是这样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和生活着。为了创作《李自成》，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他总是这样顶着星星，迎来黎明，寸阴必争，奋发写作，不断向新的目标追求，不断向艺术的高峰攀登。

座右铭是人生自警、自策、自勉的诤友。许多人都将它置于案头，悬挂墙上……姚雪垠不仅把自己的座右铭时时记在心里，指导行动，而且经常在“无止境斋”用毛笔书写，赠送朋友，还向来访的记者解释它的含义。

“姚老，听说你有三个富有哲理、发人深醒的座右铭，”一天下午，一位来访的杂志记者在客厅向姚雪垠问道：“是否真有此事，可否向我们谈谈？”“我是有三个座右铭，而且多少年来，一直用它们来鞭策自己。”姚雪垠说完，从客厅走进他的‘无止境斋’，把他事先用毛笔写好的座右铭，一边拿给记者看，一边笑着说：“这虽然是我的发明，但并不保密。完全可以给你们谈。”“那就请姚老谈谈吧！”“耐得寂寞，勤学苦练。”姚雪垠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座右铭。”“耐得寂寞的目的是勤学苦练。”他解释道：“可是我们有许多研究学术的、搞创作的，吃亏就在于不能耐得寂寞，一生缺乏战略计划，缺乏很高的追求。为什么呢？总是怕别人忘记了他。由于耐不得寂寞，就不能深入地做学问，不能勤学苦练。”姚雪垠继续说：“前几年，我把这个座右铭书赠几位朋友，但他们来信说，这两句不太好理解。所以，后来我又将自己的这一座右铭增加了两句。把原来的叫做‘正文’，把后来增加的称为‘附言’。”“增加的两句是什么呢？”记者又问。“耐得寂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姚雪垠回答道。紧接着，他又对这两句作了说明：“一个人如果真能耐得寂寞，摆脱些社会活动，做出好的成绩来，不但全国人民忘不了他，后世也忘不了他。所以，耐得寂寞，才能不寂寞。但有的人今天开一个会，明天就有短文章发表，……其实他给人民群众没有留下更深的印象。所以，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您的第二个座右铭怎么说？”记者听完姚雪垠对第一个座右铭的解释后，接着又问道。

“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功，抓今天。”姚雪垠回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座右铭。”接着，他又解释道：“这就是说，人生在世，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要做历史的参加者、推动者。加强责任感，才有实现远大理想的决心。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点。打破条件论，不是不要条件；但是，条件不好，是不是要干，要工作呢？也要干，也要工作。”

“至于‘下苦功’，任何人不下苦功都搞不出成绩来。下苦功不是空谈，就是要‘抓今天’。”

“‘抓今天’。这三个字，虽然从道理上谁都知道，但真正严格实行并不容易。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同志提出一个计划，迟迟不实行。还说什么今年已经过去半年啦，从明年元月一日起，我再开始吧；或者说，这个月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从下月一日开始；或者从星期天开始。由于不能抓今天，他们纵然有好计划，都成了泡影。所以要切切实实地‘抓今天’。未来是由一个一个今天积累起来的，没有今天就不会有明天。所以，必须‘抓今天’。”

“那么，您的第三个座右铭是什么呢？”

“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姚雪垠回答说：“这是我的第三个座右铭。”

他解释道：“作为一个作家不要一看到别人出书了，得奖了，有名了，就羡慕，就着急，甚至眼红。因为人生就好象马拉松赛跑一样，未死之前，不能决定谁是冠亚军；即使人死了，他的作品还在，甚至由于各种因素，在若干年内，他的作品仍被捧得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检验，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会黯然失色。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总会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的评价。这就叫做死后马拉松。一个作家在死后马拉松运动中能否获胜？这完全取决于他在生前对作品所投入的劳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因此，大家一定不能只看眼前，而要想到长远。”

第三十七章第五卷的写作

姚雪垠构思和创作《李自成》第五卷，一般都在他的“无止境斋”进行，但有时碰上难题，也不免到有关地方去作实地考察。为了回答读者的关怀，他在1933年5月初，曾给在武汉整理录音的助手俞汝捷写信，专门谈《李自成》第五卷的一些构思和创作情况，并将信于5月11日在《文汇报》公开发表。

第五卷主要写李自成北伐，过黄河、奇大同、出雁门关、进逼北京……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崇祯吊死在煤山上。

第五卷是先从李自成进北京的单元口述录音的。这一单元的标题是《北京！北京》，紧接着一个单元是《成败存亡关头》，它是第五卷的一个重点单元，约占全卷字数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姚雪垠在给他助手的信中说：

“经常想给你写信，都因为小说提纲的构思正在紧要关头，早晨和上午不能不为解决一个故事情节而奋斗，到下午便精力不够，信也无心写，说不定还要应付客人。”

在谈到第五卷的构思情况时，姚雪垠这样写道：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的单元是《悲风为我从天来》。这个单元从多尔衮进北京写起，写到李自成退出西安为止。中间写袁妃在北京自尽，李岩兄弟被杀，红娘子逃上王屋山出家为尼，崇祯的太子被杀，刘子政被杀。这个单元中要写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写出李自成悲剧性格的深入发展，他的精神状态的一步步失去常态。但对于逃出北京后的庆都之战，谷可成阵亡，太原失守，潼关之役，退出西安时的狼狈，都用虚字，既可以节约许多篇幅、避免拖沓（长篇小说高潮过后之大忌），也可以在必要时运用抒情笔墨和创造悬念。”

姚雪垠在信中还说：

“《北京！北京》之前，打算只写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写李自成率大军渡黄河入晋，自禹门口附近向北进军，到处迎降。在进军途中，李自成命群臣赋诗。写到过太原，破宁武（杀掉周遇吉）和太原迎降为止。标题是《三晋云山皆北向》。第二单元写崇祯亡国前的情况，重大事件包括派李健泰出京督师，朝廷上的尖锐斗争是南逃之议和调吴三桂之议，二事错综写出。这一单元，大约三章就够了，要写出崇祯亡国前的浓厚悲剧气氛，甚至写出长陵（永乐皇陵）鬼影，太庙鬼哭，英华殿九莲菩萨叹声，虽然都是太监们的幻觉，却被认为是亡国之兆。这一单元的标题未定。至于《尾声》，仍然保留，将削减一部分。”

姚雪垠在动手写第五卷中的一个名叫《双星陨落》的单元时，感到困难重重，思路不清，难以下笔。因为这个单元，重点是写李自成的死，写二十六年来生活在姚雪垠笔下与心头的悲剧英雄的最后结局，但是他却没去李自成当年牺牲的地方作过实地考察。因此，对有些事情了解不深，把握不准。为此，他于1983年5月中旬走出北京的“无止境斋”，在16、17日到九宫山，深入调查研究了李自成死的准确日期，李自成死前死后的详细情况，以及那里的自然地理环境风貌。

为了写好第五卷，从此之后，他在三年中，又五次去九宫山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

九宫山在湖北通山县城南边九十公里处。海拔高度大致同庐山一样，最高的山峰为一千六百多米。338年前，英雄一世的李自成被清兵打败逃在返里，不幸于1645年阴历五月初二，牺牲在该山北麓的牛迹岭下，后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悲剧英雄，在这里为他修了坟墓，被尊为“闯王陵”。

姚雪垠来到这里，在一群最熟悉当地地理、掌故和人民口碑传说的同志陪同下，带着通山县文化馆平日为调查李自成之死而绘制的详细地图，实地踏勘了李自成临死前逃奔路线，随后到九宫山北麓的牛迹岭下，凭吊了李自成的坟墓，参观了李自成陈列室。

在此期间，他还考察了当地有关李自成的文献，访问了“知情”老人，看到了部分李自成的遗物，为通山县干部作了三个小时的关于李自成迅速失败原因的报告。

他风尘仆仆前来通山，满载收获后返回北京。这回考察，大大丰富了他的艺术构思，尤其是经过研究，将李自成牺牲的日子确立为五月初二，更使他高兴。为此，他回北京之后，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九宫山麓凭吊李自成墓》的长篇散文，记述他此次考察的收获和感受，发表在《文汇月刊》1993年第10期和第11期上。

之后，姚雪垠还给湖北通山李自成纪念馆写了一幅长长的对联，经当地雕刻家制成本匾悬挂在纪念馆的两根木柱上。这幅对联的上联是：

纵横半中国锐意北伐渡河入晋过太原
破燕京何其盛也终因人谋不臧山海关
大军喋血前功尽毁黄尘万里无归处惟
有英勇殉社稷

下联为：

苦战十七载铙羽南来离陕奔楚弃襄阳
败武昌亦云惨矣毕竟图讎难凭牛迹岭
巨星落地宏愿皆空青史千秋悲壮志何
曾怕死盾空门

姚雪垠在九宫山考察的时候，曾经听到一个这样关于李自成的故事：

据小源口一带人代代口碑相传，说李自成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人困马乏，既要躲避搜索的清兵；又要躲避乡勇，在一次紧急的时候，他牵着战马躲进了一个黄土洞。这黄土洞离水边不远，洞不很深，平时没有人进去，所以洞口一向被草木封闭，又有大蜘蛛在洞外挡路结网。幸而每年阴历五月初旬，通山县一带常有阵雨，本地人俗称“端阳水”。李自成牵马进洞之后，下了一阵大雨，冲去了沙滩上的马蹄行迹。太阳一照，洞口外被踏倒踏弯的草木又蓬勃地直了起来了。大蜘蛛趁着太阳好，小树的枝叶渐干，重新开始了辛勤的劳动，织补破网。当清兵搜索到这里时，看不见马蹄，向洞口一望，但见草本蒙茸，没有道路，而荒草上边，从左右两边的小树枝间结着蜘蛛网，一个大蜘蛛守候在网心，敌人判断，没有人走进洞中，勒转马头，向别处搜去。

类似这样的故事，姚雪垠在他的“无止境斋”写字台前，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都变成小说的语言，写进了第五卷里，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找到。

从1981年秋天在武汉东湖黄鹄湾构思并开始创作《李自成》第五卷，至1988年春天笔者完成《姚雪垠传》的初稿，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但是

姚雪垠仍未写完这部有七十万字的第五卷。其进度所以如此缓慢，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已大，精力不够，思路迟钝，而主要是因为他对小说艺术的要求较高，不敢稍有马虎草率。为此，姚雪垠感慨地说：

“写小说，达到出版的要求并不难，但是要达到某种艺术要求，被读者所承认，真不容易！”

第三十八章学者型小说家

凡读过《李自成》前三卷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感受：
不仅被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深深震撼心灵，而且为作者渊博的知识惊叹。
同时，在广大读者中还议论纷纷：

“作者姚雪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作者生活在今天，怎么把三百年前的斗争生活写得如此真切，而且涉及到的生活范围和知识领域又是那么广阔。上自皇帝、后妃、太监、朝臣、巡抚、总兵、知县，下至巫婆、绳技、铁匠、饥民，三教九流，无不绘声绘色，各显特异……他是怎么熟识那么许多人物的？”

有一次姚雪垠到故宫去参观，故宫有些读过《李自成》的工作人员当面问他：“我们在这儿工作多年，也不知道皇帝走路是从哪边门出哪边门进，你是怎么知道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多方面进行……

一位新闻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出：

应该说，姚雪垠现在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不仅写出了令人回肠荡气的长篇小说，而且能够引人入胜地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同时对明、清的历史有着极其深入的精辟研究，发表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和学术价值的论文；他还可以不带片纸只字，在国内外各种庄严隆重的场合，作重要学术报告，而且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几个小时，竟然能使听众全神贯注、鸦雀无声，甚至感动万分，痛哭失声……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他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写出小说、散文、诗词、史学论文、文学专题研究、创作理论、文艺评论和文艺书简等共达六百多万字。姚雪垠不仅是著名的小说作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一位评论家在一篇评论《李自成》的文章中说：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生活，有的是直接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有的是从各种史籍中获取的历史知识；有的是对前代作家作品的“借鉴”。它们都在作家的艺术创作的烘炉里，分解、融合，变成《李自成》的核糖核酸，变成他的形象的化学分子。他的基因，不是姚雪垠接触的某一生活现象，而是他全部生活和全部知识的总和。姚雪垠出生在民国初年，他经历了封建制度从我们生活中逐渐消退的整个时期，同时又熟知各种文学作品和史籍，许多东西都能逐一背诵。这给他创作《李自成》提供了别人不可能获得的有利条件。……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富的社会经历，形成他创作《李自成》的时候，不是在某一具体素材上裁剪，而是在他整个经历和知识的海洋中航行。所以，他写人物、山川、社会风尚……信笔挥洒，都如临其境，亲见其人……

姚雪垠自己说：

“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所努力追求的不是历史著作，而是艺术成果，即历史小说。

“在我看来，一个愿意争取较高成就的历史小说家应具有双重身分：既是小说作家，也是史学家。

“真正的历史小说家，应该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作为他的创作基础，然后继续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围绕着要写的历史题材，广泛地收集资料，认真研究那一定历史时代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人情、典章制度……种种知识。……

姚雪垠还强调：“创作与研究并进，两种努力，还只是‘落霞与孤鹜齐飞’；作家与学者混为一体，就是‘秋水共长天一色’，达到了较高境界。”

姚雪垠的这些话既是他创作实践和创作道路的总结，也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

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象辛勤的蜜蜂那样，为祖国，为人民，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酿造出《李自成》，酿造出芳香、甘甜、沁人心肺、使人感奋的艺术生活的蜜。

正因为这样，姚雪垠才被誉为“学者型的小说家”！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学者型的小说家”，在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吧。

姚雪垠是在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果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茅盾、丁玲等人，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作家，姚雪垠则是属于第二代的作家。

姚雪垠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感兴趣，并刻苦自学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当他19岁至21岁在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上学时，就读了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及其它通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关心中国社会史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立志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同时也希望自己在在中国文学史方面作出贡献。

后来因时局动荡，条件变化，生活所迫，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走上从事小说创作的道路，“著书只为稻粱谋”，靠卖文为生。尽管在创作的道路上充满艰难，可姚雪垠始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理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在创作之余，还一直坚持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努力积累这几方面的知识。

结果，姚雪垠经过几年的奋力拼搏，不仅写出了轰动全国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一举成名，步入文坛，崭露头角。而且在马列主义哲学、文艺理论，以及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知识，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了较高的修养，不仅读书较多，而且还能写出较有水平的诗、词和各种体裁的古文。

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姚雪垠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不仅在四川的三台、成都和上海等地的一批高等学校先后应聘担任副教授、教授，专门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原理，文学理论，以及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等课程，撰写了这些课程的讲义和许多有关的文章；而且还开始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并写出一批有关的历史论文，为后来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姚雪垠的这种从青年时代起就不肯将自己的道路局限在小说创作方面，而同时注重理论学习和提高学问修养的做法，终于使他实现了作家学者化的这一追求。

在创作《李自成》以前和至今的写作过程中，姚雪垠以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围绕着他要写的这一历史题材，进行研究，钩沉刊谬，前后耗了四十年的心血。为了深入历史，了解历史，他曾下功夫反复查阅和研究了明、清两代的各种正史、野史、杂记、史钞、地方志和明、清人的文集；搜集研

研究和考证了明代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考察了当时的风俗制度，宫廷和民间的生活，特别是着力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弄清了明末农民起义的整个历史形势。如今，人们可以看到，在姚雪垠的“无止境斋”，有两个资料柜。柜里分门别类装着各种各样有关明、清历史研究和写作《李自成》的卡片，总计有两万多张！它们在作家的手下，象一支整装待发的大军，随时听候着传命调遣，它们是姚雪垠在研究过程中一笔一画用蝇头小楷摘抄的，字迹工整至极。功夫之大，令人惊叹！姚雪垠的这些卡片，是从浩如烟海的大量材料里提炼出来的，谁知花费了多少辛劳和心血！姚雪垠说：

“抄写卡片，是前人行之有效的工作。实践证明，这是治学的一个很好的具体方法。在研究有关写作《李自成》史料的过程中，我自己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收益非浅，我建议一切有志于治学的人，也都来做卡片。”他说，做卡片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把大意记在卡片上，一个是抄录原书。我自己的经验是抄录原书。因为一个人对原书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读书的增多会有变化，而摘出大意往往未必正确，只有把原书、原句照抄下来，过若干年后，当你的认识发展了，再去看发现新的意义。如今，人们还可以看到，在姚雪垠的“无止境斋”，除卡片柜外，还专门设有放工具书的地方，一般工具书如《辞海》、《辞源》、《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人名地名辞典，以及有关哲学、历史、文学等专业方面的工具书，都应有尽有；在姚雪垠的写字台上，也放着一个小小的书架，上面摆着：《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诗词典语辞汇释》、《诗韵》、《白香词谱笺》……等等，在他读书或写作时，凡有拿不准的字或词，他都随时要去查字、词典等工具书。这是姚雪垠在长期研究历史、文学和写作《李自成》过程中，养成的一种习惯，形成的又一种治学方法。

姚雪垠说：“学习无止境，追求无止境，特别是对语言上的追求和锤炼，是我终生努力的一项工作。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身边都有字典等工具书相随，我随时都要查阅。”

他还强调，千万不要小看查字典等工具书，尤其是搞语言文学的人，更要养成这种习惯。这对减少语言词汇运用方面的毛病，提高语言艺术水平，都很有好处。

在研究明、清历史和写作《李自成》的四十多年间，姚雪垠还以史学家的身分，撰写了为数不少的有价值的历史论文。比如，早期的有：《论石敬瑭式的政权》、《明代的锦衣卫》、《明代的特务政治》、《崇祯皇帝传》等；近期的有：《李自成困于鱼腹山说辩谬》、《评 甲申三百年祭 》、《李自成为何失败》、《李自成的归宿问题》等。

在此期间，他还以学者的身分，写了《试论 儒林外史 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读 带经堂诗话 有感》等古典文学论文；以及《论当前的通俗文学》、《应当重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等有关现实方面的文学论文。

在此期间，他也以学者的身分，多次出席了有关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在报刊和电视上向读者和观众，多次介绍了他的治学经验。

事实说明，姚雪垠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者型的小说家”！

但对此，他并不满足，他决心要向更高的目标攀登。他说：

“历史小说家决不能自我满足于‘孤陋寡闻’的水平，而必须自觉地追求学者化，把自己培养成饱学之士。学无止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历史小说家追求博大精深的学者化，道路悠长，终身走不到头。”

第三十九章走向世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结束了过去那种尘封网闭的状况；同国际间的交往，呈现出一种奔腾向前、令人欣喜的新局面。

在这种和煦春风的吹拂下，姚雪垠先后出访了日本和法国等国，从亚洲走向欧洲，走向世界……

1979年的5月，69岁的姚雪垠同由周扬、欧阳山、杨沫、梁斌、冯牧、林绍纲和柯岩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前往日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在日期间，他们到东京、京都、奈良、仙台等七、八个地方进行了参观，同日本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座谈和各种活动。他们的访问，为加强和发展中日两国文艺界的联系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姚雪垠在访问日本京都和奈良期间，到风景如画的岚山龟山公园，去参拜并向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献花之后，于5月23日专程到奈良市唐招提寺瞻仰了鉴真和尚的脱胎彩漆像。

鉴真和尚对于发展日本封建文化，发展中日两个民族的友谊作出过卓越贡献。

鉴真和尚那种立志到日本传法，百折不挠，置生死于不顾，在双目失明之后偕徒弟们到达日本的精神，使姚雪垠非常敬佩。他在游奈良唐招提寺仰鉴真和尚像后，当天晚上作诗一首：

我爱奈良都市美，
水源山脉通长安。
风波九死高僧至，
尘劫三番宝像完。
两国名城成姐妹，
古今文化共斑斓。
感人最是传经愿，
沧海遥天不怕难。

在访问期间，姚雪垠还去法然院凭吊了日本河上肇先生的坟墓，而且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早在四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表年时，他就读了陈豹隐翻译的河上肇先生著的《经济学大纲》，使他初步知道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时，他虽没有资格评论河上肇在日本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但他的著作却给姚雪垠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至今不能遗忘。今天他来到这位启蒙者的面前，真是感慨万千。

5月26日，姚雪垠同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市川市参观郭沫若同志的旧居前，专门到日本小说家井上厦先生家中进行了访问。在井上厦先生家里，姚雪垠回答了新闻记者、报刊编辑，以及井上厦先生的太太提出的创作方面的有关问题。

“你们中国作家为什么不敢写爱情？不敢写色情？”井上厦先生的太太问道。

姚雪垠回答说：

“爱情和色情是有区别的。中国文学从来不排斥写爱情。在《诗经》中有很多写爱情的好诗，传诵至今。你们一定知道《西厢记》、《牡丹亭》、

《红楼梦》吧，都是写爱情的杰作。‘四人帮’不写爱情生活，如今他们已经被打倒，这个禁区当然也就不存在了。”“那色情呢？”这位太太又问。“我们要用文学教育人们，不提倡写色情，”“难道人们不想色情的事吗？”“人们心里想不想是一回事，作家要不要写是另一回事。”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市川市参观郭沫若旧居后，姚雪垠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为市长高桥国雄先生在册子上当即题诗一首：

敬怀郭夫子，驱车来市川。
感谢贤市长，相迎须和田。
导我吊遗踪，诗碑献花鲜。
复至旧居所，小院稍盘桓。
脱鞋进屋内，旧居幸保全。
市长娓娓语，往事赖口传。
郭老二三事，浮现在眼前。
殷勤献茶点，闲话更流连。
中日两好意，高如富士山。
大家敬郭老，情寄屋数椽。
郭老居此处，前后共十年。
著作何辉煌，才华似涌泉。

郭老郭第不可见，事业长留天地间！姚雪垠通过这次对日本短暂的访问，既开阔了视野，又学到了新的知识，既同日本作家交流了经验，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又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同时也使他的长篇巨著《李自成》在日本文坛扩大了影响。

这次访问之后不久，他在访问时结识的日本作家、翻译家陈舜臣、陈谦臣，即开始将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翻译成日文，并于1982年10月由日本讲谈出版社在东京出版，同日本读者见面。

《李自成》第一卷的日文译本，书名叫《叛旗》，发行两万多册，这在日本文艺翻译书籍中，已属销路很好；而且该书的翻译家和出版家还分别获得了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1983年颁发的翻译奖和文化奖。《朝日新闻》、《神户新闻》等许多报纸还作了显著报道。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也随之闻名日本。

1984年10月26日，姚雪垠从北京飞往欧洲。

次日，他乘坐的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降落，开始了在法国为期两周的访问。

姚雪垠这次应邀访问法国，意在参加马资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和名作家卖书签名仪式活动。

他为什么会受到法方的单独邀请呢？

主要是因为长篇小说《长夜》。

姚雪垠四十年代所写的《长夜》，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之后，很快就引起了法国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和他的夫人雅克琳·阿雷扎依思的注意。他们两位是中文本《红楼梦》的法文译者，是法国现在为数很少的高水平翻译家。他们夫妇仔细读过《长夜》以后，又经过认真研究，便决定将《长夜》译成法文，并同法国巴黎的弗拉马利翁出版社商定，作品译完以后，由

他们出版发行。结果，《长夜》法译本，1984年1月在巴黎出版，同法国读者见面。

《长夜》在法国翻译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同时有不少报刊进行评论。比如，巴黎《读书》杂志1984年5月12日，发表了罗日·壮蒙的一篇评论文章，称“《长夜》是一部最写实而惊险的小说。”还如，巴黎《革命》半月刊、法国《世界报》以及巴黎《文学半月刊》等大型报刊都发表了评介文章，赞扬“《长夜》是一部历史性、真实性很强的书，真正反映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风貌”。

因此，法国著名女作家、龚古尔学院院士、玫瑰节世界名作家聚会活动的组织人德菲尔夫人就决定：把介绍姚雪垠的《长夜》，请他在书籍发行仪式上签名售书，与法国读者见面，作为1934年法国马赛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在会议期间，还要请姚雪垠接受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为此，法国特邀请姚雪垠，以著名作家身分，单独赴法进行访问。

这是姚雪垠从来没有想到的一种殊荣，因为《长夜》仅仅是他青年时期的一部优秀作品，并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是《李自成》。《李自成》好比一座高山，而《长夜》只是高山下的一个土丘，但它在法国竟引起了如此的重视。

姚雪垠走下弦梯，笑容可掬的德菲尔夫人等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姚先生，一路辛苦了，热烈欢迎你来法访问！”

“我能来贵国访问，很感荣幸！”

“姚先生，”在由机场去宾馆的路上，德菲尔夫人在汽车上向姚雪垠说：“我愉快地通知您：您在法国访问期间的一切用费，将全部由我们支付，祝你访法成功！”

“谢谢你们的招待。”姚雪垠尽管感到有些意外，但还是很有礼节地说。因为他原来接到通知，在巴黎3天，马赛2天，由法方负责，其余在法国的费用由中国开支。现在对方全包下来了，他想，一定是法方改变了原来计划，提高了接待规格。姚雪垠在法国期间，先后访问了巴黎和马赛等地。马赛是法国东南部的著名城市，是全国的第一大海港，也是罗纳河口省省会。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就产生于此。这里交通方便，气候宜人，景色秀丽，是人们度假、游览时理想胜地。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在他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中，曾经着力描写的令人无法忘怀的伊夫岛上阴森的伊夫堡监狱，就在这里老港外面的地中海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赛城就是以大仲马的这部小说而闻名于全世界的。如今，这里早已不再可怕了，游人只要登上伊夫岛古堡，极目眺望：象绸缎一样平滑的水天一色的地中海，矗立在红砖彩瓦之中的城区的高楼广厦，还有市区那圣母院教堂塔顶上的高达10米的“守护神”像，便尽收眼底，使你感到马赛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色彩……

1984年的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和名作家卖书签名仪式，就定于11月3日至4日在这里举行。

姚雪垠先期于10月31日从巴黎来到马赛。他被作为贵宾，在这里受到热情而隆重的接待。东道主不仅把他安排在濒临海边，景色秀丽的欧洲最驰名的旅馆——共和国旅馆下榻，而且每天有专人陪同参观游览，午、晚餐是高级官员宴请。11月之日法国国务部长兼马赛市长德非尔及其夫人，还专门设晚宴，单独为姚雪垠洗尘。

玫瑰节的活动丰富多彩。有政治活动，有教育方面的专题讨论，有世界名作家会晤和卖书签名仪式……11月3日晚上，为庆祝玫瑰节开幕，法国国务部长兼马赛市长德菲尔先生在海上浮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莅会的七十多位名作家。姚雪垠被邀请在主宾席上。

在11月3日下午举行的名作家售书签名活动中，姚雪垠的法文本《长夜》大受欢迎，很快被抢购一空。因当时来不及从巴黎把书运到马赛，所以在次日出版社只好采取先收款后发书，同时由姚雪垠在白纸上签名、盖章，交给购书读者的变通办法。

“物以稀为贵，物以缺更贵”。结果，在4日下午竟形成了高潮，到姚雪垠面前购书签名的读者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人龙，法国国务部长兼马赛市市长、副市长、总统府秘书长、社会党总书记、共和国教育部氏、社会党南方地区领导人以及其他在玛赛的显要人物，也都来到姚雪垠的面前观看，有的还要求签字。当姚雪垠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柔斯班先生在纸上题了：“为着世界和平，加强中法友谊！”这句话后，柔斯班十分高兴，立即又拿出他昨天买的《长夜》，要姚雪垠将这句话给他写在《长夜》的扉页上。各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见此热闹场面，蜂拥而至，前来采访，抢拍镜头……

签名活动结束后，主持人德菲尔夫人向姚雪垠表示热烈祝贺，并激动地说：

“作家签名活动，从来没有象您这样成功的！”

一点不错，姚雪垠的《长夜》不仅轰动了法国，而且在玫瑰节活动中销售量最大，成了法国的畅销书。

为此，11月5日上午，在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建筑的马赛市政府，市长德菲尔先生，把他们只授予来到马赛的外国元首或卓有贡献的世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马赛市纪念勋章”，隆重地授予了姚雪垠。马赛玫瑰节活动结束后，姚雪垠满载着荣誉和成功，又飞回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巴黎继续访问。在巴黎期间，姚雪垠应邀到巴黎中国学院，向部分汉学家作了题为《新体裁的历史小说》的演讲。他用有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演讲，引起了法国汉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竟将原定讲演45分钟的时间，超过一倍还多。在巴黎期间，姚雪垠还参观了他久已向往的许多世界闻名的历史遗迹和艺术建筑。比如，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和凡尔赛宫。游览了关丽的富有诗意的塞纳河，凭吊了巴黎公社墙……那瑰丽的艺术，优美的风景，英雄的业绩，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巴黎访问期间，还有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那就是他同法国密特朗总统的交往和友情。姚雪垠一到巴黎，就送给密特朗总统一本法译本《长夜》，还有已经裱好的上面写有“政治树高勋，文章作名家。”的一张条幅。并附有一封短信：密特朗总统阁下：1980年秋，您以法国社会党主席身分应邀访问北京，下榻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四位著名作家和一位著名画家。我荣幸地是您会见的作家之一。现在我应邀来法国出席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特借此机会，将我的小说《长夜》法译本一册和亲笔书写的字幅一张，赠送给您，作为一位中国作家对您并对伟大的法兰西人民表示敬意。

祝您健康长寿！

姚雪垠

1984年10月30日于巴黎

10月31日上午，密特朗总统一收到姚雪垠的礼物和信件，当即就将信

件让人译成法文，朗读给正在参加内阁会议的人员听，并与他的阁僚们一起高兴地欣赏姚雪垠赠他的条幅。

过了几天，姚雪垠就在巴黎收到了密特朗总统给他的法文复信：亲爱的姚先生：

我和我的夫人对您给我们寄来的您的作品法文译本表示感谢，对您的亲切题词，我们尤表感谢。

虽然我们不懂中文，您的信需要译者翻译，但您的书法之美使我们大饱眼福。

我希望您的这次法国之行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您能看到对您的热情款待，正如我每次去贵国访问所受到的热情款待一样。

祝愿您的《长夜》在法国获得成功。

亲爱的姚先生，请接受我的衷心敬意。

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1984年11月6日于巴黎

真是无巧不成书。当姚雪垠11月8日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由巴黎飞返北京时，密特朗总统的夫人正好同机前来中国进行访问。而且这位总统夫人还派他的随员，专门在飞机上找到姚雪垠，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

“总统夫人定于11月11日上午，在北京四川饭店宴请几位著名作家和学者，请你务必参加。请柬已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发出，你一回到北京即可收到。”

姚雪垠回到北京后，应邀到四川饭店出席了密特朗总统夫人的宴会。

姚雪垠访问法国期间，在巴黎和马赛，除接受法国国家电台文化台、马赛地方电台、法国电视三台、马赛地方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外，还先后接受了法国《世界报》、《人道周报》、《欧洲时报》和美国《环球画报》等八家法国和美国报刊记者的访问。就在他访问期间，在法国报纸上总是不断刊有关于他的访问记、新闻照片以及评介《长夜》的文章。《李自成》虽未译成法文，但在法国却有许多人知道这部巨著，所以记者采访姚雪垠时，大都问到该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并在行文中作了报道。正如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所评价的那样：姚雪垠这次对法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

通过这次访问中新闻媒介的传播，姚雪垠逐渐闻名于世界，在这之后不久，他已作为世界名人，被列入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在这部世界名人录有关姚雪垠的条目中称赞他的《长夜》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杰作。

第四十章星岛之行

姚雪垠欧洲之行后不到两个月，就又一次风尘仆仆地出国了。

1985年1月3日，他由北京飞往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在绿意盎然的狮岛，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新加坡市位于新加坡岛的南端，全市人口近二百万，其中华人约占四分之三。这里，椰雨蕉风，景色宜人，市容整洁，拥有二千多种高等植物和一百五十种羊齿植物，植物种属的丰富超过面积比它大得多的英国，被誉为“美丽的花园城市”和东南亚的“卫生模范”。姚雪垠这次是以中国大陆作家的个人身分，应邀来参加新加坡《南华早报》等部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和金狮文学将颁奖大会的。与他同来的中国大陆作家还有秦牧、肖乾等。

出席这次新加坡规模宏大的文坛盛会的还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另外六位华文作家。他们中有美国的刘绍铭、张系国，台湾的痖弦、三毛，香港的余光中、钟铃；也有来自马来西亚两大华文报纸的代表等。

在新加坡期间，姚雪垠不仅同海外的华文作家相互交流了经验，参加了各种座谈会，小说组的评审和发奖工作；而且还于1月6日在阿波罗酒店，以《历史小说与历史》为题，向大会作了专题演讲。

在演讲中，他虽然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但一百多名出席者却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

姚雪垠最后还结合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实际，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新加坡的华文小说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内容都很好，缺点就出在艺术上的不完善。他希望新加坡的华文作家应该在自我修养方面，继续努力，在艺术性的提高方面，寻求突破。

在整个演讲中，他结合自己创作《李自成》的实践，既讲理论，又讲经验，而且讲的深入浅出，趣味横生，极大地吸引了在场的听众。他演讲之后，新加坡和香港的几家中文报纸都作了报道。他的演讲更给新加坡的新闻界和文艺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新加坡《联合晚报》的一位记者在《给十位外地作家颁奖》的报道中说：“姚雪垠75岁，但神采奕奕，声如洪钟，越说越兴奋，越讲越激动。”应该颁发他“最佳精神奖”。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作家印象”的文艺专栏中，一位名叫小茂的新加坡诗人写到姚雪垠时，作了这样的描述：

撼天的浪头是
您口中的历史
滚滚翻腾
翻腾的浪头
有醉人的文艺雪花
有生命写成的
苦尽甘来
有岁月耕耘的笔痕
还有风涌
雨驰

日炎
月柔
的激情
河南来的浪头
敲响狮城的河道
浪头涌着水珠
水珠依着浪头
舞虹

在浩瀚艺海的胸膛这次新加坡之行，最令姚雪垠难忘的，是同台湾女作家三毛的交往和情谊。那是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闭幕后的一天。新加坡东道主：1月8日晚7点在世界商业中心俱乐部，为外地来的华文作家举行欢送宴会。柔和的灯光洒满了宴会大厅，流连之情悄悄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席间，大家自由用餐，亲切交谈，唯独从台湾来的三毛显得有些并常。三毛女士，原名陈平，时年40岁，为台湾著名女作家，以文笔富于机智与风趣而著称。她喜欢旅行，曾与丈夫西班牙人荷西旅居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中前后约三年。她很有生活，富有感情。也很有正义感，至今已写了十几本书，在海外读者很多，影响很大。近几年，她的作品也逐渐传入中国大陆，引起了青年读者的注意。她的充满异域风光和生活情趣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曾风靡宝岛和海外；她的倾诉情怀的歌曲《橄榄树》，更在台湾和大陆广为流传。

这位勇敢的女性，今晚穿一件浅色泡袖衫，一条深色裙，波浪状的头发披在肩上，手里紧抱着一个装会议文件的纸袋，坐在桌子一边，两只杏核眼似乎有点发呆，好象在想什么心事。

大约9点钟，宴会将要结束时，姚雪垠走到三毛身边，轻声问道：

“你明天几点钟飞回台北？”

没想到这一句话使三毛动了感情，她忽然站起来，扑到姚雪垠的胸前，小声哽咽说：

“姚先生，您亲亲我！”姚雪垠带着亲切的微笑抱住三毛，在她的两颊上各亲了一下。

这时三毛哭了起来，哽咽着对姚雪垠说：

“中国大陆也是我的祖国，是我的父母之邦，至今我却没有能够回去看看……”

姚雪垠听后，顿时收敛了笑容，严肃认真地说：“三毛，别难过了。你什么时候想回大陆去看看，我就什么时候请中国作家协会对你发出邀请。”

“我虽然想回大陆看看，可是台湾不会同意……”三毛用微微打颤的低声对姚雪垠说；而且说完，便热泪奔涌，更加失声地痛哭起来。

这一哭，将全场的主客都惊呆了。刹那间，大家都停止了谈话，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了三毛和姚雪垠的身上。三毛仍然紧靠在姚雪垠的胸前，姚雪垠仍然紧抱着三毛，谁都一动也不动。还是新闻记者反映快，他们忽然明白了是怎么一会事儿，于是所有照像机几乎都同时举起来，对着三毛和姚雪垠。三毛不愿意记者们拍摄她正在痛哭时的像，赶忙用手中拿看的装文件的大纸袋遮起了下脸孔。姚雪垠这时激动地大声说：

“三毛，这是民族的眼目，崇高的眼泪！不要遮起脸孔，赶快取下纸袋，

让大家拍照吧！”

三毛听后，果然把纸袋取下，让大家抢拍了她的“痛洒炎黄泪”的珍贵照片。

宴会结束后，在返回他们下榻的阿波罗酒店的汽车上，姚雪垠同坐在一起的三毛说：

“明早我给你写几句话，你带回去作个纪念吧！”

“您年纪大了，这几天太劳累，明早还是多睡一会儿，不要写吧！”三毛体谅地低声说。

但是姚雪垠并没有听从三毛的劝告。

次日凌晨，他三点多起来，首先在水印宣纸信笺上写下了改唐人王勃诗句一字的两句诗赠三毛：

“海外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写完后，姚雪垠又想起三毛那纯真善感的浪漫气质，便再题一首他的旧作七绝送三毛：

浪漫精神是耶非，
梦乘彩笔九霄飞。
云霞绮丽复奇伟，
随意采来补我衣。

全部写好之后，姚雪垠把字叠好，连同给三毛的短信一起装入信封，轻手轻脚地从门下边塞进三毛的房间，生怕把正在熟睡了三毛惊醒。

早饭后，姚雪垠因事外出。当他十点多钟返回阿波罗酒店时，在大门口恰好碰上三毛去机场，飞回台湾。三毛赶忙跑过来辞别，并紧挨着姚雪垠再合一影。

姚雪垠以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三毛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发现地上有一封三毛留给他的信。他打开一看，这并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三毛用血和着泪写的一首散文诗：姚先生：

不会忘记昨日分别时流下的眼泪，但愿今生今世能够再见。

数日相处，一刹永恒。

谢谢赐字，一定永远不会丢掉，而且珍存。

明日彼此便是天涯了。比邻同胞，血胜于水。请多保重。旅途劳累，回家好好休息。

晚辈

三毛

敬上

在三毛飞回台北的第二天，即1985年1月10日，姚雪垠由新加坡飞到香港，应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之邀，在香港停留一周，进行参观访问。

姚雪垠在香港会见文艺、新闻、出版界朋友，和接受各报记者采访时，曾三次谈起他与三毛的这段忘年之谊，而且每次谈起，他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有一次，当着众多的人士，他竟然哽咽起来。他说：“我很遗憾，没有亲自

送三毛上回台湾的车。当时眼见她离去，心情沉重未能想起，我本应该送她上车的。”

他还进一步感慨地说：

“民族感情是永恒的，我们国家的分裂只是暂时现象，祖国大地终久是会连成一块的，中国人终究是要走到一起的。不管台湾、大陆的作品，只要写得好，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我愿以老作家资格邀请台湾作家回大陆看看，不谈政治，只看祖国河山的壮丽：假如他们不愿去，我愿他们邀请我到台湾去”……

姚雪垠在新加坡巧遇台湾作家三毛，同三毛的交往和情谊，通过香港的许多报纸，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的照片和文字报道，很快就在海内外流传开来，并且感动了众多的读者，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

是的，天地悠悠，民族之情永存！哪有骨肉同胞永远分离之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可以预言，台湾同胞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定为期不远！

三毛女士和姚雪垠也将一定还会再次见面……

姚雪垠自星岛回到北京以后，为了永远怀念他与台湾作家三毛女士这一段的交往，特在 1985 年 2 月 4 日作诗一首：

星岛初亲才女面，
台湾喜见出琼英。
一支彩笔横机趣，
万里青春任旅行。大漠荒凉留旧影，
神州壮丽负平生。
忽然痛洒炎黄泪，
碧海苍山无限情。

第四十一章 诀别叶圣陶

1988年2月29日下午，撕裂人心的哀乐，伴着号啕与抽泣的哭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回旋……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送的花圈和花环，摆放在灵堂内外；佩戴卜花的长长的人流，在缓缓地向静卧礼堂中央鲜花翠柏丛中的叶圣陶先生的遗体鞠躬致哀，向这最后一位五四文学运动的元老挥泪诀别。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同作家协会顾问。他于1894年10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贫民家庭；1988年2月16日走完了他人生九十四年的最后旅程，于北京逝世。

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力发展人民教育和出版事业，为巩固川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以他的精神、道德、作品、事业、言行，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教师、编辑出版工作者。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举世公认的一代师表。他的光辉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

在向叶圣陶遗体告别的人流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首都各界知名人士，也订他曾经花费心血培养和帮助过的作家……

78岁的姚雪垠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姚雪垠随着人流走到叶老的身旁，看着叶老慈祥可敬的面容，浓重雪白的双眉时，不禁失声痛哭。他深深地向叶圣陶先生的遗体三鞠躬，向他尊敬的师长和朋友挥泪告别……

姚雪垠从八宝山回到家以后，心潮了直难以平静，他胡乱地吃过晚饭，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挂在墙上的叶圣陶给他填的那首“高际台”出神。看着，看着，好象那条幅上的一行行、一个个的毛笔字，渐渐地变成了叶圣陶的音容笑貌……四十多年来，叶圣陶对他的帮助、指导，他同叶圣陶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就同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早在二十年代，姚雪垠在上初中的时候，就从课本上读到了叶圣陶写的短篇小说《隔膜》。之后，他又读了叶圣陶的许多作品。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著名作家非常敬仰和崇拜。到抗日战争末期，姚雪垠由青年跨入中年人生的关键时刻，由在创作道路上探索的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紧要关头，叶圣陶先生更直接给予他有力的关系到他一生创作道路的重要帮助和指导。

那是1945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年方三十五岁的姚雪垠，刚由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来成都度假。成都东方书社经理为了向一些著名作家约稿，在他们的书社请客，姚雪垠也应邀参加。在这里姚雪垠遇到了久居成都的著名作家叶圣陶。

在此之前，姚雪垠一直在酝酿小说《长夜》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动手写作。

这天晚上尽管天气十分闷热，比他年长16岁的叶圣陶在散席后并没有马上离开。“你近来又在准备写什么东西？”叶圣陶来到姚雪垠身边坐下后，亲切地询问道：“能否把打算同我谈谈？”

“我正在酝酿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长夜》，考虑已久，但始终没有

下决心动手写作，现在思想上很苦恼，本来这次未成成就计划去找先生指教，今天在此遇到了你，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姚雪垠非常兴奋他说。接着，姚雪垠一口气向叶圣陶讲了两个多小时，才把《长夜》的主要故事梗概谈完。

“叶圣陶先生，你说这样的题材可不可以写？”姚雪垠诚恳地问道：“情给予指导，我心中实在没有把握。”

“你的题材和故事都很好，我听着、听着就被完全吸引了。”叶圣陶说，“请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动手写吧，我相信你一定会写成肆的！”

“谢谢你的帮助和鼓励。”姚雪垠说：“我很快就动手写作。”

由于叶圣陶的鼓励和指导，从这天晚上起，姚雪垠终于最后下了决心，进行《长夜》的写作；这样才使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两年后问世，三十多年后重印，1984年又被翻译成法文，轰动了巴黎和法国……而且《长夜》的写作，还为以后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了准备。叶圣陶的帮助和指导，使姚雪垠终生难忘。他在1947年3月写的《长夜》后记中说：“……当时叶圣陶先生曾劝我把它（指《长夜》）写出。从这天晚上起，我才有写的决心。若没有这次闲谈，也许这故事会永远放在心里，等将来埋在土里，永远也写不出来。”当时间距此过了二十九年之后，姚雪垠于1974年7月初在武汉接到了叶圣陶6月28日给他的信和照片。他在反复观看照片之后，又兴奋地看信。“何日晤面未可料，俾兄知我近时之状貌。此帧摄于1971年6月初，其地为香山公园。今相距三年，而大体尚如是，无大差异也。”姚雪垠看完信和照片后，当即作了一首：《奉寄叶老圣陶》的诗。

拄杖青山意态间，
似听绿叶隐鸣蝉。
须眉已满昆仑雪，
笔墨曾笼玉垒烟。
朴素文章秋水净，
清新词句露殊日。
至今后学头亦白，
难忘瑶华哺稚年。

1974年7月2日

当姚雪垠将诗和自己的半身照片寄给叶老后，很快使得到叶圣陶的回复与鼓励：

奋笔雄怀，
论文妙绪，
好音数度欣承。
酝酿长篇，
夏冬无间神凝。
闯王始未完编日，
待赈书天国金陵。
选题材，
惟欲攻坚，
功功能胜。
影中白头犹方壮，

看炯然双眼，
英气眉枝！
想望勤劳，
耽闲吾愧填膺。
汉皋京市殊非远，
盼甚时把晤良朋。
定相将，
叙昔谈今，
意兴云蒸。

以香山小憩照片，赠雪垠先生，承题一律并贻半身小影，览之喜极，口填高阳台一首，以为酬答印斋

正之

1974年7月叶圣陶

姚雪垠得到叶圣陶的高阳台后，无比喜悦，很快就让人义裱出来，悬什客厅。如今，时间距那时又过了十四年，叶圣陶先生已与世长辞，后学姚垠从八宝山挥泪诀别叶老回到家中，观看此词，见物思人，好不伤痛。在十年功乱之中，从1974年开始，姚雪垠同叶圣陶中断联系多年以后，又相互频繁地通起信来。这时的叶圣陶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而且有一个眼睛的视力又非常不好，但当他从信中得知姚雪垠已经写完了《李自成》第二卷，并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指教时，他还是仔细看了原稿，并对稿子提出意见。在1977年9月25日回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稿中运用现代词语，尚觉颇多。我意作者叙述部分，自不妨运用现代词语，而凡在引号之内当事人之说话，则最好尽可能避免现代词语。即如我此处所用‘可能，即为现代词语，其来源系翻译书籍，若令明末之人说之，虽非大谬，亦为小疵。未知兄于此点持何意见。若以为鄙意可采，则通体寻检，其事亦其繁也。……”

对叶圣陶所提的意见，姚雪垠在修改时，经过消化、思考都予以吸收。

事实说明，《李自成》的第二卷以及各卷，不仅包含着矛盾的许多心血，而且也渗透着叶圣陶的辛勤汗水……

姚雪垠真是有幸，他的大作竟然得天独厚地受到了我国五四文学运动巨匠和元老的匡扶与指正。

在姚雪垠和叶圣陶的交往中，有时他们还相互把各自写的诗给对方，彼此交流思想，交流感情，交流情况，互相鼓励，互相促进。

比如，有一次姚雪垠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寄呈叶老，叶圣陶则回信说：

“于大诗未能奉和，敢钞七一年夏间所作题为《偶成》之一律以为报，并希教之。

三百篇前早有诗，
三百篇后太繁孳。
陈言莫蹈良难必，
创获方案宁易期？
当境洽情诗更好，
斟唐酌宋我胡为？

工夫诗外放翁句，

八十余龄始得之又如，1974年9月姚雪垠将他写的五首《咏史》七律，寄给叶圣陶，敬请赐正。这五首中的最后一首为· ”

启蒙一代凭群力，
胜业千秋各自传。
海外有心研旧著，
人间无意忘前贤。
笑容常记巴山日。
瑶函频来京国天。
白首多惭负厚望，

疏星凝眺独悄然。姚雪垠并在信中对叶圣陶说：因为“第五首有‘海外有心研旧著，一句，我顺便告诉你一个故事。去年5月在武汉市文艺座谈会期间，华中师范学院讲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青年教师李鸿然同志对我说，武汉几个大学中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们都不知道除鲁迅外，对其他‘五四’老作家应该如何讲授。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组去外地‘取经’，到了北京大学，北大新文学史教研组的同志们告诉他们说，罗马尼亚有人：要研究叶老的小说，前年来我国访问，特意到北大访问新文学史教研组，问我国对叶老小说研究的情况。北大的同志们只好回答说对‘五四，作家除鲁迅外，都没有顾得上研究。我相信，这种研究工作，迟早会提到日程上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借群策群力推动起来，并缔造了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有贡献的前辈们，后来行是不会忘记的。历史永远是前后继承的，不管后未有多少发展，必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发展出来。”

——1975年12月12日，姚雪垠在武汉给叶圣陶写信，告诉他要来北京住相当长一段时间，修改《李自成》第二卷。

叶圣陶得信后即刻回复——

雪垠吾兄惠鉴：

台驾将来京，闻之已久，屡次打听，未得确信。顷接12口赐中，言下旬到京，且留居较久。喜跃之情，不言可知。承示两点经验，系从切实践履中来，我自以较能领会。

今后构思执笔之余，至盼随时惠临，倾谈种种。小酌数杯。无妨频数，实力上娱，自属深冀。匆匆作复，藉表欢迎。

即请大安

弟叶圣陶上

1975年12月14日夜

当姚雪垠在1975年12月21日来到北京三天以后，叶圣陶即在他北京东四八条的住处为姚雪垠专设家宴欢迎，他们多年未见，兴奋异常，边喝边次，无比欢欣。同姚雪垠前来赴宴的，还有《李自成》第一卷责任编辑江晓天，出席作陪的是叶老的长于叶至善夫妇。

席间笑风生，好不热闹。姚雪垠一边吃着鲜美可口江苏风味菜肴，一边高兴他说：

“叶老，我多年以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苏州菜了。今天，真使我大

饱口福。”他仔细品尝了一口松鼠桂鱼之后，接着道，“你年事已如此之高，眼力又不好，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阅读我的原稿，并认真提出宝贵意见，实在使我感动。现在让我敬你一杯，祝你健康长寿！”

叶老虽已八十一岁高龄，但仍举杯一饮而尽。让儿媳再斟满一杯后，兴奋地对姚雪垠：

“今天我们能在此开怀畅饮，倾谈种种，实力甚丰。我衷心祝你的大作早日完成！请再干一杯！”

家宴结束以后，叶圣陶感到仍未尽兴，同姚雪垠交谈时的种种情景，总在他的脑际浮现。12月27日，他感情沸腾，不能自禁，当即填词一首，然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在宣纸上。

雪垠兄到京数日后即惠访，谈叙甚欢。作水调歌头为赠：

为别亦云久，
共饮又灯前。
眉棱炯眼端相，
气壮更神全。
今夕滔滔汨汨，
平日孜孜吃吃，
环注写长篇。
环注写长篇。
大顺兴衰迹，
胸次沸奔泉！
立场工，
观点确，
今古坚。
听君斯旨综要，
如握颌珠然。
反复熔裁想象，
赅续周稽博汀，
悉力事精研。
复自定程限，
完稿入零年。

姚雪垠出望外，获词后当即仔细阅读了几遍，然后喃喃他说：“叶人过奖了，实在不敢当！后学定把叶老对我的评价，作为鼓励，不断努力！”之后，姚雪垠就把叶老给他的这第二首词也装裱好，挂在书斋，直到如今。1977年夏天，姚雪垠为了给《李白成》后三卷的创作搜集资料，曾去沈阳、锦州、秦皇岛等地，参观、考察清故宫和松山战役、山海关大战的遗址。回京后，他把此行的情况和收获，写信详细告诉了叶圣陶。叶圣陶阅后提笔回信：雪垠吾兄赐鉴：

雪垠吾兄赐鉴：

顷接手书，悉东北之行大有收获。我于明清之际史实可谓殊无所知，兄既亲采材料，将融入小说，则切盼以下三部早出，于中受教矣。

左目仍不能用，写此信凭右目，潦草不恭为歉。即候著安

圣陶上

1977年9月16日

在此后，从1978年2月到1988年2月的十年期间，姚雪垠由武汉迁到北京居住，并且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叶圣陶则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第六届的副主席。他们之间除过书来信往，互相交流之外，在每年政协召开会议期间，见了面便亲切交谈……

而今，叶圣陶走了，永远也看不到了。

姚雪垠怎能不哀伤？怎能不思念呢？

尾声

第四十二章 任重道远

进入 1988 年，姚雪垠已经在人生的旅程中，走过了七十八个年头。如果从他 19 岁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算起，至今已有六十年的时间。要是按他 1938 年轰动文坛的成名作《差半车麦秸》计算，至今他登上文坛也笔耕了整整半个世纪。

他确实老了。他已成为我国文学界和作家队伍中著名的老前辈。

1986 年 5 月，湖北省将姚雪垠、徐迟、碧野尊为“三老”，为他们举行了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五十周年的纪念大会，还拍摄了宣传表彰他们创作道路和创作成就的新闻电影记录片。为此，姚雪垠于 1986 年 5 月 7 日在武汉东湖翠柳村曾灯下咏怀：

江城盛会尊三老，
捡点平生怀愧心。
欲探驱珠空素愿，
遥瞻星斗费沉吟。
灯前自发思犹壮。
笔下青春梦转深。
万里风波付稗史，
百年音乐满胸襟。

可是姚雪垠却人老心不老。

别看他的须眉和头发银光闪闪，可是他还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有着象青年人一样的进取精神！

他是“岁老根弥壮”。

时代的责任感，历史的重大使命，使他“老来有愿多悲壮。似人豪情暗自燃”。使他“舞剑仍来残月处，挥戈惯趁夕阳斜”。

他觉得自己的事业远远未尽，任务非常艰巨繁重，道路相当漫长遥远……

现在，在姚雪垠的面前，至少还摆着三项任务，需要他来完：而每一项，简直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大山，要攀登到它的顶峰，要征服它，都需要他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至今才完成了前三卷；第五卷现在虽已写完了初稿，但仍需一年以上时间的修改才能出版；五卷同读者见面后，他再回过头来创作第四卷。这该需要多少精力和时间啊！

目前的《李自成》还不是定稿，俟五卷本全书出齐之后，他还决心对将近四百万字的全书进行修订一遍，作力最后定稿出版。为了便于读者分卷购买，选卷阅读，陆续买齐收藏，姚雪垠计划最后定稿本的《李自成》共分十二卷，每卷一个书名，结构上可以独立，下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弟某某卷”。合十二卷成为《李自成》全部。这样处理，并不损害整个结构的完整。除普通的平装本外，定稿本的《李自成》还将出豪华版。要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艺术作品，要完成这部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宏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最早也只能在九十年代初期。对此姚雪垠坚信不移。他说：作家的一生应该是始终为社会服务的，应该留给后人一点永久性的纪念！”亲爱的

读者，请想一想，姚雪垠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走多远的路程，经受多少艰难，付出何等的心血？姚雪垠在五十年代原有的三个有关历史题材的创作计划，除写《李自成》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一个写辛亥革命的计划。写完这两部书，就成了姚雪垠在晚年要完成的第二项重大历史任务！茅盾主前给姚雪垠的一首和诗中，最后有两句曾经这样写道：

“ 高龄百廿君犹半，
贺酒料应过两台。 ”

这就是说，茅盾不仅期望姚雪垠完成《李自成》和《天京悲剧》，贺酒可以超过两台，他还鼓励姚雪垠写完辛亥革命。

实际情况如何呢？“ 现在正处于《李自成》的最后决战与新作《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的准备阶段。 ” 一次，姚雪垠在他的无止境斋，曾向来采访他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这样说，并向这位记者详细讲述了他的这两部新作的创作计划的由来和故事梗概。

“ 描写辛亥革命的长篇历史小说的书名为什么叫《大江流日夜》呢？ ”
姚雪垠解释说：

“ 书名叫《大江流日夜》，这是借用东晋诗人谢眺《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一诗中的第一句，很有气魄。

《大江流日夜》同《天京悲剧》一样，姚雪垠也是准备只写几十万字，但却要把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面貌都充分反映出来。姚雪垠说：“ 《大江流日夜》在结构上，要比《天京悲剧》困难多，这将是一场攻坚战。 ”

姚雪垠计划把《大江流日夜》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写辛亥革命的前夕，主要内容有孙中山的活动，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武昌起义的准备，广州起义的始末等，一直写到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前。

第二卷，写起义枪声打响以后，到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这一段。在这一卷里，既要写孙中山、黄兴等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组织和发动的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也要写隆裕太后、宣统皇帝、袁世凯等人物，以及清朝宫廷生活和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情形。

第三卷，写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玩弄政治手腕就位；写同盟会被分化，写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写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讨袁战争的失败，孙中山、黄兴出国……同时还要穿插描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活动……

可以坚信，姚雪垠这位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古战场上指挥了三十多年、身经百战的“ 统帅 ”，不久后又将去叱咤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风云……

姚雪垠在晚年要完成的还有另一项工程浩大、更为艰巨的繁重任务，那就是在创作《李自成》、《天京悲剧》以及《大江流日夜》的同时，他还必需抽空整理、修改他一生以来的绝大部分各种体裁的作品，然后选编成有六百多万字的《姚雪垠文集》，陆续交例咄版社出版。

由此可见，晚年的姚雪垠并没有丝毫的轻松，他肩负的任务反而更加繁重，他要到达目的的路程也越来越漫长遥远……

至今，姚雪垠在整个人生前进的道路上，仅仅是标点一个“ 逗号 ”，而非“ 句号 ”。

他虽已即将进入耄耋之年，但却仍然任重道远。

姚雪垠对朋友说：

“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 ”

因而要求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不断前进，以最大的努力写出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作家的学习无止境，艺术追求更无止境。止境就是个人生命的终止。

“ 倘若我得享高龄，临终前我在病床上决不会回想我已经为党和祖国人民写成了什么作品，使我可以欣然白慰，而是遗憾我还有写作计划未及付诸实践。 ”

姚雪垠说得多么情真意切！

我们衷心祝愿姚雪垠能够健康长寿！

我们衷心祝愿姚雪垠的宏愿得以实现！1987年9月20日至1988年1月31日初稿于北京。

2月1日至8月1日一次修改。

3月至7月中旬改成。

后记

我从1976年冬天认识姚雪垠至今，已有十二年的时间。在我接触和了解姚雪垠的过程中，一直被他的事迹和精神深深感动，并且逐渐产生了为他写传的想法。经过长期对姚雪垠的了解和我的努力，如今终于将长篇传记文学《姚雪垠传》奉献给了读者。

姚雪垠虽早已进入了古稀之年，但他至今在人生的旅途中，仍然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所以，关于他的传记文学，也是一部未写完的书，我将与他一道继续写下去……

现在的这部《姚雪垠传》，采访、写作到成书，先后历时十二年。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从1976年冬天开始，到1985年5月是第一阶段。在这近九年的时间里，作为新华社的记者先后共采写播发了十几篇关于姚雪垠的报道：其中有向中央呈报的内参，有给香港报纸撰写的长篇人物专访，有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也有关于他登上文坛之前的传记文学。这篇文章介绍了姚雪垠通过刻苦自学成才的情况，如何进行历史小说《李自成》的；透露了他在完成《李自成》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的宏伟计划，及其具体内容；阐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治学经验：回答了广大读者所关心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等。

在采写这些报道的时候，我曾多次到姚雪垠家里，同姚雪垠本人，同姚雪垠的妻子王梅彩，同他的几个助手，一次又一次进行长谈，详细了解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有关情况。比如有一次是在1981年元宵节，我和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等五人到姚家请姚雪垠谈《李自成》三、四、五卷的故事梗概，结果一谈就是整整一天，姚雪垠讲得有声有色，有时轻松愉快，有时泣不成声，我们则完全被吸引了，磁带录了七、八盒，笔记记了一大本；同时，我还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湖北省文联等部门，找有关人员了解姚雪垠的情况；另外，我也亲临现场，采访有关部门和地方为姚雪垠举办或有姚雪垠参加的各种活动，比如他在首都作大报告，我必定去听，他审查有关《李自成》的电影，我也在场，他去外他讲学，我有时也随之前往……

就这样，在完成新华社报道任务，给报刊出版社撰写稿子的同时，我便搜集和整理了关于姚雪垠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这就为写长篇传记文学《姚雪垠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85年9月至1988年3月，是我写《姚雪垠传》的第二个阶段。

这期间，我写的长篇传记文学《马寅初传》于1985年10月脱稿，1986年《昆仑》杂志从第一期至第四期全文连载，1986年9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7年2月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又对全书作了广播。

本来，在完成长篇传记文学《马寅初传》后，我就计划要动手写传记文学《姚雪垠传》，但何时动手，还未决定。因为从1985年7月，我由新华社调国家教委后，担任《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进行业余创作。但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1987年初曾约我为该出版社写《姚雪垠传》，这便使我最后下了决心，尽快动手写《姚雪垠传》。为此，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我又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进一步补

充、系统搜集和整理姚雪垠的材料。

为了能够使这本传记写得更加丰富、真实、具体、生动。我又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补充采访姚雪垠的提纲。从1986年10月26日开始，到1987年12月20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姚雪垠事先有准备的情况下，又同他先后用十五个星期天的下午进行了长谈，而且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仅根据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稿子就有近十万字；与此同时，我还借阅了许多他珍藏的档案材料，阅读了各界人士给他的不少信件，仔细观看了记录他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几十本相册……所有这些都大大增进了我对姚雪垠的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

1987年炎夏，当完成了北京外文出版社要我对中文本《马寅初传》作一些补充和修改，然后由他们翻译成英、法、日等五种外文的任务后；在对写《姚雪垠传》的一切准备工作和构思完成之后，从1987年的9月下旬开始，我便在业余的时间动手进行创作。从这时起，到1988年的3月中旬，在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利用所有的节假日、星期天和每天晚上的时间，一直不停地进行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传记文学《姚雪垠传》。

写作之前，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曾得到新华社社长穆青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的帮助和支持，由于他们的热情关怀，才坚定了我在规定时间内写完这本书的决心。

在写作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季涤尘同志，对我进行热情的帮助和指导；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我的爱人魏穆紫同志不仅全部承担了家务，保证了我的创作时间；而且她还替我整理了采访姚雪垠的近十万字的录音稿子；并积极协助搜集资料，作为第一读者，她还认真阅读了初稿，纠正了书稿中的一些错漏处……

著名摄影工作者、《中国妇女》杂志摄影记者刘立冰，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同我一起到姚雪垠家拍了姚的许多照片、有关《李自成》的实物以及著名人士的手记……

稿子写完后，吴淑清、张蕾、杨峥、杨巍、魏穆紫等同志，在盛夏暑热难耐之际，不辞辛劳，帮助我抄清原稿……

今天，《姚雪垠传》虽然同读者见面了，但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加之所收资料也许不够齐全，所以书中很可能会有遗漏和差错，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姚雪垠本人以及与姚雪垠共过事的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于北京

附录一：

姚雪垠生平创作主要年表

(1910年至1988年)

1910年

10月10日(农历庚戌年九月初8)，出生在河南省邓县西乡姚营寨的一个破落地主家中。父亲姚熏南，字化甫，曾在河南省会读过书，母亲张氏，家庭妇女，不识字。姚雪垠出生之前，姚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长子姚冠杰(后改名姚含章)、次子姚冠洛(后改名姚作华)，因此，姚雪垠出生后，在他们兄弟中已是排行第三，故起名为姚冠三。

1911至1918年

8岁以前，一直在农村生活，不曾识字，喜欢听大人讲历史故事，说“古今”，听外祖母讲童话。

1919年

秋天，家中的房屋和全部东西，都被土匪放火烧光。从此，姚家由破落地主变得赤贫如洗，姚雪垠随父母逃到邓县城中租房居住。

冬天，9岁的姚雪垠开始由父亲在“烟榻上”教识字，为期半年多。

1920年

春天，10岁的姚雪垠上了李万千老师办的私塾，在这里曾读书一年。

1921年

春天，11岁的姚雪垠进入了邓县北城一条街上李萼楼办的私塾，读书半年。在此期间开始学写文言文作文。

秋天，姚雪垠考入了邓县银行街教会办的鸿文高等小学，开始了他为期三年的小学学习生活。1924年

夏天，14岁的姚雪垠以优异的成绩在鸿文高等小学毕业。毕业后，曾到洛阳，准备进吴佩孚的幼年兵营当兵，因遭到已在洛阳西工当兵的大哥姚冠杰的坚决反对，未能如愿。秋天，由洛阳来到信阳，插班进入教会办的信义中学(初中)二年级学习。

11月，因军阀混战，学校提前放寒假。姚雪垠与二哥姚冠洛在由学校回邓县家乡的途中，不幸被土匪绑架，成了“肉票”；姚雪垠被绑架后，曾先后作过两个上匪头目的义子，在土匪中生活了大约一百天。

1925年

阴历二月上旬，绑架姚雪垠弟兄的土匪被地方军阀打败，姚雪垠被他的土匪义父派人送回邓县，失学在家。

秋天，到攀城进入教会办的鸿文书院读初中二年级，但仅几个月，就被家中叫回。从此直到19岁，姚雪垠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失学在家。其间，他虽然又曾两次进私塾，又曾两次跑去当兵，但时间都很短，为的是逃避令他难以忍耐的家庭。其余时间，都在自学古文，阅读有关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作品。

1929年

春天，19岁的姚雪垠离开了充满悲剧和没落气氛的家庭，来到河南省会开封寻找出路。

在极度贫穷中，经过一段紧张的应考准备，由同乡提供一张假文凭，在秋天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学习。入学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封地市委领导下的学潮委员会及其组织的活动。

9月，在《河南日报》副刊，以笔名“雪痕”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两个孤坟》，显示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

1930年

8月，以“共党嫌疑”被捕，受审讯，关押四天，但因查无实据，后被同乡王庚先保释重回学校。

1931年

5月，在开封同工梅彩结婚。时年姚雪垠21岁、王梅彩18岁。

暑假州间，被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挂牌开除。因怕再次被捕，在挂牌的当天下午，只身由开封乘火车逃往北平。

从此，姚雪垠结束了他一生中短暂的学生时期的学习生活，开始走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刻苦自学道路。

姚雪垠到北平后，开始想通过自学作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史家，后因贫病交加，生活所逼，只好靠投稿谋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冬天，回到河南。父亲姚薰南要姚雪垠将他笔名中一个不吉利的“痕”字换成“垠”字，他当即同意。从此，“姚雪垠”的名字一直使用至今。此后他还曾用过“冬白”作笔名，但为时很短。

1932年

春天，到豫北淇县楚旺中学教书。秋天，到信阳义光女子中学教书。冬天，回到开封，失业在家。这时，他在河南省立图书馆，首次看到有关记载李自成三次进攻开封的李光墜的《守汴日记》和周浚的《大梁守城记》。最早接触到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史料。

这年女儿姚海燕在开封出生。

1933年

秋天在开封岳父王庚先家中，读书写作；冬天，辛亥革命老人、同盟会会员王庚先被宛西军阀刘廷芳杀害。

1934年

春天，姚雪垠同妻子王梅彩、岳母等全家由开封迁回邓县居住；然后，姚只身去北平自学与写作。从此时起到1937年，先后在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杂感之类的作品。

冬天，患肺结核，吐血，先后回河南杞县大同中学、邓县家中养病。

1935年

春天，去北平自学和写作。夏天，肺结核病又大吐血，八月初回河南到杞县大同中学养病。冬天回邓县家中一边养病。一边搜集口语。这一年发表了《野祭》、《渡船上》、《鸟文人》等十多篇小说、散文和杂感等作品。

1936年

长子姚海云在邓县出生：

整个夏天和秋天，姚雪垠一边在邓县家中或大同中学养病，一边继续收集口语，编成《南阳语汇》一书。

冬天，在大同中学听地下党员、诗人赵伊坪讲的一个动人故事后，便在此基础上丰富、加工，创作了短篇小说《红灯笼故事》。

1937年

春末，带妻子王梅彩由邓县到北平，住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

7月7日，北平芦沟桥事变爆发，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姚雪垠送妻子

回河南老家，只身留在北平。

8月8日，日本侵略军正式开进北平城。27岁的姚雪垠化装成浪荡公子哥儿，乘火车逃离北平，经天津、山东返开封。

9月，在开封与王阑西、嵇文甫、范文澜创办抗日刊物《风雨》周刊，并任主编。

这一年发表小说《碉堡风波》等和各种文章20多篇。

1938年

这年，次子姚海星在邓县老家出生。

春天，由开封去武汉，写成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五月在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三期发表，曾轰动文坛，受到茅盾、郭沫若等许多人的高度评价。这是姚雪垠青年时代的成名作。

3月27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曾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名义赴山东前线以及安徽采访，随后写成报告文学《战地书简》，于六月在汉口出版。

冬天，应钱俊瑞函邀，参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的进步文化活动。

1939年

春天，蒋介石下令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姚雪垠仍留五战区，在长官司令部挂秘书名义。

秋天，在湖北老河口，在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并在重庆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上连载。

本年有《红灯笼故事》、《四月交响曲》等六篇作品发表。

1940年

仍在五战区，继续从事创作。

2月，开始写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5月，短篇小说《红灯笼故事》由大地图书公司出版，12月，第三个儿子姚海天出生。

1941年

1月，完成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11月，在抗战文艺发表：

皖南事变发生后，被第五战区驱逐回家。6月由邓县去安徽立煌，后以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安徽民政厅长韦永成的名义主编《中原文化》（半月刊）。

本年发表有《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论创作的学习过程》等11篇作品。

1942年

秋天，离开安徽立煌，经邓县老家去重庆。

十月，重庆文座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11月，发表《屈原的文学遗产》；年底，中篇小说《戎马恋》由大东书局出版。

1943年

1月，从大别山到重庆，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创作。

春天，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兼任创作研究部副部长。

2月1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发表《需要批评》一文。

中篇小说《重逢》2至4月在《文艺先锋》发表，7月由东方书社出版。

6月，《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4年

在重庆从事创作。

4月至9月，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分三册，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出版。

1945年

春天，因单靠写作无法维持生活，离开重庆去四川三台，应聘担任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时年35岁。

夏天，在成都东方书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长夜》。

1946年

年初，由三台来到成都。整个上半年，先后在成都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学院等高等学校应聘担任特约讲座。

夏天，离开四川成都，先在上海小住，后回河南邓县。

这一年姚雪垠的父亲姚薰南和母亲张氏，先后去世。姚雪垠在回家期间安葬了双亲。

这一年，《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散文先后在成都《华西晚报》发表。

1947年

1月上旬，由河南邓县经开封到上海，从事创作。1月中旬同上海怀正文化社经理刘以伦谈定由该社出版《雪垠创作集》的计划。之后，住在怀正文化社创作长篇小说《长夜》、传记文学《记卢镡轩》，选编集子。

3月中旬，完成长篇小说《长夜》，交怀正文化出版社付印。夏天开始在上海《联合晚报》连载数月。

这年，由上海怀正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雪垠创作集》共有四种：第一种：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

第二种：长篇小说《长夜》；

第三种：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第四种，传记文学《记卢镡轩》。

1948年

在上海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开始研究明史并撰写史学论文；同时在高行农业学校教语文课。

这年发的作品有：电影剧本《万里哀鸿》，史学论文：《崇祯皇帝传》、《明初的锦衣卫》等。

1949年

上海解放后，姚雪垠一边任私立大夏大学兼职教授；一边下申新一厂体验生活。4月由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小说《母亲》，12月发表小说《因为我也是工人》。

1950年

春天，任大夏大学教授，兼任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院长。

这年，他一边任教，一边创作了剧本《一封信》；但思想上却在考虑一个重大问题：下半生是在高校教书、作学问，业余进行创作，还是离开教育

岗位，去重当专业作家？1951年春天，随“上海大学教师土改队”去浙东一趟。因不懂当地话，难以深入群众工作和体验生活，促使他下决心离开上海回河南重当专业作家。暑假前两个月，向学校提出回河南的请求，经校方苦劝挽留无效，最后只好批准。8月1日，姚雪垠离开上海大夏大学，返河南重当专业作家。1952年回到河南文联重当专业作家，住开封，从事创作。原来计划回河南后，将他的农村三部曲（《黄昏》、《长夜》、《黎明》）中的《长夜》加以修改，把另两部也完成；并以河南镇平的彭锡田和内乡的别廷芳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小独裁者》。但因当时有关领导不同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计划变成泡影。1953年中南作协成立，由河南迁湖北武汉，从事创作。中南作协将他由文艺八级，提升为文艺六级。1954年在新乡通丰面粉厂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萌生了以该厂的历史演变为原型，创作题为《白杨树》的长篇历史小说。随即并动手进行写作，并在这年底写出了20多万字的稿子。但中南作协有关领导坚决反对，不让他写下去。为此，姚雪垠一气之下，愤怒将稿子烧毁。本年发表有《试论 儒林外史 的思想性》等三篇作品。

1955年

处于创作苦闷时期。只有零星文章发表。

1956年

春天，患头晕病，无法写作，五月由武汉回开封家中休养；秋天，去江苏无锡太湖休息，在太湖养病期间，曾去惠泉一游，随即萌生写散文的念头，并在当时就写出了散文《惠泉吃茶记》。后由《新观察》在1957年第二期发表。此文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冬天，着手将中篇小说《携手》改为长篇小说《捕虎记》。这一年发表的作品有《谈打破清规戒律》（刊于《长江文艺》一九五六年第八期）等四篇。

1957年

这一年，47岁的姚雪垠遭到了错误的毁灭性的打击。

春天，应作家出版社邀请到北京修改长篇小说《捕虎记》，改后准备出版。

在京期间，应《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之约，计划为这家刊物写五、六篇北京散记，但仅写出发表两篇后，因反右派斗争开始，彭子冈挨批斗，就停止了。

这一年上半年，他发表的主要作品和文章有：

《创作问题杂谈》，刊于1957年1月10日《文汇报》。

《卢沟桥礼赞——北京散记之二》，刊于《旅行家》1957年第六期；

《打开窗户说亮话》，刊于《文艺报》1957年第七期；

《要广开言路》，刊于《文艺报》1958年第八期。

八月下旬，正在北京西山修改稿件的姚雪垠，被中南作协打电报，并来人叫回武汉。从9月上旬开始，中南作协就把姚雪垠作为“极右分子”，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多次猛烈批斗。

10月上、中旬，姚雪垠开始秘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1958年

从1月到7月，在极其“孤立”的状态中，夜以继日地秘密创作《李自成》。

8月初，经湖北省委批准，正式划定姚雪垠为“极右分子”，并决定于8月下旬下放他到武汉郊区东西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

从1957年10月下旬到1958年8月下旬下放劳动前，姚雪垠已秘密写出《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四十多万字，而且还写出第二卷的一部分。

1959年

在东西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仍在秘密创作《李自成》。

秋天，两腿患急性关节炎，不仅不能劳动，连生活也无法自理。为此，看管人员批准他10天假期回武汉市治病。

1960年

在东西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秘密创作《李自成》。

国庆前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被分配到武汉市文联，从事创作工作。

年底以前，将《李自成》第一卷的部分手稿送给武汉市文联主席程云看，程云看后认为写得非常成功，即向武汉市委书记宋一平作了汇报，并提出要支付姚雪垠写作《李自成》的建议，市委同意程云的建议，决定给姚雪垠支持。

这时正值中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副食非常短缺。武汉市委为了保证姚雪垠能够吃饱、吃好，顺利进行创作，让他住进当时最高级的饭店——璇宫饭店。开始同龚啸岚合作编写汉剧《王昭君》，之后集中精力写作《李自成》第一卷。

夏天，40多万字的《李自成》第一卷初稿整理完毕；10月中旬，寄交中国作家协会。10月28日，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来信，要求出版《李自成》。1962年1月4日，在姚雪垠的要求下，《李自成》第一卷初稿由中国作家协会转给中国青年出版社。

春节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江晓天，专程到武汉找姚雪垠商谈有关青年出版社出版《李自成》一书的具体事情。春天，姚雪垠将家从河南开封搬到武汉。

七月下旬，与程云去庐山，合写歌剧《闯王旗》；同时，在山上研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游览风景名胜。

八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李自成》第一卷初稿打印成20部“征求意见本”。

九月底，由庐山返武汉。十月初，武汉市委文教书记宋一平主持为《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本”召开小型座谈会。姚雪垠参加完这次会后，即去北京。

国庆节后，吴晗会见并宴请姚雪垠，席间谈对《李自成》第一卷的肯定意见与不足之处。之后，江晓天又陪同姚雪垠先后拜访阿英、李文治等专家，征求对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的意见，均获支持。

入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三次修改《李自成》第一卷。

这年发表的作品有：长篇传记文学《杜甫传》的部分章节：《草堂春秋》（刊于《长江文艺》1962年第10期。）

1963年

从1962年初冬起至春节前夕，经过百日苦战，将《李自成》第一卷初稿改完。之后，由北京返武汉家中过年。

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李自成》清样寄武汉，姚雪垠又在清样上大

改一次，才算最后定稿。之后，继续创作《李自成》第二卷。

7月，《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秋天，姚雪垠和妻子王梅彩同到武汉的一个邮局，给毛泽东主席呈寄一部《李自成》第一卷。

1964年

创作《李自成》第二卷。

3月20日，《我所理解的李自成》一文，在《羊城晚报》发表。

6月，全国文艺界进行第二次整风运动。在对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过火的政治批判中，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受到一些人在会上的口头批判，他的传记文学《草堂春秋》被打成毒草，受到湖北省的报刊点名批判。

1965年

创作《李自成》第二卷。

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不久，《李自成》第一卷被作为大毒草在大字报、漫画和各种会上受到批判，武汉地区造反派编辑铅印的小册子《毒草一百种》中，把《李自成》列为第53种。

此时，姚雪垠也被贴大字报批判。

8月上旬，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大破四旧。姚害怕红卫兵来抄家惹祸，自己忍痛烧毁1962年在庐山写的散文《铁船峰游记》和《李自成》第二卷中的《刘宗周写奏本》一章等稿件。

6月中旬，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看过了，写得很不错。你告诉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继续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就将毛主席的指示打电话告知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当即武汉市委就对姚雪垠采取了保护措施。

1967年

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受批斗。

1968年

到武昌县金口参加所谓“斗批改”。一面接受审查和批斗，一面放牛。

1969年

继续接受审查批斗。

1970年

3月，被下放到湖北省蒲圻县的“五七干校”，放牛、管理仓库。

1971年

在“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

在“五七干校”劳动。春天，利用回武汉休假，去找武汉市革委会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要求继续写作《李自成》，获得同意。夏天，在于校一面劳动，一面创作《李自成》第二卷。

1978年

春天，由“五七干校”回到武汉，继续创作《李自成》第二卷。1974年从夏天开始，同中断关系二十多年的茅盾进行长达近两年的通信，一面让茅盾看《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手稿，请提意见；一面向茅盾讨教《李自成》创作中的美学等各种问题，获得茅盾的热情帮助。

8月，写完八万多字的《李自成 全书内容概要》。

1975年

《李自成》第二卷的创作和修改受到严重干扰。

10月19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创作情况和创作计划，请求对他的创作给予支持。11月，毛泽东主席收阅了由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他的姚雪垠来信，并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同意姚雪垠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有关部门的关怀下，姚雪垠于12月21日由武汉来到北京，借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职工宿舍——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一楼三单元三号，专门修改《李自成》第二卷。

1976年

在修改《李自成》第二卷的过程中，姚雪垠顶住了“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宁肯不出书，也不将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李自成反孔”等内容加入书中；更不用“四人帮”提倡的所谓“三突出”“三陪衬”的理论来指导修改作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波及北京。在此期间，姚雪垠不顾震情吃紧和自己的安全，一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面马路上的一个防震棚里，坚持修改《李自成》第二卷。

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很快审稿部门就都同意了按照姚雪垠关于对《李自成》第二卷最后定稿的意见，中国青年出版社送工厂发排付印。

年底，开始创作《李自成》第三卷。

1977年

创作《李自成》第三卷。1月19日，给郭沫若写信，征求对《李自成 第一卷再版前言》的意见。1月22日，获郭沫若复信。

1月至3月，《李自成》第二卷分上、中、下三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7月，《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分上、下两册出版。至此，《李自成》已有五册、共123万多字同读者见面。广大读者纷纷争相抢购、阅读谈论《李自成》。很快，《李自成》受到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小说连播节目中，广播了《李自成》，文艺界将它陆续改编成各种形式搬上舞台、银幕，新闻界、评论界也广泛宣传评论《李自成》……

夏天，到沈阳、锦州、秦皇岛等地参观、考察清故宫和松山战役、山海关大战的遗址，为《李自成》三卷的创作搜集资料。

11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派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专程去看望姚雪垠。

1978年

创作《李自成》第三卷。

2月中旬，到武汉出席湖北省第四次文代会，在会上被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

2月下旬，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列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李自成 创作余墨》在这年的《红旗》第一期发表。《李自成》第三卷的部分单元，如《张献忠破襄阳》、《三雄聚会》、《燕辽纪事》、《辽

海崩溃》等，先后在《解放军文艺》、《辽宁文艺》、《人民文学》和《鸭绿江》等刊物发表。

1979年

创作《李自成》第三卷。

2月下旬，湖北省委决定：姚雪垠1958年被错划为“极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名誉。

5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三周。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姚雪垠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

这一年，《李自成》第三卷的部分单元，如《慧梅出嫁》、《袁时中叛变》等在《收获》和《长江》文艺丛刊发表。

1980年

完成并改定90余万字的《李自成》第三卷，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发排、付印。

开始写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新文学史料》从1980年第三期刊登第一部分起，到1983年第一期刊登第十一部分止。）

夏天，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一次年会。在会上被选为该学会会长。会议期间，还作了关于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报告，并去华南师范学院和顺德县讲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一辑，发表《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在《文学遗产》1980年第一期，发表《论〈园园曲〉》一文。

这一年，《李自成》第三卷的部分单元，如《项城战役》、《朱仙镇》、《第二次开封战役》、《洪水滔滔》等在《芳草》、《长江》（文艺丛刊）、《解放军报》发表；还为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歧路灯》一书作序。

1981年

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长夜》；3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姚雪垠著作小集”之一：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3月27日文学巨匠茅盾在北京逝世，姚雪垠闻讯，十分悲痛。从3月30日至4月11日，一连写了《一代大帅，安息吧！》、《读旧信追怀哲人》、《老将殊勋青史在》等三篇悼念茅盾的文章，分别在《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和《新港》杂志上发表。

5月，由北京去河南开封、郑州、洛阳等地讲学。被聘为河南师范大学顾问、郑州大学名誉教授。

6月，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二次年会。长篇史学论文《评〈甲申三百年祭〉》，在《文汇报》1981年1-3期发表，引起史学界的一场热烈讨论。

6月至9月，《李自成》第三卷分上、中、下三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9月20日，新华社发了出版消息。至此，《李自成》前三卷，已有八册，220多万字。

秋天，在武汉东湖黄鹄湾，构思并开始创作《李自成》第五卷。

12月7日，由骆文、沈毅介绍，在湖北省文联党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

创作《李自成》第五卷。

春天，《李自成》被全国中学生评为“我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

6月，在湖南衡山主持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同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姚雪垠著作小集”之二：散文集《大嫂》。7月下旬，到沈阳、大连等地讲学。

10月，《李自成》第一卷的中文本，经日本作家陈舜臣、陈谦臣翻译成日文，日文书名定为《叛旗》，由日本讲谈社在东京出版。12月，《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2月15日，在授奖仪式上，姚雪垠登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领取了紫铜的奖章和三千元奖金。随后，姚雪垠又将三千元奖金全部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1983年创作《李自成》第五卷。5月11日，向助手俞汝捷《谈李自成第五卷》的信在《文汇报》发表。

5月中旬，去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实地考察李自成牺牲遗址，为创作第五卷中的《双星陨落》单元搜集资料。考察之后写有《九宫山麓吊李自成墓》一文，发表在《文汇月刊》1983年第10、11两期。

6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列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月，被吸收为第六届全国政协文化组成员。1984年创作《李自成》第五卷。

1月，长篇小说《长夜》中文本，由法国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和他的夫人雅克琳·阿雷依思译成法文，并由弗拉马利翁出版社在巴黎出版，引起法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和评论界的关注，轰动了巴黎。

春天，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给姚雪垠写信，称赞《李自成》与他别的作品，并要求将《李自成》翻成英文。

10月26日到11月9日，以著名作家身份应邀请前往法国参加马赛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和名作家卖书签名仪式活动，在马赛和巴黎进行为期两周的成功访问，并被授予“马赛市纪念勋章”。

1985年

创作《李自成》第五卷。1月3日至10日，应邀以中国大陆作家个人身份，参加新加坡《南华早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和金狮文学奖颁奖大会。在星岛评判作品中，巧遇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与之建立了忘年之谊。

结束新加坡的访问后，途经香港，应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之邀，又于1月10日至17日在香港访问一周。

2月，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名誉主席。

2月，《李自成》第五卷中的《巨星陨落》一个单元的部分章节，在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第一期发表。

这年，《李自成》第五卷的《李自成之死》单元，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办的大型文学季刊《小说》上同读者见面。

6月20日，写完长篇学术论文：《论当前的通俗文学》，并发表和出版。

10月下旬，湖北省通山县举行“关于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全国明史专家及研究者数十人参加。姚雪垠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会后写成长达几万字的史学论文：《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后被收入《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一书，198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年，被选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武汉分会

副理事长。

1986年

创作《李自成》第五卷。1月，《李自成》第五卷中近十万字的一个单元《崇祯皇帝之死》，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办的大型文学季刊《小说》上发表。

4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希望中央从速制定思想文化战线的战略方针》的发言。之后写成《应当重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一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调查和研究》1986年第21期发表。

5月上旬，湖北省为姚雪垠、徐迟、碧野举行创作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不仅每人发给他们一张奖状，而且还拍摄了宣传他们创作道路和成绩的纪录片。姚雪垠于5月7日在武汉东湖翠柳村，曾为此作《灯下咏怀》七律一首。

夏天，在青岛主持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学术年会，被聘为青岛大学名誉教授。

从6月中旬至国庆前，一直在湖北通山风池山庄创作《李自成》第五卷，草拟《姚雪垠文集》内容。8月30日，湖北大学姚雪垠著作研究室打印出了包括三十三卷的《姚雪垠文集》初步内容纲目。9月，在通山风池山庄完成《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一文，在11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21期发表。

1987年

创作《李自成》第五卷。

修订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并为再版该书写了序。

2月18日，红旗杂志文艺组，以“内部材料”印了《姚雪垠（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与刘再复同志商榷）》发表前后的有关信件，发至中央各部门供参阅。

3月4日，完成长达数万字的《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再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一文。后于4月16日和5月1日，在《红旗》第8、第9两期连载。

3月下旬至4月上旬，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大会，并在4月3日的闭幕会上作了题为《端正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的发言。随后，他又将这个发言加以补充修改，写成五、六千字的文章，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为题，4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夏天，去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往主持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年会。10月，《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一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10月开始为全国政协文化组，撰写《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回忆性的长文。

1988年

修改、完成《李自成》第五卷。

修订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3月6日被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3月24日出席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3月25日列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6月10日，在《文汇报》第六期，发表《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一文续后》——给《文汇报》编辑部的长信。

姚雪垠主要著作

一、主要文学作品：

1. 《战地书简》（报告文学）
1938年6月由汉口上海杂志公司初版，1册。
2. 《四月交响曲》（报告文学）
1939年10月由桂林前线出版社初版，1册。
3. 《M站》（收《界首集》、《血的蒙城》、《鄂北战场神秘武装》、《战地春讯》、《M站》五篇）1942年6月由桂林文学编译社初版，1册。
4. 《春到前线》（短篇小说集）
1942年10月由桂林文学编译社出版，1册。
5. 《红灯笼故事》（短篇小说集，收有短篇小说《红灯笼故事》、《选举志》、《差半车麦秸》、《碉堡风波》等篇。）1940年5月由大地图书公司初版，1942年10月由桂林大地社再版，1册。后来，《红灯笼故事》还译成俄文，被选入苏联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
6. 《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篇小说）
1942年10月由重庆文座出版社出版，1册。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以《雪垠创作集》第三种出版；1981年3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以“姚雪垠著作小集”之一再版。
7. 《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集）
1943年9月由桂林远方书店出版，1册，其中《差半车麦秸》曾被叶君健译成英文，在美国一家进步杂志发表，还被苏联人罗果夫译为俄文，收入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1947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以《雪垠创作集》第一种出版。
8. 《重逢》（中篇小说）
1943年7月由重庆东方书社初版，同年9月再版，1册；1947年上海东方书社又出版。
9. 《戎马恋》（又名《金千里》，中篇小说）1942年3月由重庆大东书局初版；1943年12月由重庆大东书局再版；1946年由上海东方书社以《金千里》的书名又出版。
10. 《母爱》（长篇小说《新苗》第一部）
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出版，1945年5月再版，1册。
11. 《春暖花开的时候》（长篇小说，共三册）
第一分册：1944年4月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初版；
1947年8月上海现代出版社六版；
第二分册：1944年5月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初版；1945年3月三版；
第三分册：1944年9月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初版）
1946年12月上海现代出版社三版。
说明：此书，后来在香港曾三次出版，在东南亚和香港广为流传。
1969年香港高原出版社将《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入《鲁壁文艺丛书》出版时，曾将原来的三分册，合为一本出版。
12. 《长夜》（长篇小说）1947年6月由上海怀正文化社以《雪垠创作集》第二种出版；
1981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
1934年1月，由法国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和他的夫人雅克琳·阿雷依思译成法文，并由法国弗拉马利翁出版社在巴黎出版。
13. 《记卢镛轩》（长篇传记文学）

1947年8月由上海怀正文化社以《雪垠创作集》第四种出版，1册。

14.《李自成》（长篇历史小说，全书共分五卷）《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

1963年7月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

1977年7月，经重新修订，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

1982年10月，由日本作家陈舜臣、陈谦臣译为日文，以《叛旗》的书名，由日本讲谈社在东京出版。

《李自成》第二卷（分上、中、下三册）

1976年12月至1977年3月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李自成》第三卷（分上、中、下三册）

1981年6、7、8月分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上、中、下三册先后出版。

15.《大嫂》（散文集）

1982年6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以“姚雪垠著作小集”之二出版。

说明：这本散文集，共收有他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散文17篇，12万多字。按性质划分，这本散文集共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游记散文，有六篇；第二组是回忆他的老母亲、外祖母和大嫂的，共三篇；第三组是怀念和追悼师友的，为六篇；第四组写于三

十年代中期和四十年代初期，共两篇。

二、主要文学和史学论著

（一）主要文学论著

1.《屈原的文学遗产》

刊于1942年11月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第三卷第二期；

2.《小说是怎样写成的》

1943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册。

3.《小说结构原理》

刊于1944年1月《文艺先锋》四卷1期；

4.《论目前小说创作》

刊于1944年3月《半月文萃》三卷一期。

5.《试论 儒林外史 的思想性》

刊于1954年《长江文艺》第四期。

6.《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

刊于1956年《文艺报》第21期。

7.《读 带经堂诗话 有感》

刊于1956年11月25日《文汇报》：

8.《读 带经堂诗话 有感之二》

刊于1956年12月21日《文汇报》

9.《关于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 》

1979年9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说明：这本集子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的。它从不同的形式和侧面介绍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情况和研究成果。其中收有姚雪垠二十九篇关于探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创作中的美学、结构和风格等多方面问题的文学理论文章及书

10.《略谈中国古典长篇小说》

刊于1981年《中国通俗文艺》第三期。

11. 《谈小说创作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刊于 1981 年《当代文学》第一期。

12. 《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1987 年 10 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说明：这个文艺论文集子共包括五篇论文，都是作者 1985 至 1987 年间发表的。它们的篇名是：

一、《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二、《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再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三、《论当前的通俗文学》，四、《应当重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五、《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

(二) 主要史学论文。

1. 《崇祯皇帝传》

刊于 194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3 月上海《幸福》月刊第二十二至二十六号；

2. 《明初的锦衣卫》

刊于上海《中国建设》杂志第七卷第六期。

3. 《李自成为什么失败？》

1979 年 11 月至 12 月在香港《文汇报》连载；

4. 《论 园园曲 》

刊于 1980 年《文学遗产》第一期；

5. 《评 甲申三百年祭 》

刊于 1981 年《文汇报》第一至三期；

6. 《李自成的归宿问题》

收入《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一书，1987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